史學譯叢　張玉法主譯

現代中國史

合譯者

林滿紅　朱泓源

宋淑章　林貞惠　唐遠華

經世書局印行

史學譯叢 張玉法主譯

現代中國史

合譯者

林滿紅 朱浤源

宋淑章 林貞惠 唐遠華

經世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三版

現代中國史

定價新臺幣 壹佰貳拾圓整

主譯者：張玉法
發行人：馬之驌
出版者：經世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99號世界大樓1108室
電話：三一二二八九八號
郵撥：臺北六八九四號
印刷者：華信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板橋市中山路二段531巷46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玖叁貳號

序

近年政府機構和各書局出版有關現代中國史的教科書很多，雖然內容不一，史實詳略互異，但在解釋上大都相同，這代表國內研究現代中國史的風氣。這些年來，外國也有一些類似於教科書的現代中國史出版，不僅內容不一，史實詳略互異，而且在解釋上彼此也多有不同，這代表國外研究現代中國史的風氣。除對現代中國史有深研的學者以外，就一般讀者而論，中國人對現代中國史的了解如此，外國人或在國外的中國人對現代中國史的了解如彼。中國近百年來講求「上下通，中外通」，近年全國上下更假各類溝通，以造成社會和諧，使國家能進一步躋身於現代國家之林。如果在史學上能加強中外溝通，必可使我國史學在世界史學中爭取重要地位。

史學需要中外溝通，是因爲中外學者以不同的角度觀察史事。就現代中國史而論，外國一些學者視國內學者的著述爲政治宣傳，國內部分學者視外國學者的著述爲荒謬不經。如是，以目前我國千餘萬人的視聽，以抗世界數十億人的視聽，雖然大氣磅礴，猶覺力有未逮；不若彼此先解除藩籬，交換彼此觀點，然後從學術上爭論辯駁，以求眞理自明。如是，不僅現代中國史學能脫離舊巢穴，向無窮的學術領域推廣，而且能加速中國史學發展，作爲學術獨立的一個起步。多年來許多人去外國學習中國史，成爲世界知名的史學家，國內卻未造就多少世界知名的史學家，這就是學術不獨立的表徵。

基於這一點構想，幾年前就想從翻譯一部英語世界流傳較廣的現代中國史做起，但因本身研究工作繁重，迄無暇動筆。去年經世書局發行人馬之驌表示希望出版一些史學上的翻譯書籍，題名「史學譯叢」，要我請人翻譯。爲了倡導起見，決定先出一部「現代中國史」譯本，作爲投石問路之計。但何書値得完全翻譯，或出版後不至過於驚世駭俗，頗費斟酌。因決定就流傳較廣的幾本教科書中，依照史事先後，各選取兩三章，編譯爲一册。這可使讀者了解外人所著現代中國史的大概，且可不囿於一說。

被選譯的教科書有四種，一是克拉博（O. Edmund Clubb）的「二十世紀中國」（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1964.），二是希諾（Jean Chesneaux），巴畢爾 Francoise Le Barbier），布爾吉（Marie-Claire Bergere）合著的「中國——從辛亥革命到中共佔據大陸」（China: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 New York, 1977.），三是徐中約（Immanuel C. Y. Hsü）的「現代中國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London and Toronto, 1970.），四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克萊格（Albert M. Craig）合著的「東亞——現代的變遷」（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and Tokyo, 1968, Third Printing）。本書第一、五章由第四書譯出，第二、三、四章由第二書譯出，第六、七章由第一書譯出，第八、九章由第三書譯出。第一、二章由宋淑章小姐翻譯，第三、四章由唐遠華小姐翻譯，第五章由林貞惠小姐翻譯，第六、七章由林滿紅小姐翻譯，第八、九章由朱浤源先生翻譯。章節及內文標題，儘量照原書譯出，惟因各書體例不同，其章節及內文標題闕如或

意義不明顯者，由編者補入或稍加改動。

被選譯的這些書，都藏於國內各大學圖書館，一般大學生，至少歷史系的學生，應該都知道或讀過的，但仍有翻譯的價值：⑴不一定每所大學都藏有這些書，⑵不一定每個想讀的人都能借到這些書，⑶不一定每個想讀的人都沒有閱讀上的困難。經過選擇彙譯成書之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人手一册，隨時查閱，以與其他教科書相對照，俾能發現問題，進一步研究。

由於時勢所需，國內研究現代中國史的廣度與深度已漸增加。我不認為國內一般現代中國史教科書的論述都是說教式的，我也不認為國外一般現代中國史教科書論述都是荒謬的，是否客觀公正，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聞政府正囑有關機構開放史料，加強研究，希望國內的現代中國史研究，不久就可以進入學術的新境界。

張玉法 於中央研究院

現代中國史

目錄

第一章　改革與革命

第一節　清末的改革

清朝最後十年（一九〇一——一九一〇），與其說是一個逐漸走向衰敗瓦解的時代，不如說是一個改革變遷的時代。因爲政治制度與社會的改變，早已開始，而政治風暴僅僅到最後才爆發。事實上，在一九一一年以前，清廷爲了防止內部的分裂，已經開始重拾百日維新的故法，循著政法制度的改革，開始一連串重建的工作。而曾經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百日維新時推翻光緒皇帝與康有爲改革勢力的慈禧太后與其周圍的保守分子，也在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後，開始著手實行大部份百日維新內想做而未做到的激烈改革計劃。事實上，他們確已無選擇的餘地，義和團的失敗已顯示出純排外主義的失敗，再加上反清革命的威脅，驅使清廷不得不採取積極態度以自救。因此當革命運動在中國外緣滋長時，保守的改革運動爲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最主要的運動。至於革命運動方面，革命主要領袖孫中山先生（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自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廣州起義後，一直從事反清革命，但是直至一九〇五年，革命主義仍是片斷散漫的。所以在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以前，革命早期歷史僅是變流中的小旋渦而已。

爲革命打下基礎的不是革命份子，而是那些改革者，因爲清廷試圖引導的一連串變革，最後導致中

國人生活形態之改變與清廷本身的改變，這些並不能阻止將來傾覆清廷的反清勢力與離心勢力的增長。清廷派送出國留學的學生、在本國接受訓練的新軍、民族企業鼓舞下產生的商人、各省設立的諮議局，最後都轉向而變爲反清勢力，成爲傾覆清廷的主力。因此清廷就好像處在政治流沙中，愈是掙扎自救，陷得愈深。就中國民族主義的現代化而言—其意義或指滿人統治之結束—現代化就是沿海與長江流域各省興起的地方力量預示清廷中央權力的前途悲觀。

在這條走向政治死亡的道路上，清廷的改革努力不僅是機會主義者。在革命運動壓力下所施的一點反應，雖然其過程確是相當遲緩微弱，沒有效力，而且從沒有一個重大軍事壓力催促其進行，但是如果就解決中國現代化特有的問題而言，滿清在他們權力運用下所施的各種改革是很值得的。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慈禧太后在西安下詔罪己，並且下詔變法，採「取外國之長，去中國之短」的政策，以表其變法的決心。而主持變法的中心人物之一榮祿也主張西方的語言與機器只是「西方科技文明之皮毛……而不是西洋文明之根本」。在變法聲中，曾經在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拳亂期間一面倡東南互保運動與外人和平相處，一面又忠於清廷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他們的變法主張，爲此後清廷變法之張本。

張之洞、劉坤一的變法主張全在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人會銜上奏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摺（簡稱三摺）中，其中所列舉的變法要端，均未超過百日維新的範圍，只是藉口自強的口號—卽西學是源於古代中國，再傳至今的，「現在要行的變法都是在藉外國文化恢復已被我們忘却的古聖先賢的哲理」，

而不忽視我們固有文化—巧妙地把變法施之於復古，轉變變法之意義。然而張之洞在三摺中也坦白的說：「……不知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羨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兵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釐局之刁難，誇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於是「亂民漸起，邪說乘之。」因此，自此以後，清廷卽急於變法，其新政包括設立新式學校制度、派遣留學生出洋留學、仿西法訓練新軍、獎勵與發展工商業、修訂法律與稅則、裁汰閒官與胥吏等等。須要改革的事端實比以前多，但是爲了替政府培植人才，教育問題仍爲一切改革之首。

教育、新式學堂與新知識份子　清末教育改革的一般目標，乃在求有效地訓練與選擇政府人才，其最初的目的，不是在爲一般民衆提倡公共教育（不過這爲以後教育改革的理想），也不是在提倡個人的教育自由。也就是說政府在地方所設的各級學校—鄉、縣、省、京都各級—與科舉考試制度同爲國家掄才的制度，且更加強科舉的功能。因此當新式學校在公共資助下興起後，能在短短十年後，取代傳統考試制度的功能，並促使科舉制度的廢止。但是在當時，應社會之希望，新式學堂與科舉考試制度仍同時並行，願意進入新式學校預修者和志願以傳統方式求取功名者，同樣可以參加正式考試。當然，考試在內容方面，已經相當的現代化了。一九〇一年八月，已被學者攻擊了好幾世紀的八股文終被廢除，且於同年九月，舊式書院全部改爲公立學校。

爲了要使新式學校制度被社會接受，視之爲走向進步的主要方法，首先必須要緩和當時在傳統科舉制度上有其既得利益的官紳，與一直渴望借科考追求功名的傳統士大夫之反對。爲了安撫籠絡這些保守

知識份子，新式學校的各級學生，均可參加各級的科考，只是從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起，科舉考試的主題同時包括了現代與古典的科目。但是這種新舊並存，同爲入官之階的妥協辦法，很快地顯示出傳統的自行準備科考之路線，要比入新式學堂再參加科考的方式省錢、容易、更具有吸引力，因爲入新式學堂要花相當大的費用與時間，學習一些佔了很大比例的規定課程。因此大部份舊式知識份子都不願進入新式學堂。至於一些少數難以駕御的現代青年（亦即未來的領導階層），他們必須進入政府新式學堂，始可能有較好的出路，除非他根本與清廷對立，不屑於清朝之官祿。不過，其他如在中國的敎會學校，新留日風潮，和社會對各種現代敎育之需求，在在都破壞科舉制度的獨佔性。

新式公立學校首先面臨的競爭對象，便是設於重要城市中心的基督敎敎會學校。據統計，到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時，新敎敎士在中國已設有二二〇〇所幼稚園和小學，共有四二、〇〇〇名學童，三八九所中級、高級學校與大學，共有學生一五、〇〇〇位。上海聖約翰大學就是日漸成長的基督敎大學之一，其前身爲一所聖公會男子學校（一八四七年建），後於一八七九年由新敎監督希瑞喬斯克（S. I. J. Schereschewsky）改建而成，這所中外敎職混合的學校中，有五位敎授是來自在美國哈德佛受敎育的中國首批留美學生。該校到一九〇四年，文學院、醫學院、工學院三學院中，共有學生一八七名，其中只有五十七名爲基督徒，其他大多數爲殷商及官員的子弟。

敎會學校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在中國漸漸助長了基督敎信仰、個人主義、婦女敎育、及一般西方作風，且豎立了許多革命性的精神。它們絕對不讓它們的學生如一般公立學校所要求的那樣絕對忠於孔

子與清帝，所以清廷亦以禁止教會學校畢業生從事公務，作爲對抗之表示。

此時私立的現代教育也開始了。在一九〇四年從北洋海軍學堂畢業的青年張伯苓，在天津開創一所中學，學生僅七十三名。一九〇七年他取得一塊學校場地，而建立了南開中學與後來的南開大學（一九一九年建）。

因此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後，新式學堂與科舉制度的結合，似乎未能吸引那些執着於科舉的舊式知識份子，或那些湧進教會學校及私立學校的現代知識份子，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召集會議，經再三的討論，認爲新式教育在科舉制度未廢止前，學堂無展布之可能，不能達到教育之鵠的，也得不到社會經濟上的支援。故爲達到目的，其間必須作一抉擇，他建議清廷按年遞減科舉取士之數，以學校教育代其功能。他認爲學校課程應「凡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文學、理學無不包舉靡遺，凡科舉之所講習者學堂無不優爲。」並且爲了提高學生素質，凡各級學校畢業學生均須通過簡放主考會同督撫學政的考試。一九〇四年一月朝廷下詔，決定漸減舊式科舉考試錄取名額，希望因此使青年放棄科舉轉向新式教育。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朝在日本戰勝俄帝與反清革命組織在東京重組之刺激下，在地方督撫張之洞、袁世凱之領導下，希望能急速改革。一九〇五年八月清廷立即下令廢除科舉制度，從一九〇六年正式停止。由於科考之廢止，清廷把所有教育希望寄託於新式學校。一九〇六年學部成立，以監督新式教育之進行。

清政府的學校制度是採取日本式的教育制度，在中等教育後卽行專業化教育，以培養專業人才爲政府服務。這種教育制度在傳統科舉制度未廢止以前便已漸開始與科舉制度交錯實施，直到一九〇五年始得完全實行。實施之大綱與細節規定在一九〇四年公佈，其內容多模仿日本的教育實例，規定高小四年，中學五年，高中三年（可得相當於舉人出身），京師大學三年（卽可得相當於進士出身），全部課程亦有明確規定。

因此晚清教育改革者，不僅僅消極地廢止傳統科舉制度，並且更積極地要建立一套現代學校制度，這項改革如清廷其他改革一樣，從百日維新建立京師大學堂開始，曾於一八六九—一八九五年爲同文館總敎習的美國人丁韙良（W. A. P. Msrtin）便是京師大學堂首任西學總教習。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京師大學堂合併了同文館，漸發展成以後的國立北京大學（縮寫爲北大），但是除了這所最高學府外，其下的各級新式學校組織，則普遍缺乏現代訓練的教師、建築、設備、資金、及領導人才。

如同工業化方面一樣，建立學校組織之過程，主要的成功仍是在地方各階層的實施與改革，例如在教育改革方面居領導地位的張之洞，在湖北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學校—其中包括一所師範學校、五所高等小學、幾所文武中等和高等學校，以及外語、農業、工業專校與在職文官的訓練學校等—其他各省亦隨之跟進，興建學校，但是由於大學比中學容易成立，中學又比小學易建，所以學校體系中，基礎教育仍是相當薄弱。

地方教育改革者的主要改革方略都是從日本教育制度中吸取來的，張之洞就曾派遣兩個教育考察團

赴日本考察日本的學校制度，購買教科書，並且延請日本學者和教授至中國，藉著文字與中國學者、學生溝通。此外張氏亦開始了解社會公衆教育對發掘人才的重要，且相信日本將是訓練新生一代的中國教師最好的地方—因爲日本路近、費省、時短、便於考察，日文近於中文，易於通曉，且日人已得西學之精髓而無西學之弊。

中國青年留學日本求取現代教育之風氣在一八九六年即已開始，據統計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留日學生僅有十八名左右，但是在同年百日維新失敗後，留日學生在一八九九年便增至二百餘人，而且在一九〇一年後人數不斷增加，至一九〇三年已達一〇〇〇名左右，一九〇四年約一三〇〇人，一九〇五年末科舉考試廢除後人數大量增加，已達八千人左右，一九〇六年更多的青年學生去日本，人數約在一萬三千人以上。但是去日本的人數雖多，註册入學求知的留學生僅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最後能够畢業的人數更爲稀少。而從較有名望的日本學校畢業者則是微乎其微，每年從未超過七〇〇人（一九〇八年有六二三名，一九〇九年五三六名，一九一〇年六八二名，一九一一年達到最高峯有六九一名）。雖然如此，但是在當時這個數字也是相當可觀了。

清末最後十年數以萬計的留日青年，有一半是靠公費留學，而且這些公費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學生在留學之前，通常先在地方新式學校準備，然後再隨每年赴日的代表團至東京。在日本，留學生循著傳統中國地方結社的習慣，由政府官員、士紳或北京及其他歷史悠久的城市商人，出面組織各種同鄉會。因此從這方面來看，新教育制度使青年男子甚至一些年青女士緊緊地結合起來，經過一段較長的

時間及環境刺激，促使他們更爲團結，這種情形較舊式考試制度下的知識份子的散漫情形，不可同日而語。正如在中國本土的新式學生生活養成他們地方意識和地方崇拜一樣，在東京的留學生活亦培養出青年人深厚的國家主義及國家意識。

就這樣，中國教育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五年間急速地變革，中西混合的課程逐漸代替了四書五經，學校生活、觀念意識之增廣、知識份子與社會廣泛接觸，亦逐漸取代傳統知識份子只知追求功名的閉塞生活。新制度下培育出的革命性知識份子也漸取代那些忠心於孔教與天子的士紳階級。儘管張之洞嚴密地規定一套繁文褥節去教誨他的學生—例如規定學生着淺藍色的長袍，有紅穗的帽子，並且訂了一首極具教誨意義的歌：「聖天子，圖自強，……衞生先使民強壯，……孝父母，尊君上，……」但是一旦科舉制度被廢除，沒有任何辦法去阻止這改變的浪潮。

如同在日本一樣，中國知識份子所贊同的新式教育，其內涵許多都是受西方的影響。雖然中國幾十年來與西方接觸逐漸繁密，但是士紳階級眞正開始吸收西方觀念還是一九〇〇年以後的事。著名的西洋小說翻譯家林紓（一八五二—一九二四）藉著他人口譯而譯出迭更斯（Dikins）、大仲馬（Dumas）、司谷脫（Scott）、巴爾札克(Balzac)等西洋著名小說家的小說，小說中文譯本共有一五六種作品。繼這些文藝翻譯作品後，又有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翻譯與解釋的作品。曾經參加海軍的嚴復，在一八七〇年代遊歷世界各地—特別是英格蘭—與西方文明廣爲接觸，從長時間觀察西方之結果，他確信西方的思想是促使其強盛的最重要因素，而在西方思想中他尤爲推崇斯賓塞(Herbert Sp-

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國家社會是個有機體，若個人能充分發揮其民智民力，求得自我之實現，必然會推動國家在競爭的環境下演進生存下去。他認為以現今中國的情勢而言，自由的原則是在增進中國國家的富強，而不是在培養個人的自由；民主自治政府對中國而言，是早熟的現象。因此嚴復特別想試著傳播維多利亞英國的思想觀念，因為它似乎對晚清的意義更為深遠。首先嚴復以雅緻的古文翻譯了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並加上自己的註釋，於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出版。以後又陸續在一九〇〇年出版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Wealth and Nations），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穆勒（J. S. Mills）的「羣己權界論」（On Liberty），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穆勒的名學（System of Logic）的前半部付印，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孟德斯鳩（Montesquie）的法意（Spirit of the Laws）亦由商務出版。嚴復在這些作品與其他未列出的作品中，讚揚西方邏輯、法律、科學、演化等觀念，並嚴厲地指責古聖先賢的思想深植於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心中，阻礙了他們的進步，也是中國之所以落後的重要原因。

新軍：袁世凱的崛起　一九〇一年以前，中國的陸軍大致有三種承繼過去形態的軍隊組織，三種形態中，建立最早、勢力最龐大（至少在名目上）、也是最無用的軍隊組織，當為已經衰落的滿洲八旗軍和綠營軍。一八六二年數千旗人裝配了現代化的槍枝，組成禁衛軍。以後綠營軍，尤其是環駐在北京四周的綠營軍，也接受現代化的軍備與訓練。這就是以後著名的「練軍」。雖然軍隊在裝備上及訓練上已有相當變革，但是帶領軍隊的武官之任用仍要經過傳統科考中武科考試，這種武科考試仿照文官考試

方式，亦分爲三層，而內容上則仍強調馬上馬下的弓術、舞劍、拉弓、舉重等生理上的考驗。這些不合時宜的考試方式，並不能對現代戰爭有任何預備之功效。因此清廷於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廢除舊式武科考試，新式陸軍學校代之而興。

第二種軍隊組織的型態，是從太平天國之亂時一直留傳下來的地方軍隊組織。其淵源於一八五二年以後曾國藩召募農民而訓練成的湘軍，它是以五百人編爲一營，每營有一八〇名長伕，責以專門轉運輜重糧秣之務——也就是每三名士兵中卽有一名後勤人員。雖然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後卽下令遣散他所統領的湘軍，但是其餘的湘軍與李鴻章的淮軍（一八六二年建立），及左宗棠等人爲了平定這半世紀以來的各種叛亂而組成類似湘軍的軍隊，則繼續存在。這些由個人領導，地域性極濃的部隊組織，並不是一種以應付暫時軍事需要而相結合的農民團練，而是一種具有職業軍人意識的組織。它們如同獨立的軍隊組織一樣，有其自己的將領與費用來源，爲一種被賦予特殊權益的團體。事實上，它們已經取代駐紮各地的八旗綠營的功能，而成爲清廷重要的國防武力。在這些軍隊中以李鴻章的淮軍（在天津）和劉坤一的湘軍（在南京）爲主要對立的兩大勢力。他們的裝備精良，亦以現代的來福槍、大炮取代火繩槍、無膛線槍，但是他們沒有標準的軍備和經過現代訓練的軍官及參謀專家，更不用說那些工兵、信號機、後勤經理軍官、現代化運輸、或醫藥服務等等。簡單地說，他們仍只是一種半現代化的軍隊。

第三種軍隊組織，是較後爲肆應日本侵略而發展出的軍隊組織型態。李鴻章、張之洞二人早在一八八〇年代便已設立陸軍學校，並聘請德國軍官爲教席，訓練一新式的軍官團，但是到一八九四年，日本

以彈丸小國打敗堂堂的中國後，這項努力全告潰敗。經過甲午戰爭的刺激，各級政府着力於發展新式軍隊，於是新的軍隊組織紛紛出現，其中有二種軍隊組織爲以後豎立起新的模範。

其一即是張之洞在南京署兩江總督時組成的自強軍。一八九五年張之洞聘請了三十八位德國教官仿德制訓練出十三營約三千人的軍隊，其中包括德式的八個步兵營、二個炮兵營、一個工兵營、二個騎兵營。全部都是歐洲裝備，軍隊之成員則是由鄉間壯丁中精心挑選出來的，且待遇優厚。不幸地，一八九六年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由劉坤一再度任兩江總督時，劉坤一擱置了這個練軍計劃，而把自強軍隸屬在自己的湘軍之下。至於張之洞，於回到湖北後，又開始繼續爲建立一規模適度的軍隊而努力。

另外一個重要的軍事組織即是袁世凱訓練的新建陸軍。袁世凱曾以軍人的身份（非一文官）被李鴻章提拔爲駐韓商務委員，一八九五年又經翁同龢的保薦，負責訓練一支德國式的正規陸軍，並且聘請德國軍官訓練，其費用全由戶部供給。袁世凱自直魯豫三省招募壯丁給予其優厚的待遇，在天津附近嚴格地練成七千人的新建陸軍，這就是袁世凱創設以後所稱的北洋系，成爲軍閥鼻祖之經過。這支在他訓練下的新武力就是以後著名的北洋軍。在他早期的北洋軍官中，有十人在辛亥革命以後成爲地方督軍，有五人（除袁世凱自身以外）爲後來共和政府的總統或總理。

袁世凱是以出衆的軍事現代化者開始活躍於歷史舞台上，他曾同情一八九五年維新黨所辦的強學會，因此在一八九八年百日維新時，康有爲和其他急進改革份子才會尋求他的幫助，藉以抵制慈禧太后的保守勢力，但是袁世凱並沒有同意他們的做法，雖然這使慈禧太后與節制北洋三軍的榮祿更加信賴他，但

是另方面他也被流亡海外的改革份子責以出賣新黨及光緒皇帝的小人。一九〇〇年義和團發生，袁世凱曾不顧時忌地反對義和團的行為，贏得外人的讚賞，但是他對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因此在一九〇一年七月，清廷將自強軍調歸袁世凱訓練。

不久，李鴻章（卒於一九〇一年）、劉坤一（卒於一九〇二年）、榮祿（卒於一九〇三年）相繼去逝，留下四十五歲正處英年的袁世凱，這位中國首要建軍者，繼承了李鴻章在政治上的地位，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七年，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他極力結託滿洲親貴之首，名聲狼藉的慶親王奕劻（一八三六—一九〇六），分別成為清廷內外兩大柱石。慶親王自一八八四年恭親王被罷黜後代之而起，一直居北京外交事務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一九〇三年清廷任命慶親王奕劻籌辦練兵處，同為辦理練兵事宜的袁世凱則指派自己軍隊的將校深入控制練兵處與北京的兵部。

袁世凱新建的六鎮北洋軍及其附設的六所不同的軍事學校、小規模的將領參謀團、訓練精良的軍隊、令人讚佩的軍事演習，很快地被其他地方仿效　但是並不完全，也沒有什麼效果。其中以張之洞在湖北所訓練的軍隊為最重要。對清廷而言，地方區域性利益之分歧使帝國形同分裂，眞正的軍事集權化，在政治能力上根本不可能，因此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練兵計劃僅只希望使中國軍隊基本上能在各地水平發展分受各地控制，以保持原來北京與其他地區的國內勢力之平衡。新建陸軍的藍圖是要建三十六鎮軍隊，每鎮一二五〇〇人，其形式細節都是依循日本模式，所不同的就是它沒有中央集權的基本要素、適當的資金與重工業之支持。至於八旗綠營雖早已被新式軍隊取代，但是其兵籍仍然保持。

清廷陸軍的發展，由於受到俄帝侵略滿洲野心與後來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之刺激影響，發展出許多新的特徵：其一、即新式陸軍學校如在北京附近的保定陸軍學堂，開始產生一批滿懷愛國思想的新軍官知識份子階層，這些軍事行動家不但具有現代軍事知識，並且他們如一般知識份子一樣也負有重建國家秩序的責任意識。其二、日本軍事教官漸代替德國軍官，被聘請的逐漸增加，並且中國軍官志願去日本留學者，也大批地送往日本軍事學校接受訓練。他們在日本——外國領土——所受的待遇與刺激，促使他們愛國情緒更為高昂。十八歲的蔣介石，浙江人，就是在一九〇六年入保定陸軍學校，而於一九〇七年進入日本陸軍候補學堂。

行政改革與中央政權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以前清廷的行政制度大體是承襲五百年前明朝的體制。並且經過這四個多世紀逐漸地改善，清廷也有所損益：⑴增設新機關，如軍機處。⑵全國各地官員無論大小均向皇帝負責，互相牽制，促使國內地方勢力平衡，唯獨有皇帝為最高統治者。⑶將八旗、綠營分駐全國各地以保持地方之安定，並以此方法建立地方分權。相當複雜但高度清明的文官制度，使這版圖遼闊的大清帝國在一八〇〇年代已是相當地穩固與強盛。但是當鐵路和來福槍取代了騎馬射箭、汽船代替了平底帆船時，清廷面臨了一個技術上的革命，其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行政上能中央集權。

為了達到現代化的目標，必須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行政組織，負責迅速地完成許多新功能，適用新法律及財政措施。並且各地地方政府必要完全承認這個中央行政組織為他們的上級與協調機關。就是

清朝政府也必須推翻以前北京中央政府和地方上的平衡關係改爲上下相屬之關係，因爲有清一朝地方政府直接對皇帝負責，由皇帝直接控制，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的六部直接指揮控制的。另方面，由於通商口岸工業興起，地方貿易收益增加，地方軍隊與私人幕僚機關興起，使十九世紀末期地方主義抬頭，加強地方督撫在權力結構上的地位，根本不顧政府有加強中央集權勢力之需要。所以北京政府的首要改革，面臨了舊式既得利益官僚之無力，與新地方勢力之難禦雙重問題。

清朝政府在行政組織的改革方面，或是添設機構與傳統政府組織並行，或是在舊有的政治組織內建立新的行政機關代替舊有機構之功能，使舊制度逐漸淘汰，新組織代之而起。例如一九〇一年清廷照辛丑條約中之要求，將總理衙門原有並行六部的功能除去，變成一個專管外交的外務部。一九〇五年（光緒卅一年）創設巡警部，也就是後來的內政部之前身。一九〇六年維新運動中，學部接管禮部考試的職掌。同年且將原來習慣以文官爲首的兵部擴充爲陸軍部，採用新式日本的軍事行政組織，以滿洲將校代替以前的文官爲陸軍部尚書。他們的用意是想藉此削弱袁世凱和其北洋系的影響力，但是後來並不成功。

在這段時間中，另外有種特殊現象存在，即是北京許多新設的部或機關的功能，是由沿海各省的局開始推展促使其設立的。例如商務局，首先在各重要的地方發展出商會、商報、及工商學校等，後來在此推動下促使北京於一九〇三年設立商務部。後來又吸收原來的工部合併爲農工商部。其目的在獎勵鐵道的建築、工業製造、統一度量衡、掌管公司登記和農業公會、製訂礦業規則和公司法，以及其他有關現代經濟發展或行政管理法規政策等各種事項。顯然地它是一個獎勵經濟發展的機構。

在北京設立新的行政機關要比創立全國性的行政制度改革要容易得多，以法律改革爲例，它必然有一部分被外國勢力所操縱，如果要改革，必先和日本一樣廢止一切治外法權方可實現。關於清末法律改革，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法律館在六十五歲的前刑部尙書沈家本的領導下開始從事法律之改革。最初沈家本雖然表現出一個現代人對傳統社會價値之留戀，但是最後還是制定出一套革命性的法律制度。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沈家本根據德國、日本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定出一套刑法草案，明確地把法律從倫理道德中獨立出來——所謂倫理道德就是指孔教的禮法，不具有法律之約束力，例如忠孝等　並且揭示除了王室以外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關於這一點，沈家本確已對倫理社會中以身份、地位、年齡、性別之差別分劃成各種階層，以形成孔教社會之倫理秩序，給予嚴厲的打擊。但是他的草案未被接受。

雖然沈家本的刑法草案未被採用，但是他對大清律例的澈底修正，則在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公佈實施，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後仍然有效。這部新法典名爲「大清現行刑律」，但是其對大淸律例之修正却包含了民事、刑事、及訴訟法各項。對法律現代化的貢獻很大。諸如減少肉體上的刑罰與拷問，廢除烙、劓、流、斬首示衆等刑罰，廢止株連，使刑止於一身，將民法、刑法明確分開，並且公佈其他特殊專門的法規或「例」各別適用之原則，使法律有一原則可以遵循等。有淸一朝累積下來的「律」共有一九〇〇條，雖很具體，但時有互相矛盾的規定。因此執法者沒有一個固定可供依循的法律供其使用。除了法律不明確與不統一之外，法律在中國社會中旣不重要，也不能深入社會，更使判案的官員對審判功

能毫無所知且不知利用，更別說對世上法律哲學、法律術語、及法律專業化的了解程度了。沈家本在修正大清律例時已刪除許多「例」，但是他不敢對這種情形作任何批評。他提出的其他法律草案雖然都沒被清廷採用，但是他確已爲中國法律現代化指引了一條努力之方向。

至於財政改革，比法律改革還要困難，因爲它不但會威脅到許多人的「飯碗」（個人之收入），並且傳統傳留下來的財政制度太膚淺、不健全，很難開始改革。爲什麼呢？我們可從以下討論得一概觀。

一、全國每年稅收之總數從來沒有統計過，也沒有預算及會計制度。地方及省區的收稅員必須住在當地以便徵收，每年各地報到北京的稅款也是固定的，據推測可能只是地方全部稅收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少只有五分之一。

二、官方收到的稅之來源是根據稅額，而沒有一個共同稅收機關全權處理。各省每年的稅收都有固定數目支付給一些特殊地方與用途之用。中央政府應收付的金額很少在北京收得或支付，因爲從某省應得的金額，往往會因當地或其他地區之需要而就地分散支出。全國十八省中有十三省每年有一定的金額交付他省供特殊之用的。例如每年供給駐在北京的八旗軍的七百萬元的費用，就是從全國五十二個不同的單位供給的。像這種財政支配的程序束縛了清廷把全國收益大批地支付給既得利益者，尤其是供給政府及軍隊的開支更爲龐大。

三、在北京中央政府也沒有獨立的財政支配權。據估計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清廷總共的收入約有一億二百萬元（折合七千萬美金或一千四百五十萬英磅），這對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而言實在是

太少了。從戶部的收款額來看，其中包括田賦和漕糧照舊爲三千三佰萬元，鹽稅一千三百萬元，其他的雜收約七百萬元。至於地方釐金收入，上報中央的錢，名義上是一仟四佰萬元。至於正在欣欣向榮的海關收入，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約有三千三百萬元，但是在總理衙門的支配下，早就指定爲賠款之用。因此新興的貿易稅——關稅和釐金——幾乎都不在政府的控制下，而政府可支配的只是傳統的田賦等。但是這些稅金都是固定的數額，雖然也有增加的彈性。由於支配稅額的主權不一，使全國眞正收入無法確知，再加上大批費用要固定支付給那些既得利益者，因此財政改革只有利用尙屬中央政府權力下的收益部分與改變滿淸長久以來一直維持的財政平衡，始可開始實施。

淸廷首次試圖作全國性預算時，首先面臨的問題卽是如何計算全國總收入，因此淸廷於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開始着手調查全國總收入，直到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完成預算總編，其中中央與地方收支是因地而易的，這次預算中全部總收入約爲二億九千七百萬元，應支出者全國三億三千八百萬元，特殊地區三百七十萬元，預知可能的赤字爲七千八百萬元。雖然政府把預算已編出，但是不幸地各省財政根本不隸屬於度支部，故這次預算案中總收入的統計與稅率在中央度支部與各省計算的並不調和，而且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如度支部所預計的提供政府相當的財源。

從以上的敍述可以知道淸末無論在行政上、法律上及財政上種種不當的情形，已深植於中國人的習慣、政治價値觀念、和社會結構中。很明顯地，淸朝這個膚淺、被動、苟延殘喘的政府，若想眞正達到現代化之目標，必須發揮中央政府的功能，確立其中央領導的地位，但是對這個外族入統的王朝，在民

族主義高張的時代，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工作。

立憲運動與各省的支持　當日本在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以君主立憲國家擊敗了俄帝沙皇專制政體後，似乎已經證明立憲政體是調和溝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使上下共同爲國家努力的一個根本原則。就是專制的俄國在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以後也開始向議會政體努力。至於中國之所以如此熱衷於立憲政體的實現，主要是因爲立憲政體可以使正在勃興的地方社會力量有機會分担參與政府功能，漸而使地方私心消彌轉而忠於清廷，這樣也能使政府有能力強化其中央行政之權力。因此從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到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五年間，淸廷所極欲追求的就是行政現代化與立憲政體的雙重目標。但是不幸地，爲了達到目的而作的政治上之變革，却導致一場中央政府內以及中央和地方間的權力鬥爭。

這場中央政府內的權力鬥爭之起因，乃是因爲滿洲親貴爲了要繼續維持或更擴大他們掌握各主要地位之力量，以預防眞正根本的改革。這種滿洲親貴親滿排漢的作風，阻礙淸廷建立一個與地方之間一種新的且更集權化的關係之努力。

反淸情緒不但受主張革命的留日學生之宣傳而日漸高張，並且也因中國內部民族主義精神的興起而更爲提昇。這可以從一九〇五年中國第一次反美風潮得到證明。這次風潮的起因是反對美國對華人的虐待，尤其抗議美國整體的排斥華工運動。在這次杯葛中，早已消跡的傳統地方商幫又活躍起來，勢力發展到大部分的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廣州等地。在這些地區許多學生聯合商人舉行羣衆大會與現代化

的示威遊行，並且藉現代報章雜誌大力宣傳鼓吹民族主義，使美國在華貿易遭受嚴重的損失。至於清廷，因恐怕這次風潮轉變成反清運動，一直不敢明顯地去鎮壓這次羣衆排外運動。

在不斷昇高的民族主義情緒壓力下，清廷於一九〇六年上半年派遣二個正式考察團出國考察憲政。其一主要去美國和德國，其二則往日本、英國及法國。臨行前，日本親王伊藤博文曾告誡去日本考察的人一定要保持皇帝崇高的地位，不能使皇帝的地位跌落到人民之手。當他們返國後，一致推贊日本的憲政制度，一切法律與人民自由—包括「公開討論的自由」—必須經皇帝認可始能生效，這樣可以加強皇帝的地位，使他可以依然高居萬民之上。一九〇六年九月慈禧太后下詔宣佈在預備立憲以後即實施立憲政體，並且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間又陸續有更多的考察團到日本與德國參觀考察。

預備立憲中清廷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的改革。爲了建立一個現代中央集權的政府以統籌實現改革計劃，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清廷將原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擴充爲外務部、民政部、度支部、內務部、學部、陸軍部、海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等十一個部，並且保持或設立與這些中央行政機關平行的監察機關，如軍機處和督察院、資政院、審計院、大理院四院。這種官制改革似乎結合了西方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分立—和中國傳統的三個行政階層—軍事、民政、監察。而到一九〇六年始提出的資政院、審計院、大理院三院，他們和由孫中山創立而到一九二〇年代實行的五權憲法或五院憲法的意義相似。

一九〇八年慈禧太后公佈憲法大綱，並頒行九年預備立憲之定期。各省諮議局在一九〇九年（宣統

元年）成立，全國資政院則至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成立。九年預備立憲的概念是模仿日本的，日本曾於一八八一年宣布在一八九〇年召開國會。事實上　孫中山也以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以九年時間預備立憲。但是熱衷於憲政的立憲派却反對清廷延宕立憲。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去逝，這使清廷的聲勢更為微弱。做了半世紀的「老佛爺」，正如這受人尊敬的稱呼一樣，慈禧太后已經是當時權力中樞，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但是有關慈禧太后對中國究竟有多大的影響，至今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慈禧太后是一位藝術的贊助者，比如說，他就很欣賞色彩鮮艷有北方風味的京戲，但是她沒有康熙、乾隆做一個藝術鑑賞者與文藝愛好者的能力與涵養。

慈禧太后去逝的前一天，十一月十四日身體尚健的光緒皇帝突然崩殂，慈禧太后指命甫三歲的溥儀繼承帝位，亦即後來的宣統皇帝，並且由其父醇親王為攝政王。三十七歲的光緒皇帝神祕死亡，消彌了中國轉變為君主立憲國最好的機會，而使王權落在一羣無知自負的滿洲親貴手中，一意致力於在改革中維持他們的權位。一九〇八年赫德（Robert Hart）離中返英，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一月袁世凱被免職，張之洞也在同年十月去逝。

晚清清政府的改革運動本來就太勉強太遷延了，現在又面臨更多的問題使他們更是手足無措。例如：中央政府中設立的十一部，必須要有一個內閣會議協調各部才能使各部互相合作發揮其功能，但是這樣一個協調機構很可能變得相當有權力，如果再被內閣總理控制支配，那麼內閣總理之權勢可能會陵駕王

權之上，基於這種考慮，清攝政王一直猶豫不定，不肯輕易放棄他的權力。

爲了維持自己的權益，滿清政府必須繼續獲得那些地方秀異分子（elite）—亦卽傳統上各地的地方領導階層或稱爲士紳—的支持。這些地方秀異份子自從開埠以來，其本身內涵已經歷非常大的轉變。傳統具有地主、士大夫、搢紳身分的士紳已經瓦解，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科舉考試廢除後，已經再不可能以科考產生這種士紳階級，另有一身兼具地主、商人、搢紳身份之士紳階級開始出現，並且更多的士紳投資於工商企業。這種從儒家思想的士大夫轉變爲現代商人，其價值觀的改變實爲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形成士紳階級的三柱石中以地主及搢紳仍爲統治階級的擁護者，但是另一柱石—具有現代思想的商人—則漸漸取代傳統士紳的領導地位。從前由地主、士大夫、搢紳的士紳階級以半私人的資格在地方做的各種公共事業—卽維持地方公共建築（如灌漑渠道、橋樑、廟宇）、敎育事業（如開設學校、書舘）、慈善事業等—到這時當地方正日漸需要的時候却被這些領導階層給忽視了。這些新起的地主兼商人的士紳階級雖然因現代發展而漸趨於分化、城市化、多變性，但是在地方社會上及地方政府中仍是具有相當潛力的領導階級，因此清政府若要維持社會安定，就必須得到他們的支持與聯合。

立憲運動中著名的張謇就是個典型的新式領導人物，一八六八年當他十八歲時通過科考爲一秀才，經過六次鄉試，終於一八八五年爲一舉人，後來又參加了五次會試，終於一八九四年爲一進士，在他五十一歲時通過殿試而爲狀元。他考取狀元的時候，正値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時，爲了救國，他放棄追求功名的目標，轉而向實業發展，成爲一個實業家的先鋒者。最初他在其故里江蘇南通利用技工和長織

維的棉花紡織棉紗，以與當時在中國快速成長的印度與日本進口棉紗競爭。因爲他的功名高、聲望好，再加上他和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關係密切，使他得到許多優厚的待遇－如稅金優惠－鼓勵及一些必須的機器與資金之協助，而於一八九九年開創大生紗廠。至於與他合夥的股東，對他的幫助是非常少的。

張謇在生產系統上完全採用西方之技術指導與生產方式，但是他對工人管理方面卻像一個孔子、歐文的崇拜者，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也關心他們的居所與教育。大生紗廠設立後又擴充了三廠及從事棉植、輪船運輸及一些消費品工廠－如麵粉、油、鹽之生產。並且張謇也投資於地方事業之發展，使南通成爲一個有普通學校、工業學校、現代化道路、公園、孤兒院、養老院和新式監獄的模範社區，他自己也成爲著名的慈善家。從士紳轉變成企業家、江蘇教育學會會長、鐵路提倡者。至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他被選爲諮議局議長，爲推動立憲運動而努力。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省諮議局代表齊集北京請願，望清廷從速召開國會，掀起一次全國性的請願風潮。前後共有三次大請願。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十月資政院成立，二百名議員中，欽選一百名，民選一百名。自資政院成立後，眞正國會及責任內閣的需求更爲增加。在此壓力下，攝政王只得下詔將九年預備立憲改爲六年，訂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召開國會。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四月新內閣成立，但是醇親王竟愚昧的在十三名新內閣大臣中指令八個滿人，一名蒙古人，漢人僅得有四名，爲名副其實的「皇族內閣」。

鐵路風潮　地方與中央政府間的衝突到最後以鐵路問題最爲突出。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打破了清

末長久以來避免外人經營中國鐵路或借外資修築鐵路的政策。外國控制的鐵路—俄國、日本在滿洲，德國在山東，法國在雲南—成爲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工具，並且藉此在鐵路沿線開採礦物資源和開拓外國市場。其餘的鐵道雖然名義上仍屬清政府，但是早在清廷向外國銀行以官方立場借款時，旣已把利權抵押給外人，做爲償還的依據，因此雖然名義上是淸廷建的，但是事實上在建成後都爲外人操縱。因此從此中國進入外國資本家經濟侵略下的鐵路時代。

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各地方發起了一次愛國性的「收回路權」運動，地方團體紛紛要求把外國在中國所有的鐵路全部贖回，組織公司建造中國自己的鐵路。由於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的士紳，給予精神上的支助與鼓勵，使張之洞在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取得英國貸款贖回一八九八年「美商合興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的合約，準備自建湖廣鐵路。但是地方財力根本無法供應鐵路建造的經費，並且地方商紳所組成的鐵路公司，雖滿懷了激烈的愛國情操與未來紅利的鼓舞，但是他們發現要籌足資金贖回路權，付地租、買外國的車輛等是相當困難的。投機與貪汚也是阻礙了他們的努力，這對建立鐵路網的全盤計劃與指導，在技術上都是有所違背的。

另外一派即是主張鐵路國有化，其中以盛宣懷贊助最力。盛宣懷先後受張之洞、李鴻章之提拔而漸露頭角，至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他已經控制招商局和張之洞在漢口的工業基礎。同年盛宣懷把漢陽鐵廠、大冶鐵礦（離漢陽八十里，在湖北）、萍鄉煤礦廠（南方一二五〇里，在江西）合併組成漢冶萍公司，其中所需的資金則完全依賴日人的貸款，這些資金從一八九六年就開始募集，其依賴日本的程度

就好像是日本在八幡的鋼鐵廠一樣。工廠所需的鐵全來自大冶的鐵礦。在此之前盛宣懷早已以紡織工廠、電報和其他企業的官方監督貪汚致富，現在又藉修築漢口、四川、廣東的鐵路即湖廣鐵路，（從漢口到北京的鐵道已於一九〇五年修築完成），運動北京度支部向外人貸款修建。因此鐵路修建之方法問題已成爲清政府政治上重要的課題。清政府現在所急切需要的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人才領導鐵路發展之實施與外國的借款，但是這些希望却被盛宣懷著名的貪汚給毀滅了，且因此引起各地抗拒中央政府與反清情緒的提昇。

自從鐵路貸款已經成爲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主要工具，美國塔虎脫（Taft）政府異想天開想藉「金元外交」維護其門戶開放的政策。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 Knox）在一九〇九年對東三省鐵路中立化作了一項含糊的計劃，這正違反英國一九〇七年以後默許俄國與日本在東三省擴張的政策。而諾克斯不成熟的想法僅促使日本和俄國在一九一〇年更進一步祕密肯定他們在東北的勢力範圍劃分。同時一九〇九年八月美總統塔虎脫以私人身份電請攝政王，要求美國能介入湖廣鐵路貸款談判，因爲美國資本也應同樣參與貸款，這樣才能促使「中國的利益…和其領土的完整」。這使包括法、英、德、美四國國際銀行團在一九一〇年成立。於是清廷在盛宣懷的唆使買通下，宣佈鐵路國有法令，收回地方私造鐵路之權力，且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五月四國銀行團依法與盛宣懷訂立合約，清廷這次對地方權益漠不關心的態度，無疑地使地方利益與希望化爲泡影。對那些地方愛國份子而言，這無疑是滿洲人和他們貪婪的親信，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中國利權賣給外國。因此引起了一場保路風潮，尤其在四川。

一連串的羣衆大會與向清廷請願活動展開，但清廷並不理會地方人民之反抗，使四川保路運動情勢日趨緊張。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使商店與學校被迫關閉，川人宣佈停繳租稅，也動員了農民支持保路運動。至該年九月清廷調兵至川維持秩序，打死了許多示威民衆，扣留當地士紳領袖。這些抗議人們都是當地有錢有勢的人，有地主商人之背景，曾留學日本，爲地方諮議局之首，最重要的他們對鐵路建造計劃投資過大量的財產。他們反洋的標語—四川是四川人之四川—代表了這些地方領導階層的利益，也顯示出這些領導階層漸走向反清的道路。

從清末十年的改革來看，中國的社會與組織結構開始根本地改變了，一般鄉紳追求科考與清廷官祿者愈來愈少，許多紳士轉向在其故里上發展工商業，原來相當保守的地方秀異份子也都轉而支持立憲，希望清廷能早日召開國會，使他們有機會參與政治。並且他們希望早日建立責任內閣，內閣向國會負責，使這個掌管中央行政權力的官僚機構，在他們執政時嚴負責任，以使中國的經濟、行政及其他公共事業眞正地走向現代化。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各省諮議局成立，成爲政策討論與政治組織中心的新政治機構。

同時在通商口岸，現代刊物也漸成爲新政治生命的新血輪。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國定期刊物主要還是由美國宣教士開始，但是大約六十種刊物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以後十五年中（到一九一一年）漸漸發刊的，而這些刊物都是中國人自己投資冒險發行，其中包括商業報紙與改革主義的雜誌。在上海新式報紙的出現則首推申報，其至一八九五年時發行量已達一萬五千份。另外爲中國現代出版業前鋒的商務印書館

也在一八九七年成立，出版了許多新教科書，流傳於各校之間。

直到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諮議局和出版業爲「士紳」、青年學生與軍官組成的新社會階層—青年中國—提供一公開討論之場所，君主立憲仍然是這個時代的主要呼聲，然而不幸地，清朝的秩序最後却被革命思想給破壞而傾覆。

第二節　辛亥革命

十世紀到十七世紀間，中國漢人政權數度爲外族所奪，由異族入統中國包括契丹、西夏、蒙古、滿洲等。二十世紀初，通商口岸、東南亞等地海外華僑社會、及日本帝國，曾大力給予中國革命黨人庇護，事實上辛亥革命力量大部分是在日本形成的。

日本人的影響　日本對形成中國革命思想的角色，多年來被西方人士（他們的祖先曾刺激中國西化）與中國愛國者（受到日本以後侵略的刺激）所忽視。但是不可否認的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四年這段時間是日本影響中國歷史發展最主要的時期。可以從幾方面檢討，一、日本是清末改革主義者模仿的模範。二、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以後日本已成爲反清革命份子聚集的大本營，以後的共和中國可說是從東京產生的。而日本人對中國現代教育、軍國主義和憲政主義的刺激，也是促使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部分原因。

日本在這短短的幾年中，對中國的影響，比英國在十九世紀或美國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甚

至蘇俄在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對中國的影響更爲直接、深遠。其影響之所以如此深遠，其原因爲：一、日本文化與中國相似，地理位置亦接近中國。二、中國在現代化開始的歷史背景中，以日本爲學習的目標，而日本亦在不與國家利益衝突的考慮下，極願指導中國走向現代之路。

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五年間，是日本強權形成的時刻，這段時間中，日本一躍爲亞洲模範地區，不僅是亞洲其他國都有如是的看法，就是日本本身也自認爲是亞洲之模範，這加強日本欲居亞洲走向現代化的領導地位，和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意念。爲了幫助中國維持國家完整，完成政治改革和經濟現代化，在日本掀起一陣研究當代中國運動的熱潮。這種情形可以從日本幾個組織看出。諸如同文會，由政治界、文化界和擴張主義者領導，於一八九八年成立。此外除了在東京及京都研究中國歷史計劃外，當代中國歷史研究中心分別在上海由東亞同文書院建立，在台灣和瀋陽由南滿株氏會社建立。其研究廣泛包含了中國學術上及理想主義之問題。但另方面它也含有極端的侵略陰謀。提到陰謀就令人想到日本極端愛國的黑龍會，黑龍會於一九〇一年由頭山滿創立，以內田良平（一八七四—一九三七）爲首。其主要目的即是在鼓勵日本越過朝鮮往大陸擴張，以抵制俄帝勢力。這種論調，鼓舞了遍佈東亞的日本冒險者，他們包括學生、旅行者及商人，而這些激烈的擴張主義者亦無意識地培養了日本國家主義，作爲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擴張之先驅。除了這些主張擴張主義的盲目愛國者之外，就是在野的自由黨和進步黨的黨魁們，亦於國內政策中要求政府採取一活潑有力的外交政策，其中也有一些人漸對中國改革及革命運動發生濃厚的興趣。

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不幸失敗——變法首領康有爲、梁啓超在日本人的庇護下，逃往日本，康有爲在日本進步黨創立者大隈重信家中住了一段時間。大隈在一八九八年曾一度爲日本首相，他爲日本在華發展商業與對中國產生興趣找到一個堂皇的理由，那就是他的大隈主義：日本現已先現代化，應該以保證中國的自由，幫助他現代化，作爲償還日本以前受中國文化的恩惠。十五年以後大隈仍然認爲「日本在東西文化接觸中，註定要使東方文化與高級的歐美文化相融合。」（就是日本陸軍建立者山縣有朋在一九一四年還責備日本政府只知熱心於武力，而呼籲希望「使中國繼續相信我們。」）

繼大隈重信爲首相的犬養毅（一九三二年被刺殺身死），亦致力與中國各派的政治流亡者交往。他曾於一八九八年安排梁啓超與孫中山會合討論，企使康有爲爲首的改良派與孫中山的反淸革命派合作。但是康有爲拒絕與孫會面，除非孫拜他爲師，改變立場，崇尚君主立憲，臣服光緒皇帝。一八九九年康有爲開始到世界各地海外華僑社會參觀訪問，爲建立他的保皇會籌募基金。在康氏離開日本的這段時間，梁啓超曾意圖加入孫中山的革命派中，但是後來仍爲康有爲所阻止。所以日本人聯合改良派與革命派的努力澈底失敗。一九〇〇年以後，這流亡海外的兩黨，雖同樣愛國，同爲淸廷排斥禁止，却變成不共戴天的敵人。

二位主角：梁啓超與孫中山　梁啓超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到檀香山和東南亞，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至美國，而十年中絕大部分的時間在日本。在這段時間中這位精通古代經典大師盡情地吸取現代觀念，並且以雄辯、清晰有力的筆調寫作，使他很快地成爲言論界的天之驕子。他先後編輯了

幾份雜誌，從雜誌的名稱，可以看出其思想之動向——清議報（一八九八年）、新民叢報（一九〇二年）、國風報（一九一〇年）。到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年僅三十歲的梁啓超的聲望確已超過他的老師康有爲了。四十五歲的康有爲其思想並無改變，正如梁啓超「贊美」他是「儒家的馬丁路德」、「達爾文進化論未至中國以前的偉大思想家。」梁啓超在日本吸取現代知識後，開始將中國問題置於西洋或世界歷史背景中研究，不僅單以中國歷史視之。對中國必須改革的理論基礎他不再引用康氏對儒教重新解釋的三世說，而採取世界著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爲歷史就是種族、國家在進化過程中爭奪生存機會的過程。有了這種觀念後，梁啓超以中國悠久歷史與其他國家歷史作比較，拿哥倫布、達迦馬與鄭和比較，以康德與王陽明比較。並且將他曾在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時熱衷的今文經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時古典文學復興運動相比擬。簡言之，他已從中國傳統知識中解脫出來，開始對古今中國歷史作一現代的新評價。

在梁氏理想中，他企盼中國能透過公共教育，把人民培養爲一個有國家觀念和明辨是非的新民。他贊同福澤諭吉和日本的西化主義者的看法，希望中國人民能達到像典型的英國人那樣自重、個人主義、有進取心與重公德的國民。他並痛心抨擊中國政治的衰弱，力勸國人將效忠皇帝之心，轉爲愛國之心，將對儒家倫理道德的服膺，轉爲守法的精神及致力於新制度之建立——如立憲、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的政府。他且發行文學刊物，以短篇故事、小說和世界翻譯小說（主要從日本譯本譯成中文的）爲主。

在政治方面，梁啓超停止對滿清朝廷的批評。他和許多士紳與大部分外國觀察家的看法一致，相信中國一般人民尚未達到實行民主共和政體的程度，從此點而論，梁啓超仍是一個主張漸進的君主立憲、反對共和積極革命者。一九〇七年梁氏創立了政聞社致力於政治運動。雖然它受到清政府的禁止及站在敵對立場的反清革命黨的抨擊，然其對憲政運動卻有很大的影響。

梁啓超在知識份子中算是一個上流社會的貴族，一個思重於行的思想界領袖。相反的，其廣東同鄉孫中山先生很早就是現代革命專家。二人出身於相反的社會背景，成長的經歷又極其不同，對中國問題自然有著極爲不同的先入觀念。當梁啓超在爲中國民族主義詮釋時，孫則已建立起早期革命運動的組織。

孫中山先生具有相當的革命領導能力，香山人，其父務農，幼時隨一個曾參加過太平軍的伯父啓蒙讀書，在他伯父的影響下，洪秀全成爲他少年時代崇拜的英雄偶像。香山臨近澳門，長時期與西人接觸，遠離北京政府的控制。中國第一位歸國留學生容閎、買辦唐景星、和無數僑居海外的移民都是出身於此。所以從社會上和地理上來看，孫先生的出身確是對他以後革命運動有正面的助力。

孫先生一生中從沒有追求過清廷的功名利祿，當他十三歲時便隨其兄乘英國輪船到檀香山，在那裏住了三年，寄宿於英國教會學校研讀英文，並參加唱詩班，接受基督教信仰，當他回到香山時，已成爲一個提倡打破舊習者。一次他把地方敬拜的偶像打毀，被迫離開香山到香港，由其兄孫德彰供給在香港一所英求學。在另一次去檀香山後，孫先生花了五年（一八八六——一八九二年）的時間在廣州和香港一所英

國教會醫學院研讀化學、生物、外科、臨床醫學，打下其醫學基礎。一八九二年他開始在澳門懸壺行醫，因爲沒有葡萄牙的特許狀，被迫離開。從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中國失敗後，孫先生卽已開始關切中國未來的命運，他曾北上至天津上書當時西化首領李鴻章，提出其改革之策，但是沒有得到回音。由於他的意見並未被當權人重視，並且他認爲醫生對社會貢獻究竟有限，故轉而從事另一新的追求——不是商人、農民、學者，也不是懸壺的醫生，而是一個與社會各階層接觸的革命家。

孫先生很早就與傳統的反清組織三點會接觸，一八九四年他手創另一祕密社會組織興中會，且將興中會的組織擴張於夏威夷、澳門、香港、廣州一帶。一八九五年第一次起義企圖佔領廣州衙門，結果不幸爲清廷發現而失敗，孫先生的革命伙伴陸皓東等人也在這次起義中被捕殉難。孫先生自己則僥倖地逃到日本，剪掉辮子蓄髭，換上西式服裝，化名爲中山的日本人（中山原爲日人名，後來爲紀念孫先生，許多公園、街道、學校，甚至國民政府時期的一種衣服的名稱都稱爲中山）。由於孫先生是北京通緝的要犯，故他卽路經美國至倫敦。一八九六年孫先生被駐英公使館人員識破，而被拘禁十二天，準備用船押解回國。幸得孫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外科老師，也是教他板球的老師康德黎先生運動英國的輿論，使公使館不得不將孫先生釋放。由於這次倫敦蒙難，使三十歲的孫先生名噪一時，以領導反清革命名聞世界。從此後孫先生自覺對中國未來命運有天命的責任。

一八九七年孫先生回到日本，在一些日本擴張主義者的幫助與勸使下，集合了新舊各種革命勢力，其中新的成份包括那些生長在內地傳統社會之外，不受禮教拘束，有著商業價值觀、國家主義，但又不

願政治效忠王室的海外華僑社會的經濟資助，和來自廣東省尤其是香山縣那些半西化—有些是基督教徒—的愛國青年所領導的小團體。舊成分則包括由內地祕密社會會黨集結的反清武裝勢力，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武力控制地方權力，然後聯合分散的革命勢力一舉推翻清廷。

一九〇〇年在三合會協助下發起了惠州起義，然因原來計劃由日本運送武器與從台灣內渡革命黨之計劃突遭失敗，使得這次起義在二星期內即告失敗。孫先生爲了要聯合傳統與現代革命機構，他於一九〇三年在夏威夷加入三合會的支部致公堂，並且藉此在美國各地宣傳革命。

這個時候，他開始面臨一個問題，即是如何使新生一代的中國留學生——尤其是留日學生——成爲革命的新血輪。爲了這個目的，他必須提出一套革命的理論，因爲保皇黨的康有爲仍得到東南亞保守的華僑商人之支持，梁啓超的文章亦對新式的學生階層之觀念有相當的影響。同時，由其他志士發動的起義亦陸續發生，例如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唐才常屬湖南改革派，且亦屬康梁派，他安排他自己的學生們所組成的自立會加入哥老會的長江中部分會，並謀於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在漢口起義，但因事機外洩，被捕就義。

在通商口岸及在日本的留學生間，革命社團、宣傳革命的學校與報刊，如雨後春筍般的茁壯發展。在上海的江浙人士由一些古典派的學者如攻擊康梁的章太炎、蔡元培所領導。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他們在上海發行的煽動性反滿報刊——蘇報——被查禁，章炳麟且因此而下獄三年。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蔡元培集結浙江和長江下游各省的學生組織光復會。湖南黃興於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

年）創立華與會，且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他試圖聯合新軍、學生與會黨於長沙起義，但是一如以往的起義，因陰謀被發現而失敗了。一九〇三年年僅十八歲的青年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流傳極廣，對當時革命意識之喚起極有影響力。總之，革命運動正在茁長，但却缺少協調特別的意識觀念和長期之計劃。

面對這種競爭環境與革命時機，孫先生漸漸發展出他自己的革命思想理論。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他在日本與檀香山寫了他第一篇報刊文章。組織留學比京、柏林和巴黎留學生爲歐洲同盟會後，於一九〇五年回到日本東京。自此以後，孫先生運用他多重文化背景——中國、日本、美國及歐洲——取其精華，組成一套合理且足以引導共和革命的主義。這套理論就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大主義。

三民主義是在變動時代中產生的思想，是依當時須要而生的，故其內容於後亦隨時代之不同而有很大的轉變。「民族主義」在此時有反滿和反帝國主義的雙重意義，但因革命份子仍須要尋求外人對革命的幫助，所以並不強調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爲一平等主義，由憲法中的五權分立保證民主的實踐，亦即結合美國民主政治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分立，及由中國傳統政治中之考試、監察二權所組成。「五權憲法」很明顯地是孫先生自己的發明。最後他的「民生主義」是面對工業成長後可能產生的新問題而設的，其並未陷入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而是採亨利喬治(Henry George)著名的單一稅法之概念，去應付未來土地的自然增值，及制止投機者和獨占者的增加。因此，民生（其爲一古老名稱）在一九〇

五年時主要表示的是，利用西方單一稅制之方法，使城市的地權平均，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因爲土地重新分配會引起商人及地主子弟的不滿，恐怕會因此連帶他們反對政治革命。

同盟會與其變遷　在日本人的協助下，革命力量——如海外華僑資金、祕密社會的接觸、新式學生領導階層及革命理論——終於在一九〇五年結合起來。孫先生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爲了使幾個革命團體聯合在一起，於是把孫先生介紹給黃興和其他湖南革命團體的人員。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革命份子集會東京，建立同盟會，由孫先生任總理，黃興任協理，其他如章炳麟等人皆被任命居重要位置。（譯者按：章至一九〇六年始由上海出獄至東京主編「民報」）並且在新加坡、比京、舊金山和檀香山廣泛設立海外分部，有十七省的人士參加（除甘肅省以外）。在這一千名的早期會員中，以湖南、湖北省人爲最多（長期由教育現代化的主張者張之洞主政之故），廣東人第二，四川與長江下游分居第三和第四。其中黃興創辦的華興會入同盟會之人數遠比孫先生的興中會入會人數要多得多。

三十九歲的孫先生之人格是被許多人所景仰的，他不但是革命團體中年齡最長的，而且也是最有名望、經歷的地方最廣、擁有豐富經驗的一位。他在長江流域的勢力雖然不大，但是他與日本有著深厚的關係。從另一方面而言，他是受西方教育，不屬於中國的士紳階級，尤其是他以圖謀革命聞名於世，並不是以著述知名，由於與知識界有些距離，當時尚不能以現代聖人的地位，去左右一代思想。不過，在傳統崩潰的情形下，中國面臨着文化的混亂，在諸多外國模式中不知如何去選擇，還沒有那個思想家，

能像孫中山先生一樣，成功地建立如是一套有系統的思想。

共和主義的新概念由孫先生的代筆人透過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被解說得淋漓盡致。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民報主筆如汪精衞、胡漢民、章炳麟對梁啓超的漸進改革、君主立憲的觀點，做了生動嚴厲的攻擊，大大地贏得中國學界的支持，他們相信中國如果能及時革命，將會趕上甚至超越西方　孫先生主張用成語「迎頭趕上」之法，以替代漸進的改革。革命與立憲兩派都認爲，從中國過去的歷史發展來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例如日本）會影響及加速現代化的程序。其中立憲派之領導者梁啓超認爲中國人民需要開明專制政體，及普遍化的教育，以備適應現代化的政治生活。而同盟會由孫先生提出了三個程序的革命方略：㈠軍政時期：各縣以三年爲限，在軍政府統治下，成立自治政府。㈡訓政時期：以全國平定後六年爲限，置於約法政府統治之下。㈢憲政時期：最後的階段是在憲法政府統治下，擁有國民公舉的總統與議會。孫先生這些樂觀的學理及單純的想法，很快地就證實了要比冷靜、理性的梁啓超更受一般民衆的歡迎。而那些君主政體的擁護者正因光緒帝於一九〇八年崩殂，而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雖然有了新而統一的革命團體，但革命運動却遭受再三挫折，一九〇六年十月，在最難統治的湖南省，由於饑荒的緣故，促使了哥老會發起獨立暴動。並且江西萍鄉的煤礦工人，也加入了這次起義，但是一個月內就被由四省調來的清軍所鎮壓。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由於滿清政府的抗議，促使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先生出境，孫先生與黃興只得動身他往，爲指揮支援之便，抵法屬印度支那的河內，

並在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到一九〇八年五月一年間，先後在廣東、廣西、雲南發動了六次起義。但是法國殖民政府，很快地發現中國革命之事例，激勵起越南人民的反抗意識，只得將同盟會員一一遞解出境。一九〇九年清政府逮捕革命黨人，並處以極刑，加上革命黨人協調失敗，及屢次起義的不成功，減阻了海外中國人財力支持，且導致革命運動中內部的不和。因此使革命運動無法進行。孫先生只好再赴歐美尋求財源。另外特別是由巴黎來的一羣學生，擁護鼓吹無政府主義，他們如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常以暗殺行爲表示其政治主張。一九一〇年長得英俊挺拔的汪精衛，試圖在北京炸死攝政王不果，被逮捕囚禁。此時，反清情緒雖然極爲高張，但是革命運動在整體上仍是相當失敗的。

在此革命困難時，黃興則以深入顛覆滿清軍隊爲其運動革命最有力的方式。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二月廣州新軍原來計劃的起義被壓制，但是十八萬七千元港幣已由海外籌集，這些錢主要是由東南亞及加拿大的華僑所捐獻。一九一一年四月運用此捐款將軍火及趕死隊一一私運廣州。然而不幸地這次廣州起義—四月二十七日發生，亦即陰曆三月二十九日—如過去數次革命的結果一樣，仍舊失敗。雖然這次起義有許多感人的英雄故事，但是由於機密洩露、清政府實施警戒，最後不得不變動起義計劃，各軍間缺乏協調，一般的混亂等困難接踵而至。當天黃興的部屬分成好幾個隊，企圖佔領總督衙門，然而其中一隊誤認友隊爲清軍，發生砲擊自相殘殺，損壞革命軍的武力。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就是這樣犧牲的。這次革命是孫先生自一八九五年以來第十次起義之失敗，黃興事後曾評及這次起義曰：「一軍之中，情願有一劣將，不願有兩良將，以言夫將雖劣，而號令得專，單獨不至潰散，若有兩良將，必各有

主見，互相爭議，軍情必因之散漫，欲求制勝何可得矣！」

同盟會與其他團體發起的起義，其眞正的影響力表現在政治上的破壞力要比表現在軍事上的毀壞性大得多。他們打擊了清朝之聲望，公開表示要求他們的權益。一連串的暴動、暗殺與外來的資金之供應，已經逐漸打破傳統沈默大衆天命的觀念。再加上當時經濟條件之惡化，如農民的米荒（如一九一〇年湖南的情形），更增加人民對清廷的反感。又因士紳利益受侵害而支持的保路運動（如一九一一年在四川的保路運動）也促使清廷中央權力逐漸廣泛的衰退，與君主專制政體的傾覆。

清朝的傾覆　清廷的滅亡發生得非常突然。推動其成功的主要動力並非在同盟會控制之下，而是由各地即與而作。直接影響至革命發生的湖北學生與軍人，在革命前即前仆後繼地組織一連串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可謂爲同盟會的分支，總部設在上海而主力則在漢口。另一個較大的地方團體文學社，外以研習文藝爲掩飾，內則主由軍人組成。這兩個革命團體於一九一一年九月決議聯合起義。然其如往昔的革命運動，他們革命的計謀十月九日被清廷發現，使得一部分在武昌的新軍不得不在十月十日起義以自救（這就是以後的雙十節之來源，因當時爲陽曆的十月十日）。參加這次起義人數未足三千人，對清廷龐大的軍隊而言實爲微不足道，然因湖北總督倉皇逃離武昌，使清軍羣龍無首，不能有效的利用其本身之軍力。革命初成時，武昌臨時沒有革命領導，故迫使由新軍協統黎元洪暫爲領導。

這次反清革命很快地得到各地之響應，幾個星期中將近有二十四支曾受同盟會影響的新軍向諮議局宣佈反清立場，至同年十一月初，南部、中部甚至西北部各省紛紛宣告獨立。各省的獨立多是清軍在各

省都督、與諮議局、立憲運動領導者連合促成的。至於清廷與革命軍間的戰役只有在十八個地方發生。由於清軍精英都是效忠袁世凱，所以清朝在無法收拾危勢時，別無選擇，只有恢復袁世凱的權力，希望藉此作最後的掙扎。無奈袁氏對清朝並不在意，一心想乘機操縱全局奪取權力，於是要求清廷立刻設立責任內閣，由他爲內閣總理，指揮全國軍隊。同時獨立各省與同盟會革命黨在南京共同建立一臨時政府。

孫中山先生在美國丹佛（Denver）的報紙上得知武昌革命消息後，即赴英國尋求借款，並且要求英國協助革命份子，阻止日本給予清廷經濟或軍事上之支援。當他自英返滬時，及時被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宣誓就職，同時也宣佈只要袁世凱誠心支持共和，他願辭去總統職讓給袁氏，以求中國南北之統一。

革命後除了在武昌各城發生一些激烈戰鬥外，一般而言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的革命是異常平靜的。然而另一方面來看，這次革命除了推翻滿清以外，並沒有得到什麼決定性之結果。不過這次革命也有一些共同同意的看法。一、每省派代表參加國會。二、中國必須統一以抵制外國之侵略（尤其是日本）。三、承認袁世凱是位有經驗有能力的人，並願支持他領導新政府。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十二月底，孫中山、黃興及其他革命黨人大致都同意這一點，認爲袁世凱的確是避免中國內戰、社會混亂，和外國侵略的最大希望。至於袁世凱，有北洋軍的支持及中央地位，操縱全局，雙管齊下，一面公開地與清廷商議，一面又祕密地與革命黨和南京臨時政府談判，從南北矛盾中設計一套協調的方法。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宣統皇帝遵循天命，服從民意，宣佈退位，結束清廷統治以及中國自古以來的君主專制政體。

不久，孫中山卽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由臨時參議院在南京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並議決臨時政府仍設於南京，電袁前來受職。爲了避免移都南京離開其權勢所依之區域，袁世凱唆使軍隊在北京發生暴動，藉口北京兵變必須留在北京維持秩序。終於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三月十日，袁氏在北京巢窟宣誓就職，並接受臨時約法爲全國根本大法，直至國會設立與完全立憲政府成立後，始取消。臨時約法是孫先生用以限制袁氏權利野心的護符，然對一般漸進主義者而言，他們認爲必須等到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權力政府建立，替代現今各省自治的聯邦政府後，臨時約法之功能始可發揮。

由於過去十年中，現代化——指新觀念的建立、制度的改革與民族主義興起——發展得太快，使得天子能平靜、容易地消失於政治舞台上。爲了表示新紀元的開始，中華民國採用國際性的陽曆代替傳統的陰曆，其他紀年方式仍承襲傳統習俗，只是在一九一二年改爲民國元年。

第二章　從共和到獨裁（一九一二—一九一六）

雖然大家都在慶幸革命的成功，但是推翻一個王朝，只是符合傳統中國「循環」歷史觀——天子被認爲喪失天命後，經過一段時期的紛亂，必會有一個強人另受天命，起而代之，建立一個新帝國而已。其本身幷不是什麼革命性的事情。大權在握的袁世凱，企圖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後，重行帝制，正屬於這個傳統觀念的模式。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之失敗，其意義不僅是暗示了王朝興替情況的斷阻，而且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間所發生的革命事物，正顯示恢復帝制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一節　共和政治的開始（一九一二年一月—一九一三年三月）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年初，中國仍處於完全混亂的局勢，原有的政治制度已遭受革命嚴重的破壞，而那些已脫離清廷宣佈獨立的省份，皆想組織一個能滿足他們自己需要的政府。在北方的行政體系仍然保持原狀，但是在長江流域及南部各省，都督成爲地方上的新統治者，而各省的組織也開始渙散了。例如廣州已不能控制廣東省的東部，四川則有兩個政權，一個在成都，一個在重慶，許多城市和地區紛紛宣佈自己爲「獨立政權」和「自治團體」。

隨著政治組織的傾覆，社會上普遍地無法恢復應有的社會秩序，這一點可由盜賊橫行的情形來證明。逃散的農民與久未領薪的軍人，在各幫派中為自己的利益活動。在廣東這種不安定的情況尤其厲害，所以有一個西洋記者稱這種情形為「盜賊共和」（The Pirate Republic）。就是傳統的祕密社會的破壞行動也未甚於此。這些賊衆控制的地區，如四川東北部，被劃分為許多小區域，而賊衆們在這些地區只有靠著苛稅與強奪民財來維持。甚且在示威運動方面，保有傳統行為特徵的勞動示威運動，仍流行於上海工人階層中——尤以紅幫或青幫為甚。而且在成都和瀋陽的兵工廠、安徽的煤礦場、上海的紡紗廠，罷工組織又發展出一套新的抗議方式。總之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期間，革命份子沒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社會秩序之重建。至於士紳，面對着他們眞正的危險，不是人民力量的興起，而是社會上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所以對他們而言，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維持社會秩序。

雖然中國行政上早已存在的許多問題到一九一一年以後更趨嚴重，但是因地方士紳過去在地方領導的經驗，使他們確能代替政府，解決一部份行政上的難題。諸如議會、商會、職業公會，在地方上就有保障薪津給付，保障紙幣價值，處罰逃犯，組織自衞隊，驅逐不法分子等功能，使許多地方行政上的穩定性、持續性之因素，使傳統社會秩序的功能，能够維持下去。

由於士紳的努力，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秋因內地與通商口岸的交通中斷及工商社會投資減少而發生的流動資金短缺的經濟困窘現象，很快地被控制，且因他們對地方公共事務的妥善處理，而達成社會上及經濟上的凝聚力。這與政權上的分崩離析完全相反，但是這種處理方式也有它的限制。因為無論

地方士紳多麼富有，他們也不可能長期供應公共的需求，再加上地方政權的分崩離析更阻礙社會秩序的維持。例如賊衆飽掠一地受到地方之供給後，則繼續他往騷擾不已。因此使士紳轉而要求恢復中央政府的權力，以促進建立起持續性經濟社會組織。

然而是誰使中國再度統一的！誰又從中獲取利益？是受北洋軍支持且藉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二月清帝退位敕令授以合法繼承權力的袁世凱？還是受上海中產階級支持試圖將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及西方措施引用到中國的孫中山先生？

南京政府 在理論上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由孫中山先生爲總統的共和政府，應爲合法的中央政府，它的權力是由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八日組成的臨時參議院的各省代表，經由投票，認可授與的。雖然臨時參議院的議員并不完全屬於孫先生的革命黨，但是新政府的確是由出身於同盟會的人控制。例如被孫先生任命爲陸軍總長的黃興，乃爲孫先生手下最出色的人物，就好像同盟會組成時的情況相同。另方面，上海中產階級的財力及政治上的支助，更促進共和政府的誕生。據估計，在革命期間，工商社會給予同盟會的資助超過柒百萬元，商人，買辦則對外國商會施以壓力，使他們與滿清政府對立，而且要脅他們貸款給同盟會而與擁清派的勢力相敵對。他們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孫先生能制定一套政綱綜和他們的切望。這個政綱，終在一月五日的宣言中正式提出，重申同盟會的政綱要旨，主張清廷退位，在共和政府的領導下，完成中國統一與經濟發展等。其中對於早幾年孫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權的土地改革計劃却無更進一步的提出，而土地改革正是中產階級向來最不贊成的。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間政府在孫先生的領導下，致力督使清帝的遜位。（清帝終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下詔退位）并藉著新創立的組織——如省工商局——刺激工業發展，鼓勵海外投資，以開辦中國工業銀行。雖然如此，但共和政府仍無法突破統一的障礙。它號稱全國中央政府，但事實上，它的權力僅限於控制長江下游各省。至於北方，完全在袁世凱的權力之下，而中部各省，如湖南、湖北則普遍受到欲與袁世凱合作的黎元洪的影響，其他地方，由於地方排他主義與行政組織崩潰之故，中央政府發生的命令對他們根本毫無效果。

中央政府無法重新建立統一的國家，不只因爲這工作的困難重重，且孫先生缺少實質的權力，是另一個重要原因，強而有力的上海中產階級反造成了共和政府的社會基礎極端狹隘。從南京政府的軟弱無力反應出現代中產階級的邊際特質，那就是人數很少且地理上分配相當不均勻。另方面，孫先生也無法維持一個有效的黨組織。同盟會的組織本來就很鬆散，再經過革命事件的壓制，派別內鬨與其間的歧見，相當盛行。二月二十一日，汪精衛在天津召集會議，企圖重整同盟會的統一，但同盟會組織不但未因此而統一，反而更趨渙散，甚至到最後黨組織有只在孫總統周圍一些人而建立的趨勢。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先生在南京就職時，便宣佈如果袁世凱轉而贊成共和，他將準備讓位於袁世凱，不論孫先生是否認爲推翻滿清的目的已達，還是他對經濟的技術問題更爲重視，但他從沒有欲強使自己主持的政府繼續主政下去，或者他想儘可能的退讓，以促進中國的再統一，因爲中國的再統一不能由他完成。這種謙遜的態度，不是他主要特質之一，但是在這種環境下，這種行爲正證

明孫先生一生多麼深切渴望中國統一。

雖然南京政府僅是曇花一現，但是他卻將同盟會的意識觀念引進中國的政治生命中，然而由於它的力量微弱，以致於無法形成眞正民主政治，但它也使中國保有了民主政治的外觀。所以當袁世凱想掌權時，他至少必須尊重「民主」這個字與民主政治之外在形式。

袁世凱的掌權　一月中旬，經過孫先生的請求，袁世凱對朝廷開始施以壓力，逼使清帝自動退位。元月七日御前會議中清帝自動退位的構想業經提出，這種想法與良弼形成敵對，在當時良弼是一位很有勢力的將軍，也是袁世凱決定性的敵人。幾天後袁世凱遭革命黨人的炸彈暗算，幸未受傷。這件事證明袁世凱與革命黨并無瓜葛，而眞正忠心於淸室，因此使袁世凱得以消除良弼等人的反對勢力，沒有任何人能在朝廷中阻礙他的發展，元月二十七日由於北洋軍的大小將校，向淸政府與滿洲親貴聯合通電，要求淸帝立卽退位。淸廷無力反對，只有同意。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淸帝下詔退位，從此淸帝失去所有政治上的權力，但是仍擁有尊號與財產，且淸帝退位後，歲用肆百萬元由中華民國政府給付，淸帝宗室子弟亦得到特別優厚的待遇，而詔語中更授權與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淸帝退位後，孫先生忠實履行所約定的條件，立刻提出辭呈，雖然辭呈是另附有條件的，對孫先生而言，實不可想像中國共和的法統竟根植於遜帝的敕令。他認爲未來的總統應該由人民及人民代表的臨時參議院授權，所以袁世凱離開北京到南京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孫先生認爲袁世凱離開北京將可截斷袁氏與北洋系與其幕僚的深厚關係。袁世凱當然是不願放棄他的權力依靠，於是他藉口北方和北京情勢

不穩，可能有動亂堅持留京。二月廿七日，宋敎仁、汪精衞、蔡元培等南方專使團到達北京，這時北京駐軍發生暴動表示北京情勢確實相當危急，經過這次驚嚇，孫先生的專使放棄他們要求袁世凱去南京的計劃，並且他們要求在建立一個統一政府之前，必須先選定首都所在地。三月六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議案，允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就職典禮在三月十日舉行，且在就職後提名唐紹儀爲內閣總理組織新政府，四月一日孫先生正式提出辭職，並且孫先生亦提議臨時參議院亦宜遷於北京。

袁世凱靠著北洋軍的介入，先是逼使朝廷退讓，次而克服南京政府，兩次皆以武力解決問題，這似乎就是以後黷武思想控制共和的象徵，雖然如此，令人驚異的是，袁氏一開始就發展國會制度，並非錯誤的嘗試，因爲類似國會制度的參議院，正是供給袁氏權力之必要基礎。

政黨政治的經歷　革命黨的領導者，在長江下游與南部各省有相當雄厚堅固的基礎，例如曾在孫大總統政府下任陸軍總長，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三月以後爲南京留守的黃興，在其手下的軍隊就有伍萬人左右，如果袁世凱想控制全國，顯然地他必須做些讓步，然而由於革命黨執著予民主的原則與幻想，使得他們放棄使用武力（黃興自動于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春，解散他的軍隊）。作爲要求實現民主政治之手段。他們所有的努力，就是想建立一套制度及法律，阻止袁世凱的野心，完成一個眞正民主共和政府。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二月至三月間，南京臨時參議院起草的臨時約法，在袁世凱就職總統時已被接受。這正指明革命黨人想利用法治控制袁世凱野心的策略，原先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間，

革命黨曾企圖建立總統制，以鞏固孫中山先生的地位，但數星期後，他們担慮總統之位將落於袁氏，於是又改爲責任內閣制，將主要行政權力，委任於內閣，凡法律的制定，任命閣員及使節，宣戰媾和訂約等，均須經國會同意始可實施，官方文件，經總統簽署後，也必須經內閣總理副署。

若要使政黨制度能發揮效用，很平穩的實現責任內閣制，則中國受祕密社會生活方式支配的政治傳統，必須徹底改變。就以同盟會而言，它的政治組織綱領及經濟發展的思想，雖得自西洋現代思潮，然而它仍保有傳統祕密社會的許多特徵，諸如其隱蔽性，宣誓效忠，個人關係勝過一切等，都帶有相當傳統色彩。至於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和一九一三年（民國元年）陸續組成的新政黨，其內涵絕不能與歐洲的政黨相提并論。它們大部分都具有傳統的習性，入黨者不是爲了情面，就是爲了個人的利益，才加入政黨，有些人難以拒絕從各個不同政黨來的邀請，而有跨黨的現象。它們缺乏定義清晰透徹的政綱，且結合這些有錢階級的主要力量，個人關係較黨綱的力量大得多。簡單地說，這些政黨組織，如水上浮萍，不能在民衆間生根。

雖然如此，但是在共和建立之初，新式政黨的出現，確實對中國政治經驗有很重要的新貢獻。在無數政黨中，大致可分爲二個主流，一派是根源於清末的同盟會，另一派乃根源於清末立憲團體。同盟會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在短短的六年中，不斷地發生組織內部的抗爭與歧異，反滿革命成功後，其間的裂痕更爲顯著，其中南方幾個領導人物，如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聯合組成爲同盟會的左派，堅決反對與袁世凱妥協，他們主張在廣東增強革命武力，繼續與袁世凱週旋到底，他們的意見並不爲孫

中山先生接受，孫先生則改變原有主張，轉而支持宋敎仁及上海集團的方略，認爲袁世凱如能受國會控制，他們將願意與袁氏合作。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三月在同盟會黨員大會中，右派及宋敎仁，獲得絕對勝利，使宋敎仁在以後的幾個月中，政治活動，比孫先生還多。當同盟會內部爭鬥劇烈時，同盟會中一部分激烈份子，脫黨另立新黨，給予同盟會的基礎嚴重的打擊，他們是：在湖北受黎元洪影響而組成的民社，以浙江光復會爲主體，章炳麟領導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另外，吳敬恆、汪精衞、張繼等數位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成的進德會（他們幷沒有脫離同盟會）。

至於立憲派在革命後的發展，分化作用更爲顯著，分化出來的黨派中主要以共和黨和共和建設討論會爲主。章士釗有感於競爭後的多黨林立，對國家幷無益處，提倡兩黨制度，希望各黨能棄小異取大同，促成政治力的新結合。在此呼籲下，激進的國民黨於一九一二年八月建立，保守的進步黨亦於一九一三年四月結合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而成。（國民黨淵源於同盟會，由宋敎仁領導，放棄原來的社會主張。）這種由小黨結合爲二大黨的政策，促使了議會制度的適當功能之發揮，而這敵對二黨，對袁氏政權均甚支持。

袁世凱和革命黨之間第一衝突，是爲國會與政府的問題而引起的。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三月，袁世凱任命曾南下議和的唐紹儀爲他的內閣總理。唐袁之間已合作多年，所以唐氏在袁世凱心目中爲理想人選，至於革命黨，唐氏在南下議和時便已祕密加入同盟會。（譯者案：於一九一二年三月由蔡元培、

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因此革命黨對唐紹儀爲內閣總理亦極爲安心，所以從資格、才能、各方面來看這位在美國受教育的唐紹儀應爲最理想人選，在他的內閣閣員安排中，主要閣員：如內務部、陸軍部、海軍部三部，任由北洋系的人來担任，而於處理專門技術的部，如財政、農林、工商、司法、教育各部門，則由同盟會會員担任（譯者案：財政總長屬統一黨）。

民國元年六月，內閣不滿總統所爲與袁發生衝突，事情經過如下：同盟會運動直隸省議會通過選舉王芝祥爲直隸都督，希望這位革命黨員，能在直省控制北京，就近監視袁世凱。當時參議院也經由法律程序通過此議。袁世凱原先不知王芝祥的身份，而應允唐氏之決議，但後感到此事對己身之危險，堅持拒絕承認這次選舉的有效性。於是北洋軍界宣佈反對唐內閣，迫使唐紹儀辭職。唐辭職後，無黨無派外交家陸徵祥被任命爲總理組織新內閣，處於袁世凱與臨時參議院相爭的夾縫中，陸徵祥組閣確是件相當困難的工作，結果臨時參議院否決他提出的絕大多數的國務員，袁世凱於是又再度利用北洋軍與警察加以干涉，迫使參議院通過，平息了這次爭持。爭鬥是平息了，但是內閣却變成附和總統的一個祕書機關了。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九月當趙秉鈞接替陸徵祥爲內閣總理時，袁世凱與國民黨間的衝突亦漸平息，孫中山先生與黃興也曾一度到北京做官方訪問，受到袁世凱殊禮招待。在孫先生與袁大總統交談中，孫先生提出他所期盼的經濟發展藍圖。九月九日袁氏發佈命令，宣佈孫先生爲全國鐵路總督辦，負責中國全面的鐵路計劃。國民黨則利用這段休戰時期，準備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十二月和一九一三年

（民國二年）一月的國會大選。結果國民黨在國會中得到壓倒性的席位，而且計劃推宋教仁爲新內閣總理，但是不幸地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當宋教仁擬乘火車北上時，在滬寧車站被刺身死。雖然袁世凱對這次暗殺事件確爲主謀，然而國民黨對這項罪行也無可奈何。

袁世凱利用警察的煽動，軍事干涉與政治暗殺戰勝了反對黨。宋教仁的死，代表政黨政治的結束，打開了獨裁政治的序幕。

第二節　袁世凱走向獨裁（一九一三年三月—一九一六年一月）

袁世凱與列強　當袁世凱開始走上個人集權之路時，佔了很大的優勢，爲其他敵對者所遠不及。那就是他被外國政府視爲一個強人，且得到外國政府的承認與支持。長久以來他一直受到北京外交圈的贊同，而他也非常注意自己的聲譽，在他的周圍總有許多英美各國新聞雜誌的記者，其中有位時代雜誌的通訊員—莫里遜（Morrison）甚至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的七月成爲袁世凱的私人顧問；當袁氏成爲中華民國的總統時，列強也準備幫助他，雖然這種幫助對袁氏而言是極爲珍貴，而且更增強了他的權勢，但是對國家獨立自主以及主權上的損失亦不在話下。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年初，可供北京政府處理的財源非常有限，因爲滿洲政府僅留下一個空的國庫，地方政府爲了支付自己的軍隊與地方上的需要，所以仍保持稅收的自主性，海關收益也因作爲貸

款的保證而抵押給外人，鹽稅行政亦是十分混亂，政府每月收入勉強可達八百萬元，但是僅僅北方軍隊的維持費，就需要三百五十萬元，償付外人的貸款又要五百萬元，所以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國內欲增募公債的計劃失敗後，袁氏只得轉向外人舉債，列強也曾先後給予袁世凱兩次的幫助，一次是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二月，北京駐軍暴動前借給袁氏二百萬元，接著在三月份又借給袁氏政府一百萬元，這次借款以後，袁氏又藉口維持北方秩序，需增添三十支部隊爲由，要求更多的借款支付，且經由內閣總理唐紹儀預算爲一百萬英鎊。

爲了應付這些需求，國際上幾個主要的銀行，曾組織了一個銀行團。爲了避免各國間再次發生第一次鐵路借款的激烈競爭，所以四國銀行團—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均在他們的政府支持下，決定於一九一〇年共同與北京政府協議，一九一一年四月締結建築中國中央鐵路的借款條約。

革命的發生更給予這些經濟侵略者新的期盼，他們都希望以貸款方式轉而控制中國政府的財政和收益。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六、七月間，國際銀行團於巴黎會議中完成了協議，同意日本與俄國加入股份，至此以後他們與袁氏不斷地接觸，又提供了一大筆的借款。借款銀行團要求這些借款的使用必須受他們的監督，並指鹽稅的收益作爲借款的保證，且轉由外人管理。袁世凱的政府也曾多次試圖避免向獨佔外資市場的外國借款財團舉債，他也曾試圖向中比銀行（Banque Sino-Belge）（一九一二年三月）及倫敦查理士布其克里斯樸公司（Charles Birch Crisp Corporation）借款，然結果都相繼失敗了。

由於美國民主黨總統威爾遜（Woodrew Wilson）反對美國加入國際借款組織，使得美國銀行家紛

紛自國際銀行團中退出。由於爲時已晚，以致無法拒絕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已簽訂的善後大借款。這次借款的數目相當大，共計二千五百萬英鎊，且合約中已規定了借款的用途，其中一千萬英鎊是作爲外國借款服務的保證，二百萬英鎊準備作爲重整鹽稅的經費，五百五十萬鎊乃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四月至九月份政府的開支。而每年的海關剩餘及直接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省稅與鹽稅，則作爲借款的担保。除此以外，中國政府必須同意任用外國的技術顧問，以理查丹（Richard Dane）爲鹽稅稽查處主辦，康那克來魯夫（Konacraloff）及帕都克斯（Padoux）爲審計顧問，經理預算。等到這些條件完全被袁氏接受後，借款始陸續由北京的外國銀行支付。這無疑的是對中國政府一種繁雜與極端侮辱的程序。

袁世凱爲了得到善後大借款所做的讓步，確實對政府的獨立性是一很大的打擊。而且他爲了求得外國外交上的承認，所做的退讓，確實威脅到中國主權及領土的完整。原先在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間商議借款問題時，俄國及英國要求中國承認西藏與外蒙古在任何外交協議中均有其自主性。事實上這兩個地區已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宣布獨立，而且俄國在烏恰（Urga）已設立要塞駐防，並且派遣顧問深入蒙古政府中。大英帝國亦更積極的在中亞採取擴張政策。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月七日，袁氏同意簽字放棄對這兩地區的控制權，方換得英俄兩國對袁氏政權的承認，以後其他各國才陸續承認。

袁氏的退讓政策更激起外強更進一步地侵入，而且也由於對外強一再的妥協與屈服，中國的獨裁政權亦由此建立。

二次革命及其失敗　袁氏的野心是由於反對者及其協力者勢力的薄弱而興起的，反對黨黨員的渙散與黨員的背叛亦逐漸破壞他們在國會和地方的力量。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十二月選出的國會議員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四月八日集會，雖然國民黨員佔大多數，但他們竟然放棄質詢調查殺死宋教仁兇手的意念。當袁總統未依憲法程序得到國會同意，而擅自簽訂善後大借款時，國民黨員也只是提出表面的責難。事實上，袁世凱也一再試圖利用賄賂以減少國會的憤怒。而國民黨員的國會議員若依其賄賂，願自動脫離黨者，則可得到一千磅的代價，（此款乃由善後大借款中提出的）至於那些堅持立場而不動搖者卻受到警方的脅迫，於是這些國會的反對分子就因此而被瓦解了。

袁氏的勢力已控制了中國的北部，而袁氏也藉著盟友之助擴張了他在南部與中部的勢力，但是其中有六省—湖南到上海的各省與廣東省—是國民黨嚴格控制的地方，仍不願與袁氏妥協。至於國民黨籍的都督由於過份小心謹愼與缺乏軍械彈藥，也不願與袁氏公然起衝突。國民黨的領導者旣沒有給予他們任何力量去與袁氏抗爭，也沒有採取固定的策略應付時局，不過大部份仍是傾向黃興穩健溫和的路線，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鈞主張從事對袁氏的武力抵抗。

兩派間的決裂是因袁氏於六月九日下令罷免江西都督李烈鈞而引起的，這件事使革命黨黨員不得不起兵討袁，在討袁期間中雖有七省宣佈獨立，但是只有江西、江蘇二省發生抗袁的戰爭，其他各省均無戰役；到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九月二日袁氏軍隊攻下南京後，二次革命卽告失敗。當時的觀察家，尤其是外國觀察家視這次革命爲「忌妒、貪婪的政治野心者的反叛」及內戰最後的痙攣，而現在的中國史

家卻稱此次戰役爲二次革命，以強調它的重要性。從滿淸退位後，支持袁氏與反對袁氏者之間，顯然就是選擇民主或獨裁，國家主義或殖民主義的抉擇。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政治上的爭鬥情勢較一九一一年時更爲激烈，但是社會大衆對二年來社會之變動混亂已感到厭煩，民意上漸對革命黨不滿。例如一九一三年春，商界曾表示不滿於袁世凱濫用權力，善後大借款激起他們經濟的民族主義，並且宋教仁被暗殺後，上海市場的物價也引起相當大的波動。雖然這一連串的事先後發生引起中產階級的不滿，但是在一九一三年夏，中產階級並沒有像一九一一年那樣團結力量支持「二次革命」。且由於當社會自由受到嚴重威脅時，中產階級的利益往往會首先受到政治危機的破壞。爲祈求社會的和平秩序，以保障他們的利益，使他們自然地與袁世凱聯合，以求互利。雖然袁世凱沒有得到他們正面的支持，但是商界中立的政治態度，確實給他不少幫助。

雖然革命黨人得不到工商界的支持，但是卻從農民階層得到不少的幫助。如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夏，在西北各省發生的白狼暴動事件，側面地威脅到袁世凱的力量。這次暴動使三萬北洋軍超過在一年多的時間中陷入絕境。白狼的組成員是由哥老會中召集來的，他們在一位原任職於南方而經二次革命後之生還者的領導下，由河南流竄到陝西、甘肅，依靠著鄉間的居民與掠奪爲生。雖然這次運動經過之歷史很少爲人所知，但這次暴動對推翻袁世凱的政治願望，卻是明顯的使用了傳統暴亂、掠奪的方式實行的，而且其於社會上所揭示之抱負也不過是一般祕密會社所打出「劫富濟貧」的口號而已。

革命組織的渙散與白狼革命的擬古作風是西北暴動與南部長江流域抗袁革命不能結合的主要原因。

孫中山先生的聲望早隨南京臨時政府的結束而下降，國民黨的建立並沒有恢復同盟會時的革命意識，且文未提出一套普遍理想，以取代已無用的反滿的口號。

二次革命缺少民衆的基礎與社會主要階層的支持，又沒有一套意識結構作爲革命的理論基礎，最後只流於一種企圖恢復權力的武力思想。一九一三年各省紛紛效忠袁世凱，更抹殺革命黨的奮鬥意志，使革命黨與袁氏間的衝突變成強弱分明的敵對勢力；革命黨的弱勢也很快的被鎭壓下去。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二次革命的失敗，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不下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的意義。它證明了在當時的情勢，革命時機尚未成熟，革命運動只有寄望在將來實現。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八月，孫中山先生首次被迫出國，與黃興及好幾百位國民黨中激進分子逃到日本，由於國民黨與西方式政黨政治的失敗，激使孫先生想利用過去祕密社會的傳統組織型式，改組國民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七月中華革命黨在此意識下產生，黨內弟兄必須宣誓效忠他們的黨魁，以維繫黨紀。孫先生認爲只有這樣，才能加強黨內團結、訓練、及黨的效力。這種思想引起許多激進份子的反對，如黃興、李烈鈞，他們情願與孫先生決裂，也不願順從這種屈辱的宣誓程序—諸如參加革命黨者必須要蓋手印宣誓效忠。所以在以後的數年中，由於革命黨被逐在外，轉爲地下組織，並且內部又是分歧異常，對當時的影響力減弱了許多。爲了急於爭取海外華僑社會的資助，革命意識理論重建之工作並不受人重視。再加上當時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泛亞洲主義，及其對日本贊佩與友好的態度，割斷了中國革命黨與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以後受日本大陸擴張而激起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關係，使他們無法

居於思想界的領導地位。至於孫中山先生與其知友，則一直居住在日本的郊區。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乘勝伸展勢力於長江流域及南部各省。他以任命北洋軍人爲各省都督藉以控制各省，如皖督倪嗣冲等；再以取得中南部各省都督的信任與服從，如浙督朱瑞等。他更以富貴榮華籠絡在湖北擁有雄厚、獨立地位的黎元洪，調至北京，藉以削奪其權勢。袁世凱地方勢力之建立，完全依賴北洋軍對他的效忠。至於西南各省的都督—如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的態度，仍然非常不穩。不過大致看來，中國在袁世凱北京政府的統治下，得到一次暫時的統一

日本的覬覦　雖然中國得到一次短暫的統一，但是內部爭鬥與國際上帝國主義之侵略，造成中國主權喪失，與國力的衰退。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組織，即利用歐洲各國無暇東顧時，藉口與山東的德國爲敵對勢力，迫使中國接受日本政治經濟侵略計劃；使中國成爲日本的一個保護國。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中包括中國承認日本在內蒙古、滿洲、東南沿海各省—除已淪入日本統治的台灣—及長江流域等地的特殊優勢。二十一條中的第五條，竟然要求中國各民政、政府、軍事、警察等各機關組織的重要職位，都應聘請日本顧問，並且要求中國政府賦予日本以軍隊支援中國的獨特權利。當二十一條要求洩露後，引起中國民衆的強烈抗議，一股強烈民族屈辱的憤怒喚起當時的知識份子，全國中產階級也發起一次大規模抵制日貨運動，以抗議日本的侵略。雖然如此，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五月袁世凱仍然應允日本無禮的要求，簽訂條約。或許袁世凱確無法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抵抗措施，但是爲了強化其自己的權力，基本上，他是非常願意應允這些要求的。

袁世凱的個人獨裁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平定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爲他自己建立一個新的機關，以與其新的權力相應。十月六日國會選舉總統時，袁氏收買乞丐暴徒齊集包圍議會迫使議員通過。十月二十五日修改臨時約法，把內閣制改爲總統制，總統權力大爲擴張，其內容包括總統有任命各部總長及外交公使權力，無庸經參議院的同意。外交大權歸於總統，凡宣戰、媾和、締約等權力，亦無庸參議院通過。十一月四日，國民黨被宣佈爲非法組織，不久國會亦遭袁氏解散。此後，袁氏利用政治會議實行其獨裁政治。一九一四年三月，袁氏下令解散各省議會，同年十一月即修改憲法，通過新約法，規定延長總統任期爲十年，連選連任永無限期，且總統選舉時，若參議院以爲沒有改選的必要，便算連任，以後的總統由現任總統推荐，以三人爲限，「書之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這項安排，確保袁氏終生享其權力，且爲他的子孫也舖下繼承權力之道路。

袁世凱此時已屆五十五歲，生理上，身體壯碩，頭頸粗壯，言行充滿了活力，使全身生氣十足。此人說話時銳利的眼光往往能洞察對方的意思。濃厚下垂的髭鬚，加上他對人輕蔑的態度，倒頗似法國總理克里蒙梭，這一點在當時就已爲人提及。袁氏的精力與智能得到周圍的人之尊敬，但是他對他的同僚却非常輕蔑，梁啓超曾說：在袁氏的眼中，人和動物沒有什麼區別，他認爲每個人都是怕死貪財的小人。由於他政治上玩弄權術的成功，使他更爲輕蔑他人，這種評價，也促使他更進一步想作做皇帝，建立一個新的朝代。

恢復帝制的企圖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袁世凱以擁護孔教信仰，揭開企圖恢復帝制的序幕。袁氏

僭稱自己是信仰的保護者，於同年冬天，至前淸帝國舉行盛典的天壇，舉行傳統的典禮儀式。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十月袁氏的美籍顧問古德諾的備忘錄公開，袁氏做皇帝的野心就更明顯。古德諾是位憲法專家，在此以前放棄哥倫比亞大學的職位，而爲中華民國政府的顧問。這位共和國的知識份子，極力主張中國恢復以往的君主政體。他的看法後來由楊度、嚴復、胡瑛等人所領導的籌安會引用。籌安會是袁氏花了二百多萬元所建立的組織。之後，梁士詒又組織一個請願聯合會，收買無賴，紛紛電請袁氏變更國體，由於輿論的請求，袁氏經參議院決議，召集國民大會決定。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國民大會投票，全體通過恢復君主政體。國體一經決議，便積極準備登極典禮。這次的籌備工作做得相當謹愼小心，各各細節都沒有忽視，甚至連傳統改朝換代時，伴隨新朝代出現的預兆，也適時出現，一幅龍骨在宜昌出現。

袁氏企圖恢復帝制所做的各種安排，引起反對勢力的興起。反抗的勢力首先從穩健派和進步黨的批評活動開始，其中有許多都是以前的國民黨黨員，後來加入進步黨者。梁啓超也放棄官職，掀起一陣激烈的筆戰。在一連串反袁活動中，以西南幾位將領爲中心，其中以蔡鍔的態度最爲激烈，這位前雲南都督，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後，被袁氏調至北京，後來潛回雲南，並（與唐繼堯聯合）通電袁氏，要求其立刻停止帝制。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佈雲南獨立。這次西南會議發起的反帝制運動，主要的目的卽是要保護立憲政體，迫使袁氏去職，重組中央政府，恢復地方的自由，這個保護國體的口號得到雲南軍界—護國軍—的支持。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一月開始進攻四川。此時孫中山先生

雖已回到上海，但是中華革命黨在這次反袁運動中所扮演的地位却顯得微弱。反袁運動很快地展開，貴州、廣西、廣東（一九一六年三月宣佈獨立）等支持，加入了反袁運動之行列。於是中國的統一又一次面臨分裂的威脅。正如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政治危機引起中國分裂一樣，只是這時袁世凱無法平息這次危機了。

至於北洋軍袁氏的控制力也愈來愈小，由於他全力於政治權力爭奪，而把北洋軍完全交給他的將校分別管理訓練—如馮國璋、段祺瑞。因此軍隊中又形成新的集團與新的效忠對象，而且這些新興的領導者亦形成新的野心，企圖發展其權力。因此北洋軍不再是袁氏私人可運用的工具，成爲袁氏手下將校的私人軍隊。至於在外交上，列強受日本政策刺激，對袁氏帝制產生敵意，斷絕財政上及外交上之援助，這些都是一九一三年促使袁氏成功的利器。由於缺乏這份支援，袁氏的帝制運動及抵制西南反袁運動，最後只有靠發行通貨暫時資助財政上的短缺。梁士詒主持的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宣佈已經沒有任何金銀維持二銀行。至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四月停止銀之支付。

袁氏在外交上及政治上已成爲孤勢，沒有任何經濟來源，也失去從前忠心耿耿的黨羽支持，在這種情勢下，袁氏勢必做相當的退讓，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氏宣佈撤消帝制，且任共和主義者爲內閣部長職位。雖然如此，梁啓超對袁氏絲毫不肯放棄，繼續與袁氏對立，要求袁氏辭職。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羞憤成疾而死。爲了解決當時的危勢，依據反抗份子的意願及憲法規定，副總統黎元洪繼爲總統。黎元洪個人勢力非常薄弱，這也是馮國璋、段祺瑞兩位掌有

實權的北洋將領願意承認他的主因。因爲在當時他們的時機尚未成熟。黎元洪統轄的政府，在軍閥相爭的普遍混亂之前，中國得到暫時之平靜，回復共和法治和國家的統一。

第三章　軍閥時代

第一節　中央政權與外國勢力

除了共和的名字外，民初所建立的共和國僅殘存袁世凱的總統一職。不過至少在力圖恢復帝制與西南各省獨立的事件爆發前，整個中國的行政組織仍然保持着共和的形式。在袁世凱繼任者的統治下，中央的政權即陷入長期紛亂不安的狀況；隱藏在此脆弱無比、從未受到眞正重視的共和制度背後，敵對的軍系始爲國家實權的握有者。各省均打算各行其道，南方各省再次脫離中央而獨立，此一危急存亡的關頭，給予知識份子極爲強烈的刺激，爲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鋪路。

袁氏的繼承人　當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袁氏病逝，西南各省即宣告取消獨立。北洋軍系的領袖們，遂依照約法，同意由黎元洪繼任總統。黎氏曾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被選爲副總統，但是在袁氏當政期間，沒有任何表現機會。得到南方各省與自由派人士的支持，黎即於北京重新召集在一九一三年選出、後遭袁世凱解散的舊國會。但爲顧及北洋派領袖對袁氏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所強制極具獨裁意味的新約法的偏好，遂將政府中兩個重要職位：國務總理給段祺瑞、副總統給馮國璋，以安撫之。段氏組成一混合內閣。閣員包括了軍閥的支持者，以梁啓超爲首的溫和派，以及國民黨中的右翼份

子。

憲法之外貌　國會恢復，重新締造共和法統，中國政體顯然地建立在與西方民主政治完全同樣的規則與組織之上（包括議會、內閣以及共和國總統的職稱）。但是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依據臨時約法選出的國會，却陷入四分五裂、聲名狼藉的窘境。由於各個黨派、俱樂部間相互牽制、抵消力量，使得國會在當時根本無法與袁世凱對抗。現在，許多的議員更是隨時準備靠攏任一對之使用銀彈攻勢的文武官員。無怪乎當時的諷刺漫畫家將這些國會議員比喻爲一羣游蕩在全國各地、旣貪又癟的豬仔。

內閣本身亦爲各派系間脆弱而短暫的結合，故常發生改組的危機。內閣總理一職極爲重要，成爲軍閥領袖角逐的對象。而總統的位置更是常常易手，極不穩定，變成各軍系間所力爭的第一特獎。自袁氏死後至五四時期（一九一六——一九一九），三、四年間，即有三人出任總統之職。

軍閥的勢力　國家的實權全被各省的督軍（西人均稱之爲軍閥）所支配。他們是袁世凱的眞正接班人，從袁氏那兒獲得不小的權力（他們泰半出身微賤），同時在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間的危機中，給予袁氏無條件的支持。這批軍人通稱爲「北洋派」（得名於淸季所辦的一所現代化的軍事學堂，因他們多半都曾在此接受過訓練）。他們在各省均據有極穩固的地盤，組成一支殘酷、貪婪的新的封建式武力，同時並努力加強對中央幾形虛設的政權的控制力。

下面所述乃督軍中最具影響力的幾個人物：張勳（一八五四——一九二三），一個富有的軍人，曾於一九〇〇年伴隨慈禧太后避難西安，爲袁氏早期的黨羽。生性極端保守，強迫其軍隊均須蓄髮辮。馮

國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一個貧農之子及鴉片煙癮者，被袁氏任命爲江蘇都督，後即在此建立其極具高度自治的勢力範圍。倪嗣沖（一八七一—一九一九），一九一三年被派任安徽都督。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在軍事上一直爲袁氏不可缺的左右手，袁死後即代之成爲北洋軍系的領袖，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九年間，曾三次出任國務總理一職。徐樹錚（一八八〇—一九二五），一個鄉村私塾教師的兒子，與段氏關係密切，乃北洋派政治的實際策劃者。由於位居內閣總理的秘書長的職務，不但使他在原已具有的民政力量之上，更獲得了對軍事力量的控制，並且得便參與所有的內閣會議。

然而此一集團消逝得極爲迅速，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以後，幾乎所有的領袖均相繼由政治的舞台上消失。不過其所爲已爲後來繼起的軍閥打開了一條通道。

最初，督軍們尚嘗試維持彼此間一種合作的精神，遂有「各省督軍聯席會議」的召開。北京與長江下游各省的督軍曾聚集在當時被視爲中立城鎮的徐州，舉行過三次此種會議。當歐戰發生時，北京當局尚無任何明顯的決策，而於是乎（一九一七）召開的督軍會議，卻已宣告中國參戰的決議。軍閥們始終是反對國會的存在，故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一月間召開的第三次徐州會議中，督軍團一致決議要求取消國會。對軍閥們言，保守的儒家思想能暫時維持以前存在的一種帝國所帶來的秩序與效忠朝廷的情勢於不墜，故多次施壓力，欲恢復孔教爲國教。

儘管督軍們確實努力取得協議，然而彼此間敵對的趨勢卻日益強烈。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由馮國璋所領導的集團起而反對段祺瑞與倪嗣沖，開啓了以後直、皖二軍系間無窮的爭端。

文人的政治派系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重新召開的國會仍然受到自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間即形對抗之勢的兩股主要政治勢力的支配。一爲以梁啓超爲首的溫和的立憲派份子所組成的進步黨，一爲集結在孫中山之下，國民黨中激進的共和份子。兩種政治力量各自又發生過數次的分合現象，結果進步黨分組成數個以研究憲法爲主的小團體，其中最重要的「研究系」，乃梁氏的忠實擁護者所組成，梁氏本人活躍異常，於一九一八年出任段祺瑞內閣的財政部長。國民黨員則分爲四大部分，一九一六年組成的政餘俱樂部與政學會爲其中之二，分別由張繼、王正廷與林森領導。此前他們均爲孫中山的支持者，分裂發生後，仍然效忠孫先生者於一九一四年合組「中華革命黨」，形同祕密社團。不過孫中山本人一直遠在甚囂塵上的黨爭之外。

當時其他的文人政治團體則多以行政組織的型態出現在國會之外。交通系，由一羣銀行家與資深的鐵路局官員所組成，視鐵路爲其專有的地盤。安福俱樂部，由北洋派的頭子像段、倪、徐（世昌）等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創立，同時亦包括了政客或資深的公務員一批文人。

派系間的鬥爭，只攪動了社會中極小的部份，大部份的民衆完全置身於這些無意義的競賽之外。而且政客們亦常利用在政治結構最高層次中所具的影響力與極有利的地位，從事這些競爭。這些新興的政治階層包括了前清的一些學者、官員（像一九一八年出任大總統的徐世昌，以及清季任外交官、民初轉投效民國的唐紹儀與伍廷芳），半新的知識份子（像一八九八年戊戌時期的改革者—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銀行界人物（像交通系的領袖梁士詒，一八六九—一九三三），美國大學的畢業生（

像均以其西文名字著稱於當時的兩個青年外交家，顧維鈞 Wellington Koo 與施肇基 Alfred Sze），以及一些新教徒（例如一度爲國民黨中溫和派領袖的王正廷）。

中國參戰所引發的危機　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列強均希望中國參戰抗德。英國欲翦除德國在華的勢力，日本希望趁此獲得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於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向德宣戰的美國，則盼望藉此擴大其在華的影響力。中國的政界對參戰與否的問題，亦引起極大的爭議。北洋軍閥們希望藉參戰，更加強其在國內軍事上的優越地位，得到他們在政治上的聯盟—梁啟超的研究系，全力的支持。但是總統黎元洪與大部的國會議員却持反對態度，商會與一些民間團體亦倡行「中立運動」，並得到孫中山的支持。孫在一封致當時英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的著名書信中表示，白種人間的爭鬥，實在不關中國的事。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三月國務總理段祺瑞在督軍團催促下，強迫國會宣佈與德絕交。五月間黎總統卽施以反擊，下令解除段氏職務，段則得到九省督軍的支持，另組分裂勢力，迫使黎只有向極端頑固保守的張勳一派求援。結果張勳率軍佔領北京，反迫黎元洪解散國會，終遂北洋派自一九一六年卽不斷施壓力欲完成的心願。

復辟的失利　張勳乃一君主專制的信服者，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七月一日，他使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退位的孩兒皇帝重新回到寶座上，並由一八九八年的老改革家，同爲君主制度擁護者的康有爲，代擬了許多篇古文詔旨，但是張勳約兩萬人的辮子軍，終於還是無法對抗段祺瑞與北方督軍所組

成的聯軍。幾天之後只有通電下野，黎氏亦宣告辭去大總統職，結果導致段氏再回任國務總理的職位，大總統的席位則歸於長江下游一帶的軍事首腦馮國璋。

安福系的得勢（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八月，中國向德、奧宣戰，並沒有實際的軍事行動參與，德國在華的所有財產及船隻均遭扣押，由德奧所控制的租借地（包括青島、天津及漢口）全被佔領，中國輸送了二十萬的華工到西方，但非為打仗之用。列強以免除中國五年的庚子賠款為其參戰的回報。中國方面，據說當時北京的新強人，段祺瑞非常滿意此種「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的政策。在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夏天段氏尚須與南方的分裂勢力奮戰，但至一九一七年底，段氏一派力量即已逐漸控制了中國的中央政權，這一派勢力即為衆所周知的安福俱樂部或皖系（安福系得到梁啓超的大力支持，梁氏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出任政職）但在一段時期間，他們深以由大總統馮國璋所領導的另一派軍系為慮，馮的勢力植基於長江下游一帶地區，非常反對與南方進行戰爭，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他曾一度解除段的國務總理之職，但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三月段氏不但復任，並且迫使馮氏退休，安福系的爪牙亦控制了一九一八年八月間成立的新國會。一九一八年九月徐世昌被選為新的大總統，徐氏原為前清的官員以及袁世凱的祕書，隸屬安福系，故督軍團提名他出任總統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

周旋於列強勢力間的北京政府　由興起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外人特權與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複雜情勢，完全削減了中國政府獨立自主的可能性。領土的特權表現在各大通商口岸的外人租界以及

各租借地，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爲完全合法的特權。軍事上的特權，外人可派軍進入內河水域、以及駐軍於租界、北京與北京到山海關間的鐵路沿線。尤其主要的是經濟上的特權，關稅、鹽稅收入均由列強直收征收，扣除了中國每期需付的債務及賠款後的盈餘，始撥給北京政府。當一九一七年德、奧喪失其在華的領土，一度使不平等條約產生罅裂現象，不過中國當時只是暫時的代管這些土地。列強有鑑於此，後來即迫使中國同意這些土地轉變爲國際的公共租界，不再交還中國，雖然中國已向德宣戰。

當北京政府的局面愈加紊亂時，列強更加強對於中國的間接控制。由外人控制的大型公家機關（如海關、鹽務局及郵局），已成爲極具權威的高度自治個體，外人在其中多據要津，而在其上的領導人物，像領導海關的英人Aglen，出掌鹽務局的Dane與Gamble，以及控制郵局的法人Piry與Picard-Destelan，均極具權威。此外被分派至政府各部門的外籍顧問影響力亦甚大，像總統的顧問，有奧人莫里遜（M-orrison）與美人溫路白（Willoughby）。軍事顧問有法人布里山德（Brissaud-Desmaillets）與日人青木宣純、財政顧問有日人阪谷，政治顧問有日人有賀長雄，均被視爲來自民間的力量，故較易得到官方信任。在這段中央權力極衰弱期間，北京的公使團（外交使節團）扮演了甚重要的角色，它對於任何分裂或武裝政變所建立的政權，可給予或拒絕外交上的承認，實際言，即爲一種對中國內政干預的表現。當時一得到外交的承認即可取得關、鹽稅的盈餘，對任何政權的財政的維持均極重要，通常南方的獨立政府是無法取得這筆經費的。

中國對列強所負的各種債務是形成上述間接控制體制的關鍵，提供了公使團干預中國內政以及列強

直接徵收鹽稅與關稅強有力的口實。據一九一九年「中國年鑑」（一部由英國在華商業團體所出版的非官方性的期刊）所載，中國一年所需支付的外債高達一千零八十萬鎊，包括了庚子賠款，三十一項的鐵路大借款（一八九七—一九一八年間）、政府各部門短期性的貸款以及一般性的貸款（共有十四項，一九一三年的善後大借款即其中之一）。這些債務交織成一張大網，使得外國的經濟力量牢牢控制住中國的財政及經濟市場。

日本的特殊地位　截至一九一四年止，盡管發生各種的危機，有些情形甚至相當嚴重（像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但是在華的各國仍然盡量維持一種協同合作的精神，以使各國在華利益均等，但是隨著一次大戰的爆發，情勢有所改觀，英法注意力完全爲歐戰所吸引，德國勢力消滅，沙皇又被推翻，只剩下美、日兩國仍保持對外行動的自由。

美國經濟政治勢力的深入中國開始於一九一五——一九二〇年間，發展至二次大戰已匯成極強烈的冲擊力。美國的大銀行家像Pierpoint Morgan財團的Lamont，已開始積極地在華爭取利益。一九一七年美國人的「遠東密勒氏評論報」（Milli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China Weekly Review的前身）在上海發刊，它不但與美國企業界有極密切之聯繫，對中國的中產階級影響更大。留美的中國留學生愈來愈多，中國知識份子態度亦轉向美國，伍廷芳（曾出任段內閣的部長，後轉任南方政府的部長）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公開表示：「我期待有一天美國的星條旗與中國的五色旗能在永遠的友誼中一齊飄颺於世。」

然而當時美國却無法抗拒日本的優勢，在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十一月的「藍辛石井協議」（Lansing-Ishii Agreements）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權。

在一九一七與一九一八兩年中，日本對中國的財政、外交與軍事的控制，愈加增強，中國政府藉口參戰，與日本達成好幾項貸款協議。依據中國年鑑所載，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間，中日雙方的十三項貸款已告結束，仍在進行中的乃爲一九一七年的八項及一九一八年的十一項借款，其中以「參戰借款」爲最巨額，資助了段氏軍隊武備的擴充，其他的借款更保證直接提供各項武器與軍備，日本銀行團（朝鮮銀行、台灣銀行與日本商業銀行共組而成）由此取得了東北地區的路、礦、森林及大運河、郵政與電報之控制權，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初開始的西原借款（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間，中國所借的日款總稱）使日本政府取得共管中國陸、海軍的合法權利。

中國淪爲日本的半保護國的結果之一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間中國軍隊被派往西伯利亞協助日軍以干預蘇俄的新政權，安福系的徐樹錚則希冀藉此實現其對蒙古的大計畫夢想，一種視日本爲遠東地區的治安維持者的觀念，使得西方國家允許其在中國自由行動，却因而引進共產主義，西方各國簽訂密約，承認日本在遠東的特權而犧牲其中國盟友的過火舉動，產生極大的危機，成爲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催生劑。

與法統對立的中國實情　儘管安福政權殘酷無比，段氏與其軍民二界的聯盟均發現其所具的權力只剩下一個空殼子，政府各部門仍然繼續在運作之中，但在此運作過程中却與當時中國實際的情形脫節。

中央政府在平時，幾乎不再收到任何財源，或這方面的資料，一般民衆對於北京派系的鬥爭已極端厭惡，這種情形使得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間所建立的共和政權的繼承者，名譽掃地。

軍事領袖們對於國家其他大事之認知通常是模糊不清，為了避免與輿論的脫節，他們發明一種怪異的方式，即：在危急關頭通電全國，表達其意見及計劃，此舉無異對官方與民衆隔絕的事實不打自招。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二月十四日，一個尙鮮爲人知駐紮於河南的旅長馮玉祥，曾通電全國，陳述其對南北議和的計劃，這件事成爲後十年間馮氏在政府圈中陡然崛起的起點。

由於缺乏其他有力的政治機構，報界遂有絕大影響力。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五月十八日，極具影響力的北京日報的主編陳友仁（Eugene Chen）發表一篇名爲「出賣中國」(Selling Out China）的文章，引起極大的騷動，結果陳氏被捕。根據郵局所編不完整的資料顯示，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中文報紙的發行，北京有四十九家，天津有三十五家，漢口十六家，上海七十三家，廣州三十九家，其他十五個小市鎭共有一百一十八家。

全國性運動的敏感性 民衆並非永遠處於被動的形勢，也曾多次主動表達意見，最有名的一次乃爲抗議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的簽訂所爆發的偉大運動，成爲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先驅。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十月所發生的「老西開事件」，即造成一場極大的地方性運動。天津的法租界當局，決定以武力霸佔老西開這地區，結果激起鎭民高昂的反抗情緒，主動進行各種活動。街坊會

議中通過了許多動議，決定由商會發起抵制法貨行動，召開羣衆大會，各級學校進行罷課，並向北京政府請願，凡任職於法租界者皆進行罷工。反抗的行動展開得如此迅速，終於迫使法國不得不撤軍，放棄對其地的佔領。

上述事件，說明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所潛藏的力量，任一事件均足以喚起這份潛力，而且一旦覺醒，極自然地，就藉著團體直接表現出來，也不會有任何官方機構或有組織的團體出面調停。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的西原借款，亦曾引起類似的反應，而且播散到全國各地。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八月，約二千名北京學生集體示威於當時大總統的邸宅之外，留日學生亦紛紛罷課回國，表示抗議，且組成「學生救國會」，北京的報界亦口誅筆伐加入抗議行列，例如被捕的北京報人陳友仁，另外在上海、天津及福州均有示威遊行，中國商會全國聯合會的成立，代表了一向溫和的中產階級亦起而抗議此項中日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

當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中國政府被邀組團參加巴黎和會時，全國性的運動，再次運用其影響力。代表團中包括許多非政界的人物，且聲望遠在那些職業政客之上，除此以外，此一運動所欲達成的方案是相當大胆而驚人的，包括廢除列強勢力範圍，外國軍隊及警察由中國撤出，取消治外法權以及海關的控制，租界及租借地歸還中國諸要求。報界、商會、大學生聯合會與各學生組織，全部支持這些要求，故當結果傳出造成全國普遍的失望，而引起五四的爆發。

第二節　地方政治與南北對立

地域主義　走向地域的特殊性在中國並非新趨勢，早在太平天國被平定時，各省卽已表現出所具備的政治、軍事上之實力，此種趨勢演至洋務運動時代（一八六〇—一八八〇），更爲強烈，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的辛亥革命，採取由各省分別宣告獨立的方式，表示與君主專制政體的決裂，卽充份表現了地域的色彩，同樣的情形再次發生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的反帝制運動中。

中國的省實際爲一羣極具靈活個性、彼此聯成一體的個體，旅行各地經商的商人、留學生以及移居新工業中心的苦力，在所處的充滿敵意的陌生環境中，當成立同鄉會，以抗拒孤立感。省的區劃情勢通常是這樣的：中央農業區，多由當地士紳控制，四周則爲待開發、尚未設治的山區，常成爲叛亂的淵藪，如此對於省特殊性之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地理環境與政治基礎。

兼具讀書人與地主身份的傳統士紳，通常以省爲其活動範圍，他們中僅有極少數位居較高階層，而能出任肩負重任的高官，因此懷抱有「泛中國」的想法。淸季所成立的各省議會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遭袁世凱解散，於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重組，爲士紳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活動場所及範圍。

各省的軍事力量　在淸帝國統治下，各省的文武官統由一人兼領，至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臨時約法將其職權劃分爲二，但因袁世凱依賴軍隊爲其靠山，故時日一久，軍隊的統領（一九一六年起被稱爲督軍，意卽軍隊的監督者），在各省卽掌握了所有的實權，民政長官的任命亦需經過他的同意。

一些督軍視其省的基地爲出長中原（卽北京政權）的進身階，長江下游的各省在馮國璋的計劃下，力圖達成此一目標，爲皖系領袖之一的安徽督軍倪嗣冲，亦期望藉著皖省走向北京。對其他督軍言，省成爲其統治的極點，僅被用做攫取財富與勢力的工具，閻錫山爲其最極端的例子，由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直至一九四九年止，山西省一直由其統轄。

督軍們對一省的統轄力大小，得視其控制地之軍隊與財政的情形而定，而地方的財政主要依靠鴉片與武器的走私及繁複的苛捐雜稅，通常與督軍的私產混淆不清。督軍們至少有一度可信賴其部屬對其所表示的效忠，他們彼此間不是互耍陰謀，尋求協議，就是訴諸武力，致使當時的中國再次經歷如三國時代一樣紛亂與充滿詭詐的一段時期。

雖然如此，這些各省的統治者仍可以一條精細敏銳的政治線加以區分，一些人是極端的保守者，另外一些則具有進步的傾向，像在河南的馮玉祥，稱他的軍隊爲一支模範軍，或是在西南的陳炯明，他起用一些無政府主義的知識份子爲其顧問，據朱德在其自傳中所描寫：當時中部地區的一些督軍，仍以爲他們在維護共和而戰。雖然他們只不過是一羣毫無操守的傭兵隊長而已。

省不但是政治與經濟掙扎發生的舞台，也是進行與其他各省毫無關係之政治決策的場所。在每一省中，不同的團體與不同的私人利益彼此間常發生衝突。中國的政治史自袁世凱死至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止，卽被割裂成片片段段微不足道模糊不清的地方性衝突之記載。

四川 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十月轉投入共和國，並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積極支持反帝制運動，地域性的感情特別強烈，由於四川地理位置乃西部各省的門戶，故一九一六年皖系領袖費盡心力想重新掌握四川，但其所派往的督軍，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被一名前為共和國官員，後轉為軍閥的熊克武，在川省士紳的支持下，所趕跑了。

雲南 控制雲南的強人是唐繼堯(一八八一—一九二七)，他曾參與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在西南地區所進行的革命活動，由於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反帝制運動中所担任的積極角色，使他懷抱涵蓋貴州與四川「大雲南」的野心計劃。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他侵入四川，遠及成都，同時又轉投入廣東的獨立政府。他似乎亦曾與海南島有所接觸，他們自然樂意在法屬中南半島邊界上出現一個大致獨立的緩衝國。

奉天 其形勢大致與雲南相同，為一個處於邊疆有外國勢力(如日本)介於其中的省份，張作霖(一八七三—一九二八)，鬍匪頭子出身，後加入軍隊，曾經在一項交換條件下被袁世凱派為奉天都督。他利用政治陰謀與軍事壓力，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取得黑龍江，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再得吉林。在一一控制東北的情況下，搖身一變而為東三省的主人。他結交皖系並與日本保持直接的接觸，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兩年間，與朝鮮銀行簽訂兩項財政協議，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七月，以資源豐富的吉林森林作抵押，獲得一筆三千萬元的借款。

湖南 由於成為南北勢力的會合地點，湖南的政治情況乃變得異常複雜。譚延闓，一個湖南極具名

望的世家子弟，曾因趕時髦，參加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的革命，而被任命爲湖南都督，自然得到當地士紳的支持。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間，湖南的政治、軍事情勢極不穩定，譚氏於袁世凱死後，重新出任湘督。皖系於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間三番兩次想奪取湘省爲其地盤，因而與譚氏發生衝突，而接鄰的廣西軍系亦對之虎視眈眈。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湖南成爲北京與廣東獨立政府的戰場，該省的省會—長沙市，幾度淪陷，幸賴南方的支持，譚氏才得復位，但湖南終爲皖系軍閥張敬堯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奪下。

廣州的獨立政府（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當段祺瑞在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解散舊國會時，孫中山卽欲趁此機會捲土重來，以他一手創造的中華革命黨爲後盾，與以雲南的唐繼堯及廣西的陸榮廷等爲主的南方反皖系軍事領袖們達成協議，合組了一個包括數個政治團體的聯盟，海軍亦在其中，當時中國的海軍乃保持一種獨立的狀態，早與孫中山保持來往。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七月，在海軍的促成下，孫中山回到廣州，二五〇位國會議員隨之南下，他們建立了一個由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孫被任命爲大元帥，唐與陸則分任元帥，此一政府所揭示的目標乃依據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的約法，恢復共和政體。然而，廣州的國會中，不同的派系間時起衝突，就像當初在北京的情形一樣。此外，孫中山不久卽發現：他不過是軍閥利用的工具，護法的口號變得毫無意義，於是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五月自動辭職，轉回上海，軍政府因而改組，由陸榮廷所領導的桂系接掌，得到一些溫和政客的合作（

南北雙方的關係　北京與皖系從未接納南方的獨立，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間，幾次嘗試以武力去撲滅此一分裂運動，結果無效。不過其中亦有贊成採妥協方式者，像馮玉祥、各省議會的代表、（他們曾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六月在北京舉行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以及商會，一些北方的軍閥也贊成此種方式，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以當時總統馮國璋爲首的力量，即因此被皖系驅逐。南北和會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二月在上海召開，由於北京拒絕同意南方的要求，取消其與日本間的軍事協定，致使會議很快地暫時中止。

列強均拒絕承認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成立的廣州獨立政府，實際說來，此即意味到列強拒絕將關稅盈餘交付予南方，直到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一月，公使團始決定將關稅盈餘的百分之十三分給廣州政府（此一數目與列強在南方控制下的港口的貿易額相稱），但是此種舉動仍未改變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間，外人反對孫中山的一貫基本政策，切斷對孫及其支持者的一切供應，就像一九一二年孫初當選大總統時的情形一樣。

存在於民衆生活中的危機　來自省及地區日益離心的壓力，幾乎奪取了政府機構的所有力量及效能，各省均退而自保，各行其是，甚至與外國直接商訂經濟協定。此種行政上分崩離析的情形，由各省每年郵政機構的報導中清晰可見，軍隊的叛亂、土匪打刼、內戰、督軍強取基金、道路及鐵路交通的中斷、軍隊的拉伕、以及各種破壞之情事，滿篇盈紙，不可勝收，盜賊之猖獗表示軍事、政治雙重的危機，由此又導致國家解體與農業危機，迫使貧農紛紛逃離鄉村。

這段時期農人的情況日益惡化，土地集中到極少數的大地主手中，使自耕農多貶至佃農的地位，佃租高漲，且多需付以金錢而非實物，使借貸之風盛行，在傳統半封建式的地主制度影響下，督軍們更對農民採行一種奴隸式的統治，徵收重稅與各式的附加稅，不是預先徵收，就是一年收好幾次，並且放任手下兵勇殺傷掠奪，不經過任何手段隨意徵調農民或其牲口、交通工具等，而不予任何賠償。中國因此陷入紊亂與貧窮的深淵之中。

第三節　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從表面看，中國鄉村悲慘的情況與城市資本主義發達的情勢之間，形成強烈的對比。事實上，仍然擁有極強的土地利益之中產階級，從對農村開發所獲得的利益，主要用作擴展現代經濟。

工業的成長　一次大戰期間——主要從一九二〇年延伸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是中國企業界所著稱的「中國中產階級的黃金時代」。當時的經濟情勢，是極適合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戰爭方酣，減少了外人在中國經濟市場的壓力。中國工業之成長，主要得利於銀價之上漲（中國通貨是時實施銀本位制度），以及新市場的開拓，例如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中國麵粉的外銷要高出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四十倍之多。在同時期，中國工廠數目由七十五家激增至一百一十七家。由於戰爭封鎖了中東市場，煙草業，自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上海的兩家工廠，到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增到九家，且中國的地氈業亦在北京、天津興起，絲業也有極大的進展，棉業更甚，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間，

上海棉紡織廠的數目，由七家增至十一家，紗錠由一六〇、九〇〇錠增至二一六、二三六錠。就全國而言，中國資本家所擁有的棉紡錠從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的四八四、一九二錠，到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增至六五八、七四八錠，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高達一、二一八、二八二錠。

不過應特別注意的是，黃金年代的工業只是就中國已經在發展的工業，至於重工業，不是完全依靠外人，就是根本不存在。

資本主義經濟的進展　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均得利於此良好的時機，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中國資本集中在銀行投資上，估計約有二〇、四〇〇萬元，在工業的投資達一〇、八〇〇萬元，從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一項包括九五六種工商企業的調查中顯示，擁有巨額資本的企業數目相當可觀：

資本（元）	企業數目
100,000－500,000	157
500,000－1,000,000	27
超過1,000,000	33

紅利亦相當豐厚，例如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當時全國最大的出版公司上海商務印書館，即付出高達百分之三十四的紅利。對外貿易亦有改進：

年代	1914年數額（兩）	1919年數額（兩）
出口	356,000,000	630,000,000
進口	569,000,000	646,000,000

在戰爭期間及戰後二年中，物價上漲幅度極大，結果更加使低下階層者生活更加貧困，但卻加強了經濟擴展之趨勢，如上海，一九一五年物價指數爲一〇〇，至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物價指數高達二三〇・七。

經濟擴張的情形，有時甚至及於農村，特別是位於大都市附近的鄉村，如廣州、杭州、寧波與上海附近的鄉村，一些承包商在農村家庭中裝設織布機，或分派其他型式的工作（如草帽、火柴製造等）不過此種現代企業滲入鄉間的情形，只發生於經濟及地理發展受限制的地區。

中產階級的組織　自一九〇二年起，商會即已在中國開始發展，至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前商會總數已高至七九四個，其中包含各種傳統企業（二〇八）與現代企業（四三六），他們除了担任經濟與技術上的功能外，更常扮演政治與社會的角色。當中國的國家機構愈衰時，他們的道德權威性則愈加增長。

其他的商業組織亦甚爲活躍，如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於上海、北京與以後其他各大城市先後成立中國銀行界聯合會，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他們又合組一全國性的商業聯盟。華商紗廠聯合會

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這是由一個基督徒的企業家聶其杰所領導。大部分的回國留學生，均就業於這些現代企業；難怪在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訪華的美國哲學家杜威曾說：「中國到處都有哥倫比亞大學的人。」當然這句話只適用於他所踏入的每一現代商業中心，而非指整個中國。

理想的資本主義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孫中山滿懷失望的回到上海，將廣東留給西南的軍閥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遠景作了一番沉思，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孫先生發表了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計劃書，他的規模宏大的實業計劃，反映出當時中國中產階級希望之混亂，他提議：(1)建築二十萬公里的鐵路；(2)修建西江與長江的大運河，並濬通運河；(3)治河計劃；(4)在中國中部、北部與南部各建仿如紐約的大洋港口；(5)於所有鐵路中心及終點，建設新式市街；(6)發展蒙古、新疆之灌溉，以及移民蒙古與東三省。

他希望利用一次大戰結束前，從西方取得的外資發展這些計劃。然而並非所有的中產階級都能夠了解、同意他這種對西方的幻想，當一次大戰結束時，中國經濟發展又再次要面臨西方的競爭，走上反對不平等條約之途。一九一八年年底，一次要求收回海關控制權的運動，即意味著他們希望掌握提高進口稅率的權利，在上海一個專爲爭取建立海關事務平等互惠條約的團體成立，一九一九年四十六個商會亦就此問題聯合致電巴黎和會，後來的五四運動中，亦表現了商人階級對經濟發展的熱望，就如同當時急進的知識份子對政治與思想上新生的渴望一樣。

工業上的無產階級　隨著工業的成長，工人數目愈來愈多，此種趨勢就中國本身資本發展的工商企

業而言，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在一些外資控制的工業—如紡織、礦業與重工業—中，這種趨勢也是非常明顯。

不過在當時，統計資料相當不够精確，而且沒有區分出在現代化之工廠及老式廠坊中的工人。基於這種限制下，連同運輸工人之工人數目約達一百五十萬左右，當時主要的工人類別約略估計如下：

1919 年左右工人數	總數	中國企業	外資企業
棉業	100,000	62,000	38,000
絲業	200,000	180,000	20,000
煙草	50,000	20,000	30,070
冶金	45,000	40,000	5,000
造船廠與兵工廠	45,000	20,000	25,000
煤礦	180,000	60,000	120,000
鐵路工人	120,000	74,000	46,000
水手	115,000	30,000	85,000
勞工及苦力	200,000	50,000	150,000

在大規模的企業裏，尤其是礦業及運輸方面，通常外國工廠工人數目要超過中國自營的工廠的工人數目。就全國言，工人分佈的情形極不平均，上海的工人佔全部約20%，且多集中在上海近郊的幾個市

鎮，如虹口、楊樹浦及浦東。而中國其他的大城市，如武漢、青島、廣州、工人亦佔極重的比例，不過就廣大的內地鄉村言，工人的數目還是微不足道。

生活與工作的狀況 大部份的工人，多來自城市中一般家庭或農家子弟，第二代的工人通常很少見。農人多經中間人徵募，簽訂一種工作契約，透過所謂的「包工制度」，進入工廠工作。在契約規定的年限中，包工的工資全由此中間人收集，僅提供他們少得可憐的食物與極差的經濟環境，完全實施一種類似奴隸制度的管理方式。這種包工制度尤其通行於上海紗廠的年輕女工中。一般而言，中國的工人中，婦孺佔有極高的比例，對於僱工資格之要求極低，工資也少得可憐，僅能維持一種最起碼的生活。甚至童工的工作時間高達12—13個小時，且尚需做夜工，如遇到殘暴的領班（特別是英日的工廠中），以及完全沒有衛生及安全設備，原已惡劣的工作環境更加惡化，意外事件層出不窮。工人階級既很貧窮又無經驗，但仍然親身體驗了在整個社會、政治生命中為一孤立的個體。他們正尋求一種新的結合。舊式的行會組織，就像苦力的「幫」一樣，再也不能涵蓋現代工人的角色。

罷工行動（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 歐戰期間，物價急速的上漲，對工人生活打擊甚大，由於銀價上漲，銅錢相對貶值（當時發工資都用銅錢），使物價上漲的情況更為惡化。只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一年內，即發生了二十五次大罷工，上海外人所辦的益華紡織廠被迫停工四次，這些罷工純出於最基本的經濟要求，終於奮鬥成功。例如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初，上海外人所辦的棉紡織廠均被迫提高12%到15%的工資，而且這些出於經濟要求的抗議，替五四運動中基於政治因素的罷工運動奠下了極深厚

之基礎。

第四節　知識份子激烈主義的興起

新知識份子　新知識份子之崛起與近代新式教育之建立有極密切之關係；一九〇五年科舉考試廢止後，許多使用現代課程的新式學校紛紛成立，根據官方的統計，可以看出當時一般的趨勢。下面的數字是用來表示當時從小學到大學全體教育的情形：

年代	1905年	1916—1917年
學校數目	4,222	121,119
學生數目	102,767	3,974,454

北京大學在一九一二年有二一八名學生，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增至一、三三三名，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高達二、二二八名。蔡元培，一個著名的改革家與無政府主義者，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間出任北大校長後，即宣佈一套改革計劃，強調學術研究的自由，糾正過去視大學爲官吏養成所的錯誤觀念。

新知識份子中尚包括了許多由英美教會醫院所訓練出來的醫生、律師（於一九一二年組成中國律師公會）、新聞記者（在任何一政治停滯的時代中，報界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故新聞記者的態度是極

端地積極）以及工程師與科技專家，如在愛丁堡受教育於一九一四年建立「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中國的中產階級均期望丁氏對礦藏的探勘，能爲其提供另一新的活動範圍）。上述這些自由業者，見解與文章多發表於本世紀初在上海創刊，專重對現代科技文化引介的「東方雜誌」上。此一雜誌的政治觀點雖趨於溫和保守，但是對於近代教育、純科學與應用科學，卻有極力提倡之功。大部份的知識份子與學生，均來自於書香世家或鄉紳之中，只有少數是來自於新興的中產階級。然而他們均漸走向斷絕其出身背景之途。雖然他們的觀點仍不够清晰有力；不過都已體認到中國內部實施現代化，及對外關係改善的急切需要。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帶來的失望　對於各代的知識份子而言，一九一一年確實爲一值得紀念之新的里程碑，因爲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朝代滅亡後，沒有另一新興朝代起而代之確是破天荒的現象。但是整個國家陷入史無前例的紊亂，國際上之聲望降至最低，政府亦是前所未有的無能，受到極端的蔑視。

這種失望的情緒，導使極有思想的知識份子開始對辛亥革命事件重新作詳盡的分析。結果他們發現，一九一一年的失敗，在於革命的對象被限制於政治的層面，而整個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卻一成未變。此種分析自然導引他們傾向較激烈的思想學理（如無政府主義或馬克斯）。他們失望的情緒同時亦生成所謂的政治上奮鬥掙扎，不過此種掙扎多經由政治機構進行，故效力不大，至五四運動時表現的特徵之一，即是羣衆共同爲政治奮鬥的復甦努力，絕無黨派或其他有組織的政治勢力參與其間。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　二十世紀初，無政府主義卽在中國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一九〇七年，一羣中國留學生在巴黎發刋了有關無政府主義的雜誌「新世紀」，另一批留日學生則於東京創行「天義報」，他們的思想除了受瑞克拉斯（Reclus）、巴枯寧、克魯泡特金之影響，亦有道家思想之淵源。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革命後，無政府主義更進一步侵入中國。其主要倡導者爲劉師復（一八八四—一九一五），他曾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在廣州設立「醒社」，其所提倡的「十二項禁條」著名全中國，其包括「禁止食肉、酒、煙、美婢、婚姻、別號、官職、坐黃包車、替議員助選、或隸屬任一黨派、任軍職、宗教等」。以後劉氏又與其支持者組織了一個中國世界語的團體。

當劉師復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因肺病去世後，其黨派亦隨之消失。戰前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締造者，如吳敬恆、李煜瀛，現今已成爲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他們的觀念使之和國民黨的右派極爲接近。無政府主義在北京與上海年輕知識份子中仍然十分通行，但在廣州與湖南很難打入工人圈子中。

外國對激進知識分子的影響　最早，影響最深遠的外國影響力是來自日本的激進派，他們將西方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傳送到中國。就所有中國留學生，以留日學生數量最多也最窮。因爲日本離中國最近且爲西化的國家，所以留日學生仍然可以過著中國式的生活。許多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名詞多借之於日本。魯迅與後來成爲共產黨領袖的李大釗均在日本受的教育。

法國的影響力比較有限，但非常強烈，戰前中國第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就生活在瑞克拉斯（Reclus）兄弟組成的圈子中，對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如蔡元培、陳獨秀而言，法國是一個深具哲學與革

命背景的國家，而非雄踞於越南與半個上海的強權者，由蔡元培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所創立的勤工儉學會，更加強了中國與法國的連繫，歐戰期間，不少學生半工半讀維持其生活。

其他的技術人員與工程人員曾在美國接受教育，他們深被杜威的實驗主義及整個美國社會所吸引，並且發行了一份刊物—中國學生月刊（中國留美學生月刊），其中已經包括了不少五四運動所宣傳的思想。學文的通常到法國，學醫的通常到日本（魯迅、李大釗即在其中）。

陳獨秀與新青年　當時最激烈的一份刊物—新青年（法文的副題 La Jeunese），由陳獨秀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創辦，他曾參預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得到大批因抗議二十一條而返國的留日學生的支持，陳獨秀在慎重的考慮後作了一次決定，號召青年與整個舊中國決裂，而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革命僅觸及傳統中國的表層，特別當蔡元培任命陳獨秀爲文學院院長後，這份刊物在學生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雖然它討論的焦點在婦女與家庭制度的情形，但文化與教育爲其探討的主題，而絕少論及政治，陳獨秀認爲中國已病入膏肓，亟須接受西方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建議。哲學與文學在本刊中並佔有極大的篇幅，一個由美歸國的留學生胡適，反對舊有文言文形式，而提倡白話文學。

新文化運動的政治面（一九一八—一九一九）　在一次大戰結束時，各種新雜誌影響力繼續傳播着。許多新期刊與新青年一樣成功，如創辦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一月的新潮以及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十二月的每週評論。甚至態度溫和的報章雜誌亦刊登一些激烈派文章，如上海太平洋雜誌。隸屬於梁啓超研究系的北京晨報，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二月開始一種每週增刊，以新青年負責人之一

的李大釗爲主筆，新青年中關於新思潮討論的篇幅愈來愈多，激發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生命，學生及激進刊物的讀者均參與了與中國獨一無二的有關世界主義、中西歷史關係、中國社會結構的熱烈討論，他們貪婪得吸收了每一份所能得到的有關西方文學、思想及歷史的資料。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蘇俄的十月革命比任何其他事都令人感到興趣，由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孫中山致列寧的電報中顯示十月革命已在前進的知識界中引起了極大的迴響，初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在學生的眼中有極大名望的李大釗，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十月寫了一篇「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勝利」的文章，卽爲一篇讚揚蘇維埃政權的宣言，對於蘇俄政治的熱衷使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轉向馬克斯主義。就在五四運動發生前，新青年還特別出了一期討論馬克斯主義的專刊，李大釗在其中寫了「我的馬克斯主義觀」一文，更加肯定他對馬克斯主義的選擇。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年底，在李大釗的支持下，由學生在北京創立一個專門研究馬克斯主義的學會。

因此激進的知識份子，已親自面對現實的政治問題，其領袖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學生團體及觀點極前進的期刊雜誌，均曾參與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春，抗議西原借款的運動，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初，他們也參加了阻止中國和會代表團對在會議前所提出的問題上對西方讓步。

至少就最普遍的概念言，從具有政治性社團的成立中可看到參政運動。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四月毛澤東與其他湖南學生在長沙成立新民學會，廣州學生組織了一個學生救國聯合會，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一月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以繼續反對日本政府與救國努力奮鬥爲目標。所有上述的團體，

對舊社會、舊文化的研究與譴責混爲一談，至少在尋求政治行動時表現一種混亂狀況。

雖然如此，此種激烈思想實僅限於社會中極小的一部份—新知識份子及有限的地區（北京、上海、廣州及其他重要內地城鎮），這些前進的知識份子仍未侵入廣大羣衆的生活面，雖然他們的確想走向羣衆。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十一月蔡元培發出了一個有名的口號：「勞動神聖」。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三月李大釗的一些學生（以後當中有不少成爲共產黨的領袖）組成了許多從事平民教育的教學小組。李大釗要比深受西方影響的陳獨秀更加瞭解：繼續與傳統中國各方面維持的必要，特別是農人。他們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發表的「青年與鄉村」一文中特別建議青年學生與佔大半面積的鄉村保持一種有生氣的接觸。

五四運動的暴動絕非偶然，它是長期的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所受到的激動結果，在民初的軍閥時代（一九一六—一九一九），耀武揚威的軍閥與政客們佔據了整個時代舞台的最前方，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隱藏於其後，影響深遠、成果豐碩的五四運動。

第四章　五四運動及其影響

在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民國八、九年）間，中國激烈的變遷完全出乎中國政治家與中國事務觀察家們的意料與識見，各個軍人政治派系為了奪取中央政權陷入盲目無休止的混戰中，使這一個原本充滿了荒唐鬧劇的初生共和國又增添了一項對權力的明爭暗鬥。所以，當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由學生中爆發的憤怒情緒點燃了全國團結運動，如工人罷工，抵制日貨，公開譴責舊社會與舊文化，這些使得他們完全無法招架。此運動無疑使中國兩個政治社會層次—社會中新興的力量和實際政權的掌握者—間刻劃出更深的裂痕。五月四日是一九一五年或更早開始的知識份子激動情緒的極點。它是一個政治覺醒運動的開始，不但影響年輕的知識份子，亦及於工人階級，且導致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中國現代史家言，更視一九一九年為中國近代與現代史的轉捩點。

第一節　五四與其重要性

五四學生示威遊行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初，由當時普及中國各大都市的電報傳出凡爾賽和約簽字的消息。一次大戰雖然結束，中國的要求，却未被列入和約中考慮，因為一方面西方國家因需要日本在亞洲防堵共產主義的擴張，而滿足日本的慾望，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包括勢力範圍、礦、路

權與靑島的軍事基地完全轉讓給日本，而沒有歸還中國。另外他們更不願因交還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在中國所取得的權利的一小部份，而破壞不平等條約。

有數月之久，中國全國對山東問題極敏感。待凡爾賽和議成，中國學生決定五月四日發動大規模的反日與反親日中央官員抗議示威遊行。約有數千人參與此一行動，他們遊行全市後，將其憤怒完全發洩在三個聲名狼籍的親日政客上，先放火燒了其中一名的家宅，再將另一個打得半死。第二天，北京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開始有組織的推展各種活動，新聞界與中產階級中的溫和份子（包括商會、自由業者、教師）均給予支持。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中，學生示威遊行傳遍全國各地，主要城市都成立了學生聯合會，學生們且發起了全面抵制日貨運動。到此當局開始採取行動，先對支持此運動最力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施壓力，迫其辭職，接著大羣的人被捕，警察軍隊以極嚴厲的手段撲滅學生運動，雖然如此，直至五月十九日北京學生仍然繼續罷課，其他各大城市也效法跟進。

五、六月中運動擴散　六月初，當局更加嚴厲，北京首先公佈戒嚴法。日本政府亦派官方代表前來，要求結束各種反日的煽動與計劃，並派遣海軍進入大港口示威。六月三日到六日間，北京已有一、一五〇人被捕，由於學生們的勸說，上海商人也發起勸說及罷市以響應北京的行動，服務於上海大企業行號（包括紡織、運輸、煙草）的工人們自動地決定罷工，以表明其對此運動的一致態度，約六萬多工人響應此一行動，特別是南方許多城鎭，工商階層都持續地罷工，示威遊行及召開集會，直到六月十二日，當局終於被迫同意釋放被捕的學生及知識份子。解除三位被學生們攻訐的官員之職務，尤其重要的是向

全國宣告拒簽凡爾賽和約。

五四運動實際上包括兩個部份，由於政治環境與社會背景之差異，此二部份各有其不同的地理重心。第一部分發生在中國主要的文化中心—北京。第二部分，從五月初起卽在上海—中國工商階層主要集中的中心—展開。

學生的發動與工人、商人的罷工、罷市很快地告一段落，不過抵制日貨行動仍然持續於整個夏天。學生們特別組織「十人小組」來監視港口以及隨時搜查商鋪，日本在華貿易因此受到嚴重影響。

五四運動的政治特徵　「愛國」爲當時最普遍的口號，此種愛國情操主要表現在對列強於巴黎和會中促成日本野心的得逞及其加諸於中國之屈辱的抗議上。在近代中國史上，五四這個全國性的變動，首次在其所揭示的目標中，同時關切到國內外兩方面事務。「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是北京示威遊行所高呼欲達的兩大目標。換言之，五四在政治上所力爭者，不僅是對列強施諸於中國的各項政策及不平等條約的譴責，同時對於屈服於外人貪慾之下的傳統中國社會也予以激烈的抨擊。此種內外聯合的嶄新情勢，激使二十年後毛澤東將中國革命定義爲反帝國主義以及反封建的革命。綜觀前代各種爭取政治進步與社會解放的運動（像太平天國、康有爲、辛亥革命），大體言，均與當時中國當權派勢力相結合，而在另一方面，出於充滿激情的民族意識或原始的民族主義的運動如義和團之亂和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對美國的杯葛，前者亦似保留在對國內朝廷的效忠，後者則對國內的情勢保持中立的態度，五四運動不但力爭國權，更不留情地反對傳統的中國政治與社會。

五四另一獨特面，是其完全出於自然的政治天性，取代了出於利益而組織的政治團體，吸引成千的民衆實際參與行動。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革命以後的情勢所帶來的失望與痛苦，造成民衆對政治團體或政黨的政治能力普遍的不信任。而這些空有其名的政黨使議會成爲純私人利益結合的荒唐現象，更加深了一般人先存的那份疑懼感。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所自發的騷動似乎震驚了當時中國政黨中唯一較有嚴密組織而由中山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黨，雖然當時黨中的領袖人物或知識份子不是過遲加入就是沒有參與此項運動，却覺悟到此後是無法置身於其外。由於五四負責聯繫工作的小組效率極高，使得社會中各個不同階層，如學生、商人及激烈派出版界得以投入五四的大熔爐中形成完密的結合。

五四運動亦爲新生一代的運動，從五月的第一天起，學生們就扮演了極重要的爆炸性角色，他們向政府示威、毆打警察、散佈抵制日本的傳單、以及組織「十人救國小組」來勸導商人、工人從事罷市、罷工，並運用抵制日貨的指示。由民國四年即開始的反舊社會、舊文化，以及反對植基於老一輩的道德與意理特權上的舊式中國的運動，使得年青一代相信他們足以掌握政治力量。這正應了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陳獨秀所號召青年的呼聲。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七月，大多數參與運動的領導人物聚集創刊了「少年中國」（以一九一八年底出現於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命名）。

新文化運動　雖然新文化運動很難確定其起點，但五四運動所強調的政治與社會危機却無法與新文化運動脫節。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六月間充滿戰鬥性的學生所以如此活躍，完全肇因於幾年前由陳獨秀以及「新青年」所開創知識份子激進思潮之影響。這種政治行動與對既有文化的挑戰緊密的結合，

在中國是極其自然的，因爲自古中國本身卽紮基在知識與政權的結合上。行之千年的科舉考試最能說明此一現象，經由其中產生的官式文化，成爲達成全國政治一致性的有效武器，統治階層幾乎壟斷了所有寫的文化(writen culture)。(當然，當時亦存在有非屬官方性的文化。)在文化批評運動的滋養下，五四運動也轉向來加強此一抨擊的潮流。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一些雜誌的先驅者以及學生社團愈來愈多，像出現在上海及北京的「解放與改造」(其副題爲世界語 Rekonstruo，表示其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與對狹隘的國家主義的排斥)。其他如由毛澤東以及湖南學生聯合會一些主要份子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創刊於長沙的「湘江評論」，在全國各大城市都能看到，這些雜誌的出刊不但增加了早期創刊如新青年、新潮之類刋物的影響力，甚至促使一些東方雜誌之類較保守的期刊亦對新思潮採開放的態度。

五四運動中所有壽命較短的刋物均具備反傳統以及急切與舊文化及舊社會價值挑戰的共同特徵。家庭制度以及妻子兒女無條件服從的天職均羅列出來並公開的攻擊。倡籲男女平等及提高女權，反對傳統式安排的婚姻，在五四運動期間盛極一時。白話文以及文學改革運動在此期間經由學生們所散發以白話文寫成的傳單、標語及小册子推動下，在中國的政治生命中達到空前的高潮。

學生們散發一種以說教口吻寫成，且極具雄心的宣言，並組織學會推行基於無私互助的社團生活，以及組團分至鄉村及工廠教育大衆，均顯示整個新文化運動是具有高度的理想主義色彩。

五四運動同時亦爲一倡行知識與政治二分的時代。對於美國杜威的實驗主義，英國羅素的自由社會主義，日本烏托邦式社會運動—新村制度，泰戈爾東方式的理想，瑞克拉斯(Reclues)與克魯泡特金

的虛無主義，托爾斯泰與羅曼羅蘭的人道主義，均極爲熱衷。就是對在當時尙鮮爲人知的馬克斯、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亦有極大的興趣。世界語風行於學生之間。一九一九年—二〇年杜威的旅行演講及一九二〇年羅素的訪華在各地大學均造成極大的轟動。

五四時代思想的分歧　對於知識的飢求與貪婪，導致整個中國知識界，特別是學生，陷入對哲學、文學、歷史及政治論題。無以數計的論爭中，最有名的一次辯論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七月發生在新文化運動裏兩個主要人物間。已經公開對馬克斯主義表示同情的李大釗，遭到深受美國實驗主義影響的胡適激烈的攻擊。胡適宣告應卽刻停止對惱人無比的主義間之爭論，而代之以淸晰具體問題的討論。李氏囘覆以個人問題只有在社會整體情勢的轉變以及符合社會大衆的意願下始能解決。在此種明顯的哲學爭論下，導致雙方對政治上改革或革命作不同的選擇。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刋物，充滿了知識上爭論的篇幅，討論的焦點集中在中國工業化眞正的進展程度以及西方社會主義是否可應用於中國的問題。檢視東西文明之相對價值，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引起極熱烈的辯論。鄉村生活中人類的價值也被提出來討論，原本卽含有平民意味的馬克斯主義者——李大釗，發出「走入鄉村」的呼聲。傳統中國烏托邦式的井田制度，依孟子言，利益由早期中國農人均分。那時極有可能是一個相當於馬克斯所言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同時也分析比較了瑞士及美國式的聯邦憲法之優點，而反對中國式共和或傳統式中央集權的專制。許多文章討論這樣的主題及其他的問題，如此熱烈的討論證明了五四新的一代虛心坦誠的態度以及其知識上之成就。

五四運動的經濟層面　加入五四運動的中產階級，不但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同時也保護了本身經濟利益。基於愛國因素由學生們組織推行的抵制日貨運動頗能表示一般民衆的態度，所以推展得極爲熱烈。尤其重要的是此一行動同時打擊了中國工商等界在國內市場的主要對手。所以這種國家利益與階級利益結合的表現，成爲五四運動極顯著的特徵。那些中產階級在一次大戰的黃金時代中，特別切望打擊其敵人。由於戰爭的爆發，使得世界市場貨物需求量激增，隨著和平之回復，給中國帶來運輸上極大的便利，加上銀價的上漲，更促進了機械及其他耐久性貨品的輸入。倫敦每一盎司的銀價由一九一七年的四十又四分之三辨士，升至一九一九年的的五七辨士，至一九二〇年高達六十又二分之一辨士。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中產階級有足够的力量與信心對其提供在政治上的支持。上海、天津、廣州這些大都市的商會及其他團體均贊成採一致的行動，加入反政府運動的行列，有時也響應對洋貨的抵制。尤其抵制日貨行動更明顯的看出某些行業有顯著的利益。在上海一九一九年日本紗類進口降低百分之五十九，對中國和印度製的紗極爲有利。

在五四愛國氣氛籠罩下，中國的商業團體，藉著推行愛用國貨運動，延長了對日貨的抵制，號召買「愛國貨」的呼聲在各處被傳播開來。許多新興工廠，在一筆筆捐款匯集下，籌組成立，此種集資成立的集體式企業成爲五四運動中理想主義的典型代表。導源於同樣運動的工業擴張，在輕工業方面特別明顯（像女帽業、火柴業、紙業），其在設備方面的支出通常比較低。

五四運動加諸於中產階級的另一刺激明顯地表現在組織方面，新的商業組織紛紛成立，例如上海甚

至有結合同一條街生意人的組織。商會與其他職業團體組織愈來愈強，並且極富動態，以活躍進取的新血取代其中的保守份子的現象，甚爲普遍。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七月上海商會的選舉產生驚人的結果，一個現代化棉花廠的擁有者，以壓倒性的優勢取代了屬於舊制度的上了年紀的商人，成爲會長。

在另一方面，工業中的無產階級—工人，雖然極爲重要，但在五四運動中一直處於最不顯眼的部份，運動本身也亦完全未顧及其需要，上海的罷工者只是執著於純愛國的口號，僅視其本身爲學生及商人的後盾而已。工人們直到五四以後始意識到自己所負的政治責任。

農人幾乎完全沒有參與五四運動，鄉村世界全然隔絕於此一全國性的危機之外，城市中的新興階層始爲其中的主角。

五四運動的國際環境　在五四運動發生的這段時期，整個世界亦正處於一連串對抗舊專制勢力與西方優越地位的掙扎中。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發生於印度的反英示威者在阿姆瑞沙（Amritsar）被屠殺，同年在埃及也發生反英的激烈暴動（Saad Zaghlul，全國性的運動），並派遣一個代表團出發前往倫敦。在遠東，一九一八年發生的東京暴動乃由突然暴漲的米價所引發，顯示日本內政普遍不安的現象。一九一九年漢城的「五一運動」（在韓國最後一任國王死後，立即發生對日本殖民地式統治的抗議運動），已包括與五四運動類似的由學生煽動、遊街示威、公開集會與罷工各方面活動。參與五四運動的各階層均熟稔上述各項事件，並由其中吸取不少理念與勇氣。

五四運動的平衡表　運動所帶來的立即結果，在與運動本身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比較下，顯得

微不足道，僅促使一些親日政客辭職，達到中國拒簽凡爾賽和約的目的，以及使日本工廠在抵制行動中遭受到損失而已。軍閥的政權與列強在華優越勢力絲毫未被搖動。然而五四運動終究展開了一連串嶄新的過程，對截至一九四九年整個中國歷史言，五四的重要性是可斷言的。

對於中國中產階級言，五四只爲一無任何深遠結果的戰爭而已。他們對經濟的擴張，政治的領導階層，以及對抗外國競爭所具的種種期望，均於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的危機中迅速破滅。但由另一方面言，對工業上的無產階級，五四却爲其在政治上的起點。對知識份子言，就像約瑟夫・李文遜（Joseph Levenson）所言，五四乃孔子時代的結束，象徵與傳統中國之絕裂，導致一些人走向馬克斯主義，另一些人則被當時盛行的英美實驗主義所吸引。由五四運動一些領袖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創立的中國共產黨，在五四興起的一代（如毛澤東、周恩來及其他人物）領導下已持續半個世紀之久。

最後，五四運動顯示了以中國激烈派勢力爲代表的統一趨勢所產生的力量，長期存在於各省及各區域間彼此敵對的現象，幾使中央的權威蕩然無存；卽使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亦是以一種南方地區性運動的形式出現，而五四却是一種不折不扣全國性的運動，至少就「城市中國」的概念言，從北到南，由沿海到內地，它幾乎席捲了所有的城市地區。

第二節　中央政府危機的擴大

官方對五四運動的壓制　安福系在一九一九年春夏間所採取的行動極爲嚴厲，逮捕了上千的學生。

出動大批警察驅散遊行示威的羣衆，並且數次頒行戒嚴法。當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六月十一日運動已進入尾聲即將結束時，陳獨秀却因散發要求解散安福俱樂部與在北京的警察，以及保障言論自由與集會的權利的傳單，遭到逮捕，直到九月間始恢復自由。

政府所通告有關禁止抵制日貨的法令，特別在南方各省，所收之效果極微。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十一月一羣日本公民與軍人在福州聯手攻擊正在進行抵制日貨運動的學生們，（福州乃福建的省會，爲日本在華的勢力範圍。）結果許多人被殺傷，北京當局却未向日本提出任何異議。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日本已提議在山東問題上，與北京達成公開且直接的協議，反日運動再次展開。商人與學生團體特別在北京召開一非官方的國民大會，籌劃進行此一運動，結果遭到警察的破壞阻礙，總部設在上海的法租界，承繼五四運動而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亦被租界警察禁止驅散。在福州與上海的事件中，由於北京政府默認外人在中國土地上直接行使鎭壓的行動，使其本身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

安福系勢力之傾倒　安福系的勢力極不孚衆望，其在各省的代表，包括安徽的倪嗣冲、湖北的王占元與湖南的張敬堯，完全表現了殘酷、貪婪的軍閥特色。另外兩個軍人派系極欲將之消滅，其一乃由馮國璋左右的一批親信集結成的「直系」，曹錕與吳佩孚爲其領袖；由張作霖領導的奉系爲另一主要勢力，張氏已逐漸成爲整個東三省的霸主。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春，直奉二系共謀對皖系發動攻擊，其時，安福系內的活躍人物徐樹錚正指揮一支駐紮西北的軍隊，他對蒙古所懷抱之巨大野心，深深困擾

了與其接鄰的張作霖，終於直奉聯施壓力，迫使當時的總統同意於七月解除徐氏的職務，此舉激使當時安福系的首腦人物段祺瑞，決定發動反擊，戰爭於是爆發。雙方軍隊在經過幾次激戰後，段氏終被擊敗，安福系在北京及原據各省的力量亦隨之瓦解。雖然安福系最後終於屈服於羣衆的浪潮之下，但是五四運動仍未能導引中國政治走向一條嶄新的路徑，反促使另外保守的軍人派系代之而起，繼續其野心的擴張。

新政府的曖昧態度　奉直二系的合作並不長久，本來卽處於不同的地理環境及政治利益。前者控制了東北地區，後者則集中在北京與長江中、下游地區，雙方均懷抱衝破各自勢力範圍的野心以及獲得對中央政權的控制（此乃權力與利益的另一資源）。北京政壇直奉二敵對勢力交互作用的情勢，後因另一文人派系　交通系的加入，更爲複雜。交通系的首腦人物乃前任袁氏機要祕書梁士詒。

新政府的得勢，主要得之於安福系的不受各界歡迎，故其曾嘗試爭取輿論的支持。例如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十月直系領袖吳佩孚曾發表演說，以憑弔在英屬唐山煤礦的意外事件中罹難的礦工，並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五月向進行罷工的礦工們演說，以安撫之。並且停止對領導抵制外貨運動態度激烈的知識份子與學生進行壓迫之方案。

仍具共和形式的新政權，終究無法制訂一套不同於安福系的政策。因其本身亦僅爲尋求財富與勢力派系間的結合，致無法對長期處於軍閥鐵蹄淫威下的國家政治、社會層面，進行有建設性的批評與改進。所以在面對鴉片與飢荒的啃嚙下，新政府是完全地無能爲力。

鴉片與飢荒　一次大戰後的數年間，鴉片的栽種與運輸已達到一個極具毀滅性的比例高峯，一九一一年的國際協議中所達成在中國土地上從事鴉片的種植或貿易，全屬違法的規定，自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完全被破壞。

由國際拒毒協會在一九二一年所提供的詳細報告中，提到軍閥如何迫使農人放棄種稻而改植鴉片，並對鴉片課以重稅，掌握鴉片的賣出權等情形；鴉片最後的銷售多由軍隊中逃兵出身的小販所担任。廣東、福建、河南、安徽的情形均是如此。貴州除了大片相連的罌粟田外，一無所有。陝西則爲各省中情形最壞的一省。四川罌粟田茂盛的景象，就若大軍臨境一般。一次大戰後，許多無照外商紛紛潛赴中國各大商埠，利用中國政府對列強勢力的無法約束，使盡各種非法手段大賺其錢。（像私運歐洲戰場上所廢棄的武裝設備、經營妓院及其他非法營業。）他們並掌握了波斯或中南半島鴉片的絕大利益，（中南半島上法屬殖民地政府乃不顧國聯的譴責而公開銷售鴉片，因鴉片貿易乃殖民地三大國有企業之一，爲殖民地政府財政平衡之所賴。）海關對外國鴉片查禁之工作，雖非極具效率，扣押數目仍然顯示一種逐年在穩定的增加現象：

年代	數量（單位鎊）
1917	20,468
1918	26,676
1919	48,375
1920	96,627

發生於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華北地區的災荒，亦顯示出當局的無能。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直、魯、豫、秦、晉五省（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曾受嚴重饑荒的蹂躪），再次面臨情況嚴重的旱災，原本豐收的夏秋二季均形荒歉，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各地所積貯的糧食均已告罄。由一個基督教救災委員會所作不太完整的調查顯示，四千八百多萬的災民中，約有一千九百萬家產已蕩然無存，只有坐以待斃，而稍有精力者均紛紛逃至城鎮。樹葉與樹皮均被充作食物，馱獸亦被宰食，農具早已典當，孩子均被賣至城中，死亡人數高達數十萬人，整個農村滿目瘡痍，哀鴻遍野。主政的軍閥們却無法採行應變措施去對抗飢荒，雖然在公使團堅持須由六位外人與六位華人共理此事的屈辱條件下，他們也曾試行加徵關稅的附加稅，然而却因地方行政當局的無能，使這筆得來不易的經費常常無法到達災民手中。

災荒之造成並非僅因氣候之酷烈，不健全的水利系統或是儒家「社倉」制度的解體，最重要的因素在中國農業所呈現的一種封建狀態。絕大部分的農民經常處於死亡邊緣，備受任何隨時可能發生的天災

的擺佈。而軍閥政權完全無法察覺這些存在已久的問題，遑論去解決它們了。

中國境內外交敵對勢力的再起 經過攜手對德作戰，獲得共同勝利的英美，發覺又面臨太平洋上日本勢力的挑戰。日本利用戰爭增強在中國的勢力，又趁着蘇俄發生革命，以調停為藉口，深入西伯利亞，日本這種前進政策，深深困擾了英美，美國此時在華已完成了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春列強嘗試為另一次的合作行動，由美國大銀行倡議，聯合英、法、日的財團組成第二次的國際銀行團（第一次成立於一九一三年，於戰前解散。）同年銀行團中一名叫貝克（Bakes）的美人提出共管中國鐵路的計劃，為日本拒絕。由於英美與日本在利益上的衝突，使得二次銀行團幾形同虛設，並且影響於一九〇二年成立至此剛到期的英日同盟，無法繼續下去。西方與日本間衝突的形勢，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達到高峯，會議中公然要求日本停止其擴張的政策。

上述外交上的敵對形勢同時說明了直奉聯合驅逐安福系的背景。英國為直系的支持者，直系所在的地理範圍與政治勢力所及地區，完全與英國從長江流域延伸至唐山煤礦的勢力範圍相一致。而直系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春對皖系發動攻擊，亦與英美全部力量轉回遠東的行動一致。由於五四運動主要的攻擊對象是日本，而非列強統治的本身，故羣衆對於同樣反日的英美政治軍事結合的勢力，比較能夠接受。

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日本不再甘於被排斥的地位，公開表示放棄對當時不受歡迎的安福系的支持，並且透過奉系（日本在東北有龐大的經濟勢力）以及交通系，與當時北京的新政府取得實質的接

觸。

中國的內政，仍然與孫中山和袁世凱奮戰的時代一樣，爲列強間經濟、外交勢力交互作用的形勢所控制。如同過去政治上的分裂，各省在財政上的獨立，更加強了此種形勢。一九一九年政府的全部收入共計約二億三千一百萬元，其中由鹽稅獲得七千五百萬、關稅三千四百萬。至一九二〇年左右僅由全部的關稅收入四千九百五十萬兩中，取得兩千萬兩而已。中國所得之於關、鹽稅的收入，乃是在支付對各國的債務與賠償後的盈餘，並且必須經過各國公使團的同意。所以中國幾乎達半數的收入須仰賴北京公使團的善心慈悲。

第三節　來自分裂勢力的壓力

南方軍政府的危機　南方省份的再次獨立源於一種政治的本能，爲抗議北京政權在國內外所造成的荒唐鬧劇而訴諸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的傳統。然而自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孫中山離開後，廣州的軍政府在桂系的操縱下，形同另一個軍閥派系。桂系首領陸榮廷，原爲強盜頭子，後加入劉永福的黑旗軍始逐漸崛起。他唯一的目標在掠奪廣州附近富饒地區以自肥。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六月廣州的中產階級在「粵人治粵」的口號下，勇敢地與陸榮廷對抗，並提議由省中的一名紳士伍廷芳出任督軍，但爲桂系否決。廣州政府與北方和談失敗而威勢大衰。（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經過一整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而告休會。）當一九一七

年響應孫中山護法號召回粤的國會議員，於一九二〇年三月離粤至雲南時，軍政府最後的一點權威也化爲烏有。雲南督軍之所以接納議員們，完全基於一種煽動性的理由。

桂系軍閥受到廣州各界極端地厭惡，孫中山與其擁護者發動反攻的時機已告成熟。

粤人治粤與孫中山的回粤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十月一個曾參與辛亥革命的粤籍軍事將領陳炯明在經過多年轉戰於福建邊境後，終於回師廣東，並請孫中山同時返粤。陳氏喊出「粤人治粤」的口號，與一九二〇年代中盛行於中國的聯省自治運動相互呼應，並且得到身受桂系軍人騷擾不已的所有廣東紳界的支持。新成立的廣東政治乃建立在另一個政治力量孫中山的國民黨之上。在放棄了形同密祕結社的中華革命黨的狹窄範圍後，重組的國民黨宣示其目標在：將中國建設成一個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現代化國家。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透過一九一九年夏創刊的建設雜誌，日漸壯大。五四運動在國民黨毫無預備下發生，但是由激烈派的刋物在運動中所發揮的政治力量上，覺悟到思想競爭的重要性，於是黨中第一流的知識份子，包括胡漢民、廖仲愷與朱執信等均親身參與建設雜誌的編輯工作，在年輕的知識份子中爭取了大批忠實讀者。

在以促進整個國家進步的大前提下，僅暫以廣州爲其往後活動基地的國民黨，與懷抱地域主義、只想重建粤省秩序的陳炯明之間，僅維持一相當脆弱的政治聯合。雙方依據重新恢復的一九一二年的「臨時約法」，選舉孫中山爲大總統（幸虧有那些回粤國會議員參加投票）。新成立的廣東政府政策相當前進，特別任命當時已成爲公開的馬克斯主義者的陳獨秀爲教育方面的首長，當時的廣州市長孫中山的哲

嗣孫科，亦擬行一套規模宏大的都市建設計劃。

政府中潛存的異議爭執，終於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演爲表面化的衝突。

聯省自治運動　陳炯明對廣東的政策僅爲另一大運動中的一小環而已。在厭倦了省際間無休止的戰火與對無能的北京政府澈底的失望下，許多的中國人開始渴望將國家轉變成聯邦的形式。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許多的期刊雜誌均極力鼓吹此方面的理論。無論是激進的知識份子，或是像梁啓超般的溫和份子，甚至連一些軍閥，均贊同此種計畫！使當時的情勢充滿了矛盾又複雜。不過此一僅若曇花一現的運動，終究從這複雜背景中，吸取了一些益處。

聯邦主義複雜的思想基礎　對激進的知識份子言，聯邦主義爲其一種意義重大的撤退戰術，他們期望在「省」較小的背景中，達到其在全中國所未達成使激烈的思想得到勝利的意圖。「新山東」的一篇社論說道：「不要苛責我們只關切山東的利益，……除了建立一個新的山東省外，我們將更努力號召同志，建立一個新的中國。」

就像康有爲與梁啓超在一八九八年所提倡，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的革命與五四運動的領導份子（像如胡適），均渴望在西方中尋求聯邦的實例。他們不但研究美國憲法理論中各州與聯邦的權力，並且分析瑞士與巴西的成例。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在中國仍有相當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聯省自治運動也非常支持。他們對地方權力的強調，完全承繼着一八六〇年代巴枯寧抗駁馬克斯的中央集權理論的傳統。

聯邦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基礎　聯邦主義同時風行於激進及溫和的知識份子當中，而且得到社會上的普遍支持主要來自於鄉村的士紳與各省的商人勢力。當國勢愈加混亂時，他們只有在自己的家鄉發展各自的抱負與計劃。

「粵人治粵」的口號相繼爲許多省份所採用，像「湘人治湘」、「川人治川」、「鄂人治鄂」等。南方的省份，神祕的特殊性尤爲強烈，省間的界線亦劃分得最爲淸晰，各地區的經濟情形相當蓬勃（由於水運的發達），並且承繼政治上獨立的傳統。

就政治情勢言，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國民黨幾次捲入有關一些省份獨立的過程中，特別是湖南、湖北、陝西三省，孫中山的回粵與其對「省治運動」的支持，均屬其長遠計劃中之一環在重新回到中央的政權以前，鞏固國民黨在各省中的勢力。黨中知識份子均積極推行聯邦主義的理念，像曾參與擬定民初「臨時約法」的王正廷，曾受多省請託，爲其草擬獨立的省憲。

由於「聯省自治運動」的推動者均爲文人，註定其壽命的短暫。因爲不管文人對國家、政治忠貞的態度或其優越社會背景，在面對各省中實際掌握權力的軍閥時，顯得一籌莫展。

省區主義與軍事權力　袁世凱死後，軍閥主義作祟得更加厲害，國家各方面均遭到軍閥們的強奪及破壞。鐵路爲其隨意徵用，軍隊到處拉伕，鴉片與武器的貿易運輸極爲蓬勃。各地城鎭均慘遭軍隊的蹂躪。聯省自治運動原本是對軍閥的作祟一種普遍的抗議，結果竟然幫助軍閥獲得在其統轄省中勢力擴張的口實。

在對幾個實施省憲運動主要的省份檢視中，清晰可見各省在一些要人的支持下，如何去爭取獨立，結果如何失敗，以及督軍們假藉省治運動的口號而行其宰制中國政治陰謀的情形。

湖南　當譚延闓自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起卽活躍於省中的政治人物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夏趕走原先由皖系所派任的督軍後，卽立刻打起湖南獨立的旗幟，後經過數月屬於私人間的爭戰，趙恆惕（一八八〇—？）起而代其出長湘省。仍然遵循譚氏的路線，宣告湖南獨立，並且延聘專家草擬湖南省憲，分送各地士紳加以討論改正，最後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一月公佈。

趙氏以極高的技巧，不但獲得湖南鄉紳之支持（透過省議會），更博得激進知識份子與工人的擁護。態度激烈的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甚至高喊出：「擁護湖南的門羅主義政策！」暗示湖南應置身於南北衝突之外，就像門羅主義下的美國，完全超脫出歐洲專制主義與自由主義間的衝突。後來毛澤東告訴史諾（Edgar Snow），當時省治的理想的確深深吸引了他。湖南的工會（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亦極贊同聯省自治運動。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三月曾爲了長沙一間重要工廠的轉移給湖北人而抗議，並且宣稱此乃爲三千萬湖南人所共有的財產。一九二二年當軍閥運用武力壓制「學運」及「工運」時，軍閥與激烈勢力間亦告決裂。

四川　聯省自治運動在該省，亦得到五四運動中激烈派的知識份子的倡導與支持，一九二一年四月間在吳玉章早年爲四川共和運動中的尖兵，晚年則變爲共產黨的領導下，一批知識份子成立了「四川獨立聯盟」，倡行民主政治、主張男女平等、發展集體工業。未料此一運動，後來竟變成當時省內兩大軍

閥劉湘與熊克武的宣傳工具，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夏天他們利用此種藉口驅逐了唐繼堯的滇軍，粉碎了唐氏「大雲南主義」的夢想。當知識份子發現他們所處地位的曖昧不明，立刻決定解散「獨立聯盟」。自此四川的省憲運動，卽成爲該省督軍野心與陰謀的最佳擋箭牌。一九二一年春劉湘亦以「川省獨立」的名目，趕跑了熊克武，結果發現必須面臨分散在四川各地各小軍系的挑戰。

湖北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春天，爆發一場反抗當時屬安福系的該省督軍王占元的暴動。抗暴者在國民黨軍隊領導下，高呼「鄂人治鄂」的口號，顯然爲聯省自治運動的擁護者。而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使該黨在鄂省不但有名且極受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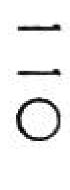
暴動之後，成立一個暫時性的省政府主理省政。政府各部門的領袖與支持湖南獨立的團體及四川軍閥劉湘均保持極好的接觸，劉湘本人亦爲聯省自治運動的支持者。而於一九二〇年出掌北京的直系，可不願冒險失去此一位居中國中部鐵路、水運網心臟的重要地區，故吳佩孚將軍的軍隊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發動「援鄂戰役」，輕易地鎭壓住省治派的軍隊。

浙江　位居沿海的浙江，遠離了當時任一經濟軸心或是大型的政治暴動，此一特別的地理位置解釋了何以在直奉戰役之後，獨有該省仍能保有一個隸屬皖系的督軍盧永祥。盧氏深知其地位之不穩，故欲藉著擁護浙江獨立以鞏固其位。他宣佈成立一「制憲委員會」，依據湖南省憲制定浙江的憲法，制定出的憲法原文，包括許多複雜無比的條款，暴露出當時法律專家們的通病，雖然各個通曉西方的法律，却鮮知中國當時的社會實情。雖然在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九月正式採行，對於浙江的軍閥政權形勢，

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或幫助。

陝西　此一較爲偏僻的省份在中國的政治地理系統上據有極特殊的地位，乃一適於退守及進行偵察的地帶，並爲對整個華北發動攻擊的可能基地。故當一九三四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選擇延安爲其主要根據地，並非純屬巧合。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夏，一個來自該省充滿戰鬥性格的民族主義者于右任，在一個「公民大會」的支持下，發動陝西省的自治運動。對國民黨言，此一行動兼具戰略與政治上的利益。孫中山曾於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一六年兩次向陝西請求援助，使陝西成爲廣州政府可能牽制北方一切政策措施的基地，廣州亦可由此基地，從後面消滅他們的敵人。



第五章　中國國民黨的興起

第一節　國民革命的背景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是軍閥亂紀達於極致，也是新興的革命運動重建中央政權的時候。革命的首要目標是尋求中國之再度統一，其次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此時，所謂愛國者就是指反帝國主義者。然而國內的政治情況却十分複雜，運用工農羣衆組織的社會革命曾有一絲成功的希望。但是，革命運動的領導人物，爲了某些原因，最後與社會革命背道而馳，限制羣衆組織，並藉著統一國家及反帝國主義兩大政綱，鞏固勢力。

就政治的過程言，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中期，革命運動的種子已在萌芽，經過兩年的高潮之後，才逐漸緩和下來。

就政治進展的階段言，國民黨得勢可視作一個新的政權最後取代了君主制度。條約國也承認這個政權，對中國主權之行使問題，允許作修訂。然而兩者之發展卻遭到部份阻礙。國民黨無法控制整個中國，革命所及之區主要是在城市；同時廢除治外法權也無力達成。一九二〇年代的革命運動就如同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的辛亥革命，也是一個不徹底的革命。

很不幸地，在中國境內，由於傳統的農村社會正加速崩潰，革命的種子也不斷萌芽。農村的生活面，舉目所見儘是貧窮及道德頹喪。據估計當時中國人口直線上升，在一九二〇年代已超過四億，甚至達於五億。然而農村的手工業經濟，卻受到外國產品之大力衝擊。機器化的紡織品、火柴、陶器、紙等出現，再再使農村工業，如棉織布業，爲之破產。農人如此貧窮，一方面貯藏穀物以改善工具與種子，另一方面盡量避免與高利貸者打交道，佃戶在華南地區似乎有所增加，但地價及物價也隨之上漲。同時天災叢生，例如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的華北大飢荒。投靠在軍閥之下的傭兵是依恃鴉片而生，因此供應嗎啡、海洛因及其他痲醉品的市場應運而生。貧窮、營養不良、盜賊，瀰漫了整個中國。總而言之，不管是精神或物質方面，對國民革命運動有力的因素正不斷在滋長着。

若說一九二〇年代的革命在政治方面的成就遠超過對社會或經濟制度的影響，是不足爲奇的。中國的再造運動，在前七十五年內，曾由各方面嘗試，可惜都令人失望。這種高度的挫折感困擾着近代中國每一位當權者，在一九二〇年代並且引起集團間的相互對立，無論是帝國主義者、軍閥、第三國際或國民黨，都只能有局部性或暫時性的成功。

由於這些因素在中國所造成的激盪，列強對中國的政策，不免受到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他們對中國無法提供解決之道。但是在通商口岸從事貿易的企業家，在內地提倡教育傳播福音的教士卻不可避免的要與中國當時的政治問題接觸。列強無力給予中國一個政治組織模式，或者示知如何管理一個新的開發中國家。外國人破壞了舊秩序，他們能幫助中國建立一個新社會嗎？這個問題構成一九二一年至

一九二二年以外交解決問題的基礎。

華盛頓會議與條約之修訂　列強的外交家大都希望中國能像其他國家一樣，發展爲一個穩定的政府。因爲在不平等地位之下所簽訂的條約總是具有償付的可能性。但是那些外交家與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對收復主權的問題卻有所爭執。更明確的說是，對收回主權的速度與過程之爭論更甚於目標之達成。然而與那些懷抱理想主義之政客持不同態度的外國人，因爲在中國擁有大規模的利益，所以仇視此種改變。一九二〇年代，他們由於不支持革命，乃成爲革命運動所欲打倒的對象。

關於中國問題在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華盛頓會議中被提出，此會由美國發起，藉以解決遠東之善後。除了標榜門戶開放的兩大政策，即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及維持中國行政領土之完整外，威爾遜總統又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華盛頓會議召開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欲壓制日本在戰時的擴張。因爲西方列強於大戰中無力與日本在中國的經濟擴張中競爭，以及防止一如二十一條所列，對中國之侵略；所以不得不在巴黎和會召開前與日本祕密訂約，承認日本獲取山東特權。基於這個原因，美國不肯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

華盛頓會議給予遠東穩定的局面與中國發展成爲一個國家的基礎，會議能够順利達成目的，主要是日本的妥協，願意自動放棄戰時既得之利益。遺憾的是和會不論對武力政策之束縛，或者對條款的實施，皆欠缺強制執行的效果，因此不能維持宣言中的決定。

探討此會成功的因素是，第一，英日同盟不僅對日本已無拘束力，也可能使大英國協捲入未來美日

之衝突中。因此英國不願再續約，但卻沒有新的盟約來取代。第二，關於海軍軍備之限制，這是本會的主旨。規定主力艦之噸量爲美五、英五、日三之比例；並且規定英美不得在新加坡以東或夏威夷以西建立海軍基地。第三，日本同意歸還山東及自東北亞大陸撤出其勢力。東北亞早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中期，布爾塞維克革命時，聯軍卽曾插手。特別是日本的軍隊佈滿了沿海各省、北滿及東西伯利亞。爲了還報日本的讓步，和會保證日本海軍在西太平洋之優勢。第四，簽訂九國公約，正式規定每一個國家都須尊重門戶開放政策，並且決定修訂中國的關稅協定與領事裁判權。

根據華盛頓會議的決議，日本歸還山東，英國歸還威海衞，但是關稅協定會議遲至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才召開。各國目標分歧與中國欠缺眞正統一的政府，是這任務失敗之主因。商談解決領事裁判權之會議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在北京揭幕，同樣地也沒有結果。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以後，在美國努力之下，曾召開包括英、美、日、法四國的國際會議，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結果也未成功。因爲日本銀行家反對，担心是否能夠收回早期的債款，尤其是高達十八億八千萬的西原借款。

總而言之，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是妨礙中國發展成一個國家的主因。而盜賊及軍閥的暴行危害外國人生命及財富，以及中國當局無力履行國際義務，減弱了對恢復主權的要求。因此中國內部的混亂，阻止了不平等條約之修訂。另一方面，英、美、日三國之間彼此沒有強固的聯繫。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美國所頒佈的排斥法案傷害到美日外交關係。同時英國因焦點集中在歐洲問題上無力關切遠東；至於法國因爲要求庚子賠款折合金法郞計算，而與中國起爭執，直到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才承認

華盛頓會議的各項條款。因此，修約之舉遲遲未決。

蘇聯與中國革命之接觸　一九二〇年代，蘇俄對中國的衝擊是屬於另一種型態，與列強的冷漠完全相反，他們熱烈地提供中國一個革命的模式。蘇聯的革命技巧與意識形態似乎是中國的愛國者建立新秩序的可行之法。這些是列強從來不曾做到，事實上，他們的政治方法與理論也不適用於中國。

早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前，列寧就曾建議，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支持亞洲的革命運動。根據共產黨的釋義，是藉中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運動來對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夏季第三國際召開第二次大會，列寧在「對國家與殖民問題」的演說中提及，因爲西方資本主義者利用剝削殖民地的廉價勞工與資源，繁榮其生活面，所以西方無產階級應該採取「側背攻擊」，與亞洲的中產階級抵抗他們的共同敵人。

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理論風靡了當時的世界，對於造成中國混亂的政治因素，他都給予一種屬於世界性的歷史意義。因此崇尚武力者卽可能被冠上「軍閥」之名，相當於舊社會中的「封建反動者」。在城市中的商人與中產階級亦被冠上「民族中產階級」，相當於歷史進化中的「資本主義者」。但是若採用馬列主義，將可超越資本主義而達於社會主義的階段。在蘇聯及中國，由農人協助而由共黨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統一陣線」必能成立，在此情況下，中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絕對可以打倒帝國主義，而無產階級也可從中掌握力量。當時列寧預測在亞洲的共產黨終有與「中產階級的革命攜手合作的一天，或者發展爲類似蘇維埃的組織，進而建立獨立政權。

這兩種理論都由列寧的繼承者所承襲。托洛斯基主張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組織，史太林則贊同與國民黨合作。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一個眞正的黨派必須是代表一個階級。托洛斯基對與國民黨合作一事有所爭辯，他以爲國民黨並不是一個黨派，是由農人、工人、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者組成之結合體。在這兩種政策的爭執下，蘇聯對華態度乃採取二元論，即與革命運動合作打倒帝國主義，或者是在中國製造階級鬥爭，建立蘇維埃組織。這兩條路的中間路線，則爲與「小資產階級」合作，對抗「民族資產階級」。

除了對革命運用彈性的理論外，蘇聯當局對華政策是一面支持門戶開放政策，也執行革命的顚覆工作。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加拉罕提出對華宣言，願意放棄沙皇時代在中國的特權，這個外交政策是由許多外交使節來執行，幾經磋商之後，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中東路由中俄共管，蘇聯對外蒙持有絕對優勢。因此，加拉罕大使的地位一躍而居列強之上，並且削弱了北京外交使節團的影響力。

同時，在蘇聯意圖顚覆下，第三國際派遣吳廷康及馬林來中國。其任務是促成中國共產黨成立，領導職工運動，並且與中國南北方各實力派人物，如吳佩孚、馮玉祥、孫中山等接觸。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由於蘇聯內戰導致經濟崩潰，迫使列寧發表暫時退縮的新經濟政策，表面上放棄共產主義色彩。這種並不過激的蘇聯形象，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影響了孫中山與其信徒。但是史太林與托洛斯基在蘇聯對華政策之爭論，直到列寧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去逝

後，才塵埃落定。

國民黨改組及與第三國際結盟　孫中山的個性，在執行革命任務的過程中，常常尋求結盟。譬如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的革命中，即與南方祕密會黨、日本志士、華僑、東京留學生，甚至各省獨立的軍政首領合作。在前此經驗之下，他慢慢摸索，尋求建立黨的組織，促使政權由軍政轉換爲利用政治約法來結合中國羣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國內局勢混亂，約法的理想被擱置。在早期國民黨採用西方模式的政黨失敗之後，孫中山乃有建立獨裁政權的計劃；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嘗試建立了以他爲中心的中華革命黨，結合經過選擇及訓練的中堅份子。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回到南方，仍然尋求利用黨的組織來爭取政權。此時恰好俄國的獨裁政權建立，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義大利法西斯黨也建立，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成功地進入羅馬，這是獨裁政黨成功的最好例證。此外，五四運動的狂潮，更鼓舞孫中山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有著手改組政黨的決心，他將國民黨改變成一個公開的政黨，並且在四年後建立了黨的組織。

就如同早期的革命運動，孫中山結納一批飽學且富經驗的人，再度成爲領袖，試圖動員一些激進的革命志士，並且建立總部，草擬國民黨黨章。這些黨章是經過起草委員們多次修訂而成，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公佈，改組則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完成。同時孫中山也正式採取聯俄容共政策，與第三國際結盟。

探尋聯俄的動機則有下列幾個因素。首先是華盛頓會議中，列強對中國提案之漠視，他們與北方政

府交涉，並不以平等主權相待，雖有九國公約之規定，却藉故遲延執行。日本的擴展野心遭到阻礙，但廢止治外法權工作則少有進展。孫中山對中國重建而尋求外國援助的宏大計劃，一直沒有得到迴響。事實上，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他向外交使節團要求使用關餘被拒後，列強居然在是年十二月派遣十五艘船至廣州示威。

同時國內的變化，亦使孫中山深感失望。廣州境內派別林立，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摧毀了他欲統一中國的北伐計劃，不得不撤往上海。陳炯明是位有民主思想及醉心新文化運動者，但是他具有獨立自主的地方軍權，致使國民黨無法視他爲國民革命陣營中可依賴之基石。

當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在桂林謁見孫中山之時，卽以他自己對新經濟政策的模糊概念向孫鼓吹。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一月，國民黨派出代表前往莫斯科參加會議，與華盛頓會議成對立之勢。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中期，第二屆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決議，遵守第三國際指示與紀律和國民黨合作，組織聯合陣線。後因孫中山反對而有所修訂，不以兩黨聯合的形態，准許共黨以個人資格加入，意卽由黨內合作代替黨外聯盟。這種改變，是馬林因孫中山之請而強迫中共接受第三國際的決議。李大釗是第一位允許保留共黨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接著陳獨秀亦以同樣方式加入，並在黨中謀得高位。其他成員也陸續加入。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越飛因與北京政府談判失敗，乃由北京飛抵上海，與孫中山直接會談，彼此同意，「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並且「放棄沙皇時代在中國

之主權，對中東路必須兩國之同意而整理，對外蒙，蘇聯無意實施帝國主義」。此宣言發表後，廖仲愷追隨越飛前往日本，學習蘇聯的制度。並且因蘇聯之勸，一九二三年八月孫中山派蔣中正赴俄，觀摩黨軍制度。

自從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孫中山成功地回到廣東後，在黨中開始引用共產黨員，並以精於技術指導的鮑羅廷作他的顧問。鮑氏是在九月的時候以蘇聯政府官方代理人身份，在加拉罕指派下到廣州的。他爲國民黨起草新黨章及設立學校和指導黨員組織羣衆之法。根據蘇聯模式，國民黨開始在地方建立黨部，從中選取代表組成省縣的執行委員會，然後再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黨中實行民主集中制，層層負責。

至於共產黨方面，雖然遵守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第三國際四次大會的決議，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獨立的組織。以中共組織部部長毛澤東爲例，他曾與國民黨之忠實黨員胡漢民共同處理兩黨合作事宜。但是擁有千名左右的中共份子，因國民黨對他們的嚴密控制而反對與之緊密結合，最後毛澤東辭去其職。此後中共極力推動他們獨立的工人聯盟組織。中共的雙重政策是，一面在外面發展羣衆組織，一面企圖控制了國民黨內部組織。

孫中山是因著自信與經驗，允許中共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因爲他看到社青團中，學生高效率地發展地方性農工組織，加上當時中共絕對無法與國民黨的勢力相抗衡。儘管據說列寧認爲他是一位天眞、純潔之人，孫中山確信國民黨須與中國之主要伙伴蘇聯交善，但絕不能被中共所愚。假如中共不守

國民黨紀律，必要時開除黨籍，若蘇聯反而支持他們，孫中山將與蘇俄爲敵。

國民黨理論之發展與黨軍　隨著新黨的建立，孫中山需要新的革命理論，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以後，他以自己一些體驗，完成了心理建設的理論，這含有「知難行易」之意識形態，承認前此對革命缺乏理論基礎。他也寫了不少關於物質建設的計劃，以中國境內的國際發展爲題，刊登在英國報章雜誌上；主張利用外資、開拓廣大的鐵路網及其他方面。孫中山的心目中並不接受列寧所主張的，資本主義必轉成帝國主義的說法。他只是把資本主義視作一種政治壓力而已。他贊成被壓迫國對抗壓迫國之鬥爭理論，但是反對國內的階級鬥爭。爲應鮑羅廷之請求，國民黨採取了一些形式上的理論，提出三民主義的主張。

一九二二年至二四年冬，由一些零散的演講中可知，此時所謂民族主義已由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排滿而轉爲強調反帝國主義。它包括兩方面，卽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國民族自求解放。民權主義，意指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他所強調的觀念是「政府好比是機器，而人民則爲工程師」。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權，實際上在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實施。民生主義最受人誤解，他拒絕階級鬥爭理論而採取亨利喬治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說法，由此看來三民主義的理論對社會主義不太熱衷，更違論馬列主義。

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中的核心問題，毫無異議的能够達成。雖然他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相似處，但是對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的崩潰、國家衰退的歷史唯物論，仍然不改變其一往的主張。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他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並發展農工組織，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來被中共闡揚爲「三個偉大的政策」。

和黨的組織與意識形態同樣重要的是黨軍的建立。廣東的革命政府是以打敗北方軍閥完成中國統一的願望而結合的，因此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十二月蔣中正自蘇俄回國後，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即決定建立黨軍學校。六月，在黃埔開訓，學生四百九十名。蔣是校長，廖仲愷負責行政。六個月一期的黃埔軍校，教師皆爲中國人，部份曾至日本受過訓練，其它則是來自留日軍官建立的保定軍校畢業的學生。中共代理人周恩來負責政治教育部門，中共企圖滲入其中，但未十分成功。第一批俄製來福槍八千枝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十月抵粵，不久，前兩期黃埔畢業生形成國民黨黨軍，最主要的訓練目標是爲孫中山的主義而戰。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五月，蔣中正成爲總司令，使軍隊成爲革命過程中之要角。他深知這批黨軍是得勢新鑰，此乃孫中山一生所追求的。

自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之後，他即被尊爲國父，（譯者按：孫被尊爲國父，是民國廿九年的事）並且成爲革命潮流中之主要人物。他的理論叫孫文主義，依照他的主張，七月一日國民政府由他的繼承人之一的汪精衞主持下成立了，此時亦即是國民革命發展爲羣衆運動之時。

第二節　中國國民黨之得勢

工人組織與五卅慘案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夏天，佔優勢的國民黨與小規模的中國共產黨皆

有一個發展的機會，因爲這是反帝國主義愛國份子與反資本主義之勞工結合的時期。這些運動實際上都有它產生的背景。自五四運動後六年內，不管華盛頓會議解決的方案如何，愛國份子仍能看到列強在中國依然繼續享有特權。例如，日本關東租借地與南滿鐵道控制南滿，當時南滿鐵道與在英國佔有下之開灤煤礦壟斷中國最大礦源；天津租界由英、法、日、義四國人控制；公使館衞士依然列隊穿過北京城；上海在英人控制下；南方貿易由香港掌握；外人控制關務、鹽務，關餘則用來償付外債；外國船隻穿梭於湖南、四川間；許多現代工業是由外人投資壟斷。

全國各地任何中等學校學生對身爲次殖民地之恥辱，都耳熟能詳，這是在華北、華中、滿洲的軍閥無法改變的事實。當時在中國各大港口，如上海、廣州、香港、武漢、天津等地，反帝國主義運動隨處可見，這些地區，勞工階級是密集的聚集着，他們很容易與反帝國主義的愛國份子相結合。

在中國，工廠工作的最大弊病是對勞力的無限需索，一般工人，一日工作數達十二小時，少有休息之日，不純熟的農人，工資是按工計酬，童工、女工也被利用，做了母親的女工常把嬰兒放在紗廠滾燙的熱水爐下，種種情形都威脅到工人的健康；尤其是勞工階級與外商、領班時常衝突。這種情形與一百年前的歐洲有相同之處，這是中國勞工運動的推動劑。

當然，現代勞工講求新形態的勞工組織。中國傳統上手工藝組織及雇主仍然控制工匠及學徒，若有勞工的結合卽遭壓制。然而，同鄉會或會館皆以省籍爲標準，祕密會黨此時已不適宜再領導工運，譬如上海最有權勢的青幫、紅幫不過從事鴉片走私、犯罪及不正當的工作，無法從下層社會中躍居領導的地位。

隨着現代工業的成長，勞工互助團體也跟着建立。其中大多是屬於礦工和鐵路工，雖然最早的組織是一九一四年在國際船舶上成立的海員工會。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據記載約有一百五十次的罷工，因爲純屬無意識的經濟保護手段，組織上過於鬆懈，皆告失敗。隨着五四運動的罷工風潮，一九一八年至二一年間，產生了較好的組織與勝利。從此以後，不論是無政府主義、國民黨及其他黨派，在組織上都因中共所領導的勞工運動而黯然失色。一九二〇年代，敎士、信徒、工人和國際勞工組織皆試圖糾正並揭發中國被剝削者的勞工階級之痛苦，而共黨却已悄悄地主掌了工運，並利用勞工來達成軍政行動。

第一屆職工大會在中共指導下，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四月於廣州召開。無政府主義者、國民黨、及其他地區的工會並未列席，或者進一步組成全國性、有政治趨向的勞工組織。但是不斷的成功却隨中共的努力而來。譬如毛澤東在湖南的同學劉少奇，在兩湖及華北鐵道沿線成立工會，但當一九二三年二月平漢線工人罷工時受到吳佩孚的血腥鎮壓。革命運動運用工運，要到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容共時才加以重整與協調。

此時隨着外國通商口岸建立，外國工廠紛紛建立，軍閥與外國勢力似乎有所關聯，軍閥與帝國主義結合被視爲互相勾結製造罪惡。國民黨與共黨都目睹此二罪首，視之爲民族國家之敵人。中國企業家更反對外人在通商口岸作貿易競爭。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前期，上海的罷工，與日俱增。同時中國商會亦抗議許多法規及上海市議會由外人控制。

當英國警察在五月三十日於南京路射殺十三名示威份子後，引然全國性的示威、罷工、排斥外貨。六月二十三日又爆發沙基慘案，此路正面對沙面領事館，共射殺了五十二名中國人，造成長達十五個月的騷動，並對香港實行抵制，造成英國在華南貿易上的嚴重損害。

總而言之，這些糾紛，是由小小意外造成，却給學生與各階級人士一個很好的機會，而共黨正好利用了它。年輕的狂熱份子成爲工運的核心人物。因此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間，中共的人數急遽增加，他們有希望掌握城市中之工運。

北伐與國共的分裂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是國民運動之肇始，它激起革命的意志，首先統一廣東的游離部隊。照當日的說法，所謂左翼，成爲重要份子，它在中共與右翼間，維持一種不穩定的均勢。

當時廣州是由左翼中的野心家所操縱，右翼面臨著中共急速發展之壓力，乃在各國外交家前公開他們所選擇的另一種立場。以孫中山先生的夥伴之一戴季陶爲例，早期醉心馬克思主義，而後轉爲馬列主義，但此時他主要的目標是反帝國主義，認爲國家的利益應勝於階級之福祉。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中期，他便提出國家統一，須結合各階層的反帝及反共力量。這個觀點足以與當時歐洲的反共主義相提並論。因爲中共的分化計劃，使一部分人覺悟，嘗試反共。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八月，左翼領袖廖仲愷遭暗殺，十一月凡屬重要的右翼份子皆離開廣州，後來被視作西山派。他們在北京孫中山先生靈前召開會議，決心反共。

對中共與第三國際來說，掌握黨的路線，抉擇有些困難。要斷然與國民黨分裂，冒着被國民黨壓倒的危險？還是與國民黨繼續合作，利用左翼打擊右翼來爲共黨造機會？隨着局勢的發展，中共逐漸在勞工運動中培養獨立的力量。一九二一年後也開始有農民組織，如在廣東的海陸豐。毛澤東也在湖南展開農運，但是後來史太林認爲羣衆的趨向仍贊成國共聯合陣線，因此繼續與國民黨合作。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召開二中全會，左翼控制全黨，共產黨員掌握組織部及祕書處，中央執委會中有七個名額，這種安排是汪精衛與蔣中正所認可。此時黃埔學生已擊敗廣東小軍閥，但在香港組成的工運却落在中共之手，並且在廣州擁有武力，形成政府中之政府。國民黨的組織及羣衆組織中，他們的影響力是與日俱增，甚至接管了海軍。所以可以明顯地觀察到，蔣中正爲了自衞在中山艦事變中，將一些共黨份子與蘇俄顧問驅逐。同時又表明廣州政府與蘇聯合作之誠心，並在說服鮑羅廷繼續支援國民黨武器之後，他輕而控制了左翼及共黨。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夏季，蔣中正力倡北伐論。此時共黨的路線再度引起爭論，是否應該與國民黨合作？答案仍如往昔，究其因是史太林欲藉著與蔣中正的合作來抵抗托洛斯基，一如蔣中正想藉中共及蘇聯之助來完成北伐。

實行北伐，打敗軍閥，完成中國統一，這種思想脫胎於孫中山。用意有二：即一方面脫離廣東的地方鬥爭，他方面是增加政府稅收。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七月，在蔣中正領導下，揮師北上，這是一支包括六方面的軍隊，其中有一軍是由黃埔學生組成，由何應欽指揮。北伐的進展十分迅速，國民革

命軍是一支受人民愛戴的軍隊。抵長江時，已吸收了三十四個分屬軍閥之下的部隊，可是其中只有一團在蔣的控制下，而中共也無法在軍隊中生根。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離開廣州遷到由左翼控制的武漢，此時蔣中正面臨極大的威脅，三個中共黨員依然高居黨中要職。十一月第三國際在莫斯科開會，史太林仍然訓令中共，保持寄生在武漢政府的左翼中，此一政府宣稱是由工、農、及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並且企圖將右派份子逐出革命陣營之外。他們繼續採黨內聯合方式，服從武漢政府，並且儘可能不搞農民運動，不建立獨立的軍事力量。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春，北伐軍在華中獲勝時，國民革命也進入一個新階段。軍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為軍中全面性的反共風潮加速造成國共分裂，首先是蔣中正與右翼合作對抗左派及共黨，然後左翼拋棄中共，最後加入右派的行列。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的政局，是蔣得勢的重要關鍵。他在江西南昌建立本部，並掌握長江下游的米倉區及上海的工商業。四月六日，北京當局搜查俄使館，得到許多意圖顛覆的證據，李大釗等人被處死。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由蔣總司令會同外國人，運用一連串手段，摧毀中共的軍事組織。四月十八日蔣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並與武漢成對立之勢。他所控制的地區，工運無法立足，但與蘇聯依然維持良好關係。

在這事件中，武漢左派終於醒悟，六月開始淸共。鮑羅廷、宋慶齡及一些左翼份子一同前往蘇聯。八月一日由中共領導的南昌暴動終於發生。蘇聯將中共在中國之失敗，都歸罪於陳獨秀，指責他是機會

主義者。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二月，毛澤東發動兩湖秋收暴動，但隨卽被鎭壓。八月十一日的暴動也告失敗。因此中共轉爲地下活動，威脅華南地區。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五月毛與朱德會於湖南、江西邊界之井崗山，與蔣中正的力量相抗。

因着中國銀行家、上海商人之資助，蔣及右派左派言和，並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軍閥雖然未完全被翦除，但中國已有統一的趨勢。更重要的，有了中央政府後，乃專心建立民族國家並重建國家尊嚴。

列強與革命　列強對中國境內的局勢是採取謹愼的態度。雖對中國政治頗具影響力，但基於外人在華生命財產之安全，並不偏袒任何一方。在反帝國主義下，他們採取了一些讓步；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是排外運動極盛期，敎士退離內地，國際方面遣了四萬士兵據守上海。五卅慘案後，上海市議會中，中國議員名額增加；城市公園也爲中國人民開放，上海的會審法庭，在一九二七年由中國地方法庭取代。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列強同意在粤海關征收附加稅。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中國收回漢口及九江租界，當國民革命軍於四月二十四日抵南京時，射殺了六名外國人，英美列強列陣以待，但是最後顧慮及中國民情之激憤，方以和平方法解決。

英國在中國是居列強中之要角，往往採取防衞性的態度，可是一旦中國出現強有力的政府時，則表現出願與中國商議廢止不平等條約。美國國務院亦如此，不爲布爾塞維克所迷惑，同時拒絕接受上海外人社會傳言，中國反外運動是蘇俄陰謀的說法。他們等待中國統一政府之出現，事實上，列強對革命運動之阻礙並不太大。

第二次北伐於一九二八年春再度揮師，六月入據北京，易名叫北平，當時的首都叫南京。美國首先同意簽訂關稅協定，七月承認南京政府。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底，國民政府已得到大部分國家之認可，而後張學良所佔據之東北易幟，是年底，中國終於統一，表面上達成這個目標，實際上，日本與蘇聯仍控制滿洲的局部地區。

由新一代的歸國學人領導下，國民政府努力從事國家統一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外交部長王正廷的主要任務是對外收回主權。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南京頒佈民法、刑法時，治外法權才告收回。廢止治外法權的磋商使中外關係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關稅協定才成立，收回稅務機構、鹽務機構與郵政機構。外國租界從三十三個減爲十三個。這種蓬勃的國家主義之外交政策，隨着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日本對華侵略而削弱。中外需要合力抗日，外國人是基於保護外人在中國之生命、財產安全，尤其如上海等重要地區。

一九二七年到二八年間，列強一如以前在一八六一年、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時一樣，偏愛秩序，接受够穩定政局的政權。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列強在國民黨對抗共黨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由另一方面言，列強對中國的興趣依然濃厚，他們急切與組織南京政府的銀行家、政治家和軍人合作。與其說在外交方面，不如說在修訂的條約下，參與中國各種事務。上海是北伐時期的戰略中心，所以國民黨與帝國主義合作，對外宣佈保護外僑在上海之特權。因此列強的外交家對中國內戰保持絕對中立與不干涉主義，當南京面對着日本侵略之時，反列強運動已不再那麼尖銳了。由中國與列強，特別是英人、美

人、法人、加拿大人依然保持暫時利益的合作情形可以反應出，外人仍參與中國生活的各方面，保有醫院、銀行、貿易公司及投資事業。

一種很落伍的想法，由一九四〇年代回溯一九二〇年代之政局，無疑的對這時期仍以歷史色彩來解釋。例如，學者首先著重研究國共衝突，遠超過此時期的軍閥、國民黨崛起、及它的成就等其他方面研究。

總而言之，回顧一九二〇年代，第三國際沒有成功的希望。在城市中組織勞工，像在歐洲一樣爲了爭奪政權，是一種冒險的行爲。這些城市，都被國民黨與列強牢固的控制著。國民黨擁有軍、政、商、工各方人才，造成一個新的領導階層，它能够領導歸國學人，運用由華僑和各省地主得來的資金，並掌握軍隊。反觀共黨却無法控制城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黨軍，同時他們亦無法控制國民黨。第三國際給了國民黨蘇俄模式的組織，很難推翻它。一九二〇年代，農民對政治依然保持保守被動的態度，加上中共勢力薄弱，在在使共黨不能成功。

由國民黨與蔣中正的勝利來看，可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即政權的依賴主要是來自軍隊和工業支持。成功之後，却未能爭取農民支持，此一支持對軍隊之來源必有所助益。當時三民主義對青年學生及農民似不如馬列主義那麼具有吸引力。國民黨的信仰是國家統一、收回主權。對外反帝國主義，對內反階級鬥爭，這是當代的觀點，不若共產主義激進，因此，在城市及地主階級中獲致成功。簡而言之，整個中國，甚至領導階級，在一九二〇年代對極權主義之運用及革命力量之發揮上毫無準備，可是二十五

年以後却成爲可行的。

第三節　南京政府的黃金十年

雖然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距今很近，但要瞭解歷史眞相，當代日本的紀錄卻遠較中國爲多。南京政府時期，由一九二八年北伐統一，到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這十年是很特殊的一段時間。在此期間，中國原本可完成部份西化，但不幸却捲入了內部問題。這十年，史太林在蘇俄崛起，經濟大恐慌發生於美國，納粹在德國興起，因此日本侵華之舉並沒有引起世界之視聽。而南京政府呢？也在下面三種影響力下左右爲難。第一、日益擴大與西方的接觸對全國人民生活發生了影響。第二、日本蠶食中國。第三、中共在鄉村鼓動風潮。

當時國民政府顯得極端矛盾，它既不能行民主，也不能行極權；既不能行社會主義，也不能行資本主義。這個政體看起來是介於現代西方與古代中國之間。南京政府的雙重性格，是許多新興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共有的現象。舊的政治傳統被擊垮，但新的西方政治模式，還未能適應，乃造成領導者須兼顧二者，事倍功半。

這個時期的中國之另一種特色是，政治現代化與經濟發展過程非常緩慢，規模亦小。縱然是在南京政府執政十年的末期，有四、五億人口的中國與有兩千五百萬人口的西班牙相比，公路總數相等；鐵路哩數遜於義大利或美國伊利諾州；電報線只及法國三分之一；工業產品不及只有八百萬人之比利時；其

他工業技術方面也一樣落後。簡而言之，現代化實在很表面化。

這種情況，中國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非西化不可。因爲日本是敵國，而蘇俄的工業化模式還未能達到出口程度，都不足以爲中國提供第二條路。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的中國，從一般人的識字率到專門技術，都無法使國家獲得發展，因爲須做而未做的事太多了。

由中國政府對西方模式之依賴，造成西方與南京間的共同利益，足以解釋這個政權表面之特徵。因爲受過西式教育的官員，自然地把他們在國外所學貢獻出來，而他們的努力反映出一個工業國家的行政制度、科技及人生價值觀，當然農業落後及農人不滿就不是重要問題了。因此南京政府較注重對外貿易、現代金融、交通及通信事業，反而疏忽了命脈所繫之腹地。這些具有現代心態的官員，很少關心農村，國家以對外出口爲本，而不依靠農村的穀物及稅收。中央當局的情況與清朝以前一樣，現代化只是皮毛而已。在某些方面，南京當局對外的接觸，要比對農民還多，因此使得廣大的農民羣衆，落入軍閥與地方舊勢力之手，尤其偏遠地區，情形更爲嚴重。

很明顯的，以這種方法來克服南京政府的缺點，不如面對重要問題，並設法來解決。

蔣中正與國民黨的當權　蔣中正及國民黨所以掌權，是因爲滿淸政府瓦解後的十五年內，中國政治仍然需要一位最高決策者，這不是集體領導或憲政分權所能提供的，國家所面臨的兩大問題，即安內（軍閥）攘外（抗日），所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領袖，這個任務非蔣中正莫屬。

蔣中正是一位愛國主義者，具有高超意志力，政治反應精明，但是也有一些知識上的限制。他早年

生活在地主社會的浙江，對曾國藩相當崇拜，在日本士官學校培養了武士道精神，並在軍閥政治時期閱歷了軍事的越來越重要。他在蘇聯學習了軍事組織，但沒有學到羣衆運動，他不相信羣衆的力量足以與軍事力量相抗衡。無論如何，他面臨了執政者的共同問題，即如何能維持政權於不墜。面對着一些爭權奪利的人，在人事安排和其他權力分配方面都需要巧妙地支配。他的兩項做法是，維持最高的統治權，並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因此對工業及經濟發展的問題列爲次要，對農村重建及農民運動等問題亦無暇多顧。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蔣中正與宋美齡結婚。宋爲衞理畢業，同時也是宋慶齡的妹妹。與宋美齡結婚後，蔣成爲一位基督教徒。經由宋子文及孔祥熙的關係與西方建立極爲密切的接觸。因此他以這些受美國教育的人担任高階層財政職位，並引用受日本教育的幕僚担任軍職。

除了繼續增加軍事力量外，他在黨內主要問題是，如何由一個局外人的地位，來和國民黨元老相處，特別是在左翼的汪精衞與右翼的胡漢民之間。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中，胡漢民支持南京一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三年之間，由於胡漢民合作，使汪精衞的野心不得逞。後來汪、胡二人一度聯合，但當前最大問題是抗日，軍事領袖是不可欠缺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蔣汪之間取得協調。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胡漢民去世，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蔣成爲黨魁。曾自認是孫中山之繼承人的汪精衞，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一次暗殺中倖存，在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投歸日本。

此時蔣委員長已成為黨、政、軍之最高領袖。蔣先生以黨、政、軍三權制衡，藉以排擠地方勢力或反對派。軍隊的軍官以黃埔畢業學生為主幹（在革命中已陣亡半數），黃埔軍人分據軍警要津，可用來排斥廣西派軍人與其他的地方勢力。

在黨內，黨工組織由陳立夫、陳果夫兩兄弟領導，並設立了「中央政治學校」以訓練忠黨人才，這些人才日後可在國民黨之祕書、軍事、財政及警察等機構服務。與他們對立的是政學系，這是一羣由政界財界有關的政治家與銀行家所組成的散漫組織，承襲自梁啓超的研究系。雖然黃埔系與二陳派都有熱烈的民族主義及反共思潮，但是他們的國家社會主義目標却十分明顯，他們在下層的軍事和政治上步調並不一致，但在最高階層他們都效忠蔣中正的領導。

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雖仿效俄國模式，但對黨員並沒有達到如共產極權般的控制。不包括軍隊在內，黨員約有兩百至四百萬，政黨組織結構以代表大會為基礎，但是同時已可以看出逐漸增加的人數與政黨之集權中央成反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召開，有一百五十位參加。至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第六屆大會有六百位卓越之士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成立，初時有委員二十四名及十七位候補。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有兩百二十二位委員及九十位候補。同樣地在中央監察委員會中人數也有增加。以前中執會每年只開會兩叄次，後來又增設常設委員會作為權力中心，開始時只有八人，後來也增為五十人，而且幾乎每週都開會。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蔣中正成為總裁後，獲取中執會之否決權，控制了執監會。黨內沒有反對派，而且有一種

傾向，即黨內的重要職位的安排都由黨領袖決定。

國民政府是由黨控制而非由人民控制，在一九二八到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間的訓政時期，指導國家政治的政治會議只是黨中執會的附屬機構。黨中的許多部門，如組織部、海外部、社會部、宣傳部都成爲黨中央的一部份。這段期間黨團機構與職權混淆不清。以歷史眼光來看，中國首次嘗試政黨政治，事實上反映了很多舊式色彩，即軍政兩方面在最上層結合在一起，領導人是由一個具有法律權力的政黨選出，並且得到各階層人士公開或祕密支持。

與政黨組織相對待的，是政府組織。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形成南京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其中行政院的職權最大，具有十二個部門。相反地立法院就缺乏國會的特性，沒有經濟、財政的控制權。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八年，孫科任立法院長時，擁有八十名左右的委員，全爲黨領袖所指派，其中有些是掛名的，並沒有眞正執行立法權。採三級制的司法院及想在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建立新監察制的監察院，也不具獨立性，無法發揮其功效。考試院在十六年中經由考試錄取了八千位公職人員，但是這些人僅佔官僚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也許這些部門在太平時可發揮作用，但事實上，在五院之下的文人政府是與軍事機構平行的，且軍費總是花費了國家大部分的稅收。

國民黨武力的成長　由於日本入侵，以致引起中國偏離了主要問題。國民政府把建設的重點放在國防上，以致許多內政問題不能及時解決。日本投降之後，國民政府的建設仍然以軍事爲主，他方面建樹較少。中國被日本所逼，走上軍國主義之途，而忽略了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西方的影響，也喪失了以溫

和的、漸進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機會。要支持此一論點，必要了解蔣中正是一位軍事政治家。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後，南京政府注意於統一事業與國家發展，而摒棄階級鬥爭。國民黨與工人聯盟而與左派聯盟競爭，但農人組織卻較少。國民政府沒有運用廣大的農民羣衆，來對抗殘餘的軍閥及地方勢力。

這些在北伐的進程中是顯而易見的，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四月到六月時，蔣中正以北伐軍總司令，統領四軍，各軍實際上是由廣西的李宗仁、山西的閻錫山、醉心蘇聯制度的基督將軍馮玉祥與蔣先生自己負責。閻、馮有他們自己的軍隊，而李宗仁亦有自己的地方權利集團及重建省的計劃。北伐完成後，爲了和平重建工作而裁汰過於膨脹的軍隊，此項工作並未達成協議。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的中原大戰，汪精衛加入了馮閻集團，進行倒蔣。這次戰爭由於得到滿洲張學良的援助，南京政府才獲得勝利，但基礎並不穩固。只要軍閥的觀念不死，軍事統一是絕對不可能的。國民黨中反蔣的大本營在廣東、雲南、四川、山西、新疆及其他各省，對南京的態度只是口頭聽從而已。到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爲止，共黨已在江西、陝西策動農民暴動。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以後，在滿洲的日本人已於東北、熱河及河北北部部署軍隊。一年復一年，中央政府的力量必須藉著國家統一的名義，與地方勢力妥協。

坦白地說，一九三〇年代以後，軍國主義仍以地方勢力爲主，這是政治組織的基本模式。南京控制了經濟條件最佳的地區，即長江中下游以及主要的口岸（大連除外），佔有絕對優勢，但必須與在南方、西南、西北、北部、東北的地方勢力相抗。南京政府的勝利，是由於蔣中正之領導。在他領導之下，富

於俄式黨軍色彩的國民革命軍之建制，並不是被國民黨控制，而大半是由他所指揮。

國民黨組織越來越龐大。一九二八年到三一年間，蔣中正是政府領袖，他將軍事置於軍事委員會之各部門下。當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底，由於黨中反對者之緣故，被迫解去委員長之職，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六年繼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在這之下有各種持續之成長。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蔣驅逐蘇聯軍事顧問，轉向德國，採用與日本相似之德式軍事組織。因此國民黨之力量和政府平行，獨立於政府之外，換言之，立法也無權干涉。軍事幕僚是獨立自主地，與行政院之下的陸軍部門不相聯繫。（一九三○到一九四○年陸軍部是由何應欽負責）蔣主席與他的部下完全控制軍事委員會，藉著軍事上的目的，建立許多經濟政治部門，最後並設立了十五個特別的訓練學校以及中央軍事學校。這些機構是有巨大的官僚體系，多由黃埔畢業生來掌理，而政府稅收他們也可依需要而調整。從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以後，蔣中正的軍事剿匪司令部也接管了由共黨地區收復之省級地方行政，在許多地區，取代了黨與政府的地位。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經由前德國司令希克特將軍（Von Seickt）所計劃之德國軍援已開始。這位將軍主張建立一個高水準的軍官團，組織劃分清楚，命令亦能統一。凡福克豪森將軍（General Von Falkenhausen）則敦促建立一個軍事工業化基地，當然一切要援用德國裝備。中國一支最精銳的軍隊此時建立，人數由八千人發展到三十萬人。因此位於上海與南京間的長江三角洲之安全被強化，並且建立了以生產德式武器爲主的兵工廠，雖然德國專家在許多方面的計劃完全以第一次大戰之幻

象的壕溝戰、城堡戰爲主，他們的軍事理論並非針對與農人合作或者是第二次大戰中的焦土戰術。

地方軍閥的存在與日本對華侵略是促成一九三〇年代中央政府軍國主義產生的主要原因。軍國主義的形成，就像一種定律，因著傳統的軍事目的，爲求自保再求以力量統治；它對中國社會的長期經濟社會需求而言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南京政府與經濟　南京政府十年，其經濟成長之主要模式是來自極權主義程度不一的德國、蘇聯和日本。然而一個未開發的國家是無法期望將國家資源作同等的運用。雖然也嘗試有效預算與審計，但是由於無法控制軍事力量，進而更無法控制它的財政，以追求發展之計劃，更遑論發展國家經濟了。國際聯盟曾在公共衞生的工作上，給予技術援助。在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的刺激下，南京成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嘗試開始並調和發展，但却無大成就。經濟成長可能靠國外援助之刺激，但是那時的美國持著孤立政策，只關心自身的經濟蕭條與新政之施行，而且尚無援助他國政府從事規劃的觀念。

財政與政府有密切的關係，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二十多家外國銀行仍然在通商口岸大行其道，經營對外貿易，獨佔外匯交易。甚至發行他們自己的銀行券，而且還爲中國政客、軍閥、投機者及商人提供私人資金的信託服務，有時他們在上海庫藏有一半之銀根，銀是上海商界交換的媒介。其中最大者爲香港及上海銀行。一八一四年時資本爲港幣兩百五十萬元，至一九三〇年代已增至兩千萬，準備金爲一億，資產達一兆。當時，上百家包括國有、省有及私人的現代中國銀行，發行大量貶値的銀行券，以

應付短期商業交易或貸款給政府機構，但關稅與鹽稅却是用來償付外債的。

因爲革命之緣故，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於廣東建立了中央銀行，宋子文爲經理。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在上海改組，成爲發行政府國庫券之銀行。同時中國銀行亦改組爲管理外匯貿易，如同日本於一八八〇年代建立橫濱正金銀行以對付外國銀行。交通銀行也加以改組，協助運輸與工業發展。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成立中國農民銀行，以融通農業信用。總之，不管它們的功能如何，這四家銀行都發行鈔票，並且嘗試著重複其他各家的功能以形成四足鼎立的中央政府銀行。存款增加了幾乎達五倍之多。至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佔了全面銀行五分之二的資本及準備金和超半數之存款。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以前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完成了一項財政改革，即關稅自主權之恢復，關稅收入擴增，外債內債的重新調整，並廢除銀本位制。這些改革帶來經濟的現代部門及擴大資本，如此信用歸政府控制是可能達成的。自從一九三三年，美國發展購銀計劃後，很不幸地又從中國吸收了許多銀幣。而中國自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自衞性的貨幣改革，也使得國內舊銀幣不能作爲通貨，而代之以紙幣。這次改革，得到英美兩國支持，促使政府統一，並管理金融之準備金以控制貨幣鈔票的發行。因此它能逐漸地將這些銀幣形式之準備金改變成以外匯形式保存。其目的是使外匯國家控制化，穩定中國貨幣的國際價值，建立超然於外國的銀行制度。結果這四家銀行所發行的貨幣鈔票替代了銀幣及其他銀行的貨幣。一九三六至三七年中國因此沒有通貨膨脹的現象。

這些財政上的發展，緊跟著是城市中他方面的現代化，諸如銀行分行，銀行間的合作，工業金融長

期流通，銀行家協會之組織，但是由事實證明，卽使透過信用合作，甚至一九三七年建立了農業信用局，也不可能有效地提供農業人口所需要的資金。郊區銀行之信用是便利季節性短期需要，非長期性生產之投資，其目的是與高利貸者爲敵。許多郊區規劃複製成藍圖，其中有些已付諸實行，包括土地開墾、森林栽培、灌漑、水土保持、疾病控制、種子改良，還有穀物和動物飼養等事。美國式農業拓展工作被引進中國，但却沒有不斷地創造全國性的增產。

由公共財政顯示，南京政府的活動是集中在通商口岸的經濟部門。一部份原因是南京政府將田賦留給省級政府處理，因此在它原本就無法控制之領域下，不如放棄以博德政之名。放棄曾爲多數王朝主要財源之稅，象徵着南京有避免騷擾農村的趨勢。取而代之的，國民政府由關稅方面獲取了總稅收達半數以上之收入。另外，透過重要產物之統稅，如香煙、煤油、麵粉以及獨佔的鹽，對消費大衆課稅。因爲沒有徵收所得稅，這種負担便落在一般消費者身上，便減低了大衆的購買力。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中央政府之收入兩倍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對進出口的關稅更隨時調接以利貿易和工業。事實上，政府是依賴近代經濟規劃而生，理論上，它必須嘗試所有方法來謀求發展。

經年的赤字，南京政府乃向四個官家銀行借款，大約佔政府支出額的四分之一。這四家銀行輪流地向國內市場抛售公債，其中債項支出很快地超過對外國貸款之支付。這些債務的花費大致佔所有支出的三分之一。國內公債持有者，包括南京官僚，他們經常獲取甚高的利率。如此供給國內某些人的不當得利，無疑的此椿事比起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以後，被列強奪取巨大賠款來說，是較不可憎之事。

然而南京政府的政策並不是計劃增加國內外貸款之生產力，只是達到一些長期工業成長所需的儲蓄與投資。國家的資本並未被善用，因爲有效資源主要都被用來支援軍事或者有利於官僚的資本主義。後者可給予歷史定義，即近代傳統貨幣之操縱者，他們利用官方的關係，獨佔發展計劃高利貸及資產之投資，而不是投資在生產力上。

運輸方面的進展可能大於工業方面，自從第一次大戰以後，收回許多鐵路。這些鐵路的設備資金，當時有一部份是利用英國所退回的賠款。結果中國資源融通地方上的建設，避免外國對線路的控制以及投資於債劵。鐵路總哩數由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的七千七百公里，至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增加到九千八百公里，縱然當時有三分之一是在滿洲的日本人控制中。國民政府完成了粤漢及京贛鐵路，並舖設了達六千里長的公路，便利了橫貫整個中國的公車線路。可是與四川的聯絡仍賴帆船與汽船，而且中國輪船中五分之二仍隸屬於英國。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代早期之緊縮與經濟蕭條後，到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中國的經濟才轉爲較富有動態。三十年代，使用中國勞力而發生於日人掌握下滿洲的工業化，使南京經濟相形見弱。

文化生活與美國影響　生活在反叛鎮壓及日本侵略陰影下的一九三〇年代之中國人，他們認爲自己是五四時代智慧的一羣，可區分爲改革派與革命派，前者代表者是一些致力於科技研究的學者，後者之典型是試圖產生社會文化革命的作家，後來這批人逐漸與左派靠攏。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在文藝圈中，魯迅成爲一位重要的角色，他鼓舞年青作家從事寫作、揭露政府在言論出版上的檢查及迫害左傾作家的情形，並憐憫下層階級。他可以被視爲左派之典型人物，在「對的文學作品」中，他提到「佳作絕不是在他人指使下的作品」。後來因爲政府的越權行爲，使他在感情上傾向共產路線。雖然他不是共產黨員，却在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被說服而加入由矛盾及五十位作家組成的「左翼作家聯盟」。此乃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創造社被禁後，所出現的一個象徵著共產黨在文藝圈中崛起之既大且新的組織。雖然魯迅在聯盟中是一位卓越的政論家，瞿秋白却是領袖，他提倡白話文以及文學大衆化。

矛盾是左傾陣容中之著名小說家，由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蝕」中之女主角，可反映出當時青年人對革命的狂熱和北伐時對革命的幻滅，理想現實間之掙扎、愛與責任之衝突、野心與良知之矛盾，以及假自由之名所行的獨裁與專制。

一九三〇年代的小說家也包括無政府主義的巴金。他的筆名是採自兩個譯名的前後音節，巴郎巴枯寧，金郎克魯泡特金，深受屠格涅夫及其他蘇俄作家影響，著名的作品是「家」、「春」、「秋」三部曲。敍述一位中國青年的體驗，對家庭制度、婚姻、貞愛之挫敗與爲革命犧牲奮鬥的歷程。

老舍，是另一位著名的作家，旗人，一九二六年至三一年留英，深受狄更斯影響。他的文學技巧是善於對舊社會之諷刺、對妥協者的弱點及浪漫派革命家之描述。很不幸的，老舍「黃包車男孩之悲劇」，

被翻譯者加上虛構的男孩得到女孩的結局，以助於在美國銷售。

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的一些改革者對中國非革命的知識份子影響甚大。他們是受外國教育而在大學或科學機構服務。此時並有許多教會學校成立，由二十一個教會和十二個美國大學合作的。行政上仍受中國當局管轄，學費是主要收入之一；教員人數在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有三分之二屬中國人。學生人數約有六千五百名，雖與政府設立的上百高等學校的學生人數無法相比，但在知識方面的教導卻領先他校，北大、清大的教授大都是留美歸來。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某些機構也頗有幫助，如「中國地質調查所」、「國立北京圖書館」，以及在中央政府管轄下，包含十二個研究機構的「中央研究院」，另外，在南京有「國立農業研究所」。在北京洛克斐洛所創辦的醫學院、全國性衞生措施均受他們開創性的工作之惠。

受西方教育的中國留學生將所學貢獻於國家。在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到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間有二千四百人到美國唸書，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〇年增至五千五百人，他們分別在三百七十個研究機構研究關於科技與實業方面的問題。回國以後服務於上海、南京的學校，這是中國新生代之碩彥份子。他們與西方有密切聯係，雖然在物質及學術方面不能達到西方的水準，但是也比中國農村的農民及文盲要高出很多。

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新一輩的中國學人被西方所刺激，開始重新評估中國舊有的歷史與文化。在許多方面很有成就。如安陽考古、發現一些不爲世人知曉的石碑、北京人、出版及引用清朝檔

案，文史各方面也逐漸融入現代科學的觀念與詞語。

傳教和鄉村重建　由教會也可反映中國的問題，因爲教士在傳播福音的工作中，也從事各方面實際工作。中國境內的基督教於十九世紀末，受福音主義的刺激有長足的發展。成千的美國青年，遠渡重洋自願到中國傳教。一九〇九年以後，在某些財力之士資助下，組織「國際傳教會」，募集許多經費，並以中國爲主要目標。一次大戰期間，基督教復興主義者，如艾狄（Sherwood Eddy）及摩特（John R. Mott）都曾到中國各城市遊歷。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到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基督教徒增加了四倍，到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增加六倍，全部教徒人數超過五十萬。一九〇〇年時，有分別屬於二十八個不同支派的美籍教士東來，到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人數增至三千人，教派有六十個。

同時新教的使命，可以拿摩特所作的「當代世界之福音化」（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爲代表，他並不太關心教派，比較注重社會福音，企圖在社會秩序中找尋上帝的王國。初期到中國的傳教士，大都在小城鎮活動，新的一批則在都市中從事社會工作。一九三〇年代，大約只有一百個縣沒有基督教的傳佈，不過，三分之二的教會是集中在城市。民族主義在中國形成一股狂潮後，由中國教士領導以及外國教士從旁協助下，努力尋求教會中國化。

自從一八八五年男青年會與女青年會創立後，乃成爲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從事社會工作之主流。城市中男女青年會的主要計劃是針對勞工，企圖減少文盲及其他社會工作。他們不再表現刻意傳播福音，主

要是從事社會服務，男青年會吸引了許多年青領導份子，也賦予中國人道主義之動力。

基督教的熱忱充分表現在實際的工作上。如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中國華北大飢荒，教會成立了中國國際救災委員會，一九三六年利用五億元，與災區的官方機關合作，共同處理善後。建立道路、河堤、水井，並爲了適應農村需要，該會成立類似農會的組織，擁有兩百萬會員，許多傳教士都參加了該項工作。

中國境內的教會逐漸與社會福利事業接觸。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組織了國際基督教會，部份從事社會福利工作，部份促進了教會中國化。除了城市服務外，也發展農村計劃，加強農村教會組織，這個運動鼓舞了農業研究，由南京大學教授巴克（J. L. Buck）領導下從事活動。因此教會在農村重建的工作上也扮演一個要角。

這個運動的急先鋒是晏陽初（James Y.C.Yen），耶魯畢業，青年會會員，在洛克斐勒基金的資助下，在北京附近的定縣著手改革。同時舉辦民衆教育運動，藉著外國的資助改善中國的農民問題，提供農業科學知識及推展小學教育。進一步解決農村貸款、市場運銷、合作社及農民協會等問題。這個組織型態與知識份子結合，他們爲農民的痛苦發言，並討論土地租佃與地方政治問題。就此觀點而言，這些社會工作者與教育家漸進改革的做法與地方士紳發生衝突，士紳爲求自保，常與祕密會黨及軍閥聯繫。

鄉村重建不僅是農業方面的問題，事實上，也給國家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蔣中正藉著與教會、青年會有密切關係的蔣夫人，邀請美國教士在江西從事改革，建立模範縣，以恢復被共黨破壞的農村。因

爲農村問題實在複雜，一九三〇年代的計劃，並沒有多大效果，但所設計的方法，足供處理農村的基本問題。廣大的北方，在洛克斐勒支助下正要進行農村重建時，日本開始積極侵華。

身爲一當權者，並扮演聖人及英雄角色的蔣中正，在此時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做法，即新生活運動，強調舊道德禮義廉恥之重要，並採用男青年會的方法。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到三七年，有一千三百個網狀分會，勸說羣衆應該朝著衛生、健康、清潔、整齊的原則；吃東西不可發出聲音，滅鼠及滅蠅、儀態端莊、迅速等等。直接致力的目標是道德重整。

南京政府十年，是最西化的十年，此種說法，有待更進一步討論。鄉村的資料太少，難於統計。最大的運動像農村重建，或官方努力恢復儒家思想等工作都未能深入做下去。軍人與知識份子的分歧沒有解決，最大的分歧是來自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知識份子，他們受治外法權保護，以輔助的地位幫助社會改革，因爲在中國少有西方模式可資運用。一九三〇年代，非共產黨員對中國文化與社會重建所訂的計劃，主要是來自西方的衝擊，彼此也是散漫與分歧。因此新發展之熱度受到軍事侵略便逐漸減低了。

第六章　內憂與外患

第一節　日本侵略東北（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東北的淪陷　日本侵略東北之後，連帶著有一連串錯綜複雜的調度。中國人很難說是沒有防衛能力。單單張學良的東北邊防軍就有四十萬左右的人馬。一如很多其他的中國軍人，他隨時準備把幾萬的軍隊投入內戰之中。張學良的軍隊，在人數方面，遠遠超過日本侵略者。然而，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張學良進入華北時，已動員了十萬的精銳部隊進入長城。此外，他還在長城以北不遠的錦州建立一個龐大的東北軍軍團。

瀋陽事變發生時，張學良及其顧問端納（W. H. Donald）正在北平。這時候張學良正和石友三將軍展開一場內戰。石將軍是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隨同韓復榘投奔政府的。石軍很快即被殲滅，但張學良的東北邊防軍已精疲力竭而不足以迎擊外來的侵略武力。

早在瀋陽事變發生之前的九月十一日，蔣委員長就曾訓諭張學良儘量避免和日軍發生衝突。當日軍侵略東北的消息傳到北平之後，張學良向蔣委員長請求指示。蔣委員長仍堅持既定政策，爲了不要使偶

發事件擴大，必須堅守不抵抗原則。九月二十三日，蔣委員長向全國宣佈已將此事交託國聯辦理。張學良自始至終都訓勉其軍隊遵守指示，堅守不抵抗原則。端納後來也承認曾參與這項策略的策劃。但是，這當然是由中國人自己做最後決定。只有端納的建議與張學良及蔣委員長的意思相吻合才可能被接受。

設若國聯或任何第三勢力，肯出面衛護中國，不抵抗政策可以想見將會發生作用。但情形並非如此。國聯兩度指令日軍在某時限之內撤退，但東京方面對國聯的指示置若罔聞。國聯討論過對日本加以制裁的問題，但若無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競爭者，而且不是國聯會員國的美國支持，國聯難以採取有效的行動。但美國拒絕參與制裁日本侵略的聯合行動。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曾經聯同國務卿凱洛格（Kellogg）簽署巴黎公約（Pact of Paris）的布里安得（Briand），曾向朋友發表評論說：美國的拒絕意味著國聯的死亡。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七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Stimson）通知日本與中國：美國不準備承認以違反巴黎公約的手段達成的任何情勢、條約與協議。所謂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也就是這樣形成的，但這並不是什麼新主義。這項主義啓靈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白里安（Bryan）對二十一條要求的回應方式。在國聯方面，十二月派遣了一個調查團到東北調查這個事件的是非所在，並提出解決方案，這就是所謂的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

而在這同時，日本繼續快速推進。他們很快地吸收了好些中國軍官、政客爲他們服務，並在東北的

遼寧、吉林兩省建立傀儡政府。然後日本再轉移注意力到東北最大的省份——黑龍江。

瀋陽事變爆發時，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正以其精銳部隊在華北與張學良進行內戰。萬福麟把省務交給他懦弱無能的兒子——萬海鵬。由於黑省幾乎沒有一個權力中心，日本侵黑之事看似舉手可得。

一位投降了的中國將軍——張海鵬，被日軍總司令任命爲黑龍江省打下以後的新主席。十月初，張沿著中東鐵路向省城齊齊哈爾北進。但經常駐紮在黑龍江的防衞司令——馬占山，動身來迎接這項攻擊，並在嫩江制止張海鵬。馬占山進而把架在嫩江上的鐵路橋樑燒了，使得他的防衞能力更加穩固。這條鐵路是由日本出資建造的，其維持暢通對日本有實際的利益。日本表露了對這條鐵路的關切，並要求這條鐵路在限定時間之內予以修復。

馬占山是由少兵當起的樸實軍人，性情直爽，深得民心，從未爲中國的官場積習所腐化。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方面有不抵抗的命令，一方面又沒有任何支助，他原先可能沒有向日本關東軍開戰的計劃，他只是算著時間，但卻不去修橋。日本送自己的工程師前往修橋，馬占山的軍隊就向他們開火，接著日本武裝部隊開始展開行動。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嫩江之上掀起了一場熱戰。這場戰役發生之時，中國新聞界雖未予以重視，但馬軍的戰績確是輝煌。

幾天之後，馬軍敗退，日本軍繼續往前推進，於十一月十八日佔領黑省省會齊齊哈爾。但這時候全國民心業已振奮。正如一位中國評論家指出：馬占山英勇與強硬的抵抗使中國免於懦弱至極的恥辱。馬占山成爲嫩江戰役的英雄。他的行動不只保全了中國人的榮譽，而且刺激了中國的義勇軍不顧南京政府

的不抵抗政策起而對抗日本侵略者與漢奸。

在馬占山東側的李度將軍以及在東北西部的蘇炳文將軍都得到馬占山的支助。但是受日本壓力較輕的張學良却完全撤走了關內的正規軍，而馬占山與義勇隊都被切斷了軍事援助與物資供應的基地。在幾個中國的大城市裏雖有籌款運動，但無法扭轉大局。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二月，馬占山本人投靠了日方。

滿洲國的成立　約在這個同時，一位顯貴的滿人投奔日本，與國民政府對立。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的優惠條款中，中華民國政府答應永久負責以適當的禮儀維持淸朝皇帝的皇陵與宗廟。但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七月國民政府佔有北京不久，皇陵被人闖入而遭到搶刼，乾隆皇帝與慈禧太后的遺體也遭受侮辱。一度曾爲淸朝皇帝的溥儀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被馮玉祥無禮地趕出皇宮之後，並未隨之對整個中國產生敵對心理。然而在民國十七年以後，他的態度急劇轉變。

也因此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月瀋陽事變爆發時，溥儀已表現出較早先更能接受復辟計劃的態度。十一月初，特務機關部長土肥原在溥儀位於天津的日本租界的宅第拜訪溥儀，並提出使他復辟的計劃，但是復辟的地點是在東北。溥儀的顧問們對於這件事意見紛歧，但溥儀最後在鄭孝胥的催促下，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日，也就是在他被馮玉祥的部下趕出，在北平使館區避居的第七年，他登上了一艘日本輪船回到他祖先的故土。

證據顯示溥儀做此重大決定時，是期望在東北重建一個滿洲政權，這個政權將被視爲全中國的「合

法」政權。他的黨羽當中，希望這種結局發生的，必然是大有其人。但這種結局並未發生。很顯然地，日本還不準備做這麼多。二月中旬，中日雙方的許多領袖匯集瀋陽，決定在東北單獨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實體。東北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宣佈獨立，三月一日「滿洲國」成立。

兩個滿人的代表團曾經在大連拜訪溥儀，催促他出長新成立的滿洲國，但溥儀拒絕了。他的拒絕不過是擺個樣子。另外一個代表團再次敦請溥儀時，溥儀接受了。這完全是傳統皇帝登基的慣例。溥儀答應之後，即刻出發前往新京(長春)，三月九日正式出任滿洲執政。即位典禮有日本軍政顯要參加，其中當然包括本莊繁將軍。溥儀的忠實黨羽鄭孝胥，是位詩人、書法家、理學傳統的學者官吏，出任總理。鄭建議新政府將依王道而行，日本人也曾用王道這套中國古帝王的作風勸張學良採用，但並無結果。在現代日本人的詮釋下，王道是反對社會激烈主義的，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

下一個發展也有點古風。滿洲國的國防部長非嫩江英雄馬占山莫屬。馬原先已得到日本政府承認出長黑龍江省主席，所以馬仍駐紮在齊齊哈爾。這時候馬開始可以施展其袖裏乾坤。四月一日深夜，馬乘著一輛載滿了有用物資及大量金錢的卡車偷偷出城。幾天裏他都裝著一副到處巡查的樣子，而後，在四月十二日，他發了一通長途電報說明以前他公然投靠日敵的理由，並報告出他與日本合作期間所獲知的日本計劃，並矢志抗日到底。

中國有這麼一位將軍玩弄了狡猾的日敵使中國重新燃起了希望。日本一時感到極爲羞辱。當十九路軍將軍蔡廷鍇拒絕遵守蔣委員長的不抵抗命令時，日軍於一月底開始猛攻上海。蔣委員長派出八十七師

與八十八師軍隊與蔡軍會合，共同遏止日本皇軍。在當時國際輿情看來，日本打的是防衛戰，而馬占山的這一番波折也使日本需要重做軍事安排。但日本費時不久即重做決定。五月簽署停止上海地區敵對狀態的協定。增強了東北駐軍之後，日本軍隊於五月底對馬占山的軍隊發動猛烈攻擊，並切斷馬占山軍隊與遠在東邊的李度軍隊。

日本進而對現有的收獲加以整頓。在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一項同盟協定中，日本承認滿洲國是根據其住民的自由意願組織而成的獨立國家，而在另一方面，滿洲國同意保護日本在其境內的權益。另外一項協定指出日、滿兩國爲了國家安全應該彼此合作。

國聯的李頓調查團一直到十月二日才公佈其調查結果。而在國聯深思熟慮之前事端又不斷發生。因爲日本是不會等待的。十一月日軍發動最後的完全掃除異己的戰役，清除所有在東北而與日本對敵的主要軍隊。北方的馬占山、西邊的蘇炳文、東北邊的李度等的軍隊都被瓦解。由他們所剩微不足道的幾千名軍隊也可以看出中國防衛力量的薄弱。馬、蘇、李三人也就帶著這些軍隊撤退到蘇俄。他們解除武裝之後，被限制在一個地區活動。除了若干不重要的游擊戰之外，沒有再發生些什麼重大事件。中國在東北的抗日活動已經結束。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南京政府在與俄國斷交五年之後重新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也可淸楚地看出南京政府的失望。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初，國聯終於正式討論東北問題。李頓調查團所做的調查結果認爲雙方都有過錯，並建議根本的妥協辦法。中國方面拒絕任何要他讓步的解決辦法。日本強調其國家安全問

題，說他們不能坐視中國的赤化。日本特別表示其對東北與東部內蒙不能赤化的關切。日本指出：「若這兩個地區赤化，將會影響朝鮮的治安，進而再影響日本本國的治安」。

日本明白指出他們將淸除這兩個地區的共黨份子以確保日本的治安。日本提出的這個為了防禦共黨而採取防衛行動的理由對西方當然頗具吸引力。而日本侵略行動的兩個根本理由：阻止美國在亞洲的經濟擴張，促使中國維持分裂以便利日本往中國大陸的推進，却未提及。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國聯對東北問題採取行動之後，日本隨之退出國聯這一國際組織。布里安德（Briand）的預言實現了。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蘇聯的加入國聯並不能挽回國聯的衰勢。西方民主國家正傾全力於掃除其各自所遭遇到的經濟恐慌。而德國、義大利、日本却正準備對外侵略。

日本進兵熱河　佔領東北只是日本往亞洲大陸擴張的長遠計劃的第一步。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三月滿洲國成立之後的第二年，日本很快地又往熱河進攻。熱河主席湯玉麟據報導有投降日本的動向。他是舊式的軍閥，因為在省內大種鴉片獲致很大的利潤而養得很肥，顯然地並不是一塊可以成為英雄的材料。然而，日本的威嚇喧嚣並沒有使他投降，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同胞對湯玉麟也施以同樣的壓力。而中國人也很自信的說，如果日本攻擊熱河的話，因為熱河是多山的地區，利於防衛，將能够打得很久。

中國人的聲明就像是在黑暗中所吹的口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日本打下了山

海關——介於東北與華北之間的長城關卡。二月時日本以一支名義上說是滿洲人組成的小小武力向熱河推進。湯玉麟奉命要作戰到底。宋子文搭乘飛機到北平明顯表示中國絕不容許另一個富庶省份爲日本侵略者所侵奪。華北的軍事將領們舉行一次會議，並宣布他們抗日的決心。但是湯玉麟的軍隊以及黑龍江省前主席萬福麟的第三路軍很快就被前進的敵軍所瓦解。南京政府並沒有支援軍隊或飛機到達前線，在十天之內，日本已攻克熱河。熱河首都——承德是由一百二十八名日本人打下的。

中國的失敗還不只於此，在日本西進攻打熱河時，他們同時希望打下長城左側的重要關口。熱河右鄰的察哈爾省主席，是一個能戰的馮玉祥舊部——宋哲元。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蔣委員長打敗馮玉祥，將國民軍加以改組時，宋哲元受命統領二十九軍——馮玉祥手下一羣久戰之士所組成的一支軍隊。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宋哲元受命共同防守熱河。但當二十九軍到達長城時，發現萬福麟的軍隊正在急速敗退之中。然而，二月初他們在喜峯口守衞起來，喜峯口是長城上的一個重要關口。在喜峯口、羅文峪，還有更西邊的古北口，宋哲元給予日本在他們輕易地攻打中國以來唯一的打擊。

爲了採取迂迴政策，宋哲元的軍隊四月裏放棄了喜峯口，五月裏放棄了古北口，但他們持續作戰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協定簽訂，這個協定使雙方暫時停止敵對狀態。宋哲元爲自己贏取了「喜峯口英雄」的聲名，而後他走進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熱河的輕易淪喪引起中國權力結構的重大轉變。張學良的政治地位在滿洲國成立之後大爲低落，因爲他成爲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代罪羔羊。然而，他仍保全了十七萬部隊，而被任命爲「北平軍事分會」的軍事委員兼代分會主席。然而他那位權勢很重的將軍萬福麟在戰場上表現得儒弱無能，而熱河幾乎全無抵抗卽行投降時，張學良這位少帥逐漸式微的聲名再也無法屹立了。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在輿論強大的壓力下，他把他的殘餘軍隊交給蔣委員長，而開始走上往日失意政客所走的老路——出國。途中他在上海進了一家醫院醫治他的鴉片煙癮——此事以後將有其意義。

張學良下台之後，馮玉祥很快地又顯赫一時，當日本正因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一日佔領熱河東側多倫的重要據點而感到興奮時，馮玉祥由退休狀態中起而組織一支名爲人民抗日聯合軍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七月時馮軍已將日軍完全趕出察哈爾，並且接掌了察哈爾——這是屬於宋哲元指揮下的省份。但馮玉祥的這一舉動並未使國民政府感到雀躍。因爲國民政府剛剛於五月三十一日簽訂塘沽協定，希望可以避免與日本再起衝突。馮玉祥的孤意行事，使南京政府感到尷尬。

宋哲元與另一位馮玉祥舊部——黃郛居間斡旋南京政府與不聽軍令的愛國者之間。由於其他全國性的領袖們對馮玉祥的舉動未加附和，使這項調停更易於進行。馮於八月解散了他的抗日軍重新歸隱到泰山。日本重新佔領多倫——進入察哈爾的門戶。

但日本人並不認爲他們的大陸擴張因爲塘沽協定而結束。塘沽協定對於日本要求的屈服，使得日本人更產生了政治侵略中國的野心。他們開始相機行動，先在河北省，繼而在察哈爾，那裏的蒙古人因爲

長期不滿於漢人的統治，正想自治。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日本在兩地的活動都很頻仍。

日本在東北的侵略也向前邁進了一步，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滿洲國改爲帝國。二十八歲的執政——溥儀，乘著一輛防彈的美國製汽車到仿照北京做的天壇祭天，而後卽位爲康德皇帝。這是溥儀第三次當皇帝。但同前兩次一樣，溥儀都不是以自由之身充任皇帝。溥儀的總理——鄭孝胥極力爲溥儀的威權奮鬥。但是日籍顧問及日本的勢力却是經常環繞在皇位的四周。康德皇帝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一個傀儡。東北是日本往大陸擴張的一個台階。

然而，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中，東亞很多事情匯集成流，使日本改變了侵略方向。

第二節　中國自身的分裂

滿洲國的建立帝國體系不過是日本想要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徵象之一。一個月之後，也就是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四月，日本一位發言人已實際聲明日本將成爲中國的衞護者。這個天羽聲明，絲毫不去理睬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對中國任何借重他國抵抗日本的企圖表示不快，並表明日本反對任何其他國家供給中國戰鬥飛機，或替中國建築機場，或簽署供給中國政治用的借款。這個聲明使日本更自以爲有權扮演東亞治安防衞者的角色。

很明顯的這時日本已準備在中國推展其意願，至少使日本的力量中立化，並含容中國的革命運動。天羽聲明，在某種意義上，實爲這些目的的正式聲明。這個聲明是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日本退出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華盛頓海軍裁限條約的前兆。但是這項聲明的公佈主要與中國的發展情形有關。

南京是中國統一的希望 中國的情勢一向會有多種解釋。一九三〇年代外國訪客都會因爲上海、南京等城市的發展情形而留下良好印象。在上海這個全國第一大口岸裏，可以看到對外貿易仍在成長之中。在南京，也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政府建築物正在興建之中，新的首都很明顯地是比北京現代化。北京則仍沈溺於遠古的回憶當中。外國觀察家們注意到中國已有一股他們心目中的新力量，中國也在逐漸統一之中，但是這些口岸城市所呈現出來的景象是容易使人發生錯覺的，因爲南京畢竟不能代表全中國。

蔣委員長仍堅守著以政治抵抗日本的政策，而另外追尋一個段祺瑞也曾有過的目標，以軍事統一中國。但是日本侵略中國益甚，中國人民的抗日情緒也就更加強烈。蔣委員長的兩個政策越來越無法並存。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但沒有促成中國的統一，反而促成中國的分裂。要發現中國的實況，需要越過口岸城市深入中國內地來觀察。

統一以及由之產生的力量事實上是那麼遙遠，以致幾乎沒法看到。外蒙古在俄國的影響之下轉變成爲蒙古人民共和國，顯出將永遠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樣子。西藏正如中國成語所說的「鞭長莫及」——仍安穩地維持在南京政府的權力之外。東北這塊中國最富庶的農工區也仍然在國民政府的管轄之外。

中國的其他地區這時候雖然還很統一，由於東北及熱河的淪陷，南京政府在內蒙古西邊的權力也正

在式微之中。而隨著內蒙古的喪失，華北也隨之喪失。新疆與西北中國的若干省份是由半獨立的軍人所統治著。最後，華南對於南京政府的反對也越加具體化。而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的南京政府本身，眼看著自己的策略就將失敗，強有力的分裂勢力正在運行之中。

內蒙的情形　在內蒙地區，蒙古人的民族意識越來越濃厚，深深影響內蒙的政局。雖然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曾有允許中國少數民族自決自治的許多允諾，但國民政府對於蒙古的治理，與北京政府的督軍們一樣，仍有諸多困難。國民政府不顧蒙古人的反對，在北伐完成之後就將內蒙古西部特別區劃分為察哈爾、綏遠、寧夏三省。而在「重新認墾」的名義下加速了漢人在蒙古地區的墾殖。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蒙古的代表曾走訪南京尋求減緩漢人墾殖的可能性，但結果失敗，而蒙古人的政治、經濟處境也愈加困難。

日本佔領東北之後，吞併了內蒙古六個盟旗中的三個盟旗，而後環繞著整個內蒙古西部的外側。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察哈爾北部的蘇尼特左翼旗盟主率領一個蒙古代表團到南京討論內蒙事宜，並建議做若干的改革。但這個代表團卻空手而回。南京政府的政策基本上並無所改變。

日本的佔領熱河，並攻入察哈爾省的東部引發了新的危險。在南京政府很明顯地表示不願意抵抗日本的進犯之後，在開明、幹練的德王領導之下，一羣年輕的蒙古人正著手想出他們自己的自衛措施。

蒙古人所能做的選擇非常有限，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在日本進入熱河的同時，把東部內蒙古建成一個新的政治支部，並宣佈使東蒙古成為滿洲國境內一個自治的蒙古地區。有三個理由，

使西部內蒙古沒有任何可能達成有效的獨立：(1)他們無法求助於「蒙古人民共和國」或是俄國，因爲這兩個國家除非是出於自衞不會關心國際事務；(2)此時蒙古盟旗的大多數地區都已經滿漢混合，新設立的內蒙三省的省長並不比中央政府更富熱忱；(3)日本軍方很明顯地是想把蒙古放在一個適合其帝國主義發展的政治架構之中。蒙古所能做的最好抉擇，是在入侵的日本人手下，或是有效的中國統治之下，建立一個「自治區」。

德王除了是蘇尼特左翼旗的旗主之外，也是錫林郭勒盟的代理酋長，並爲這個盟的主要領導者。德王有一個強有力的支持者是烏蘭察布盟的酋長雲王。雲王的姪子是德王的至友兼追隨者。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也就是塘沽協定簽訂的那一個月，雲王與德王召集蒙古王公到百靈廟召開一個小型的會議，預先討論內蒙的地位問題。兩個月之後又召集另一次會議，到八月十四日內蒙古的王公們通知南京政府，他們想要建立一個自治的蒙古政府。

南京政府一時感到震驚並隨即採取行動，九月間派遣一位高級官員——內政部長黃紹竑到張垣討論蒙古問題。黃將軍發現蒙古王公們並不願意到張垣，顯示出他們已不承認黃是他們的上級長官。而蒙古人們已召開另一次會議討論新政府的形式。十月時黃將軍到了綏遠省的省會——歸綏，以便與會集百靈廟的蒙古王公就近磋商。但黃將軍的計劃了無進展。最後，很不情願地到百靈廟，會見了雲王與德王及其他蒙古領袖。這種情形，就像穆罕默德，最後仍要走到山中。

磋商的焦點在於：是要像蒙古人所建議的成立一個蒙古的自治政府，或是如中國方面所建議的，不

成立自治政府，代之以實際情況的改善。雙方原已達成初步協議，但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時雖然通過了協議的形式，却省略了協議的實質內容。於是雙方又起爭議，而整個情勢也已改變。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日本已經與德王接觸，此時雙方又往來頻繁。蒙古方面發出強烈威脅，如果南京政府對他們的要求再不讓步，他們將被迫考慮與滿洲國妥協，而滿洲國正準備三月一日推執政溥儀爲皇帝。

南京方面取消了一月時所通過的議案，而在溥儀即帝位的前一天——二月二十八日，通過一個新議案，準備建立一個全蒙古的政治機構——蒙古地方自治委員會。三月七日南京政府任命雲王做這個政治分會的主席，並任命德王做政治局的局長。四月二十三日這個蒙政會正式成立。蒙古人似乎終於獲得了前年十月他們所力爭的實質。

但這並不意味著蒙古問題的自然解決。日本的壓力仍然在繼續加強。六月底並有馬基亞維利式的土肥原初次走訪內蒙古。而南京政府以及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盟旗所在的察綏兩省省長，正不知要如何履行他們與蒙古人的協定。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日本的天羽聲明已明顯地表示出日本的意向。日本的策略很明顯地是要進一步削弱國民政府在內蒙古以及華北的控制力量。而在這兩個地區，因爲塘沽協定簽署，已使中國的防衞線有了裂痕。不必隱瞞的是，南京政府與蒙古重要團體間的聯繫業已鬆弛。

新疆的情形　新疆的情勢即使不能成爲中國發展趨勢的一個代表，至少也相當可以顯示出這種趨

勢。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六月南京政府推翻北京政府之後，從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來卽以鐵腕統治新疆的楊增新向南京政府表示效忠，使國民政府獲得一項很大的成就。但當楊增新受命爲新疆省省主席之後六天，也就是七月初，他被暗殺了。暗殺者——一個名叫樊耀南的官員——的動機，除了與楊增新有若干衝突以及希望獲得權力之外，已經無法得知。因爲這暗殺者連同他的家人和共謀者在幾小時之內又被一名想統治新疆的人——金樹仁殺害了。

這樣一個發展，使新疆走上一段漫長而飽受折磨的歷程。金樹仁是楊增新這邊的人，在老督軍底下是一位很有才幹的行政官。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政變發生時，他是新疆省的內政委員。他有他自己的野心，並且可能預先知道殺害楊將軍的陰謀。無論如何，他的地位使他對於樊耀南的行爲能夠採取迅速有利的對策，於是他進而取得了權力。在新疆擁有權力就是擁有法律，南京政府在做了可以想像的若干躊躇之後，承認了他已經掌握了的職位。

但是金當起省主席來，不若當內政委員之能勝任。他一反楊嚴厲而公正的統治新疆回民政策，而採取高壓手段。新疆回民這時所面臨的是：要繳更多的稅，政府壟斷新疆的出口貿易，同時還要承受一位中國軍人毫不收斂的邪惡。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事態更爲嚴重。當哈密的沙王(Mag Sud Shad)死的時候，金準備以中國的行政官代替傳統的王公統治，又不斷將由(他的祖籍)甘肅逃到新疆的難民安置在回民的農田上。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二月，回民的積怨終於因爲一位中國的收稅員綁架了一位回敎女子而爆發了一場叛變。

這場叛變發生之後，中國的西北改由好戰的漢回混血的馬家所統治。一位年輕的馬家子弟——馬仲英，才歃血宣誓統治甘新兩省不久，後來被一些反對他的將軍聯合趕到甘肅省。在叛變的回民的邀請之下，他捲入了新疆的紛擾之中。這場紛亂也因而演爲叛亂。

馬仲英在西北早就因爲好殺而聲名狼籍。由於一位伊斯坦堡的土耳其人以及他隨從的一位日本人的建議，他做起帝國夢來。根據瑞典探險家斯文哈定(Sven Hedin)的描述，他是一個標準的蒙古戰士，在與他的顧問們聊天的過程中，他很平靜地設計出一套聯合德、俄、土三國征服整個世界的計劃。馬仲英的確抱負不小。

馬仲英初次刼掠新疆時，即在戰役中受傷，不得不撤回甘肅。回到甘肅之後他由一位最近由飛機上以機關槍掃射他的一位將領手中取得四個縣份的控制權，並由南京政府任命爲三十六師的師長。因而當他的隨從們還在新疆打金樹仁的時候，他休息下來養精蓄銳。

金在戰場上的指揮官是滿人盛世才，他的軍隊有一部分是金以前徵集來支持他的政權的白俄人。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一位馬家的尉官驅進新疆省首都——烏魯木齊的大門。由於盛的指揮成功使烏魯木齊免於淪陷。但到四月時，由白俄軍官所領導的政變剷除了腐敗無能的金樹仁的權力。在白俄的支持之下，盛世才接掌他的職位。

五月，馬仲英重新進入新疆。一個月之內他控制了十三個縣，包括新疆中部的重要城市——吐魯番。盛派遣代表與馬仲英磋商，南京政府派遣參謀總長黃慕松前來排難解紛。盛在黃的眼前槍決了三位

重要的南京政府官員，黃在未完成任務的情況下離開。過後南京政府又派外交部長羅文幹繼續進行這項工作，羅稍能拉攏敵對的雙方，但是新疆的情勢遠非國民政府所能控制。羅在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的情況下於三週後離開，地方權力的爭奪戰仍在繼續著，其中又夾雜著回民的因素。最先引馬仲英進入新疆的就是回民，但回民又依違於馬仲英與盛世才之間。

雙方又展開了戰爭，戰爭的發展對馬仲英有利，十二月叛軍又迫近烏魯木齊。一月中旬，當馬仲英的友軍由北邊、西邊進攻時，馬仲英的軍隊直接進攻新疆首都。但盛世才十二月時曾派遣一個使團到莫斯科增進雙方的友誼。這次出使非常成功。當馬仲英的軍隊幾乎要打垮盛世才的權位時，蘇俄的馬軍、坦克、飛機加入這場戰爭，粉碎了馬仲英的友軍，並將馬仲英本身的軍隊由天山趕到南疆。

蘇俄有雙重的動機。一則因為馬仲英底下的土耳其人和日本人使蘇俄感到：馬仲英建立土耳其帝國的夢想對蘇聯自己的回民統治將構成一個長期的威脅，而且馬仲英也深受日本極為危險的影響。其次，事情很快就明白的是：盛世才答應蘇俄的新疆蘇俄化，對於蘇俄的國防安全來說，要比不可控制也不可預料的馬仲英所能答應的任何條件都好。即使在馬仲英一月的進攻之前，蘇俄原已允許李度與蘇炳文的軍隊回到新疆。李、蘇自從由東北撤軍之後，一直為蘇俄管制在一個地區。但是後來因為蘇聯軍隊的親自介入，使得原先這個構想並未生效。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馬仲英在一位蘇俄領事的陪同之下橫越了中蘇邊界進入蘇俄，而後沒有再回來。他也就是以這樣一個奇怪的結局結束了他多彩多姿的一生。

盛世才把他的職位賣給蘇俄，並對新疆省未來的發展做了若干承認。他已經明白表示要脫離與南京政府間的關連。就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上半年的發展看來，他私下似乎還要對新疆做一些安排，來增進他自己的福祉。而事實上，這就是使新疆獨立，但受蘇俄控制。新疆的軍隊變成「反帝軍」，他的政黨改名爲「反帝社」。新疆也改用了上面有六顆星的紅旗。至於南京政府的禁令，並沒有達到新疆。

中國內部的情形　南京政府只在中國本土的部分地區進行有效的控制。西北回民除了南京政府官員朱紹良統治的甘肅以外，其他地區雖由中國官員統治，但他們對南京政府的忠心有限。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隨著韓復榘投靠政府的馬鴻逵統治著寧夏。馬步芳及其弟弟馬步青對青海的控制幾乎是極權式的，他們口頭上雖然表示效忠南京政府，並沒有進一步表示恭敬的舉動。

在中國西部很多國民黨軍人都從事著半獨立統治，隨著自己的喜好採行一種統治方式。龍雲在雲南採行一種嚴厲控制。龍雲原是哥老會領袖，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接掌唐繼堯的權位。雲南鄰省的貴州則由王家烈將軍控制。四川因爲有崇山圍繞著盆地，非常的安全，對於南京政府的漠不關心是典型的例子。三位老軍人在川北互爭勢力範圍。在四川省的其他地方是由劉湘和他的叔叔劉文輝（譯註：原文以劉湘乃劉文輝之叔，有誤）在互爭雄長。四川境內約有二十萬軍隊，其中沒有一支軍隊受南京政府的控制。這些軍隊都爭著搶地盤以爭取軍糧，四川省民也因而痛苦呻吟。也因此四川不只不在南京政府的統治或法律行使範圍之內，四川本身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

對於南京政府的反對勢力也存在於中國南部。在日本侵略東北之後，胡漢民很快就響應全民呼籲全國統一的要求，但是在南京政府答應廣東的政治領袖給予上海到廣州之間的軍事控制權以前，並不願到南京與國民政府磋商。十二月蔣委員長再度下野，分裂的廣州政府解散了，福建的十九路軍在上海佔有一個據點。汪精衞、孫科又回到南京，孫科充當行政院長，陳友仁也回來充任外交部長。

然而，在應付局勢的快速發展時，這些新領袖所領導的國民政府顯得懦弱無能。於是孫科很快就發現需要請求蔣委員長復出。結果同意在南京成立一個以蔣委員長、汪精衞、胡漢民爲首的政府。孫科與陳友仁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辭職，並離開南京。在一種顚跛狀態之中，國民政府又開始慘淡經營起來。

國民黨結合得正是時候，在兩個日本人被謀殺之後，一月的下半個月日本開始在上海展開武裝行動。先是與十九路軍交鋒，接著與中央政府的軍隊交鋒。國民政府旋卽遷都遠在河南的洛陽，一直到中日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沒有再回到南京。

國民政府內部又遭遇新的困難。宋子文在新政府當中並沒有安插上一個位置，暫時是處於一種被疏離的狀態。胡漢民仍因被監禁事而使心理蒙受很大創傷，不願離開廣州前往担任新職，他一直沒有回到南京。蔣委員長在沒有一個聯合的反對力量的情況之下，很快地又在新政府中掌握支配性的地位。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夏天又有一個新的權力危機產生。八月六日汪精衞辭掉行政院長之職。辭職的原因汪自己說是因爲張學良和他自己關於東北淪陷之事有一些意見的紛歧。接著張學良也辭

職了。八月九日，在無法勸使汪精衛回心轉意的情況下，行政院各部會也提出總辭。

在這關頭，宋子文重返政壇，一身兼任行政院長及他原先担任的財政部長。汪精衛又走上他自己經常走的自我放逐之路——單調的出國之行。這一年中的政權轉移與更動，掃除了蔣委員長所有的危險政敵。接著蔣委員長在南京鞏固了黨與政府的權力而不再受到有力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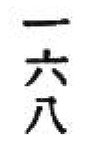
但是廣州的政治分會仍獨立於南京政府之外繼續活動。這事實上就是華南的政府。雖然習慣上因爲這個政治分會的正式名稱是西南政治分會而以「西南派」相稱。一如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年中，廣東政權背後的軍事力量主要是由廣西派、福建的陳銘樞和蔡廷鍇、廣東的陳濟棠和余漢謀等構成的。這個政權運用了一個雖然不很堅實但已經很龐大有力的政治資源——全國繼長增高的抗日情緒。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緊接著馮玉祥華北抗日活動的失敗，陳銘樞、蔡廷鍇、李濟琛發動另一次叛變，在福建成立一個人民政府。這個政府內政方面採取民主的形式，在外交方面建議成立一個抗日的聯合陣線。他們計劃中的第一步就是號召全國其他地區的人與他們聯合共同推翻蔣委員長的政權。但是其他南方的政治領袖並未給予福建方面援助。他們與担任福建新政府外交部長的陳友仁——原武漢政權的外交部長——一樣對社會激烈主義嗤之以鼻。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一月這個叛變政府很輕易地就被蔣委員長的軍隊所敉平，國民政府的控制力量也因而擴展到另一個新的省份。

南京政府此時在沿海以及長江下游的省份掌握了有效的控制。這包括福建、浙江、江蘇、安徽，以及江西省的一部分，此外國民政府在湖南、湖北、河南、陝西、甘肅也擁有很大的支配力。總之，一九

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年初，南京政府的統治範圍約有傳統中國本部十八省的一半地區。但是蔣委員長的政權四面受到敵對勢力的包圍：日本由北方進一步往南侵略。中國的西部、極西部都由一些獨立的暴君統治著，他們正緊守著他們的自治權。對於南京政府的合法性，南方也仍不斷提出挑戰。

南京政府同時還面臨來自國內的另一個敵人。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初被打垮的社會革命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又復崛起，而在多方面打擊當政者。



第七章　中國民族主義的再起

第一節　中共的武裝暴動路線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中國共產黨被淸出國民黨後，逃亡的共產黨員或轉入地下組織，或逃到偏僻的鄉下。共產黨的人數由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四月的五萬八千人急轉直下，到該年年底減爲一萬人，由此可以明顯看出左派勢力的息歇。然而，共產黨的組織，以及一羣奮戰到底的共產黨核心人物仍然殘存。一旦時局需要激烈的解決手段時，他們將重新擁有權力，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想出一個適合社會、政治情勢的策略。

政治依然紛亂。一如前面所述，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政府以統一全國爲首務。如果中國的經濟力量非常富厚，如果大多數中國人所住的鄉村非常安定，如果沒有外敵壓境，這個策略也許還有成功的可能。但是這些條件事實上都不存在。要先達成政治統一、而後解決國內社會經濟問題、再抵禦外侮的理論，本身就含有一些內在的弱點。這些內在的弱點隨時都會被較爲大膽或想像力較爲豐富的反對者所攻擊，尤其是共產黨，他們一開始就想控制並運用社會革命的力量，而當時機來臨時，他們將以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再聯合起來，這股力量就是正在醞釀中的中國民族主義。

經濟與社會的危機　由於耕地有限，人口快速成長，租稅與高利貸負担太重，戰爭連綿不絕，軍閥又要拉伕，又要課稅，又有「特別捐」等等的壓力，做爲中國經濟基礎的農人已日趨惡化。一個世紀以來，低度的進口關稅使進口品摧毁了農村的手工業，而農村的手工業是農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此外，中國也受到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開始的世界經濟不景氣的不良影響。一如對日本的影響，世界工業原料與農產品價格下跌直接打擊到中國的出口貿易。最嚴重的是，東北的淪陷使全國在生產方面，煤炭減少了三十％，鐵礦減少了七一％，已發展的電力減少了二十六％，水泥減少了四十七％。

農業中國，在重覆著年代久遠的朝代循環模式之下，革命的時機業已成熟。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也就是國民革命軍在華中討伐桂系、馮玉祥首次叛變、國民黨與蘇聯差點決裂的一年，乾旱襲擊華北、西北九省，乾旱面積約有三十四萬平方英里（約爲美國大陸本部面積的八分之一）。乾旱以及乾旱所帶來的飢饉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

據估計，除了已經有很多人死亡之外，這個地區因乾旱所形成的飢民多達兩千至兩千五百萬人。沒有餓死的人在久旱之下也會淪爲乞丐，他們原已不多的錢都用完了，他們的器皿也賣了，房子拆了充當燃料，甚至家庭也拆散了。根據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一月一位南京政府官員所報導，在過去幾年中，陝西一省卽有兩百萬人死於飢饉，有成千上萬的村莊荒蕪，四十萬人被賣爲奴隸。

飢荒也影響到全國的市場結構。繼長增高的米價以及其他糧價，使這些飢民更難以取得足够食物。但是國防開支仍在增加。遠東評論（Far Eastern Review）的一位作家估計，若將軍人與盜匪合算，中

國有五百萬的武人，一年要花費三十億元（十億美元）。國民政府本身一年國防支出五億元。因現代的國防支出昂貴，這些國防支出並不算多，但也佔南京政府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

南京政府的軍事支出不過是全國許多軍事支出的一項，各省的軍閥也持有他自己的軍隊。南京政府的財政可以依賴關稅與銀行借款維持，其他的獨立軍閥則要取給於全國。這對一般老百姓的實際意義可由當時甘肅省所要繳的四十四種稅目看出來，這些稅眞是中國成語所說的「殺雞取卵」：畝稅、罰稅、清鄉稅、皮外套稅、麥穀稅、軍騾稅、襪稅、軍人報酬稅、制服更換稅、軍事費用稅、水壺稅、國防費用增加稅、國防工事修復稅、橋樑骨架稅、特別借款、富室稅、燃料稅、床稅、總司令稅、設備購買稅、水車稅、調查費用、田賦、助軍稅、草鞋稅、軍服稅、貨幣流通稅、雜項費用稅、軍隊調動稅、商人借款、穀價稅、房屋稅、銅稅、武器修復稅、豬稅、公債、臨時費用、交通稅、麵粉店稅、徵兵稅、特別稅、修路費用、馬料稅、其他貨物稅。以上所列還只是較常徵課的稅而已，另外還有許多特別稅收或地方稅收。

即使很多地方缺乏糧食，糧價也普遍高昂，但鴉片一點也不短缺，鴉片價格還下跌了。在漢口，鴉片以一盎斯只賣三元的價格公然在店裏出售。農民們因爲軍閥們以田地生產鴉片的可能收益繳稅，被迫種植鴉片而不種穀物的情形當然不只是四川一省才有的現象。即使在某些地方，收稅員會留下一些東西，長年的戰爭也會遺漏掉一些農村，但是薪水又低、又飢餓、又無紀律的軍人常常訴諸搶劫、燒殺。農業在承受多重負担的情況下，土地所有權不斷由小地主轉移到大地主兼放高利貸者手中。農民們也因

此越來越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盜匪的普遍可以反映中國內地民生的惡化。叛變或沒有薪水的軍人，沒有力氣再向放高利貸者或自然環境奮鬥的農民，失業的工人，或純粹的流氓，都組成幫匪在中國四處騷擾。

窮困無狀的農民是盜匪最主要的來源，其他還沒有演變成盜匪的農民，爲了防範盜匪以及軍人的騷擾，形成許多個保衞團體。過去在農民叛變中或在改朝換代時，祕密會社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當時一個最典型的農民祕密會社就是紅槍會，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村民們大量被徵召參與軍閥間的戰爭時，紅槍會開始活躍起來。

紅槍會的一般目標也是世世代代中國農民的期求—安定、和平、免於壓迫。當社會普遍動盪時，紅槍會在華中、華北的勢力增強了。紅槍會的組織非常完善，有軍事部門，有民防部門，也有賞罰分明的司法制度。紀律嚴格，對於違紀者均處以刑罰甚至死刑。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紅槍會在河南一省的會員卽有十萬之多。

紅槍會因此頗有力量，軍閥們也經常想引爲己用。但這種嚐試往往失敗，因爲紅槍會一如其他大多數的祕密會社，對於軍人的搶刼基本上是採取反對態度的。其他的祕密會社有哥老會、天門會、長髮會、黃沙會、大刀會、孽子會等等。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年底，長江以北的地區，據估計有七十三萬農民附屬於祕密會社之下。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他們曾在河南阻撓國民軍的前進。馮玉祥的軍隊因爲得不到南京政府的配給，不得不就地取糧。紅槍會就是爲了要抗拒這種騷擾而組織的，所以紅槍

會對國民軍的失敗有很大的貢獻。

這種祕密會社還是舊式的組織，但似乎正醞釀著一種改變。在農民叛變中所宣洩的不滿只要注入一點革命的思想就會變成眞正的社會革命。國民革命的蘇聯顧問早就體認到可以爲了革命的目的而將農民組織起來。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襲擊北京蘇聯大使館時得有資料證明這一點。而孫中山在他的三民主義中也提供中國社會革命一些啓發性的概念。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在一位有革命精神的教員彭湃的領導之下，在開封，在廣東，發起了一個較爲現代型式的農民運動。由於國共聯合期間，若干共黨領袖的煽動，華南的農民運動却如野火燎原般地擴展成爲一個有力的「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這有助於北伐軍很快，也很輕易地渡過長江。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反封建的潛在驅力仍然存在，留待著另一種革命份子去加以運用。

城市裏也有和鄉村一樣的革命動向。中國工業化的長期問題大抵都被忽略了，而戰爭已經開始。工業中心的工人們待遇不好是不滿的主要因素。中國一些敢於發言的青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也是影響這種不滿的因素之一。如果知識份子對極權統治及經濟敗壞的不滿只停留在茶餘閒談的階段，那將不會有多大危險，但是如果政府沒有締造一個環境使受教育者的才能得以發揮，使卽將成爲工程師、醫師、經濟學者與政客等人的願望得以達成，這種不滿將會加深，也可能變得非常危險。不滿的知識份子可能會轉而成爲中國社會下層泉湧而上的革命力量的領導者。

構成革命浪濤的基本素質是顯而易見的。自從辛亥革命揚棄了儒家的政府原則之後，並沒有一套完

整的政治哲學可以繼承。到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三民主義顯然並不够用。蔣委員長的統治面臨一個根本的挑戰：國民黨未能提出一套新的政治哲學，而別的政黨正準備提出。

走孫中山、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斯、列寧、金諾維也夫（Zinoviev）這條較爲激烈的思想路線的中國知識份子，最後勢必要反對一個只想把他的合法地位單純地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政府。陳獨秀在十年以前曾經痛譴過北洋軍人，但這時候國民政府又開始以武力來解決政治問題，走著袁世凱與段祺瑞的老路。但是任何對中國極爲敏感的民族主義的損害，任何抵禦外侮的失敗，只有使愛國的知識份子更加離心，因爲「反帝國主義」仍是一個不容壓抑或疏忽的革命動力。而長年累積下來的反封建主義壓力眼看著就要爆發。

中共的發展路線：上海與江西的對立　事實顯示，國民黨的激進派是在由蔣委員長領導的國民黨溫和派的支配之下。唯一能領導另起爐灶的政黨似乎也只有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淸黨以後，共產黨的勢力已經分裂，軍事領袖走一邊，政治領袖走一邊。黨的中央委員會仍然存在——隱藏在上海租界之中。共軍在南昌、汕頭、廣州被打擊之後，已分散成許多小單位而各自逃命。

擺在共黨前面的一個選擇是他們應該獲取城市無產階級的支持，或是獲取散漫的農民的支持。上海租界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要是由城裏人所組成，而中央委員會也仍富有「共產國際」的觀念。可以反映出中國共產黨的弱點與方向的一個顯著指標是：這個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在莫斯科召開第六屆中國共產黨會議，而國際共黨大會也同時在莫斯科舉行。國際共黨的頭目斥責中國共產黨的錯誤，並

預測中國將會產生另外一個革命風潮。中國共產黨受指示要準備進行武裝暴動，做為結束所謂中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以及推翻帝國主義者、地主、中產階級所締造的國民政府的唯一途徑。

在這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出現了較為強硬的領袖。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朱德帶領著衣衫襤褸的軍隊在江西西邊的井崗山，與毛澤東率領的一小支軍隊會合。中國的「紅軍」也因此出現。那年秋天彭德懷率領他的小支軍隊來與另兩位領袖會合。一九二九年春天重新組合以後，紅軍為數約有一萬人，但只有兩千支來福槍。畢業於雲南軍事學堂，曾經參與推翻滿清，差點當上像袁世凱那樣的皇帝的朱德，充當總司令；一度為圖書館管理員，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春深信農民叛亂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毛澤東，充當政治委員。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莫斯科會議回來之後，並沒有和在崎嶇的江西山區的紅軍會合，而仍然在上海做為一個地下組織。它也仍然受國際共黨的控制，對朱毛兩人建立永久基地的構想的價值表示懷疑。

關於這一點，毛澤東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他向湘贛邊區的第二次黨會議中提出的報告中已經按壓到他們的生存之鑰。他說，因為舊軍閥與新軍閥之間不斷的戰爭，要使紅軍在「白色勢力」之中生存是可能的。紅軍的基地也因而應該建立在省與省交界的無人之地，在這種地區將會有有野心的軍閥們彼此衝突。就長期看來，革命組織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曾有大量農民、工人、軍人參加革命運動的地區應該可以擴大它的力量。但就長遠看來，勢必要建立正規軍與穩固的基地。

由於這種革命途徑被批評爲不够正統，毛澤東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一月的一封長信中進一步推展他的主題。他批評反對他佔領江西而寧可到處打游擊戰以造成全國騷動的看法。他寫着說：同志們基於革命的衝動常過分高估革命的潛在力量，而低估反革命力量。這樣一個估計無疑地將走上機會主義的途徑。他同意時勢一般說來是具有革命的動向的，而且一如中國古語所說，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要運用這種時勢需要事先建立自己的權力。

「奠定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並在重要地區的工業界建立共產黨的支部是目前共產黨在組織方面所要進行的工作。但是在這同時，鄉村階級鬥爭的發展，在小地方建立紅色政權，創建、擴張紅軍等，尤其是協助城市裡的鬥爭以及加速推動革命浪潮的主要條件。」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六月，有一個由李立三路線傳遞的指令由共黨中央委員會傳到正在茁長中的紅軍說：要攻打城市，這個指令說是根據共產國際的一個意思發出的。共產國際的意思是：一個新的革命浪潮正在興起，這個革命浪潮興起之後，城市將被反叛的農民與城市中不滿的工人聯合佔領。假如紅軍成功的話，他們認爲這些革命成功的城市將提供將來農民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者」。

這時候的客觀情勢並不順遂，因爲南京此時雖正和大結合的北方軍閥進行殊死鬥，但各省的軍人並未參加。而朱德與毛澤東很頑強地要執行命令，在攻擊武漢、長沙等據點時只有慘敗。他們一度取得長沙，但是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並未響應。最後，因爲受到較爲優異的軍隊的打擊，紅軍從戰爭中敗退。

但是共產黨已經學得一個教訓。評估夏天進擊的結果，朱毛下結論說：革命的浪潮正在後退而不是

升起，因而他們必須在農民之中，而不是中國爲數甚少的「城市無產階級」之中締造革命。他們不再走共產國際的路線，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傳遞莫斯科指令的李立三，被共產國際說是犯了革命投機主義的罪，正前往莫斯科接受矯正。

中共的中央委員會仍然留在上海，正爲了正式領袖而發生嚴重而少見的問題。而在內地，在毛澤東與朱德的眞實領導之下，中共的革命運動已經走向農民。

蔣委員長的軍事顧問 就全國看來，在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討伐擴大會議的戰爭之後，中國各敵對黨派之間連一年後東北淪陷所形成的若干凝聚力都沒有。蔣委員長仍要加強軍力以便備戰。他十分了解國民政府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勝利要歸功於蘇聯的軍事顧問給予國民革命軍的現代訓練。但那些顧問勢必要離開，蔣委員長開始要找人替代，他所找到的是德國人。但他沒能夠立刻找到與加倫(Bluecher)同等官階和能力的人。雖然加倫屢爲美國新聞記者魏甘德(Karl von Wiegand)推薦，但蔣委員長寧可任用鮑爾(Colonel Max Bauer)——一次大戰中極爲有名的魯登道夫（Ludendorff）將軍的一位同僚。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二月，正是廣東公社成立的時候，他訪問了南京一段時間之後，伴著由軍政部長陳儀率領的中國軍事特使團回到德國。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他再回來担任蔣委員長的私人顧問。

鮑爾建立了一個由四十五個德國技術人員所組成的參謀團，開始以德國的方式訓練中國的國民革命軍並充實其戰備。他對蔣委員長在武漢打敗廣西軍有極大貢獻。但他很快就死了，因爲他在這次戰役

中，在漢口感染了天花，而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五月六日死於上海。

但是鮑爾已經打下了基礎。他的德國顧問團長的職務由克里伯(Lieutenant Colonel Hermann Kriebel）所取代。他是民國七年德國參與休戰會議的一員代表，在會議結束的道別聲中，他說：「二十年後再見！」。到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德國軍事顧問團在國民革命軍已經地位穩固，而國民革命軍的軍力也很穩健地在發展之中。這些德國人當中有很多是魯登道夫的學生，所以他們被稱爲魯登道夫的人。但是他們訓練蔣委員長的軍隊，並提供軍事策略的活動並未得到輿論支持。不過，這些年來，他們的影響力已越來越大。卽使對於中日關係，他們也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一九三〇年代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卻直接影響到：毛澤東努力醞釀一個農民叛變來對抗中央政府。

第二節　勦共戰爭的延續

第一次圍勦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夏季紅軍在長江中游的進擊使國民政府感到需要剷除殘餘的叛亂份子。何應欽將軍被任命爲勦匪司令，有十二師軍隊集在一起，準備全力掃蕩共軍。十二月十日國民政府命令最慢在三到六個月之內要勦平共產黨及其軍隊，第一次勦共之役因而展開。

但國軍失敗了，因爲何應欽折損了兩師的軍隊。一位國軍的旅長提出失敗的六點理由，其中第六點理由指出最根本的因素：農村的破產，工人的失業，人民普遍的經濟困苦爲共產黨的成長提供了用之不盡的燃料。

第二次圍剿　第二次剿共之役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二月開始。國軍似乎沒有從第一次剿共之役中得到敎訓，國軍的總司令基本上還沿用第一次的戰略，他們似乎不相信正規的戰爭方式迎戰衣衫襤褸以及沒有完善武器的叛軍時將會失敗。與第一次戰後唯一的不同是南京政府調動了更多的軍隊。但紅軍已比六個月以前增強很多，面對著國民政府的優越武器，他們極善於運用機動性的戰術。國軍到六月時只好停戰，結果共黨的軍隊因搶獲了武器以及戰敗的政府軍而更強大。

蔣委員長這時在南昌親自指揮。他增加了十萬軍隊參與這次戰役，國軍也因而增加到三十萬。戰爭的懸賞四處公告着：生擒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各獲賞五萬元，斬其首者各得兩萬元。七月一日第三次剿共之役又復開始。

第三次圍剿　南京政府的軍隊似乎所向皆捷。七月三十一日路透社由南京發佈新聞說：「蔣介石將軍向政府提出正式報告說：已經佔領了所有共產黨在江西的要塞，並指出政府的剿匪之役業已成功地結束」。國民政府拍了賀電給勝利的蔣總司令。

但勝利並未完全到來。回到南京之後，蔣委員長於八月中旬又下了一道命令說：在月底以前要掃盡江西的「赤匪」。一個禮拜之後，他匆匆趕回前線親自指揮。整個情勢有了關鍵性的發展。共產黨在最初階段避免全力作戰，然後再由國軍的背面與側面予以反擊，就這樣重重地打垮了政府軍的兩師軍隊。

九月七日到九日在江西省的高興（譯者案：在興國縣）一役打得最爲激烈。蔣委員長又回到南京，

很自信地報告政府軍在這次戰役中的勝利：「赤匪經此重擊將難再起，餘黨旋可剷除」。但雙方在這次戰役中似乎都損失慘重，而紅軍也仍未剷除。

無論如何，高興之役已結束了第三次剿共之役。就在這緊要關頭，南京政府的注意力又要轉移到其他地方。廣州政權的軍隊經湖南分頭北進重新對南京政府加以挑戰。南京政府指責廣州的叛軍與紅軍暗中勾結，但這些口頭攻擊並無法阻止廣州叛軍的軍事活動。

由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變發生，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大陸，國難當頭不應再起內戰的輿論浪濤隨之捲起。這使得南方的軍隊撤回。當蔣委員長的統治所受的這個最直接的威脅減退之後，南京政府也帶著有點休息的意味停止了剿共之役。剿共的軍隊由江西撤出，而使共產黨仍然控制著江西省的南部與中部。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華中的百姓更為困苦。除了剿共之役以外，長江大水造成很廣大地區的禍害，在中國農民原已沉重的負担之上又增添了一層痛苦。是天而不是政府使長江、漢水、湘江一帶同時都下了大雨，大水匯集在長江與漢水交會的武漢，即使長江水深，水的流速也快，並無法把這些水排掉，而這些水也非洞庭、鄱陽等自然湖泊所能容納。這些水沖潰了隄防，泛濫到所有農村，摧毀了村落與作物。連漢口的街上都流注了長江的大水。約兩個月之後長江這條深闊的河道才能排掉長江中游這幾百萬噸的水。沒有人能够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這次水災，但約略估計是兩百萬人。在水災之後又帶來了細菌性腸炎、霍亂與飢饉。一生的儲蓄被洗盡，家園被摧毀之後，推動社會動亂的力量因而亦大為增長。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以後的經濟情況也更爲惡化；國民黨本身很多有力人士仍然與南京政府對立；共黨叛亂份子，卽使不是南京政府的一大威脅，也是南京政府的一大挑戰；再者，日本已經開始侵犯到中國的主權。在這時候，中國國策所面臨的兩個抉擇也就更爲具體。那就是：中國是否應該採取新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動員它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或是國民政府仍要以武力壓抑國內不斷增長的反對勢力而姑息外國侵略者？

事實上，蔣委員長早已做了決定。對他來講，國內的敵人仍需優先注意。日本人侵略之急，國民黨右翼的合作需要爭取，蔣委員長均已納入考慮。但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的時候，蔣委員長對力量相對較弱的中國共產黨較爲注意。蔣委員長似乎未體認到對日戰爭有利於他統治地位的穩固。他似乎也不了解如果不能疏導社會不安的力量，將有另一個競爭的政治團體代起。在這種情況下，他做了他的選擇——「先安內而後攘外」。

這個政策基本上不能赢取民衆的支持。國民政府並未積極推展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而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間的反封建主義，對於幾千萬貧困而無產的農民有著強大、持久的吸引力。由於採取對日本的不抵抗主義，並且給人民一個含混的許諾，說國民政府總會對抗外來侵略者（可能要在中國統一之後），國民政府已經漸漸坐失了可用的民族主義力量，而將這股力量轉手給其他希望掌握政權的人。

國民政府的策略似與整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潮流未合。現存的情勢就過去而言已足以引起叛變。因

爲這時候有一羣被壓抑的農民，而城裏的情況並沒有比較好些。而這時候又加入了其他的新力量。西方的生產方法引進中國城市之後，其產品仍以有著千年歷史的分配制度分配。結果經濟只有更爲敗壞。

同爲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工業文化衝擊而醞釀的社會革命，到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才誕生於中國。而其發展仍未告一段落。只有一樣東西可以阻止中國社會革命的不斷發展，那就是人民經濟生活的改善，也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推行。因爲社會革命的思想直接打動民心，所以也無法阻止其傳播。而將國家的重建只限制在上層的若干改革與創新也是不可能的。一個眞正的社會革命勢必要在廣大的人民大衆中發生。

這個發展在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一度中斷之後的五年，社會革命已由傳統的型式邁向一個更符合時代潮流的階段。一個反對國民黨政策的社會叛亂有了一個更明確的焦點。在中國很多不同地方已經出現了六個重要的蘇維埃地區。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七日，中國第一屆蘇維埃會議在江西南部的瑞金召開。這個會議擬訂了一項臨時憲法，並建立了一個臨時的蘇維埃政府。

漢口的一種英文報紙在專欄中對這件事背後的意義做以下評論說：

「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悲劇性的事情。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都不免要下結論說，不快樂的人們在壓榨、貪婪不能緩和，而接近失望的邊緣，他們極可能要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廣州軍隊的由南移北並非軍隊的決策使然，而是一羣對壓迫感到厭倦的人民，他們希望他們掌握政權之後，生活可以改善，至少是部分改善。……北伐的軍隊還被當地的人民歡迎是從來沒

有過的，而他們因爲以前的主人的鞭笞，只求換個主人，即使吞下蜈蚣也再所不惜。…如果一個蘇維埃政權果眞建立，促成此事者主要將是國民政府的反對者而不是蘇聯或是中國國民黨左翼的能力或努力。」

這一張報紙也刊登了新的臨時蘇維埃政府的外交立場。包括：廢止所有不平等條約、去除外債、收回所有割讓地與租借地、沒收在中國領土上的所有外國企業、將所有在中國的外國軍隊撤出。中國革命勢必可以展開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最後導致世界帝國主義的摧毀。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仍舊躲在上海。毛澤東是瑞金政權的領袖，朱德是軍事委員、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軍事委員會的代理主席是周恩來。這些人所領導的革命運動，透過他們的外交計劃，掌握了「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南京政府遭遇到一個來自遠方的公開反抗，勢力漸大的共黨政權向日本宣戰。

國民政府是如此地忙於內政、外交，以致於到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時剿共之役不得不暫時擱置，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四月，當日本軍隊穿過長城，進軍河北的時候，中國人民的情緒更爲激昂，抵禦外侮的主張也更爲加強。很自然地，輿論要求：爲了全國的統一要停止內戰。

但國民政府並不想永遠放棄剿共工作。當南京的政權鞏固之後，蔣委員長於日本軍穿越長城的四月中又展開了第四次剿共之役。南京政府對當前外來的威脅的迎接態度是：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塘沽協定中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在北寧鐵路與北張鐵路以北的河北境內解除武裝。

第四次圍剿　第四次剿共之役由陳誠將軍指揮，陳誠與蔣委員長同爲浙江人，兩人的故鄉且極接

近。南京動員了二十五萬軍隊來從事這一次的戰爭。一年前來自福建在上海個別攻打日本的十九路軍也銜命參與這次戰役。

但與前面幾次剿共之役一樣，這次戰役亦爲失敗。這次戰役仍集中在江西省，這裏是臨時蘇維埃政府與主要的共黨部隊所留駐的地方。由於無法敵對共黨在山區的機動部隊，陳誠在多次戰役中共折損了三師軍隊，其中被殲滅的兩師是南京較好的部隊。他被解除了指揮權，戰役也結束了。十九路軍在戰役中極不合作。這件事的意義容後補述。

中國共產黨在應付四次剿共之役時都很成功，在被圍剿之下的共軍事實上是力量更擴張，他們的勢力範圍已由江西的根據地擴展到湖北、湖南、四川。有一小支共軍且在山西贏得一個據點。他們透過有效的情報，在山區的高度機動性，民衆在江西基地給予的支持，他們贏得這些成果並培植他們的力量。總之，他們充分利用了有利於游擊戰的條件。

共產黨的地位絕非無懈可擊。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臨時政權成立之後，這些叛亂份子所做的承諾已遠非其能力所能勝任。極左派的領導人物希望直接走向「社會主義」。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一月的憲法納入許多共產黨有關勞工、農業的教條，這些教條就全國而言，或許還有若干推行的可能，但對江西的叢林地區而言全不適合。由於共產黨試圖在那樣一個貧困的農村地區發現依照傳統教條所劃分的社會階級，對農民以及鄉村的手工藝者加以一些硬性的劃分，生產因此大受影響，而在與國民黨競爭的情況下，共黨正需要充分發揮其可能有的產量。

瑞金政權的政策也沒有優先考慮最重要的事情。由於激烈主義的過份舉動，臨時的蘇維埃政權疏離了地方上很多的重要人士。到目前為止，共產黨的力量主要是來自負面的因素。國民黨由於政治、軍事上的若干困難，本身已有促發革命的趨勢。但中國共產黨不能老以為國民黨的軍事困難將會持續下去，德國軍事顧問的影響力已經開始在發生作用。

繼克里伯（Colonel Kriebel）之後担任德國軍事顧問的是魏澤爾(Lieutenant General Geory Wetzell）。然後，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之後，有名的戰略家席克特（General Hans von Seckt）在蔣委員長的邀請之下前來中國，調查中國的軍事設施與當前的軍事情況。在魏澤爾的有力協助之下，席克特設計出一條用來打擊紅軍的新策略。然後他又回到德國，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初再回到中國，在希特勒全心贊同之下，繼魏澤爾之後，充任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團長。

第五次圍剿　第五次剿共之役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月開始，與第四次剿共之役比較之下更可見德國的影響力。蔣委員長採用一種圍攻、封鎖以及逐漸包圍的新策略。除了軍事與經濟封鎖之外，在江西南部共黨整個佔領區的四周還用碉堡、彈藥箱堆成防禦工事。在共黨佔領區的東境，十九路軍略過閩贛邊界，而封鎖住共黨往台灣海峽的前進活動。所有紅軍與外面世界的交通都有著嚴密戒備。所有與「蘇維埃共和國」的貿易也都停止了，這個在萌芽時期的叛亂政府很快就感到鹽、油、醫藥等民生必需品的短缺。

中共一開始就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一個是政治方面的，一個是軍事方面的。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

二年）十一月，國民黨的分歧分子發動福建叛變並設立一個獨立的「人民政府」時，曾給予鄰近的「蘇維埃政權」若干援助。那年年初的幾個月中，中共三度想與其他團體組成聯合陣線抵抗國民黨，當這種機會到來時，却因聯合作戰的條件不够令人滿意而弄翻了這項計劃。如：其他反對國民黨的團體認爲福建叛亂份子的行爲取向太過激烈時，中共竟然還大駡福建叛亂組織是「找尋第三條路線的人」，並召喚福建羣衆起來推翻他們。蔣委員長開始把中共中央地區外圍鐵一般的防線拉緊，時時越過防禦工事向共軍進攻。

整個戰爭的局勢對共黨不利，蔣委員長爲了這個第五次勦共之役，也是具有決定性的一次戰役，動員了七十萬部隊，而共黨才有十五萬軍隊。蔣委員長的軍隊不但軍力佔優勢，軍備也佔優勢，不只是有很多大礮，而且還有一支空軍。國民政府前進的軍隊，兩側都有嚴密的守衞，軍隊後面也有緊密的重點防衛。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卽面臨兩種選擇：嚴守根據地做沒有希望的抵抗，這種抵抗可能會遭遇嚴重損失；或是在國民黨的戰爭策略發生效力以前放棄根據地，再在中國其他地方重新締造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環境。共軍領袖選擇了前者，後來共黨也承認這是他們所犯的第二個軍事錯誤。

中共頑強的防衛當然也有它的政治作用。這時候如果放棄江西，並沒有充分的撤退準備，這對於江西的人民或全國其他地區同情中共的人來說，將是沒有盡到保護蘇維埃政權境內住民使他們免於南京政府統治的任務，而且是一個理由不够充分的撤退。此外，眼看著中日關係的發展，以及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中共由中國東南撤退以求自全似乎爲時過早。這樣一來，在江西的延擱對中共來講，可能還是一

個正確的策略選擇。

紅軍打得很久，很辛苦，國民黨的第五次剿共之役也花費頗多。一九三四年十月，也就是戰爭開始以後的一年，約有九萬紅軍，分成五個軍團，衝破重圍離開江西、福建基地。他們帶著一些拿著扁担的農民，循著不同路線，開始找尋各自的避難所。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在軍事史上並沒有詳細記載。中共殘餘的軍隊，一邊打著中央政府的軍隊或是省政府的軍隊，一邊在崎嶇的西部中國一省穿過一省地長途跋涉。他們一共跋涉了約有六千里路之後結束了這段遠征。而在一年之後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毛澤東率領著約有兩萬軍隊在中國西北的陝西省與十萬共產黨軍會合。中國紅軍，雖然式微，但仍然存在。其他的紅軍在時機到來時，也會前來增強毛澤東的軍力。而從江西出發以來的長征過程中，雖然死了很多共黨份子，但也留下一些決心參與共黨革命運動的死黨。

第三節　西安事變的因果

西南之統一　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剿共之役有一些意外的收穫，在國民政府的軍隊追趕逃亡的紅軍時，他們逐步在雲南、貴州、四川等省建立他們的權威。蔣委員長的政敵指出蔣委員長是有意讓中共西逃的，以便使其政權推展到原在南京政府控制之外的地區。

內蒙之叛離　但是，「收之東隅，失之桑榆」。尤其是內蒙，當國民政府原先答應給予的財政援助

與軍事設備沒有如約送到時，一九三一年四月卽已成立的自治政治分會很快就與南京政府疏離了。一如往者，日本的土肥原又出現了，帶來了禮物，也提出很多的勸誘。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德王正式與日本公開磋商。國民政府在內蒙的官員綁架了德王的官員，其中一位叫韓奉林的，九月時以日本間諜的罪名被殺。十一月蔣委員長考察西北而訪問歸綏時，德王親自與蔣委員長會面。他們仍互道效忠與同情等慣常所說的話。但是實際的政治發展比口頭所說的話來得有力。在過後的幾個月中，德王與日本及滿洲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到一九三五年年底已完全揚棄了中國陣營。

日窺華北　德王的變節有一部分也是受到華北情勢惡化的影響。一九三五年日本已逐步在華北從事政治與經濟滲透。那年一月，日本佔領了察哈爾東部的沽源縣，日本所持的理由是沽源在滿洲國的轄區之內。中日雙方又有新的妥協，五月時另一事件的發生，使中國又做進一步的屈服，這個屈服寫入七月六日簽訂的所謂何梅協定之中。

該協定內容之一是河北省省主席于學忠的退休及其五十一軍的撤出華北。此外河北省的國民黨員也要撤出，並全面禁止抗日的機構與宣傳。在日本的壓迫之下，極享盛名的察哈爾主席宋哲元也遭免職，轉任平津防衛隊指揮及北平市市長。十一月底，南京政府廢除了原由何應欽領導的北平政治分會，並任命宋哲元担任冀察清鄉委員。但是仍然統帥著二十九軍的宋哲元，拒絕接受這項任命。

直到南京政府設立一個冀察政治事務整理委員會，又任命他的屬將張自忠爲天津市長，宋哲元終於接受了維持華北安定的重任。日本這時候正計劃把中國最北邊的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

東轉變成爲一個獨立於南京政府之外的自治區。

剿共新佈署　蔣委員長決心繼續他的剿共計劃。張學良是這個計劃中的關鍵人物，他在歐洲旅行之後，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到中國。在這次旅行當中，他曾經到過納粹德國及法西斯的義大利。張學良回到中國時健康情況大爲改進，而且他的民族意識也比離去時濃厚。蔣委員長任命他做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剿匪總部設在漢口。

當中共退到中國西北時，張又被調到那個地區，將剿匪總部設在陝西省的西安。他的會議廳裏留下一個空位，因爲他的顧問端納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離開了他，轉到蔣委員長處服務。此時有一項心理因素摻雜進政治情勢之中。張學良以及他的東北軍越來越關切他們的故鄉—東北的發展。在當前這種情況下，幾乎不可能期望他們將會專心攻打別的中國人。

將委員長的軍事活動也有另一個改變。席克特因病不得不於一九三六年三月離開中國，改由法根浩森（Alexander von Faulkenhausen）代替。但是以維持國內安定爲先務，無限延緩日本問題的基本政策仍然維持不變。

西南異動　一九三六年中國的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都發展到高潮。這年二月東京發生一次軍變，有很多重要的民政與軍政官員被殺之後，日本政府開始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一次會議中警告說：「日本政府極爲關切共黨在東亞的影響力。由於紅軍在有利的時機將會北進，我們正極關切事情的發展」六月，西南的國民黨人要求南京抗日。由於沒有得到所希望得到的

答覆，西南派的領袖再度開始將他們的軍隊往長江的方向北移。他們因南京政府派出的軍隊阻擋，以及廣東的余漢謀將軍連同廣東的整個空軍投奔蔣委員長而無法再往前邁進。

余漢謀的離去導致陳濟棠在廣東的軍事設施的崩潰，而使得國民政府的勢力可以延展到廣州來。廣東的政治分會也解散了。這個政治分會的主腦人物—胡漢民也於五月時去世。一九三二年黃紹竑已離開廣西派而與中央政府結合。留在廣西省的李宗仁與白崇禧顯得非常孤立。

蔣委員長進而準備與廣西軍一戰。蔣委員長派遣黃紹竑與他以前的同志進行磋商。最後，李宗仁到了廣州，在與蔣委員長的一次會議中，雙方妥協，李宗仁與白崇禧仍然留在廣西，但接受南京政府授予的頭銜。南方的分裂主義已持續二十年之久。南方與中央政府間的敵對狀態至此結束。但是舉國對南京政府所持政策的反對仍有增無減。

抗日要求　一九三六年五月救國會在上海成立，使得民衆的不滿更有自由發言的機會。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多半是知識份子，有些共產黨員也在其中活動。透過煽動與宣傳，這個組織試圖促使政府放棄內戰並起而抗日。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暫時妥協政策沒有改變，由於親納粹的國民黨右翼份子的支持，以及德國軍事顧問的戰略建議，國民政府對於報紙的批評以及知識份子的請求均未措意。此外，國民政府也忽略了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以來的叛亂運動中隱含著一個警告：一股澎湃的民族主義再度變成革命力量。即使在中國的軍方也有這種趨勢。

尤其，蔣委員長似乎未注意到張學良的東北軍心中根深蒂固的反帝國主義意識。東北軍被逐出東北之後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目前正要與西北的共軍對敵。此時的軍事情勢與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九路軍由東側的福建打擊共黨相似。但整個政治氣氛已顯著改變。

陝北的共黨　共黨將其總部設在陝西省西北部乾燥山區深處的保安。在江西的時候，貧困的共黨領袖把革命的重點放在反封建上面，並且也得到一些支持，但不足以激發全國響應。社會激烈主義者後來希望採取更激烈的革命手段，使毛澤東手下的一羣人可以與蔣委員長優越的軍事力量對抗，進而取得政權。

新的力量已經出現。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月瀋陽事變之後，日本每次侵略所增加的危機都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更加泉湧而上。共產黨的工作在運用這股力量發動革命。由於歐洲局勢的惡化，導致俄國的世界政策改變，也使中共得到助力。

到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中共已正式結合成一個抵抗共同外敵的聯盟。一九三九年第七次共產國際會議指示所屬的共產黨要以各種方法試圖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兼國際性的聯合陣線。尤其在相關的共產國際決議書中更指出：「蘇維埃運動在中國的擴展以及紅軍戰鬥力量的加強必須與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發展相結合」。

中國代表王明（陳紹禹）很忠實地實踐共產國際的指示。他說，中國正遭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唯一解救中國的辦法是：爲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而做的神聖民族革命鬥爭，運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

陣線戰略，使整個中國動員起來。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毛澤東承認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與十九路軍結合的錯誤時，他贊同民國二十四年共產國際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春共產黨從保安基地與張學良有了祕密接觸。這年夏天，這一連繫發展到中共代表經常住在張學良軍隊總部所在的西安。蔣委員長很可能期望在下一次剿共之役中能同時剷除紅軍與張學良的軍力。但蔣委員長不知道東北軍早已轉向。

一九三六年秋，紅軍又會合一次。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徐向前的四路軍已經北上，與毛澤東的軍隊在新的基地會合。賀龍率領著第二支軍團，離開他在湖南與湖北邊界的根據地，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也在中國西北與共軍會師。中共此時約統領了八萬的「正規軍」，其他還有許多士兵。他們的來福槍與軍人數目相對而言仍少了很多。但很明顯地，他們已不再是一支「殘餘的軍隊」。事實上，他們的軍力幾乎與兩年前由江西開始長征時一樣多。

西安事變　就在這年十月，中共在西北完成會師之後，蔣委員長到西安與張學良商討第六次剿匪之事。張學良建議蔣委員長停止內戰，建立一個全國的聯合陣線，並與蘇俄聯合，以進行對日抗戰。蔣委員長很嚴厲地拒絕這些建議，並回到隴海鐵路東端的洛陽軍事總部，以便繼續掃除國內的敵人。在上海有七名愛國的救國會的領導人物被捕。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反共國際公約簽訂，在這同時整個國際事務也顯出戰爭卽將到來的惡兆。而在甘肅，紅軍也給蔣委員長的第一軍相當嚴重的打擊。

十二月七日，蔣委員長回到西安通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與西安綏靖公署副主任楊虎城第六次剿匪之役卽將發動，攻擊令將於十二月十二日公佈。十二月十一日張學良、楊虎城以及很多師的師長會合並擬下他們的計劃。在十二月十二日這個關鍵的日子，他們拘禁了蔣委員長。然後他們拍了一通電報給南京政府，並告知全國這件事。他們提出的八點計劃當中的第一條是改組一個容納各黨各派的國民政府，迅卽停止內戰，全面武裝抗日。

南京政府大爲震撼。軍政部長何應欽建議使用原來儲備用以剿共的炸彈對西安發動懲罰之後，何將軍的計劃似乎沒有把正被拘在攻擊目標的蔣委員長的可能遭遇給予很多考慮。年前曾被暗殺、此時正在德國的汪精衛已康復，與何應欽連繫過後啓程返國。很顯然地，他認爲這是他取得國民政府領導權的一個機會。

西安較激烈的叛亂份子想殺蔣委員長，但是政治有時非常奧妙。一九二七年促成國共分裂並處死很多共產黨員的蔣委員長，却爲國際共黨所救。國際共黨派來營救的人就是周恩來。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蔣委員長清黨時周在上海僅以身免。反叛的國民黨員張學良、楊虎城的八點計劃主要部分與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國際共黨的指示互相吻合。中共因而很快前來支持八點計劃並贊成組成一個包括蔣委員長的國民政府在內的聯合陣線。十二月十五日周恩來在紅軍指揮葉劍英及前中共書記秦邦憲（博古）的陪同之下抵達西安。

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與蔣委員長進行協商，希望他接受八點計劃。

端納、宋子文、蔣夫人也由南京搭機來到西安，共同參加討論。十二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考慮接受抗日要求，並停止內戰，而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被釋。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所計劃的懲罰之役因而取消，仍在海上的汪精衛，原有可能以勝利姿態回到南京，此時改變行程只到上海。就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那個重要的月份中，紅軍佔領了陝西保安以南的延安。

西安事變深深影響了幾個重要人物。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到三〇年間以中國政治家少有的風度爲蔣委員長服務的張學良伴著蔣委員長回到南京，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一月起，張學良因爲這件叛逆事件被判處十年徒刑。但他很快就得到特赦，而被安置在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本人的監護之下。在本文撰寫之際，也就是此事爆發之後二十五年，他仍在蔣委員長的監視下住在台灣。西安協議停止內戰、並恢復國共合作，也影響到另一個政治人物。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四月，蔣委員長的哲嗣蔣經國，在離國十二年之後由蘇聯帶著他的俄籍妻子回來。國共由合作破裂到恢復之間已經過了十年。

國共再合作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促使毛澤東與朱德攻擊市區的李立三路線已經失敗。隨後共黨努力建立一個以鄉村的反封建主義爲基礎的革命運動已有若干顯著的成效，但到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却受到有著優越武器、精密戰略，而且受過訓練的部隊越來越多的威脅。在另外一種政治情勢之下，蔣委員長在其德國顧問的協助之下可能可以順著自己的意思行事。

但是中國正在萌芽中的民族主義已摻雜進來阻撓這項軍事活動。正如民國五年雲南的蔡鍔將軍因爲對帝制自爲的袁世凱的反叛而使全國團結起來，馮玉祥、廣西李宗仁和白崇禧、福建陳銘樞和蔡廷鍇的

叛亂都爲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的政變舖了路。民族主義的革命力量使蔣委員長改變其內政與外交政策。再度正式與全國抵抗外敵策略相結合的中共，此時也就免於警察的威脅而可以得到保護。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時，雙方都曾善用反帝國主義的雄厚力量。中國政治的未來有一部分要看第二次國共合作中那一方面更能成功地運用這股力量。

第四節　中日衝突與國共聯合

日本加緊侵略　日本密切注意蔣委員長西安蒙難後駭人的發展。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關東軍正式表明日本的立場：

「例如中國中央政府在國內粉碎共黨，並採取長遠的政策與日本共同防範共黨，關東軍將樂於相助。假如，中國政府與共黨及其無數成員妥協，並接受共產主義及抗日政策，關東軍將如他以前所宣布的，爲了維護滿洲國及東亞和平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一九三四年的天羽聲明中事實上已指明日本要單獨保護中國；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日本外相廣田的三點原則之一是建議中日合作打擊共產主義；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簽署反國際共產公約之後，日本一直想拉中國加入聯盟，此時日本軍方已很簡明的表示可能採取軍事行動。

抗日陣線的建立　在蔣委員長回復自由之後，雖然南京政府一直設法避免公佈外交政策的轉變，但事實已越來越明顯。第六次剿匪之役並未展開，而事實上內戰已經休止。西安所達成的協議只是原則性

的，而且也是口頭的。此時又展開一些公開或祕密的協商以討論抵抗日本擴張的具體措施。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南京開會。在開會之前收到共黨中央委員會二月十日的一通電報要求停止所有內戰，集結全國力量抵抗外侮，並加速準備對日本的抗戰。這電報並指出如果國民黨接受這些建議，共產黨答應以下條件：⑴停止全國各處推翻國民政府的軍事活動。⑵將蘇維埃政府的名稱改變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將紅軍改為中國國民革命軍，這支軍隊將受南京的國民政府的直接指揮。其他還有許多點，但以前面兩點之承認南京政府在民政方面與軍政方面的權威最為重要。

日本竭力禁止新的政治趨勢的發展。他們的最終目標仍是達成廣田的三點原則：⑴澈底壓抑中國的抗日思想與活動；⑵簽訂中日軍事反共公約；⑶日本、滿洲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並使華北特殊化。國民政府知道中國所要付出的代價是中國要置於日本的支配之下。在這種日本提議的關係中，國民政府將喪失其獨立地位。若只是單純為了自私的理由，國民政府不能接受這些建議。

曾為東京參謀本部單位主管的北政一，剛剛被指派到南京充當軍事隨員，三月時在一次河南、山東、華北的旅行中訪問了中國的軍事方面人物。日本在華北駐屯軍的總司令田代皖一郎、田代久一郎，與宋哲元頻頻接觸。宋哲元是冀察政治分會主席，此時的處境不算順遂。日本大使在南京一直強迫外交部長王寵惠從速訂定中日合作方案。日本軍方人物在天津、上海頻頻聚會，中國官員也往來頻繁。更重要的是，國共之間仍不斷進行討論，一邊有國民黨官員在陝西北部與共黨磋商，一邊有周恩來在牯嶺拜訪

蔣委員長。

四月底川越茂爲了一個重要的會議回到日本。五月十日，他在東京向國防部長杉山元、海軍部長米內、外交部長佐藤做一份有關中日關係的詳細報告。幾天以前的五月七日杉山元拒絕與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會談日本準備侵略中國之事。但是在這同時，佐藤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表示他對未來的中日關係表示悲觀。

五月十日的報告內容自然沒有直接披露，但是可以想見川越茂的報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日方宣佈日本遣派三師軍隊到中國，一師到滿洲國，一師到熱河與中國本部的邊界，一師到青島。在五月十九日的緊急會議中杉山元向被召集到東京的各地首長表示：中國的過分自信導致中國採取一種侮辱日本的政策。他又說，中國可能一開始就會阻止日本向中國的和平擴張。在佐藤這方面，五月二十四日他告訴東京自由貿易協會，假如日本的榮譽與威望受到損害，除了訴諸戰爭之外將別無選擇餘地。

中日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受中日雙方頻頻壓逼的宋哲元，回到山東樂陵老家以逃避雙方給予的壓力。根據日方報導，在遙遠的西北中國，蔣經國正與周恩來進行磋商給予中國共產黨法律地位的問題。

最駭人的改變還是在日本發生的。六月五日，近衞文麿所領導的內閣壓倒林銑十郎將軍的內閣成爲新內閣。杉山元仍爲陸軍大臣，米內仍爲海軍大臣，但廣田回來取代佐藤成爲外務大臣。除了外交任務之外，廣田還要領導國家計劃委員會。同年六月五日，讀賣新聞引述廣田外相的話說：廣田所提出改善中日關係的三原則都只是抽象的言語，在雙方關係發展到要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時，這些原則不復可行。

日本在華北的軍隊總司令也由陸軍少將香月淸司接替田代少將。

蔣委員長所在的避暑勝地廬山，也異常地忙碌起來。張學良的東北軍已由陝西、甘肅遷到河南、安徽，並重新編入國軍，十二月西安事變所留下的政治陰影隨之一掃而空。張學良在蔣委員長自己的監護之下，與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終於被任爲特使到國外研究軍情，六月底由上海啓航。蔣委員長及其他重要將領之間已經開過幾次重要會議，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四日之間在廬山有一連串的會議。七月四日廬山開始對一萬四千名挑選出來的軍事人員給予特殊訓練。出席夏天這些會議的人物當中包括了毛澤東、朱德與周恩來。

七七事變　七月七日，星期三，在北平是一個溫和的夏日，空氣中一點也沒有特殊緊急事件卽將到來的那種感覺。這天夜晚，演習中的日本部隊要求進入距離北平不遠的宛平城門，說他們有一名士兵失蹤了，他們要到城裏找這名士兵。主管宛平軍務的官員拒絕這項要求，日方開火，中國方面也予以還擊。此卽盧溝橋事變。這件事一開始發生時，中國人原以爲可以和瀋陽事變一樣和解。事實上，據報導，冀察政務委員會曾經爲此事寫下致歉的文件，並答應撤出引起糾紛的中國軍隊，懲處「藍衣社」（南京一種法西斯式的團體）、共產黨及其他有礙中日友好關係的公開組織。這些讓步將使日本至少在華北得以推展廣田三原則。但是南京政府很快就宣佈不承認未經其批准的任何地區性協議。

宋哲元終於離開樂陵，而於七月十二日抵達天津試圖調停最近所發生的諸多事件。但「協議」頻頻通過之後很快又復破裂。事實上，第二次中日戰爭已經開始。這場戰爭已不可能停止，因爲中國方面舉

國已經被要求不再做任何撤退，日本方面也已決定用武力解決問題，日本軍隊此時正傾入中國。

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正在北平街上挖著濠溝，其目的與其說是要對轟炸北平城的敵軍做決死的巷戰，不如說是要避免駐紮在老租界的日軍的任何突襲。當有一支日本騎兵由那方向走近時，在防禦工事上的中國軍隊開了火，結果這個「敵人」竟然是美國水師（駐紮在北平的外軍兵團中唯一騎馬的水師），但中國人如何知道他們不是日本人？有一名水師受傷，其他人在誤解澄淸以前一直隱避在街邊。這是北平故都唯一的流血事件。

但在這同時的華北其他地區，情況很快就惡化了。七月二十五日在一場熱戰之後，由天津前進的日本軍取下了到北平途中的楊村火車站。七月二十六日香月將軍下令在隔日正午以前一定要馮治安將軍的第三十七師撤退。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宋哲元及其屬下兩名軍官率領著三十七師離開北平。

在北平南方的南苑，中國部隊遭遇埋伏並受到屠殺。在北平東方有很多道觀、佛寺，以及外國人優雅的夏天別墅的西山上空，日軍的轟炸機接連盤旋了好幾天。而後戰爭的聲音逐漸微弱。八月八日北平租借地的住民站在古老的城牆上看日本軍隊進入北平。這座古都已經看過許許多多的征服者，這次來的是日本人。

共黨在抗日中的謀略　蔣委員長與周恩來在一段相當長時間的磋商之後，於九月間正式宣佈國共二度組成聯合陣線。中國爲生存而戰的戰爭已經開始。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加入聯盟之後，並沒有放棄其引入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目標。他們對這種

作法也不隱瞞，他們聲稱他們目前不過是爲了適應中國的緊急需要而改變其戰略而已。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針對「國共組成聯合陣線後，中國革命的迫切工作」做公開聲明說：「兩黨的再度結合使中國革命邁向新的紀元」。在他看來，這個聯合陣線是符合人民需要的，但這不是單純的兩黨結合而已，而應該是一個全國在守著一般政策之下爲戰爭而動員的全國性聯合陣線。

一般政策何謂？毛澤東解釋說，這應該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中共於八月十五日提出的：抗日與救國大計劃。因爲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並非不能妥協。

共產主義在未來的革命發展階段中將會實現。共產黨徒並不敢希望目前即能實現共產主義，只求實現由歷史決定的國民革命與民主革命原則。

毛澤東認爲後面兩個原則與三民主義可以互相對應：「中國共產黨始終未放棄其反抗帝國主義的堅定原則，這也就是民族主義。蘇俄式的人民會議也就是民權主義，農業革命無疑的就是民生主義。」

簡言之，中共已預料到中國人民在一場抗日的民族戰爭中將會掀起一股羣衆力量。中共毫無疑問的是希望：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國民黨與共產黨將競爭著去爭取人民的效忠。這種情形今天可稱之爲「競爭性的共存」。爲了與國民政府組成聯合陣線，中共事實上已同意放棄以暴力推翻國民黨，放棄蘇維埃化、取消蘇維埃政府、停止土地沒收政策「紅軍」的稱呼也取消了，共黨軍隊被重組成國軍的第八路軍，名義上是由中央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所控制。

表面看來，這個即將到來的安排基本上已經回到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間國共合作的情形。在那

次合作中兩種軍隊爲了共同的目標而結合。在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九月這個歷史性的日子，爲了適應國家的處境正式與中共妥協的國民黨發佈宣言說：「我們應該誠摯地結合起來，以便使我們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可以確保中華民國的繼續存在」，「國民政府也樂於接受任何一個政治組織的服務，只要其誠心爲了國家的生存而努力，並願意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下與我們共同參與反抗侵略的戰爭。」

兩黨也就這樣在表面上同意維護其個別的目標。但是孔子在兩千年前就曾勸告說：一個政府最先要完成的一件事是「正名」。他告訴他疑惑的詢問者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國民黨與共產黨口頭上都說遵守三民主義，但從民國十六年以後，兩黨對於「民族」、「民權」、「民生」等主義的詮釋卽有很大距離。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共黨再度與國民黨結合時，由於有前次結合時所得到的教訓，更加小心翼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共黨的地位與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結合時他們所佔的地位相比有三大不同點：其一，中國共產黨已更強大，比早期受到更多鍛鍊；其二，共產黨這時有自己指揮的武裝部隊，卽使有九月的協議，他們也不希望放棄這支軍隊；其三，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北伐時主要的敵人是國內的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動力並未充分發揮。此時全國以日本爲最大的威脅，中共知道：在國內鬥爭中勝利的將是最能利用反帝國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政黨。

國共雙方也就在很多欺騙、血鬥的回憶中，也在有著很多內心的保留之中，走進新的合作關係。對中共而言，這次結合是考慮了共產國際所決定的國際政治、國內權力因素以及中日關係的緊急狀況之後

所完成的一次「形式的婚姻」。對蔣委員長而言，與共產黨的再度結合無異爲一次決鬥之後而得的婚姻。面對著日本，國、共兩黨都認眞的考慮到日後雙方在國內將會有的較量。

第八章　中日戰爭（一九三七——四五）

一個統一而又能抵禦外來侵略的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極端份子而言，並不是什麼好事。這些人爲求向中國大陸擴張，十分介意中國本身的改善現狀。如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關東軍裏頭的年輕軍官，就常想趁着中國還不十分強大，搶先予以襲擊。而滿洲的輕易得手，國際制裁的缺乏，以及納粹和法西斯的氣焰高漲，正不啻予日軍以鼓舞，促之再將華北地區變成第二個滿洲，爲其大陸政策紮基。中國西安事變及採取統一戰線之後不到半年，亦即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這批軍官就在北平十哩外的盧溝橋製造事端，立刻與當地守軍衝突起來。中國政府眼見已經激起敵愾同仇之心，而和平解決又不可能，遂毅然宣佈，要爲生存而戰至最後一兵一卒。日人原想短時間解決的戰爭，却因此變成一個漫長的消耗戰，拖到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爲止。這個間隔不到半個世紀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使兩個國家都遭到嚴重而無以復加的慘痛影響。它不但使日本在其近代史中第一次落敗，而且更澈底削弱了中國的國民政府，開啓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大門。

第一節　日本軍國主義的得勢

雖然外表上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的「中國事件」，不過是一個由關東軍籌劃的地方性問題，

但實際上却是經過審愼計議的陰謀，而其中又表現出日本軍人與文人政府，以及軍人與軍人之間的一系列衝突。滿洲的輕易得手，使得這些軍國主義者在文人政府中的地位，一下子提高起來。甚且忽視傳統所謂軍事不得干預政治的誡諭。這批少壯派軍人開始攻擊政黨出身的官員，公然責其國務處理不當，降低了日本的國際地位。一種沙文主義式的嫉羨，使他們鄙夷官僚的無能及腐敗，並譴責財閥造成經濟蕭條。他們又自認國家的救主，誓言掃除國內的障礙，成功一次「昭和の復興」；如此一來，天皇就能透過軍隊，重建其與廣大農家及百姓的直接關係。由於任務如此「神聖」，致令少壯派軍官目中無人，直認軍隊的聲望與地位高過一切，不容任何力量凌駕於其上或挖角於其下。他們貪圖權力而又無情，公開主張擴張，隨時準備叛變、恫嚇與暗殺，其舉措正顯示某種「異常行爲」類型。的確，其目無法紀、橫行霸道的作法，就連那些年紀稍長、訓練較佳的軍官也難忍受。話雖如此，但少壯派軍官並未因此收歛，他們自稱代表人民的心聲與日本的未來。另外，他們又得到激烈派政客與政黨的支持。從一九三二年到三六年，軍國主義者在國內政界繼續抬頭，直到完全凌駕在政黨政府之上。不能不說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個悲劇。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的政變　軍國主義者所以能迅速得勢，部分是因爲使用政變及暗殺手法。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春兩度流產政變之後，少壯派軍官乃採用政治謀殺方式，於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春天有效地剷除了前任財相兼銀行總裁，以及三井財閥的領導人。接著，在五月十五日一羣陸軍及海軍軍官攻擊東京警察局、銀行與政黨總部，成功地謀殺了首相犬養毅，原因在該氏不准對

中國採取軍事行動而贊成談判妥協。事後兇手又主動向警方投案，大胆地向行刺的後果挑戰。此案的審判竟變成爲這些謀叛者的主張作免費宣傳。而讓羣衆爲所謂的「消除昏庸政官、腐敗官僚及自利財閥」諸論調，產生廣泛的同情與憐憫，最後竟然使得檢察官與輿論界不但不將兇手視爲殺人犯，反而當作英雄。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成立以來的政黨政府，經此致命的一擊之後，一蹶不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接下來連續兩任首相人選的抉擇，就驗證了軍國主義者強而有力的影響。政友會曾提出名義領袖鈴木喜三郎博士作爲提名之候選人，但陸軍堅持平沼喜一郎男爵（該氏爲激烈的「國寶社」之領袖）。結果逼得元老政治家西園寺不得不另外舉出齊藤誠海軍大將做爲折衷性的候選人。齊藤的內閣維持了兩年，即到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七月爲止。齊藤的下一任也一樣又以海軍軍官爲首，即岡田敬助大將。他的任期到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的政變爲止。這段時間中，主戰派及政治激烈派氣焰越發囂張，推動國家進一步踏上法西斯與極權主義之路。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政變　在對抗文人政府之時，陸軍雖曾合力奮鬥，但蕭牆之內也有爭鬥。有些年紀較長的，比較負責任的軍官仍服膺傳統的規避政治之訓諭，但其他許多人則熱衷政治，並且愛管閒事；二者慢慢形成了不同的集團。一個是「皇道派」，包含年青而富衝勁的軍官，在陸相荒木、副參謀總長眞崎及憲兵司令畑的領導之下，要求軍事獨裁，控制國家預算，擴展海、陸軍，使基礎工業國有化，在亞洲擴充版圖，以及對中國採直接行動。另一個集團是「統制派」，包含年長的，較受過訓

練的高階軍官，如長田鐵山、安部信行、寺將軍，奇怪的是東條英機也在其中。他們也一樣主張強勢對外政策以及將日本的盟主權擴大到亞洲，但不贊成直接行動及恐佈手段，而主張透過合法方式及適當步調來獲得影響力。

軍隊內部的衝突加深了不穩及混亂。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少壯派軍官中的一小撮，不滿於齊藤元帥無法遵照皇道派的要求來從事改革，陰謀殺害所有閣員及政黨領袖。雖然此一荒謬絕倫的謀反被及時揭露，避免了一個大型流血事件，但這些代表軍國主義與沙文主義新興浪潮的四十四個攻擊者，卻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才被逮捕送審，但又在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被釋放。無論如何，本次政變的失敗可以說是統制派在權力鬥爭一個回合上的勝利。荒木將軍的職位由林銑十郎所取代。而為了減低兩派之間緊張的程度，林銑乃將擔任軍事教育總督察的眞崎將軍予以調開，代以比較負責的渡部重太郎中將。這個調差的主意是出自統制派的永田將軍。然而好景不到一個月。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永田就被一年青的軍事激烈份子　相沢中校　所弑。此人後來雖然被判死刑，但已經無法壓抑少壯派軍人法西斯主義的氣焰了。因此，一旦財相在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大量削減軍備預算，這派軍人又決意再大幹一番。

二月二十六日一羣年青軍官及一千四百名士兵，由安藤哲郎上尉率領，控制了東京的心臟地帶，佔領了國會大廈、警察總局，與陸軍省。侵入首相官邸，誤殺了首相的妹夫。此一事件中被殺的還有一位前任首相、財相、以及軍事教育總督察。一直到皇室部隊包圍了反叛者，宣布詔書，令其返回駐地，這

個政變才被控制住。審判的結果，處決了十三名軍官，並將荒木與眞崎打入後備的部隊之中。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岡田元帥辭首相職，改由廣田繼任。廣田氏自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以來卽担任外相一職，以激烈及主張侵華論著稱。藉著軍國主義者的支持，他答應「改革」政府，並指派許多由陸軍所默許的人員入閣。

廣田的對華政策 廣田外交政策目標放在孤立中國，俾迫其就範上面。同時又要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以防阻這些國家擴大對亞洲的影響力。爲求政治與經濟上由中、日、滿洲共同組成聯盟，廣田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提議在三個條件之下改善中日關係：㈠中日親善，中國承認滿洲國；㈡中日滿經濟合作，共同開發華北；㈢中日滿共同防共。主要目的在迫使南京政府承認滿洲的既成事實，華北的自治運動，以及中日共同抗俄的必要性。中國政府拒絕了上述原則，同時也提出三點：㈠中國領土完整；㈡中國主權不容侵犯；㈢中日關係以平等互惠爲基礎。果然不出所料，此次外交折衝沒能產生具體成果。

日人在華北的活動越來越變得令人無法忍受。他們在華北五省　河北、察哈爾、綏遠、陝西與山東　發起自治運動，並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成立「冀東自治政府」。中國政府爲尋對策，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總部設在北平。然而，磨擦事件層出不窮，日本浪人及韓國人、台灣人的公然涉入大規模的銀元及痲醉藥的走私，更使問題惡化。從許多方面看來，華北已儼然爲第二個滿洲國。同時，日人更在中國境內接二連三地製造是非。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六月，日本駐南京

副領事突然失踪，給予日本軍閥藉口，威脅侵佔南京某地，以爲談判的基礎。而俟數天之後，該名失踪的副領事又出現了——原來他自己跑到深山之中企圖自殺，但因受不了飢寒又回來了——緊張的局面才頓時冰解。其他事件中，則包含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日本未經中國同意，擅在四川成都設立領事館，致令憤怒的中國民衆將四名日本記者誤認爲該館領事而予以毆斃。此事後來經中國政府將兩名肇事者處決而不了了之。

在這些事件之中，中國人民要求抗日的情緒一天一天地高漲，全國杯葛日貨，削減了兩國三分之二的貿易。由於以民主黨黨員居多數的國會提出要求，廣田乃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夏與中國重開談判，提議：㈠停止中國境內的反日行動；㈡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㈢中日共同反共，尤其反對外蒙；㈣中日經濟合作；㈤中國政府雇用日籍顧問。上述條件中，特別是最後一條帶有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廿一條要求的性質，被中國提出相對的條件之後予以完全拒絕：㈠終止日人、韓人及台灣人的走私；㈡日本撤退在河北、察哈爾的駐軍；㈢停止日人發動的自治運動。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談判破裂。

對其他地方的外交，廣田立意孤立蘇俄，準備對英、美作戰，以及與德、意合作。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與德國簽訂防共協定，次年又與意大利簽訂同一協定。在廣田的領導之下，日本已成爲極權國家，越來越靠近戰爭的邊緣。

廣田內閣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倒台，翌年二月林將軍上台。新外相佐藤尚武採取

親善的對華政策，恢復經濟關係，雙方在較次要的問題上頗能獲得解決方案，然而華北却依然是一個特殊地域。這時的中國已經進入「統一戰線」階段，無意再做進一步的退讓。林內閣四個月後倒台，接著上台的近衛文磨公爵內閣則完完全全被軍隊所主宰。關東軍參謀長東條將軍主張對華用兵。雖然他的策略未被東京接受，但華北的日軍已立意自行採取行動，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製造了一個衝突事件。

第二節　一個未經宣佈的戰爭（一九三七年）

盧溝橋戰事爆發與平津易手　藉口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和約中，准許簽約國於北京到海口一帶駐軍，日本在華北的部隊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上旬，在北平市郊盧溝橋舉行軍事演習。並藉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在七月七日深夜以前進入宛平城內搜查。當地守軍——宋哲元手下的第二十九軍——予以拒絕，日軍於是轟炸該城，七月八日早晨四時三十分進佔該地。就這樣，掀開了兩國之間未經正式宣佈的戰爭。

嚴格說來，日軍所謂根據和約行使軍事演習於法並無根據，因爲該約第九條提供北京到山海關之間，有十二個地方得由各簽約國駐紮有限的軍隊，即英、法、德、日各一千三百五十人，意大利五百人，蘇俄三百人。而宛平城以及盧溝橋並未在名單之內。事實上日本的駐軍在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時，已經是法定配置數的四倍。日人不光在條文方面違反規定，而且就以往軍事演習的先例而

言也越出常軌。過去，外國軍隊通常都選擇山海關（離北京最遠的地方）來演習，以避免激起中國的敏感。除此之外，特別是在中國政府首都已經從北京遷到南京之後，日人是否可在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的時候，仍然引用該和約也不無問題；因爲這樣一來，從首都到海岸之間，自由通行的條文已經沒有意義。

一旦發生敵對行動，日軍立刻從滿洲與本土增援，不斷湧入華北，佔領了北平郊外所有戰略要點。從日軍作業的井然與迅速，顯然可以發現，盧溝橋事件不過是一個大型計劃的開端而已。而中國方面組織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南京政府，此時也已決心開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集會議，斷然宣佈：中國到了最後關頭已別無選擇，要爲國家的生存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但爲求事態或許仍有轉緩餘地，他提出四項最低條件：

1. 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2. 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3.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換。
4. 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蔣明白指出：中國熱望和平，但是並非不擇手段；中國不尋求戰爭路線，但若戰爭逼迫眉睫，則中國別無選擇，必將戰鬥到底，絕不妥協。熱切希望中國的人民與社會團結起來做神聖的一戰。他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

心。「抗日戰爭的實際行動，自從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以來一直忍耐未發，如今終於確定其凝結性及意義。中國人民及各黨各派——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等等——都熱烈響應，支援作戰。

假使中國決定長期戰鬥，則日本並無必要陷入這個亞洲大陸的廣大土地而不能自拔；依參謀本部的看法，蘇俄依然是主要的敵人。日本所要求於中國的，是迅速攫取華北，得到中國經濟上的合作。由於蔑視中國投入全面戰爭的能力與意願，日本軍方答應三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假使純就軍事觀點來看，似可如此預測。

現代化的日本軍隊實非中國部隊所能望其項背。在重創二十九軍之後，日軍即停下來佈署，計劃在七月底攻取北平。國民政府鑒於若採取有效手段來防衛此一保有悠久歷史寶藏及文化的古都，則無疑將使這些無價的歷史文物及藝術珍品遭受難以言喻的損失，於是決定讓北京逃過這個浩劫，而下令於七月二十八日撤退。兩天之後，天津也接著淪陷。

日軍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　八月十三日日軍在上海——全國經濟重心——開闢第二條戰線，目的是摧毀中國參戰的經濟來源。在該地，蔣投下他最優良的，由德國人訓練的部隊——八十七與八十八師——成功地使日軍在三個月內毫無進展。雙方的損失都極慘重，有人就批評蔣，說他這個決定的代價太高。但無論如何，這次英勇的禦敵行為，證明中國如果一旦下了決心，就能使侵略者遭到挫折。而這個啓示也大大地鼓舞了中國人的士氣。然而日人側翼迂迴進攻的戰術終於奏效，造成中國軍隊的防禦陣線意外快速的解體。造成通往南京的路上缺乏防備，致令日軍迅速推進，兵臨了中國的都城。這個時候，

德國出面調停。

德使的調停　德方並不喜歡日本侵略中國。他們不祇担心如此投注部隊會鬆懈對俄的壓力，而且也恐怕中國因此轉求蘇俄的援助。柏林方面也不曾忽略另一敏感問題，即他們幫助中國訓練軍隊來抗拒的侵略者也同時就是在防共協定與德攜手合作的盟友。基於上述理由，柏林指示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向蔣提出日方擬具的和平建議：㈠內蒙自治；㈡擴大華北非軍事區，中國在此非軍事區享有行政權，但不得派任反日官吏；㈢擴大上海非軍事區；㈣終止中國反日活動；㈤中國有效制止共產黨，以及修改關稅規則，俾有利於日本。

蔣委員長的將領們勸他慎重考慮這些和平條件，然而在展開外交談判之前，日本的狂攻導致南京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陷落。勝利使得日本軍閥要求東京當局中斷談判，否則修改條件。十二月二十日日本政府透過德國大使要求中國答應：㈠放棄反日政策，與日本和滿洲國聯合反共；㈡賠款；㈢與日本和滿洲國簽訂經濟合作條約；㈣接受日本前所要求的華北非軍事區和上海非軍事區，並允許此軍事區自治。

東京方面同時警告，假若拒絕這些條件，將迫使日本從一個激烈的新角度來重估這場戰爭；換言之，第二次轉達的這份意見書實等於哀的美敦書。蔣的德籍顧問福根浩森將軍得到柏林方面指示，勸蔣接受，認爲戰爭的延長對中國不利。而當蔣正在權衡各項可能而有所延遲之際，日方第三度提出甚至更爲嚴苛的九點條件意見書，令德國大使亦不便轉達，同時蔣氏亦決定拒絕和平談判。將首都搬到四川的

重慶，希望憑藉高山、深谷與長江三峽的激流來阻擋日軍的滲入。作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氏本人留在戰略要地武漢指揮軍事作業，其他在佔領區中的學校、工廠，與各種設施則被勸導盡量移往內地。西南諸省於焉成爲中國抗日的新基地，粉碎了日本迅速解決中國的迷夢。

日軍屠南京　南京一陷落，慘不忍睹的十萬人混亂大屠殺以及無法勝數的姦淫案件接踵而來。這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南京大屠殺」，它慘酷的程度甚至令日本軍閥都刻意掩飾，不敢公諸日本輿論。等戰後國際戰犯法庭在東京開審，這個事實終被揭露，日本人民大爲其暴行所震撼，深深引以爲恥。

攻克南京之後，日軍主力沿津浦鐵路北移，另一支則從華北南指，企圖用鉗形夾攻來封鎖交通要津—徐州。但於一九三八年，三、四月之後在徐州附近的台兒莊遭逢中國軍隊英雄式的抵抗，傷亡三萬。這是中國軍隊在南京淪陷以來主要的一次勝仗。但仍於五月十九日撤離徐州。繼而在六月炸毀黃河河堤，以減緩敵軍的前進。

武漢陷落　接下來的一個主要戰場是武漢，蔣設總部於該處。日軍以十二個師分沿長江與淮河兩路進逼。四個半月之中，雙方大小交戰共計數百回合，中國軍隊終於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棄守。武昌之陷，及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已經使一些信心不堅的國民政府領導人開始失望喪志，但蔣則說到做到繼續爲抗日而奮戰到底。

武漢淪陷代表戰爭第一階段的結束。爲期十六個月。在這段時間，中國人以空間換取時間，引誘敵人深入內陸。拖垮了日本爭取速勝的策略，令日軍深陷中國腹地而不能自拔。

戰爭膠著與傀儡政權的出現　戰爭的第二階段——從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的珍珠港事變——基本上是個消耗戰。日軍佔領的是中國東半部大部份的都市與交通路線，而中國人則採焦土政策，配合戰略性撤退與游擊戰。雙方打了無數拉鋸戰，而整個的局勢正慢慢地穩定下來：日軍主宰了地圖上的要「點」，如城市、交通要津；中國軍隊則在鄉間掌握了廣大的「面」。這也正是中、日在策略上的不同所在。

戰爭使得民衆大受干擾，而敵軍殘忍無道的舉措更加深苦難的程度。日本人轟襲平民、擊沉漁船、砲轟百姓、成批成羣殺戮退伍軍人、焚燒、虜掠、姦淫，眞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甚至鹵莽地攻擊中立國的人員物資。美砲艇「巴納」號就因此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城郊被日機炸沉。國際的譴責遲遲不至，因爲歐洲方面正遭受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而美國則因仍守中立不便插手。然而不管如何日本人已經無法迅速贏得勝利。東京方面終於不得不承認被僵化的局面，而採取借用傀儡政權治理征服區的政策。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察哈爾及綏遠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由內蒙的德王主持。十二月十四日另一傀儡式「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以王克敏爲首。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三個傀儡政權在南京成立，形式上以梁鴻志主之，領有東部的三個省份——江蘇、浙江與安徽。但這三人的聲望不足以統一全局，因此日人乃另外尋找更爲有力的人士。

第三節　汪精衛的和平運動

日本的安撫政策　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衞親王於明治天皇誕辰紀念日宣佈「東亞新秩序」政策。其原則有六：㈠東亞的永久穩定；㈡睦鄰與國際正義；㈢聯合反共；㈣經濟合作；㈤建立新文化；㈥世界和平。頗似「門羅主義」在日本復生，它所顯示的是日本在歷史上着意主宰亞洲的努力。此種努力反映在十六世紀豐臣秀吉的征韓論、征華論，二十世紀初日本政界領袖的大亞洲主義，以及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的「田中書簽」。

汪精衞被吸引　對於那一些因爲中國的勝利與和平遙遙無期、經濟上通貨膨脹十分嚴重、以及生活日趨困難，而焦慮不安的政界人士來說，近衞的主張似可爲問題的迅速解決提供一線希望。汪精衞就是這些人士中的一個。他發現日本人的想法頗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於是興起了前往一探的念頭。首先他企圖說服雲南省主席，但不得要領，於是在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從重慶飛往河內，開始了和平運動。四天之後，近衞宣布日本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而改與「新的」中國政權共商中日關係。其基本原則有三：㈠中日親善，日本不祇不要求中國割地或賠款，而且將歸還租界、割地，並且取銷治外法權；㈡共同防共，其精神相同於軸心國之間的「防共協定」；㈢經濟合作，日本沒有任何意圖獨佔中國經濟。

鑑於上述條件比諸由德使轉達的意見書更爲有利，汪乃催促重慶方面加以接納，作爲解決的憑藉。

將不予考慮，並促國民黨將汪開除。汪遂轉而自組政府，並與日本簽訂八項協定，其中包括承認滿洲國，准許日本駐軍中國以便聯合反共。其他方面的協定則認可日本在經濟合作的方式下，控制中國天然資源；並得指派顧問，參與中國的教育及文化事務。

爲將通敵行爲予以合理化，汪呼籲國人必須承認日本具有打長期戰爭的能力。由於兩年來的抗戰不能得到具體結果，因此若打消敵意，以免亞洲文明於淪亡，則不啻爲智大德。於是汪氏藉口強調孫中山本人卽深信大亞洲主義與中日合作，要求國人不與日人爲敵，而他又說只有中日合作才是反共的最佳保障，才能避免內戰悲劇。其附合者美其名，謂汪之和平運動堪比淸季自強運動（一八六一—九五）時期曾國藩與李鴻章的「綏靖政策」。

然而，吾人需知孫雖然在從事革命的早期主張親日，但後來對日人的干預逐漸反感，而於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轉變成激烈的傾俄。在這個背景之下，汪如何自圓其說，自謂仍爲孫的追隨者，但同時却又反共？爲求對此明顯矛盾有所解釋，汪乃遠從馬克斯主義與民生主義中的不同說起。汪在他個人所組成的國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宣稱：共產主義原自古希臘，是一個政治概念，與古中國的「大同」理想並無不同；而與根源於唯物辯證與階級鬥爭的馬克斯主義相異。汪並且強調：孫將民生主義比作共產主義，所涉者乃廣義的原始共產理想，而非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孫越宣言也曾淸楚提到：共產主義並不適合中國。根據這些理由，汪可以反對共產主義而同時又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

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汪在日本卵翼之下設五院政府於南京，而將過去分設於北平與南京的兩個傀儡政權併入。汪政權爲滿洲國、三個軸心國、以及軸心國家的附庸國所承認。除此之外，西方列強沒有一個加入承認的行列。

這裏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團，卽爲何以一個孫的親密同志，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二號人物，竟然會變節投敵，置聲名令譽於不顧？吾人以爲，似乎是：第一，失敗主義使他認爲中國無法戰勝，倒不如在全面潰敗之前，先行謀取和平比較來得實際。第二，在與蔣爭奪權力中，他失敗了，而認爲蔣奪取了他作爲中山先生繼承人的職位。第三，他關切日軍佔領區中國人民的福祉。第四個解釋由主要助手周佛海所提供，比較吸引人。在一個記者會上，周技巧地說到，汪的做法不會使中國不利。如果蔣能戰勝，則汪與日人的協定自動無效；如果蔣不能戰勝，則蔣所將與日人簽訂的條件不可能如汪所簽的條件那樣優越有利。接著，爲求爭取同情，周反問道：假如汪沒有提供其服務，又有何人能够照顧淪陷區內的百萬災黎？有人或許會猜測，謂汪受了失敗主義與嫉妒心理所影響，乃決意將自己充作介乎凶悍的日本征服者與無依無靠的中國百姓之間的緩衝區。或許他眞的相信其謀和使命，從長遠處看，不會傷害中國；而就近程觀之，又的確能够大量減低悲慘事件的發生。也許他心裏頭的眞正動機永遠沒有人會知道了，因爲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數月，汪氏已經不在人世。雖然汪本人逃過了法律的審判，但其高級的附從們則被視同叛逆，在戰後不久就被槍斃了。

第四節　國民政府的抗戰建國綱領

制定抗戰建國綱領　抗戰初期，國民黨及政府當局的內部有一些重要的發展。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設立國防委員會，其中包含社會賢達與各黨各派成員以象徵全國的統一。接著於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一月重組「最高軍事指揮部」，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七至九人，而由委員長主之（蔣爲委員長）。另外影響更大的是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中有四個主要決議：㈠設總裁爲黨魁，選蔣中正任之；㈡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爲抗戰建國的基本力量；㈢成立國民參政會，爲戰時最高民意機構；㈣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在抗戰建國綱領中強調三民主義與國家統一，以及在蔣中正與國民黨的領導下來對日抗戰。它同時又提出幾個基本原則：

1. 建立地方自治，並爲憲政實施之準備。
2. 外交上獨立自主，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
3. 訓練全國壯丁，充實民衆武力，加緊軍隊之政治訓練，使全國官兵明瞭抗戰建國之意義。
4. 經濟建設，以軍事爲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勵佔領區工廠內移，發展自由地區之工業。
5. 教育爲抗戰及重建的基石，鼓勵大專院校內移，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與現代科學教育並重。

這份建國綱領於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獲得國家社會黨（後改爲民主社會黨）支持，四月二十一日獲得青年黨的支持。共產黨方面，由於自有所圖，未表示意見，但也算是默示贊同了。

成立國民參政會　國民黨全代會之後，接著就組成了國民參政會，包含各種政治主張之黨派的代表，如毛澤東以及其他的共黨領導人。該會於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七日至十五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與會的一百六十二位代表無不堅決誓言，所有中國人民，不分黨派、宗教、種族與職業，矢志支援抗戰，直到獲得最後勝利。

爲了抗日，中國團結起來了。但在此一全國人心歸向的激昂時刻，卻也隱含了嚴重分裂與紛爭的種子，特別是有關共產黨的問題。

第五節　統一戰線及其沒落

統一戰線的建立　我們還記得，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之後，共產黨重新修好與國民黨的關係。翌年一月共產國際的王明等人抵達延安，來幫助設計統一戰線的策略。他們促令中共：讓南京政府認爲他們有合作的誠意；竊取英美同情；盡全力擴充紅軍；使蔣以爲他們爲求統一抗日，正準備重估中國蘇維埃的問題；以及在陝、甘、寧、青、新五省建立羣衆戰線。根據上述指導原則，中共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二月開始與南京談判有關統一戰線的細節。而在中日戰爭展開之後不久，一個名爲「共赴國難」的動人宣言，由中共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以解釋

其在戰爭期間所採的立場：

1. 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它是解決中國今日需要的最佳答案。
2. 取消推翻國民黨的暴動及蘇維埃化運動、停止強制沒收地主產業的政策。
3. 取消蘇維埃改採民主式政府，俾統一全國行政。
4. 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

蔣歡迎中共如此決議，並虔誠希望它，能透過對戰爭及國民革命的實際貢獻，來表示其誠意。三萬紅軍被整編爲第八路軍——後來改稱十八路軍——由朱德與彭德懷率領。分爲三個師。其中一師的師長是林彪，後來逐漸竄紅。這支部隊被派往陝北繼續抗日。中共在長江以南的部隊，接著在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組成新四軍，葉挺、項英爲正、副軍長，轄下一萬人衆。軍事之外，國共攜手的進一步象徵，其爲前文提及的，毛及其他中共領導人於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參加國民參政會。就這樣，兩黨在日本的侵略下牽起手來了。

中共的貌合神離　然而這一次的聯合，也和一九二三到二七年一樣，遭遇了悲慘的命運。中共一開始就視之爲手段，來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逃避國軍的襲擊、以及藉著戰爭培養自己的力量。爲求所有黨員不致誤會上述目的，毛訓誡其核心幹部，務必充分利用抗戰時機，從事自我擴張。他說：我們的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敷衍、一分抗日」。這些幹部被要求：即便失去與黨中央連繫的機會，也仍需照樣行事。毛說得十分明白：暫時與國民黨合作並不背叛既定原則，也許向敵人投降，而卻是十分實際的

應變，以休養戰爭帶來的疲困，爲將來培養革命的力量。他一再強調紅軍的變成國軍，邊境蘇維埃被地方政府所取代等情事，都是形變而質不變。簡而言之，與國民黨的合作，提供中共良好機會，來休養，來擴張，來擬議新方案，以代替過去並不怎麼成功的老辦法。

爲求在統一戰線中發掘充分的利益，毛的計劃分爲三階段：第一，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與之相持；第三，深入華中各地建立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進而取代國民黨的領導權。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在一份題名爲：「抗戰的未來與中共的路線」的報告中，毛明白剖析黨在戰爭之中的展望。假如中國戰勝，則國民黨精疲力竭而中共強大壯盛，那麼中國的「十月革命」可望產生；另一方面，假如中國戰敗，但未完全癱瘓，則天下勢將三分，日人在滿洲與華北，國民黨在西南地方，中共在西北地方；假使中國完全潰敗，則國民黨勢力將被掃除，而共產黨則可以從事地下活動。有鑑於軍事力量將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中共應該要充分利用戰爭，來擴展軍事力量，來爲最終的獲取政權而準備。

根據這些解釋，就不難明瞭爲何中共軍，開始時與日軍略微接觸之後，就避免「打硬仗」，而集中力量自我發展與擴充，來爲「百萬紅軍、百萬黨員」的目標而努力。中共黨幹部的手册，有名爲「與友軍相處之策略」者，要求透過祕密組織與特工之培植，來滲透國軍，以散播歧見、教唆分化、助長脫黨與叛變。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中共自行建立「陝甘寧邊區政府」，接著又成立「晉察冀

綏邊區政府」。而中共軍與國軍之間的磨擦事件，也越來越多。

國共衝突的再起　國際間瞬息萬變的聯盟風氣，更助長國共間的僵持，使緊張程度越來越高。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緊接著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日蘇中立協定也簽訂了。這些行爲使得統一戰線之所以存在的理論基礎與利害關係，一下子消失了，國共間的衝突變得更加嚴重。新四軍所駐紮的魯西與江蘇一帶，局面尤其嚴重。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中央命令新四軍移駐黃河以北，而新四軍則予以拒絕，並且反過來更加強在江蘇的作業。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一月五日新四軍與國軍第四十師發生衝突，造成政府於一月十七日決意解散新四軍，並逮捕新四軍指揮官，解送軍法審判。中共於是另外指派新的司令官，並擴編新四軍到七個師。這個「新四軍事件」使得統一戰線爲之粉碎，而國民參政會中的共黨代表也拒絕參加會議。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兩黨才又重開談判，但因中共要求合法地位，以及擴充軍隊到四個軍十二個師，致令談判再次破裂。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底，中共的談判代表周恩來離重慶而去。

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四日談判又在西安召開，中共再提出合法地位及十二個師的要求，以及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此外，又要求憲政上的聯合政府。雙方交換數次意見之後，談判地點移到重慶。當時正值日軍大舉進攻之時，國民政府談判的地位大受影響，而中共則動作迅速，儘量利用此一大好時機，提高要求，即從十二師變爲十六師，承認中共在華北、華中、華南所控制的地區，以及召開國務會議，討論聯合政府的問題。但國民黨斷然地拒絕了上述請求。

接下來的抗戰期間，國共衝突問題依然無法解決。縱使蔣本人也一而再宣稱，共產黨問題本質上是政治的，應該只有循政治途徑才能解決，但仍派出大批精銳部隊來封鎖西北地方的中共，以免他們企圖在戰後來打內戰。中共方面，則始終不停地在擴展軍力與羣衆組織，同時擺出一個姿態，使人以爲他們是民主的農業改革者，而不是激烈的革命團體。於是在邊區政府裏，刻意製造印象，使人以爲只有三分之一的官吏是共產黨員，另外的三分之二，則由農人與地主的代表平分。果然，這個作法造成西方人士一種印象，認爲中共不同於俄共。甚至連羅斯福總統駐華特別代表赫爾利，該氏曾在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訪問中共首都延安，也認爲中國的「共產黨事實上不是共產黨，他們正爲民主的原則而奮鬥」，就像許多人認爲國民黨員並非法西斯信徒一樣。的確，中共機巧的策略，幾乎已經贏得了「國際承認」，而同時又大量地擴張了軍隊。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四月紅軍的數目已經到達了九十一萬之衆。

第六節　戰時外交與美國的介入

俄美英法的援助　從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展開戰爭的序幕，到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中國一直在孤軍奮戰。這段時期西方所提供的是同情、道義支持，以及小量貸款。只有蘇俄提供實質援助。由於戰端啓於中國，使蘇俄免除日本的直接壓力，而得與中國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八月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派遣「志願」飛行員，以及提供總數達到兩億五千萬

美元的低利（百分之三）貸款——一九三七及一九三八年各五千萬元，一九三九年一億五千萬元。至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底，蘇聯總共提供了飛機一千架，飛行員兩千名，以及軍事顧問五百名。事實顯示，俄國一些最佳的軍事人才，都參與了此項援華計劃。

同一時期，由西方世界所提供的援助眞是小得可憐——主要乃因美國籠罩在孤立主義之下，而歐洲方面則局勢岌岌可危。總共西方提供了兩億六千三百五十萬美元，只比蘇俄一個國家所提供的多一點，其中包含：美國的一億二千萬作購買非軍事物資之用，另外五千萬用來穩定貨幣，而英、法兩國則分別提出微薄的七千八百五十萬元及一千五百萬元。然而，美國在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戰爭爆發前後，向中國購買白銀，總量到達三億五千萬盎斯，約值二億五千二百萬美元，間接減輕了因戰費而帶來的沈重負担。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美日商務協定未終止之前，美國同時又是日本蠶絲的大主顧兼石油、廢鐵、汽車零件的主要供應者；另外日本所需要的金屬、棉花、及木漿，有百分之四十產自美國。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看出，日本對美方市場的評估，直接間接地支持了她的對華戰爭。

美國介入中國戰場 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九月歐戰的爆發，使得外援的型態有了實質改變。俄援開始式微，最後終於停止。而英、法為避免激怒日本，也在向後退。在日本的壓力之下，法國於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停止滇越鐵路的營運，而英國也在一個月之後關閉滇緬公路，使中國與外界的連繫整個切斷。一直到日美交惡，美國開始支援中國，情況才有些改善。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三月羅斯福總統提出租借法案，雖然在開頭的一年，數額只到二千六百萬美元，是所有國家貸款總

額的百分之一點七，但它代表了一個重要的開端。除此之外，另有一些美國及英國的信用貸款，在幫助穩定貨幣及外匯交易的條件下，提供給中國。

珍珠港事件改變了中國境內戰爭的性質，也改變了外援的型態。英美聯合對日宣戰，中國接著跟進，對軸心國採取相同行動，而使亞洲的戰爭，變成全球反侵略、反極權戰爭的一環。盟軍在中、緬、印建立一個戰區，由蔣中正担任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並自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五日生效。而早年曾任駐北平翻譯官的史迪威將軍，被派赴重慶，担任蔣的參謀長。此外，一羣美國志願飛行員——飛虎隊——早從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八月開始，就在昆明作業，也於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日開始，與十四航空隊合作，由陳納德將軍擔任司令。從這個時候開始，美援有了實質的增加。總計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戰爭結束，美國對華信用貸款到達史無先例的五億美元。同時，租借貸款增加到十三億美元，如加上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的二千六百萬元，和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的二億一千萬元，則總數到達十五億四千萬元。而為美對外租借貸款總數的百分之三。

太平洋戰爭剛剛開始的那段時間，日軍有顯著的進展，輕取香港、新加坡、緬甸、及菲律賓。盟軍作戰的成效與中國長期的對抗比起來，顯得十分不光彩。也因此而使得中國開始得到西方尊重。國防部長史汀生告訴羅斯福說：「中國人過去以及現在所表現的漂亮抗戰，以及對一般正義所做的貢獻，頗値吾人全力支援。」華府不祇提供中國三億美元貸款，來穩定物價，而且更說動倫敦當局，於一九四三年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聯合聲明，放棄過去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此外，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更進一步不顧英、俄反對，決心將中國變成世界四強之一。英國外相艾登「不喜歡這種使中國人橫行於太平洋的想法」，而俄國外長莫洛托夫則辯稱，中國對於歐洲戰事而言，並無啥利益。但到最後還是為美國所說動，接納中國做為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莫斯科宣言的共同簽字國。此份文件，宣誓四強無止境作戰，直到最後勝利為止。它並且明白宣稱，不承認任何一國單獨與敵簽訂的和約。

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　羅斯福很喜歡藉用個人與世界領袖晤面的機會，來決定戰爭的目標，與未來的和平計劃。而各國領袖也同樣地樂於見他，好來爭取更多的美援。就這樣，羅斯福急於與蔣和史達林會談。但這位中國領袖不齒於與那位蘇俄領袖商談，因為史達林曾於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簽訂了日俄中立協定，並且放言支持中國共產黨。蔣要求早先個別面晤羅斯福，如果不能，他寧願延期會商。羅斯福與邱吉爾於是安排了兩個場所，會蔣於開羅，會史達林於德黑蘭。

在盟軍的全盤大戰略中，歐洲佔有首要地位，次為太平洋，再次是中國。由於恐怕羅斯福的偏愛中國，會令羅斯福給蔣太多承諾，而減少在歐戰上的投資，邱吉爾於是要求在會議之前先與羅斯福商量。但羅斯福顧及此種作法可能會引起中國及蘇俄的疑忌，因此仍然直接前往開羅。帶著蔣夫人——一位具備卓越語言能力的衛斯理畢業生、並藉著她的翻譯，蔣與羅斯福之間有著深長而懇切的會談。邱吉爾因此懊惱，事後曾謂：「那個中國故事把與會者對有關英美之間話題的注意力都搞散了。……（羅斯福）總統……不久就另闢密室，逕與蔣談將起來。原想勸服蔣及其夫人去參觀金字塔，做幾日遊，好讓我們抽

空前去德黑蘭的，也因此泡了湯。結果，原本位列開羅之會最末的中國問題，却跳居首要的地位。「蔣要求立即歸還失土乙案，博得羅斯福首肯簽署，後來並由邱吉爾與史達林予以副署。羅斯福總統又進一步答應，越過喜馬拉雅山脈，來增加物資供應；執行長程轟炸日本；並在未來的聯合國中，給予中國一個崇高的位置。而藉著豐盛報償的提供，羅斯福總統同時也認爲，中國應該能够更努力作戰。

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的開羅宣言，首度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完全歸還日本得自中國的領土；日本本土以外，佔自蘇俄之土地，如庫頁島與千島羣島，還給蘇俄；太平洋上的託管地，轉由美國託管。在給美國人民的耶誕文告中，羅斯福親切地宣佈：「今天，我們與中華民國，在友誼的深摯及目標的一致方面，正到達史所未有的密切地步。」

史迪威危機　中美睦誼之間有一枝刺，這枝刺不是別人，就是蔣的美國籍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綽號「醋約瑟」的史迪威，爲人粗率固執，缺乏在他職位上所需要的軍事外交官的能力。由於受到一小撮自由派並且有些左傾的參謀所影響，他越來越抨擊蔣處理戰爭的方式，以及國民黨對付中共的政策。他不祇搞砸了與地主國上司的關係，而且嚴重捲入中國的政治問題。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六日，他提出建議，要蔣解除對西北中共地區的封鎖，並准許十八路軍與國軍並肩抗日。這種意見即使軍事上說來，似乎蠻合理，但却具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根據重慶的美國大使館估計，至少有二十個師，或者大約四十萬的精銳部隊，陷在封鎖中共地區的任務上，而無法從事抗日工作。由於受到史迪威干預中國政治的刺激，蔣原打算要求美方將之召回，但以蔣夫人勸阻，謂如此將令美方不快，才作罷。雙方

被扭曲了的關係，到討論緬甸北部的戰略時，爭吵又生，使得情況更加惡化。史迪威原已在該地訓練中國軍隊，好來為自由中國打開一條新的供給線。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日本發動總攻擊，以便打通一條從華北，經華南，到達印支的「大陸走廊」，對於這個新問題，兩個人又吵將起來。此時，敵人已滲透進入廣西省會桂林這個重要據點。不祇使美B29轟炸機的空軍基地陷落，而且更危及重慶。為求解圍，史迪威又重提使用共軍舊議，而為蔣所斷然拒絕。因為蔣仍然和過去一樣，担憂中共部隊的不可信任，以及詭詐的蘇俄在滿洲、蒙古、及新疆的計謀。兩人之間的關係，至此惡化而不可收拾。

由於十分關切中國境內的共產黨問題，以及整個的中蘇關係，羅斯福派遣副總統華來士來到中國，並訓令駐俄大使哈里曼，向史達林強調修好關係的必要性。史達林與莫洛托夫則曰，中共並非眞正的共產黨，而不過只是「人造的植物性的奶油」，是「包心菜型共產黨」、「蘿蔔型共產黨」，意卽中共不過是表面紅罷了，實質上並不眞紅。當他們將這些比喻傳到蔣耳裏，蔣不禁大笑，謂中共正在製造一種農民的民主派之假相，而實際上則比蘇俄更共產。他向華來士保證循求政治途徑，來解決中共問題，但同時希望中共放棄其部隊與所據土地的獨立性，來併入國民政府。談及中俄關係，他認為，如果羅斯福總統願意充作調人，則他將極其意願，來與史達林會面。

蔣同時抱怨史迪威不能合作，缺乏判斷。為求與白宮建立直接連繫，他要求羅斯福派遣一位個人特別代表駐在重慶。藉著這個方式，他希望可以繞過支持史迪威的國務院及國防部。華來士事後記道：「我深為一個生處苦難困厄之人的呼求所感動。」

日軍進攻逼近重慶的時候，史迪威說服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要求羅斯福將蔣對所有中國部隊（包括中共軍）的統帥權交給史迪威。尊嚴受到嚴重傷害的蔣先生，告訴羅斯福，他會接受這個苛刻而嚴肅的建議，但有三條件：㈠對史迪威的權限做明白的交代；㈡不包含統帥中共軍隊；㈢蔣本人有全權管理租借物資。羅斯福因此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說道：「蔣委員長話中有話矣！」

赫爾利將軍，原胡佛總統任內的陸軍部長，被派往重慶，担任總統私人密使，來化解史迪威與蔣委員長之間的惡劣關係，並使前者就任中國部隊統帥乙事得以順利進行。態度的溫和以及善於言辭，使赫爾利得蔣的同意，將統帥權交給史迪威。但蔣堅持仍然保有對主要戰略決策的最後可否權，以便史迪威不至凌駕其上。就在這談話當兒（九月十九日），「醋約瑟」到達蔣的總部，不聽赫爾利的勸告，當面遞交一份措辭嚴厲，並經羅斯福批准的文件，要求蔣立即將中國部隊「無限制的統帥權」交給史迪威，並應對中國境內軍事局面的迅速惡化，保證負担「個人的責任」。事後赫爾利說，接到這份文件的蔣先生，就像被人擊中了「太陽穴」一般。

蔣告訴羅斯福總統，他可以接受一個美國人來担任統帥，並且重組他個人的統帥關係，但他不能賦予史迪威以如此重責，因為此人只想統御，而不能合作。蔣並且率直要求將史迪威召喚回國。眼見統帥權可能喪失掉，史乃軟化立場，同意不使用中共部隊。但為時過晚，蔣心意已決。

在這場爭執之中，雖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繼續支持史迪威，也不論羅斯福總統本人曾有何種疑慮，赫爾利的一份主要報告解決了問題。報告中指出，他認為蔣並非不能察納雅言，其領導亦非無法開放，

但史迪威總以爲除非蔣被武力所迫，否則不能就範。因此史迪威說什麼都是要抑制蔣，而不是要協助蔣。「閣下與蔣之間，除史迪威之外，沒有任何問題。」赫爾利精明地告訴羅斯福總統，「我的觀點是這樣子，如果你在這個爭執上支持史迪威，那麼你將會失去蔣先生，而且可能連帶把中國也丟掉了。」報告的結尾處又認爲，如果指派另外一人來替代史迪威，則蔣必能合作無間，並且計劃出阻擋日軍擴張的策略來。赫爾利的勸告證明是決定性的，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史迪威被召喚回國。

魏德邁中將接替史迪威，被任命爲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兼蔣的參謀長，但不是中國軍隊的統帥。魏德邁的溫和柔和姿態，表現出與史迪威的頑固行爲完全不同的典型，而爲蔣所立卽接受，中美兩國的關係也轉入了較佳之階段。奇怪的是，日軍在這段時間的攻擊也軟化下來，因爲兵力多轉移到太平洋戰區，去對抗美軍了。自此以後，無法再於中國境內進一步發動大型的攻擊。

赫爾利的調停（一九四四—四五）　鑑於國共衝突會影響中國對日抗戰的努力，並威脅未來國家的統一與重建，赫爾利乃尋求途徑，希望造成兩黨的和解。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在蔣以及美國聯合參謀本部的同意之下，飛往延安，與毛做爲期兩天的會商。中共方面有感於赫爾利此行的誠意。也表示熱切歡迎。對當地歡迎會上所表演的「豐年舞」，急切想表示好感的赫爾利，也以印地安舞相回敬，舞中並且高呼巢克圖族的戰語「呀呼！」。氣氛十分融洽。其後雙方進入討論，而於十一月十日獲得「五點草案」。其中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共黨派代表與國民黨組聯合軍事委員會；共產黨

爲合法政黨；政治自由；以及由聯合政府統率全國軍隊。毛以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簽字，赫爾利也因此以「美國總統個人代表」的名義簽字。但事後美國國務院卻堅持他只以「見證人」的名義簽字。爲求對美國人的努力表示欣賞，毛於十一月十日致函羅斯福，略謂：「我們一直希望與達成協議，增進中國人民的福祉。今天，透過赫爾利將軍閣下，我們乍然看到了實現的希望。」而赫爾利的延安之行也使他相信，國民黨所秉持的原則，與中國共產黨所秉持者，縱令有所不同，也只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蔣對共產黨的看法，却站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對他而言，聯合政府實無異表示國民黨主政的失策，並爲共產黨的滲入政府組織大開方便之門。他毫不含糊地拒絕五點草案，並且提出三點計劃，認爲只要共黨奉行三民主義，把軍隊完全交給國民政府，一定允許共黨合法，使共黨代表參加軍事委員會，允許政治自由。簡單地說，他要毛在未來政權分配期間，交出槍桿，並且信任國民黨的誠意。精練的毛，如何會接納這種安排。他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如此寫著：

這些人們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的民主分子並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生以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一概沒有軍隊，同時也一概沒有自由。

眼看談判陷入僵局，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遂於十二月九日離去。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

年）一月二十日，經過赫爾利一再的敦促，才又返回重慶，再開談判。

由於受到輿論敦促及美方規勸，將同意召開，由所有黨派及獨立人士代表組成的國務會議。表面上，這個會議將研究如何在憲法制訂之前，來結束國民黨訓政，引進憲法，訂定共同政治目標，以及讓所有黨派都參與政府。但是實際上聯合政府對蔣以及國民黨而言，實不啻詛咒，因此密謀制止。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三日，國民政府未與共產黨諮商，即宣佈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由於國民大會的代表係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由國民黨輔導下推選出來的，可能制訂有利於國民黨的憲法。因此周恩來責怪國民黨此舉如同欺騙，而毛則拒絕承認一九三六年的國民大會代表之合法性。談判於焉又告破裂。

赫爾利係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被任命，接續前任大使高斯而來的。但不能獲得使館人員的充分支持，因爲其中多人公開批評蔣氏及國民政府。他們催促華府，略過國民政府，直接與中共及其他黨派共商抗日。這種念頭爲羅斯福總統所打消，他支持赫爾利完全的、無條件的支持蔣氏的政策。但等到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一種向國民黨施壓，使其與共產黨達成協議，來擴大政府陣容的想法，在華府獲得了較多的贊同。而在這同時，國際間有關抗日戰爭方面，也正在做成重大的決定。

雅爾達會議（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底，德國的戰敗已經指日可待，盟軍領袖們遂將注意力轉移到日本上面。華府決定從太平洋直接攻擊日本，而不必如過去所設計的繞道中國。

聯合參謀本部估計，在德國戰敗之後的十八個月內，可以使日本就範，而德軍的失敗預計將發生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之間。此種對日本戰力的過高估計，造成邀請蘇俄參戰，俾減少盟軍生命損失的決定，重新克復菲律賓的麥克阿瑟將軍，估計大約要蘇俄六十個師的兵力，才能克服滿洲的日軍。爲求訂定蘇俄介入太平洋戰爭的條件，三強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在雅爾達召開會議。

會中史達林同意在德國戰敗後二到三個月內對日作戰，條件是一九〇四年（光緖三十年日俄戰爭）以前，原屬於俄國之權益（如蘇俄在滿洲的特權）歸還俄國。他特別要求千島羣島、庫頁島南半部、溫水港大連者旅順、中東鐵路、南滿鐵路之權益，以及對維持外蒙現狀的支持。「這是很明白的，」他對羅斯福說：「如果沒有這些條件，他及莫洛托夫將難以向俄國人民交代，爲了什麼來對日作戰。」由於這其中大量涉及中國主權，而中國並無代表與會，因此會中責成羅斯福，來爭取蔣氏對上述條件的同意。史達林方面，則答應尊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並與蔣氏簽約，承認其爲中國的唯一領導人。

由於重病及勞累，羅斯福已經無力在雅爾達討價還價。他覺得自己已經完成了此次會議的主要目標，亦即使史達林同意：(一)德國戰敗後三個月內參戰；(二)支持蔣爲中國領袖；(三)承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然而，他同時未經中國授權，就「簽掉了」中國在滿洲的主權性的利益。英國外相艾登認爲，沒有必要出這麼高的代價，來要求蘇俄參戰，因爲蘇俄有可能會自行參戰。但是他反對簽訂雅爾達協定的意見，並不爲邱吉爾所重視。邱吉爾的着眼點是，一方面表示他對羅斯福判斷力的信心，另一方面則想保

全英國在遠東的利益。

雅爾達協定的眞實條件爲何，蔣以及赫爾利都被蒙在鼓裏，但兩個人都間接地獲知有關的事項。內心感覺到被忽視及侮辱了的赫爾利，決意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三月返回華府時，當面向總統質問。而令他大吃一驚的是，當他倆見面時，赫爾利所握住的羅斯福的手，竟是「如此鬆散無力的皮包骨」，而他臉上的皮膚則「似乎是用漿糊貼上去的」。「你曉得，」赫爾利後來作證時說：「我原來想跟他理論一番的力氣都消失掉了。」四月十二日羅斯福去世，杜魯門繼任。此時的雅爾達協定，被保存在理希上將（Admiral Leahy）的特別檔案裏頭，新任總統全然不知情。

四月五日蘇俄照會日本，謂兩國在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所簽中立協定已經失去意義，因此沒有可能繼續存在。事實上，根據條文，該協定的效期在一年之後就可屆滿，但是蘇聯很顯然已經不願再多等待。此時，各地局勢的轉變非常之快。五月一日希特勒自殺身死。一週之後，德國投降。俄軍於是開始從歐洲開往亞洲。

在俄軍大量湧入滿洲之前，蔣派遣其姻親兄弟宋子文前赴莫斯科，先與史達林達成協議。史達林方面，答應簽訂一個爲期三十年的友好同盟條約，以對抗日本未來的侵略。答應支持蔣爲中國的領袖，停止援助其敵手，日本投降後三週內自滿洲撤軍，並於二至三個月內完全撤離。反過來看中國這方面，則在滿洲一地給予蘇聯許多重大的讓步：即蘇聯得在其海、空軍基地駐軍，其中包括旅順、大連、及其鄰近地區；享有對南北滿鐵路及其附屬事業的所有權；中國承認外蒙獨立。在正式條約寫成之前，史達林

會赴波茨坦會晤邱吉爾與杜魯門。重要的是，他因此而隱瞞了日本於七月六日要求他出面與盟軍商談調停方案的消息。

原子彈試驗成功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波茨坦會議的第一天晚上，消息傳到杜魯門，謂在新墨西哥試驗的第一顆原子彈已經成功地引爆。在邱吉爾與史達林面前總覺得不安的杜魯門總統，此時「突然元氣百倍……並且說，這個消息給予他完全新的信心」。得知原子彈消息的邱吉爾，則用一種詩意極濃的口脗說：「火藥是什麼？小玩意。電力是什麼？沒意義。就是這原子彈，才算大火器。」這位英國領袖認為，再加一個或兩個嚴重的震嚇，戰爭恐怕就要結束，實在沒有請求蘇俄參戰的必要。美方的軍事首長也同意這個觀點，但仍認為俄國的介入，會使戰爭較快結束，而且減少犧牲許多生命。無論如何，大家總認為蘇俄的控制滿洲是無法避免的事情，除非美國願意取而代之。而美國為求不介入，最佳方式不外給蘇俄一點報酬。

日本投降與中蘇簽訂友好同盟條約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宣言，提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遭遇立即而完全的毀滅。東京方面開始時忽視了這個警告。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投到廣島。兩天之後蘇俄參戰。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投在長崎。一天之後，日本政府宣布有條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當天，史達林就警告宋子文，如果同盟條約不趕緊簽訂，滿洲將有陷入中共之手的危機。該約因而在八月十四日簽訂。條約內容與過去所討論的大同小異。俄方答應予蔣所統治下的中國以道義、軍事及實質援助；尊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停止干涉新疆；日本戰敗後三星期內開始撤軍，三

個月內完全撤離；認知外蒙古的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中國方面，則同意准許外蒙循由公民投票方式來自治；認知與俄國共管中東鐵路、南滿鐵路三十年，並於期限屆滿後無償收回；大連港由兩簽約國自由使用三十年；旅順則爲中俄聯合海軍基地。

這個條約雖然所費不貲，中國却滿意地接受下來。因爲它保障了中國新疆的和平；使蘇俄承認中國在滿洲與新疆的主權，並且不支持共產黨。事實上，與蘇俄和平相處是中國戰後重建所急需的要件，而蔣也覺得，倘若蘇俄不遵守諾言，則此一條約可用來作爲衡量其行動的尺碼。

勝利與隱憂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下詔結束戰爭，九月二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上，簽訂了投降書。經過八年戰鬥，中國終於得到勝利。蔣的聲望到達了顚峯，因爲他帶領著國家，衝過戰爭的漫漫長夜，得到最後的榮耀。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之高，也前所未有，他爲了對抗侵略與極權，掙扎通過了最長的戰爭。

戰爭結束帶來全國的歡欣，而人民也開始熱切盼望和平與重建。然而，掩藏在歡欣鼓舞之下的，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共黨問題，其不祥的陰影仍舊迴盪在這個國家的深處。的確，毛澤東已經熬過了這個戰爭，正靜靜的募集力量，來要求政權了。

第七節　戰爭的影響

這次戰爭，帶給中國、日本及東亞極其深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者則如下述：

亞洲的一個新國際秩序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引導東亞進入一個新時代。經過多年的反侵略戰爭，中國取代日本成爲首要強國。她跳出戰前次殖民地的地位，成爲當世五強之一，並在聯合國佔有安理會永久理事國的身份，擁有否決權。其在近代的國際地位上，此時到達最高的一點。反之，日本則不再是國際政治上的強權，而在美國的佔領與指導之下，轉向內部，注意重建的問題。那些舊式的歐洲殖民強國——英、法、荷——雖然也屬戰勝國，但在戰爭之中被日本趕出他們的亞洲佔領地，已無復往昔的光彩。她們過去的殖民地，印度、緬甸、印支、與印尼，都紛紛要求獨立。十六世紀開始存在於亞洲的歐洲殖民主義，終於走到盡頭。另一方面，由於是擊敗日本的主要力量，美國因而成爲太平洋地區最強盛的國家。這一切事件的轉變，使亞洲的國際關係的演化，指向了嶄新的一頁。

國民政府的精疲力竭　縱然美國是戰勝日本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國的貢獻不容忽視。她從頭至尾，紮紮實實地牽制了相當比率的日本軍隊，如果沒有她，這批日軍會被用在其他地方。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一年，中國獨力作戰，與五十萬到七十五萬的敵軍週旋於中國戰區，如果加上在滿洲的關東軍二十萬到七十萬人，則約爲日本總軍力的一半。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戰爭結束之前，日本兩百三十萬駐外軍隊中，有一百二十萬被拖在中國地區。中國地區的戰役，花掉了日本總戰費的百分之三十五——即三百四十億美元中的一百二十億。造成三十九萬六千零四十個日人被殺，及更多的日人受傷。中國方面，則動員了一千四百萬人，傷亡總數爲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十九人。包含一百三十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八人被殺，一百七十六萬一千三百五十五人受傷，及十三萬零一百二十六人失蹤——造成一筆

爲數可觀的戰債，卽一兆四千六百四十億元。民間的傷亡以及財產的損失，則更不計其數。國民政府，担任戰鬥的主力，在精神與物質上面都消耗過量，致令它在戰後的階段裏，明顯地已經無能再應付一個新的挑戰了。

經濟不景氣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國民黨掌政以來，赤字支出的「慢性疾病」就一直纏繞不去。等到了戰爭期間，軍費的急劇升高，與由於沿海諸省淪陷，失掉了海關收入，更令問題愈發惡化。收與支之間的巨額逆差，已到達示警的階段。茲以三個典型的年頭來加以比較：

項目／年份	戰費	收入
1937	1,167	870
1941	10,933	2,024
1945	1,268,031	216,519

（以百萬圓爲單位）

政府當局對此別無良方，而唯有採取增印紙鈔的下下之策，心中明知這樣一來必定造成通貨膨脹，但也不得不然。所印紙鈔從十九億圓（一九三七年開戰之時），飛升到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底的一百五十八億一千萬圓，及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更凌越一兆零三百一十九億圓。濫發紙鈔造成驚人的通貨膨脹，以及平均零售價格的急速上升：

年份	零售價上升比率（百分比）
1937（開戰後九個月）	29
1938	49
1939	83
1940	124
1941	173
1942	235
1943	245
1944	231
1945（一月至七月）	251
1945（八月至十二月）	230

最後，通貨膨脹摧毀了將士的戰志，敗壞了行政的效率，擾亂了民衆的生計，並使中產階級家庭淪爲貧戶。通貨問題帶來經濟的蕭條，而經濟的蕭條則疏離了廣大民衆，尤其疏離了知識分子，使他們埋怨政府的處置失當與不負責任。縱令在戰爭階段，通貨膨脹或許是非要不可的罪惡，但一到戰後，它儼然變

成咒詛一道，損害了政府的經濟根基。

心理上的倦怠　中國人民在漫長八年戰爭之中，一直動心忍性地在艱苦困厄中渡過。如今一旦獲得勝利，却再也無法承受任何新的逆境，特別是國共間的鬥爭。他們渴望和平、渴望休養。而一旦和平，休養又離他們而去，則自自然然地會對當時的政府及當權的政黨無法諒解。在抗戰早期就打好算盤，等待著這麼一天的來臨的毛澤東，立刻迅速把握此一不滿心態，而大加發揮。和平才剛剛來到中國，他就已開始向國民黨的優勢展開挑戰了。內戰的烏雲再展，陰森森地蓋上了大地，似乎在警告這個疲憊萬狀的國家，又是一個悲慘亂局的來臨。

第九章　內戰（一九四五——四九）

第一節　受降問題引發衝突

中俄共掠取勝利果實　兩枚原子彈的震嚇，造成日本的潰散，其速度快過一般想像。而對於突如其來的戰爭結束，國民政府眞不知如何來接納這個事實。許多問題一下子擁到蔣中正身上，其中最急的就是共產黨進入日本佔領地接受日軍繳械的威脅。滿洲的情勢也十分緊急，俄軍長驅直入東三省內陸，而不管日本已經投降。史達林三個月內撤軍的承諾已經抛諸腦後，其意圖如何仍舊不明。戰爭的終結帶給國民黨的，是極端困擾的軍事局面。

緊接著日本投降，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展開了瘋狂似的競賽，每一方都試著以最快的速度進入佔領區，來接受日人投降，以便從敵軍獲得最大量的武器與裝備。其中共產黨似乎比較佔地利，他們控有中國北部、南部及中部的十八個「解放區」，人口一億。並放言擁有一百萬正規軍及兩百萬民兵，這些人來自黃河、長江及珠江流域的農村。至於這些流域裏頭的大都會，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漢口、與廣州，則成爲孤島，由共黨操持的大海也似的農村所包圍。爲求充分利用有利情勢，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九日——卽蘇俄參戰的隔天——宣稱日本潰敗在卽，中共發動總攻擊的時機

已經到來。八月十日「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下令攫取日軍佔領下的所有城鎮與交通要地，並接受日軍的投降與裝備。八月十一日林彪率兵十萬沿北寧鐵路直驅滿洲。在日軍投降兩週之內，中共業將佔領地從一一六個縣擴充到一七五個縣。

中美合作接收淪陷區　國軍散佈在各個戰線以及中國西部，在爭奪中所處的位置較爲不利，但蔣決意不讓勝利的果實從手上溜走。八月十日他向中共領導人抗議，要求節制中共自行其是的行動，並要求日本及其傀儡政權的軍隊抵制非國民政府的軍隊。朱德則攻擊蔣氏此舉是在幫助日本侵略者及叛國賊，並直接要求日軍中國戰區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共代表投降。爲求不使中共佔得地利，蔣要求美軍協助空運及海運其部隊到被佔領區。

美國很快地予國民政府以助力，指使其部隊之運輸工具進入被佔領區，並將五萬名海軍官兵佈署在主要港口及交通中心，以等待國軍的到來。國民政府的三個軍也被空運到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同時有總數大約五十萬的軍隊被運到各個地方。此外，華府對日方所發佈的第一號總命令，明白要求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與十六度線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的日軍，以國民政府爲投降對象。八月十五日蔣本人要求岡村寧次，除非得到他進一步的指示，否則仍需在佔領區中保留原來秩序及所有軍備。八月二十二日岡村寧次更被要求只准許國軍進入佔領區。岡村寧次也完全配合。

由於有了美國的協助及日本的合作，國民黨贏了第一回合的勝利。國民政府重獲對中部、東部及南部地方幾乎所有重要城市、交通要衝的控制權，而中共軍祇得暫時退居鄉野。雖然受到頓挫，中共仍能

在頭兩個禮拜的競賽中得到一些點數——贏得了五十九個城市及廣大鄉村（特別是北部地方）的控制權。

滿洲所呈現的是一幅特殊的爆炸性景觀。俄軍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指揮下，於八月八日以驚人的速度長驅直入，而與從外蒙古晚兩天出發的另一支軍隊會合。日本八月十四日的投降並未能終止俄軍的進度；俄軍甚至更越過滿洲而進入中國的其他地方，滲入熱河、察哈爾，並幫助中共軍隊開入滿洲，而且將大量日軍裝備轉送中共。

試圖以談判解決問題　為求打開上述死結，並與中共和談，蔣三度邀請毛澤東至重慶商議。而毛雖然猶豫，深怕國民黨從中佈陷，却也因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前往延安担保其安全而終於成行。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廿八日毛飛抵重慶。全中國的人民此時在熱望及憂慮中，正摒住氣息為蔣與毛的歷史性會談而祈禱，祈求一個和平的結果，好來避開一場內戰的發生。

第二節　毛澤東在重慶

毛澤東去重慶談判　毛在離開延安之前已經仔細作好談判的策略。縱然國民黨首開勝利，重握大都市的控制權，但毛認為中共終究可以控制長江下游北岸、淮河流域、山東、河北、山西及綏遠的大部，熱河與察哈爾的全部，以及遼東的一部。他面對眼前的困境，乃採取彈性的低姿勢，但對基本的重大事件則不讓步。結果在他停留於戰時首都之時，毛盡了一切努力來表現得合乎理性而且樂於讓步——

種預計要贏得世界輿論以及市井中人同情的姿態。他身穿新軍服，脚着新鞋子，直讓人覺得他每個地方都溫順可愛，而不是個粗魯、玩火的叛亂者。他接受國民黨的熱情款待，使用他們所派的車，上劇院、赴晚宴，並舉杯祝賀蔣主席萬歲。他接納無數求見的青年，甚至准許已婚婦人親手。在外觀上，不管是作東或作客都表現着友好和有教養的樣子，致令衆人油然浮現妥協與和平的希望。

此次談判，毛種下一種能講理、可協調的印象。他不再堅持聯合政府，但要求召開國務會議，以研究形成聯合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及制定憲法的各種問題。

國共談判的主要議題　對於國、共軍力的比較及整編爲國軍之議題，毛最初主張共軍有四十八師，但同意改降爲四十三師，而國軍則爲二百六十三師。目的在維持一與七的比率。後來發現國民政府方面不願接受，乃終於答應只保留二十到二十四個師，並要求國民政府同樣要削減軍力到一百二十個師。

對解放地區的政治控制問題，毛主要希望在北部地方、內蒙及某些重要都市得以自由行動。等發覺政府代表十分猶豫，毛乃改提讓解放地區暫時保留現狀，以待憲法之採行，而以地方政府由普選產生爲條件。毛的意思顯然在努力維持地方事務的控制權，但國民黨對於這一點態度堅決不肯退讓。

對接受日本投降乙案，兩黨之間亦有鴻溝存在。國民黨對於裁軍主張排外性權利，而共產黨則在其活動領域以及其對手（國軍）被包圍的地方，也主張相同的權利。對於這個案子，雙方沒能達成協議。

六個禮拜的會商無疑地少有進展。毛除了外表上好像可以妥協外，對任何侵及中共根基的主要各點則毫不退讓。另外一方面，國民政府以居於優勢的地位，用力量做籌碼，而堅拒妥協。由於帶領全國在

對抗近乎強大無匹的障礙而終獲勝利，蔣氏的聲望正如日中天。此外，除控有力量遠超其對手的軍力外，還有美國的援助與支持，以及與史達林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蔣不可能對在此階段由毛所提出的，爲和平所作的「過渡性安排」感到興趣。

蔣八年來飽嘗抗戰的辛酸，現在自應享受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勝利果實，沒理由讓共產黨分享榮耀。如果赫爾利扮演較主動的角色，規勸蔣在毛的路線中找尋一個共同生活方式，或許可以把中共限制在北部地方，但赫爾利扮演了一個消極的角色，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中立。他所能做的，頂多是敦促雙方領袖在重要原則上首先得到協議，然後再去研究細節。但問題就在這些細節上，兩黨無法得到共同點。

共黨決定訴於戰爭　十月十日蔣與毛終於簽署了公報，強調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以及和平重建中國的重要性。他們談判的細節並未公佈，但顯然並沒能談出具體結果。毛返回延安之後召集手下稱，爲了「和平」，必須盡力將羣衆機動化，並擴充人民軍，以建設新中國。他的姿態之所以忽然強硬起來，原因固多，而其中之一則爲東三省新發展的結果。

第三節　蘇俄在東北

蘇俄據東北　滿洲境內蘇俄的行動完全違反了史達林在雅爾達以及在簽訂中俄條約的談判上的承諾，他原先答應三週內撤軍，並且在三個月內完全撤離滿洲。似乎，他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

二月及七、八月間沒有預料到中共的崛起如是之快。對於美國的介入中國，他看來並不怎麼介意。事實上則指示毛要與蔣達成某些協議。毛表面上遵照史達林的勸誡，骨子裏則決定與國民黨進行軍事對抗。對於這個訓示，史達林後來自己承認，是錯誤估計了中國的情勢。

戰事一開始，史達林的態度顯然有了劇烈轉變，中共當時所表現的強硬與狡詐，使他印象深刻。一旦俄軍已事實佔領滿洲，得到雅爾達密約與中俄條約所給予的特別權益，史達林發現沒有遵守承諾的必要。俄軍掠奪滿洲工業設施，移走有價值的裝備，總價二十億美元的物資被他們視爲戰利品。他們利用所有的藉口來阻止國軍進入滿洲。

阻止國軍進入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十月由美軍艦艇所載運的國軍被蘇俄當局拒絕進駐大連，俄方的理由是該港爲商業港，不適合運送士兵。馬林諾夫斯基建議以葫蘆島、營口、及安東爲登陸地點。國軍在懊惱中進駐頭兩個港口，卻發現都已在中共的控制之下。最後，經過五個星期的遷延，國軍選擇北部地方的港口——秦皇島——登陸，並企圖以該港爲基點來進駐東北。由於共產黨的攻擊，國軍速度大受限制，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佔有第一個在滿洲的戰略性城市——錦州。

俄國駐軍司令一而再地拒絕國軍的空軍進入滿洲，而只准許運送安全人員與憲兵在俄軍開拔前的五天到三天之中進入。由於時限過於短暫，沒有任何正規政府軍能到達接管地。在其他場合裏，蘇俄的司令員通知國軍去接管某地，而等國軍開至該地，卻發現已落入共軍之手。藉著這些戰術，俄軍有效地封鎖了政府軍的實質進入滿洲，而同時又幫助中共軍的移入，並且以鹵獲的日軍武器來裝備共軍，容許其

吸收各地的軍事傀儡單位。俄軍三度以各種理由來延遲撤退，等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五月終於撤離時，滿洲已經整個進入共軍之手了。

扶助中共擴張勢力 蔣決意要收復滿洲，認爲滿洲是八年來對日抗戰的基本理由，魏德邁將軍對國民政府收復滿洲的能力表示懷疑，他勸蔣首先鞏固長城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並確保北部地方的溝通網路。蔣拒絕上述勸告，將他最精銳的五十萬部隊投入滿洲——這決定後來曾令他反悔。到最後，蘇俄司令員終於准許空運國軍到東北各主要都市，政府軍方才於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五日進駐長春，三週之後進駐瀋陽。那時候，中共軍已幾乎完全控制這些口袋之外的鄉村地帶，用一種難以招架的姿態來對抗國軍。這個威脅國家走向內戰的鄉村地帶，此時已愈發壯大。

第四節　馬歇爾在中國

馬歇爾來華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華府採一新策略，有條件地繼續支持國民政府。這條件是：不使美軍介入內戰，並設法使國民政府與中共達成協議。事實上，此種轉變無異於廢棄過去無條件支持國民政府的政策。赫爾利在失望中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以辭職來表示抗議，並控訴國務院官員瞞著他從中作梗，祕密支持中國共產黨。杜魯門總統於是指派馬歇爾將軍——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突出的美國軍人——作爲其駐中國的特別代表。他受命幫助國民政府，盡可能重建威望於整個中國（包括滿洲），但不做任何直接的軍事干預。他同時要敦促蔣氏召開由所有主要政黨參加的全國會議，以便終止內

戰、統一全國，終而或能產生一個「強盛、統一，而民主的中國」。最後他還需對蔣說明，美國大規模的援助要在休戰及全國統一的條件下進行的。

調停國共衝突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中旬抵達中國之後，馬歇爾發現兩黨都表示要接受仲裁，並且準備副署他所提的三個臨時提案：㈠停火，㈡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組織聯合政府，㈢國民黨軍與中共軍整編為國軍。但，對立兩黨所表現的熱誠歡迎及支持允諾都不過是鼓舞性的姿態，事實上他們顯然也不能有其他的表示。馬歇爾的高聲望、誠摯心、啣命為中國的和平、統一與民主而來，以及他的國家所擁有的雄厚力量，成為國共不得不親切的充分導因。然而，在裝腔作勢的熱忱與感激之下，兩黨中的極端派心裏暗藏著的，是對美國從中作梗的憎惡感情。

由於彼此互不信任，在一九四六年初仍擁有五比一的軍事優勢的國民黨，有信心以奮力之一擊來粉碎對手。另一方面，中共則把國民黨視為紙老虎，認為只要能拖，一定可以把對手打敗。對於聯合，雙方都堅持一套不同的條件。國民黨要求共產黨在制憲政府建立之前先行投降，而共產黨則要求在制憲政府建立之後才來整編。對於聯合政府，國民黨主總統制，中共則倡內閣制。由於國民黨主要想操持中央政府，特別是行政部門，因此中共堅決要求高度的省自治以及強有力的立法部門，好來牽制行政單位。此時若思鉗制其好戰之氣，則唯有針對這些問題，研商出能使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

馬歇爾積極主動的仲裁獲得了快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結果。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責成國、共雙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即刻停火，以及恢復交通。一個三人軍事小組成立，其中包含國民

黨一人、共產黨一人，以及一個美國代表，並由最後提到的一人担任主席。小組內的決議需要全體一致通過方克施行。為了監督停火，乃派遣類似此種結構的小組前赴戰地。

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在一月十日到三十一日的停火期間召開，與會者共三十八人，其中國民黨八人，共產黨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黨五人，以及獨立人士九人。泛長的研商造成一個決議，即國家最高機構將是多黨組合而成的國務會議，同時賦有立法與行政權力。該會議由四十人組成，其中半數由國民黨提名，半數由所有其他黨派及獨立人士提名。國務會議的決定可改變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但需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因此任何一個有能力集合三分之一——即十四票——的政黨或政團，都能享有否決權。共產黨及其同情者，其中以民主同盟為最著，有信心得到必需的票數來抵制國民黨任何修改的企圖。

政治協商會議採納內閣制，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該會並議決未來的憲法中須承認省為最高地方政治機關，省長普選產生，得擁有省憲，以保證中央與省政府權限的適當劃分。

政治協商會議所獲致的成果，較有利於共產黨，這反映了一般追求和平與民主統治的心聲。馬歇爾本人雖然未克參與研商，但卻以嘉許的口氣形容其為「一個自由而充滿希望的憲章」。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這是第一次為和平與重建之願望展現了曙光。

國軍及共軍整編計劃　馬歇爾獲致的另一重要成就是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協議，其中涉及國共軍事力量的比率，以及兩黨軍隊的整編成為國軍。該會決議國軍在一年內裁減為九

十個師，而中共軍則為十八師。並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之內再進一步裁為：國軍五十個師，中共十個師。這種軍力裁減的分配情形是這樣的：東北地方國軍十四師對中共軍一師；北部地方國軍十一師對中共軍七師；中部地方十師對兩師；南部地方（包括台灣）及西北地方，國民政府分別有六個師與九個師，中共則沒有任何駐軍。在這種軍事安排之下，國民政府顯然佔著優勢，而中共的影響力就被限制在東北及北部地方。而同樣地，國軍也能夠接收共產黨在西北地方的基地，如此一來，阻絕了中國共產黨與其蘇俄的直接連繫。

馬歇爾的「馬到成功」使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就宣佈成立「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由魏德邁率領，共計一千人。根據了解，馬歇爾早先承諾將中共軍隊包含在接受訓練的名單中，而且在整編為國軍之前得接受美式裝備。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志得意滿的馬歇爾返回美國安排進出口銀行的五億美元貸款。就在他離去的當兒，國共兩方談和的誠意又遭逢嚴厲的考驗。

調停的失敗　國共雙方彼此誰也不相信誰，因為它們概屬革命政黨，其執着點不同，而且都不能適應妥協的局面。二者之間談合作是幾乎不可能的（除非時間很短，而且都有利可圖）。馬歇爾之所以有早先的成就，乃因其個人的積極規勸，以及聲望卓著所致。事實上，對立的兩黨都不喜歡他的參與。兩黨的極端派人士暗地裏認為馬氏是獲勝的阻礙。國民黨中的西山派—馬氏稱之為「自私而無法調適」—強烈地認為是馬歇爾強迫國民黨來與中共簽約，若無馬氏介入，國民黨早就可以戰勝對方了　共產黨從他

們的立場而言，其所以暫時與馬氏敷衍，乃因該協約基本上對他們有利，或者說沒有無法忍受的害處。但中共却從未打消祕密擴充軍隊以及擴充地盤的念頭。只有馬氏在場的時候才能使這兩個黨不致於拉破臉。但如果他有朝一日離去，則兩黨就不顧停戰而逕自火拼起來，好來改善己方在戰地的態勢，以便一旦談和不成，能够站在更爲有利的地位。原先地方性的磨擦，在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卽演成大型戰役。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仍然是個未能實現的夢想。

東三省境內的爭鬥尤其激烈。經過八年抗日硬戰所收回的東三省，蔣氏決意不再讓它落入蘇俄或中共之手。因此不顧該區軍事局面的顯然不利，支遣所屬部隊的大部進入滿洲。中共軍由於在滿洲得到蘇俄佔領當局協助，曾予國軍嚴重打擊，於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佔領長春。藉著這次勝仗，中共要求修改滿洲軍力分配比率，卽從原來規定的一個師增爲五個師，來對抗國軍的十四個師。蔣憤而拒絕其要求，同時命令發動總攻擊，於五月收復長春。此次戰鬥原可很快結束，但由於馬歇爾已返回中國，並且提出抗議而改觀。六月六日開始，雙方停戰十五天。然而，戰爭的狂熱已經使雙方不可能就此罷休，並且開始感覺馬歇爾是獲得最後勝利的阻礙。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上旬，蔣告訴馬歇爾：「對付共產黨首需嚴厲，然後，在兩、三個月之後，才可採用大方的姿態。」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如果馬歇爾將軍能够稍安勿燥，共產黨才會提出和解的要求，才會有意願爲和解而做必要的妥協。」中共方面也同樣對最後勝利充滿信心。他們控訴馬歇爾玩弄雙重手腕，一面援助國民黨，一面又當和事佬；並要求美軍全數撤離。似乎，國共雙方在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中，有意採取

新途徑，不再尊重馬歇爾。馬氏的影響力此時跌到了最低點。

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乘勝宣稱將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忽視了政治協商會議所謂國民大會需在聯合政府組成後召開之決議。果然，中共與民主同盟宣佈杯葛這個「非法的」大會，此外，毛更呼籲爲自衞而戰。雙方的裂痕更加擴大。馬歇爾於是轉求全中國的人民，來共同向兩黨施壓，以獲得協議。馬氏此舉正若獨泣之於曠野，贏得了同情，却得不到結果。他告訴蔣經濟有崩潰的危機，而戰勝中共也無法對經濟產生絲毫助益。但蔣委員長的看法不同，他認爲通貨膨脹固然嚴重，但不會帶來經濟悲劇，因爲中國屬於農業經濟型態，其穩定與否決定於軍隊是否能控制，而與西方國家的工業式經濟不同。

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到九月期間，國軍確確實實地打贏了每一場戰役，這個事實好像在強調一種看法，認爲馬歇爾阻礙了國民黨的獲勝。共產黨在短時期的挫敗之下，公開指控美國以仲裁爲煙幕，背地裏則支援蔣氏。由於調停的任務受到懷疑，馬歇爾遂在十月一日警告蔣氏，除非停止戰鬥，否則他要停止仲裁返回美國。蔣則以一而再的勝利而拒絕停戰。然後，在十一月八日，國民大會開會的前數天，才取消了攻擊，目的在讓共產黨及民主同盟重新考慮其立場。蔣氏對自己作爲的公正及贏得戰爭的能力充滿信心。同年十二月一日他向馬歇爾表示，敵軍可望在八到十個月內肅清。

馬歇爾自知任務無法達成，於是由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六日將他召回。在告別中國人民的談話中，失望敗興的馬歇爾指責國民黨爲「不易相處的一羣人」，謂其以舊的方式控

制中國，並無意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他同時批評中共，謂其無意作成公正的妥協。認爲中國的希望在自由派人士身上，可惜這些人缺乏行使「控制性影響力」的權力。和平與統一渺渺無期。而美國人在中國調停的夢想，也隨著這份談話而告終了。

馬歇爾回到美國出任國務卿一職，但由於剛剛獲得不愉快的經驗，使他不可能蘊育出積極的對華政策。他曾說：「我回來的時候，幾乎無法對中國問題構想出一個長遠性的結論。因爲國民黨步向失敗的結構，以及共產黨的決意、組織及訓練方式，和其背後無疑的擁有蘇俄的諮商，以及可能的支援，使得問題撲朔迷離。」在心靈上充滿錯綜複雜感觸的馬歇爾，採取了一種「等著瞧」的態度，希望或許中國自己會走出一條路子來。唯一的一次態度上較積極的措施，是應共和黨議員周以德之請，於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七月派遣魏德邁將軍，來華從事調查工作。（周以德曾在中國担任醫療工作，是蔣氏的忠誠擁護者）魏德邁在中國停留了一個月的時間，曾試圖規勸蔣氏從事改革而不得要領。返國後提出一份報告，要求在一萬名美軍的監督下，提供國民政府「充分而迅速的軍援。」該報告另外復提出五年的經濟援助，以及由五強　美、蘇、法、英、中——共管東三省，或者如果不行，可由聯合國「托管」。該份報告被馬歇爾禮貌地接受下來，但又靜悄悄地束諸高閣。此時的馬歇爾已無法使正在到處支遣子弟兵，只賸一又三分之一師的美國，有能力再派出一萬名人員。可惜魏德邁此行，顯然沒有獲得蔣氏或馬歇爾的好印象。

第五節　內戰的擴大

政府決定剿共　蔣氏在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中期之後，選擇軍事途徑來解決共產黨的問題，以證明如果沒有美國的仲裁，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掃平敵手。勝利可以爲他判斷的正確辯護，並且證明天眞的美國人所想在中國建立的聯合政府是如何地不符實際。於是乎，不顧美方不幫他打內戰的一再警告，說什麼也不相信，美國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會比較喜歡後者。國民黨人士認爲美國不致於眼看中國淪入共產黨之手。美國輸不起中國。因爲這個想法，美國的警告被視爲耳邊風。心想中國的局面縱令變得相當嚴重，美國也義不容辭，會助國民政府一臂之力。

內戰初期政府軍每戰必勝，在一九四六年中仍然享有至少三與一之比的軍事優勢，因此有信心迅速贏得戰爭，共產黨方面則不同。他們預見達到最後勝利之前仍然會有幾年的硬仗，並且根據這一認識來安排其奮鬥方式。一九四六年毛預測解決國民政府需要五年時間，彭德懷也承認相同的困境：「我們不會被擊倒，但也可能不會贏。」對最後的，「無法避免的」勝利，他們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共產黨仍舊爲一個漫長艱苦的戰爭從事着準備工作。

召開國民大會　軍事上的勝利鼓舞著蔣氏，滿懷信心地發動政治攻勢。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不顧共產黨及民主同盟的杯葛，召開了國民大會。並由該會一千七百四十四位代表於聖誕節通過新憲法，其中包含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條。此一文件，於隔年元月一日生效，重申三民主義爲

中國基本指導原則、五院制、以及人民享有四權—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共和國總統由國民大會選舉，六年一任。總統得提名行政院院長，並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而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立法委員則依地域及職業，由選舉產生，三年一任。司法院有解釋憲法之權，中國法律制度中司法審查制的地位因而建立。基本精神上言，此一制度並不完全屬總統制或內閣制，而確是兩個制度的綜合。如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但是，如果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則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至於地方政府方面，則已為省長及縣長的民選制定了可行的通則。

共產黨方面果然大聲疾呼，抨擊這份憲法為非法。但國民黨人士並未為這些控訴所阻撓，繼續進行選擇，於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選出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大會開會，選舉蔣中正為中華民國總統，四月十九日選舉李宗仁為副總統。藉著這次選舉，國民黨施行了二十年的訓政時期——原先預訂只要六年時間——形式上終於告了一個段落。雖然蔣氏贏得了這次選舉，內戰却使國民黨進入一個頭痛的階段。

剿共戰爭失利　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中似乎是戰爭的一個轉捩點。前此不斷獲勝的政府軍事機構開始着急。其原因一部分固然在於收復地區越廣闊，所需留駐的衞戍部隊越增加，相對地使得實際參加戰鬥的部隊越加減少。共產黨方面則相反。共軍一直持續地擴張，而於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六月達到一百九十五萬，相對於國民黨的三百七十三萬。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下半年，共

軍發動總攻擊，而分別在河南及河北北部獲勝。

就這個階段言，國民黨所受到最嚴厲的打擊是在東三省。那裏中國當局不顧美國人的勸告，投下了最精銳的五十萬部隊。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聖誕節後三個月內，林彪的部隊使這些精銳部隊損失了十五萬人。其餘部隊被迫進入瀋陽、長春與錦州之間的三角地帶，這個地域只佔東三省百分之一不到的土地。要穩住這個難以防守的地帶，並沒有什麼希望，但有關方面決意爭到最後──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中，林彪緊緊地鉗住該地，窒息了國民政府的防禦部隊。十月十四日再創十萬政府軍於錦州；十月十八日取長春；十一月二日入瀋陽。東三省之役損失了四十七萬最精良的國軍，並予整個政府軍的士氣以致命打擊。根據巴爾將軍（David Barr）的看法，此役已是國民政府失敗的開端。

在東三省之役的同時，另一支陳毅手下的中共軍，在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濟南戰役狠狠的一擊之後，攻佔山東省。而使中共軍得以五十五萬部隊移往徐州歷史性戰略地，即津浦鐵路與隴海鐵路的交會處。該地政府佈署了四十萬的機械化部隊，裝備著坦克、重型砲、與裝甲車，來防衛南京的門戶。然而多數軍官已因敵人殘酷的重擊而失去鬥志。再加上大雨、厚雪與冰雹使得機械化的部隊無法動彈，因此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淮海戰役開始不久，即有整整兩個師背叛而去。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十萬政府軍被挫。十一月十五日徐州淪陷。淮海之役於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一月結束，政府損失了二十萬左右的部隊，以及兩個被捕的著名將領。因勝利而精神大振的毛澤

東，信心十足地預測一年內將獲得最後勝利。現在，他的部隊進逼南京　國民政府所在地。

同一時間，林彪的八十萬部隊已解除東三省方面的交戰，乃與中共北部地方軍團聯合，作鉗形之勢，於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迫向津平路。國軍守將傅作義，原曾於綏遠擊潰共軍，此時手下控有五十萬部隊。但其作戰總部竊藏中共間諜，偷走了他的守禦計劃，致令整個抗禦希望完全破滅。戰略的被竊及人數上的優勢消失之後，天津與北平的衞戍部隊分別於一月十五日及一月二十三日投降。傅本人也投降，帶走了二十萬的部隊，從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國民政府損失了一百五十萬軍隊。在這樣慘痛的損失之下，國軍只有潰敗一途。

大陸的淪亡　國民政府究竟何去何從？蔣總統被黨內主和派所迫，於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辭職，而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李仍舊希望能保住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開始與中共談判，但於事無補。勝利如此迫在眉睫，毛說什麼也不會妥協。四月二十一日，毛的部隊渡過長江，三天後佔領南京。爲了安全，國民政府搬到廣州。共軍此時自四面八方蜂擁而至，擋也擋不住。眼看局勢如此，毛不等佔領全部的中國領土，就在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國民政府於十月十三日從廣州遷往重慶，再於十二月八日從重慶移到台灣。這個時候，共產黨併吞整個中國大陸的工作終於完成。經過了二十八年的掙扎(一九二一年到四九年)，毛澤東終於爬到了權力的頂峯。

第六節　美國所扮演的角色

美國援助的失效　中國內戰時期美國作了些什麼？她所要承担的「罪過」何在？吾人要明白杜魯門總統早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派遣馬歇爾來華之前，即已明言大規模援助需在國家統一的條件下才有可能。馬歇爾本人也在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中一而再地告訴蔣氏，美國並不準備參與中國內戰，並認爲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會積累形成經濟崩潰。蔣氏不願美國干預剿共戰爭，投下了命運的骰子。

華府方面主要的錯失在於無能發展積極的對華政策。它既不否認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又不整個從中國解脫，却在半推半就中做部分的撤退及有限的援助——如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提供二千七百七十萬美元的經援，建立小型駐華軍事顧問團來提供諮詢。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使華府親國民政府的人士及「中國遊說團」發啓一個運動，要求除非開展一個有意義的援華計劃，否則要抵制「歐洲復興計劃」。共和黨議員周以德於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宣稱：「（我們）必須也在亞洲求勝，否則終將失去歐洲。本人反對投票贊成以二百億元支援一個戰線，同時却忽視另一對我未來攸關重大的戰線的作法。」對他而言，失去中國將導致整個亞洲的淪陷。有鑑於美國已無兵可派，他乃要求給予實質軍援，俾國民政府淸除長城以南地區並保住東三省。麥克阿瑟將軍也持同一看法，請求更多的援華行動，並抨擊美方於中國內戰方殷之刻要求對方改革的作法：「當一棟房屋正遭祝融侵襲的片刻，我們不

可能先要求它改變結構設計圖，這是兩碼子事。」

爲呼應國民黨一九四七年終所提十五億元的四年援助計劃，其中第一年份經援五億元、軍援一億元，杜魯門於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提出十五個月份，五億七千萬元的補助金，來緩和中國經濟衰退之勢。當時適逢東北及北部地方告急，國軍正處於嚴重挨打的時期。只有直接的軍事介入才能挽回局勢，至少暫時挽回。但直認中國問題「實際上無法解決」的馬歇爾，拒絕投入美國部隊，因而喪失掉軍事干預的最後機會。甚且，援華案在國會又遭受阻撓，被裁掉百分之十三，變成四億元，而且要等到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的下半年，當國民政府幾乎已一籌莫展之時，才來提供。這個援助實在太少、太慢。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三十日，毛宣布國民政府的結束已指日可待。八月十三日馬歇爾也說：「對於這個超過我瞭解範圍及判斷能力之外的問題，我已經洗手不再干預了。」

杜魯門放棄援助計劃　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的大選年中，國民政府的不幸又與美國撲朔迷離的政局糾纏一起。由於失望於民主黨的政權，國民政府的外交人員乃轉而支持共和黨，寄望大選能帶來統治權力的改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紐約州州長杜威，於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宣佈，如果當選，將擴大對華軍、經援助。却不料杜魯門大令世人驚訝，又在選舉中贏得一個響亮的勝仗，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及十二月，他兩度拒絕國民政府的求援。更糟的是他把仍留中國作爲支持國民政府象徵的一小支軍事顧問團也撤了回來。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一月蔣氏辭

職之後，華府裏頭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希望儘可能早一點脫離與中國的關係。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五月陳納德將軍請求美援七億元，來支持西南及西北地方諸省抵抗中共的最後一次要求，到了華府也如石沉大海地無回應了。

美國角色的檢討　事後檢討起來，或許有人會認爲美國「有罪」，因爲有許多應該做的不做，不該省的却省。但若說美國應該爲「中國的淪陷」負責，則不盡然。中國人的共產主義觀在國內已經發展了三十年的時間，外國的干預並不能改變其路線。如果在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春天以前，有主動的軍事介入，或許確能中斷其進展。而這個介入，根據中國問題專家的看法，需要十五萬的美國子弟（也雖然就後來發生的韓戰及越戰看來，投入一百萬士兵或許更爲實際）。但即使美國盡了最大的努力，也不過能暫時中止共產勢力的崛起，並給國民政府一個喘息檢討的機會，好來自己研商出解決的途徑，接著而來的問題是，當美國國內爲戰後恢復正常秩序，正在遣散部隊的時候，美國士兵究竟能夠而且是否願意在華長期逗留？事實上，美國無法避免中共的興起。但其政策的搖擺不定，在國民政府最需援助的時候斷然拒絕，則無異予蔣氏以最大的打擊，使他的希望落空，間接加速了國民政府的失敗。從這一點看，美國對於國民政府的失敗，應該分担一些責任。

第七節　國民政府失敗的原因

對於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失勢這等重要的事件，其原因究竟如何，史家們責無旁貸。此時由於檔案

尙未完全公開，或許還不能蓋棺論定。這裏，只能做嘗試性的解釋，單就犖犖大者論之，也許過分簡略也說不定。作者本人以爲最重要的一點，爲八年艱苦抗戰。它耗盡了政府軍的軍事、財政及精神力量。假如沒有抗日戰爭，中國的局面一定非常不同。因此，上一章所討論的中日困戰之不良後遺症，繼續在剿共的奮鬥中困擾著國民黨。國民黨爲中日戰爭所投下的巨資，也變成導向淪陷的第一筆債款。

虛有其表的軍事力量　雖然抗戰使國軍得到更佳裝備與訓練，但卻也使之成爲一支倦怠困乏的部隊。在抗戰末期原已顯現力不從心的國軍，其所以能够支撐到戰爭結束，依靠的是民族主義、愛國情操，以及對盟軍即將獲勝的期待。日本一投降，頓使大家鬆散下來，感覺上認爲任務終於完成，可以好好休息了。對於立刻接著再打一個內戰，大家都意興闌珊，心存厭煩。因此縱令接到命令，要打還是會打，但其心已倦、其力已窮。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中期的漂亮勝仗，此後再也不見。

共產黨方面則不然，中日戰爭中他們不曾担任主力部隊，而且反而趁機擴充軍隊。戰爭結束之時，正也是其羽毛豐滿之刻；對於未來，他們有的是清醒、活力與信心。說他們與國軍之對抗，正若一年富力強之青年對付一倦怠萬狀之鄉紳並不爲過。意識型態不說，單就耐力上的差別就註定了此次交手的結果。

除了戰爭帶來的困乏之外，國民政府的策略也有待斟酌。不顧美國人的勸告，逕把大批部隊投入滿洲，只有造成四十七萬之衆的被殺及被俘，當時應該將部隊集中來防衛長城以南的地區。逼迫延安，並爲捕捉共軍頭目而窮追不捨，進入沒有戰略價值的西北山區，也費掉四十萬部隊。淮海與平津之役，

由於指揮錯誤，人力上又造成另一無法彌補的損失。從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國軍喪失的部隊遠超過一百萬人；兵士的戰鬥意志消失了，剩下的也沒有辦法再繼續打了。

通貨膨脹與經濟崩潰 此戰爭帶來的疲憊與策略運用的錯誤更糟糕的是急劇惡化的通貨問題。抗戰期間原已十分猖獗的通貨膨脹，到了戰後更加無法控制。造成通貨問題最重要的原因是紙幣的過份發行。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總發行額為十三億圓，一九四八年底則到達令人乍舌的二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九兆九千九百億圓。造成自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到一九四八年每個月的物價指數升高百分之三十的結果。一九四八年八月法幣由金元券所取代。兌換率是三百萬法幣對一元金元券。但六個星期不到控制又告失敗，通貨膨脹又回復不可收拾的局面。從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短短八個月內，紙鈔增加了四千五百二十四倍。在上海一地物價指數飛升了天文數字也般的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二倍。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七月金元券由銀元券所取代，並可使用銀兩及錢幣，又進一步扭曲財政局面，加速了經濟崩潰。通貨膨脹及財政處置失策敗壞了億萬中國人民的生計，同時也整個摧毀了政府的威信。無怪乎大部分的中國人不反對，而且甚至期待着改變。

國民信心與敬愛感的喪失 除了財政不負責任引致猖狂的通貨問題外，國民政府官吏回到戰爭中被日軍佔領的地區之後，其乖張之行止，致令政府威信遭受永恆的打擊。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用藐視的眼光對待當地百姓，視其若叛逆或不貞。對敵人留下之財產，喜於佔有私用，而不充為地方父老之

福利，不知其在日軍佔領下已經備嚐艱辛。又獨佔營利商品及企業，公開與民競爭；公然拍賣救濟物資，得款悉歸己有。最惡劣的是強迫南部及中部地方人民將由日人支持之傀儡政權發行的貨幣，以過低的二百比一的比率來兌換法幣（實際上的比率並沒有這麼低）。如此一來，人民的儲蓄及現金突然間被大量削減，立刻造成深切的痛恨。這種情事在早幾年以前就已經發生一次，那時當地的傀儡政權硬將他們所持的法幣，以二比一的比率換成偽幣。這兩度的兌換，使人民眞正存有的錢僅剩下原來所存的四百分之一。佔領區內的這些百姓，苦等八年才返回國民政府統治，如今被如此無情地榨取，如此的受人瞧不起。這種際遇直讓他們懷疑是否在日人統治下生活比較好。國民政府官員乖張舉止的眞正後果，就是造成了千萬受苦受難同胞的疏離與冷漠。

美國仲裁與援助的失敗　如果美國能在中日戰爭期間採取不同的方針，則戰後的中國應不致於如此。首先，戰爭開始的前四年（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如果她所給予中國的援助能夠更切實際，則或可強化國民政府的財政，以便在通貨剛剛開始膨脹的時候就加以控制。藉著及早鏟除惡劣狀況之滋生，後來的急轉直下不可收拾之局面也許不致發生，而避免經濟最後的崩潰。其次，假如美軍保持原來從中國大陸攻擊日本的策略不變，則美軍將在中國沿海諸省登陸，從日軍手中爭得領土再轉歸國民政府，而減少被共產黨佔領的機會。然而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盟軍策略的改變，排除了該項計劃，而代以從太平洋來攻擊。此一決定將國民黨的中國置於戰略上並不重要的位置，使得她在戰爭突然終止的時候，眞不知如何來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和平。

除上述經濟及軍事的考慮之外，美國在對華外交方面也喪失至少三個足以行使決定性影響的機會。第一、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到十月間，毛澤東訪問重慶之時，赫爾利如能在仲裁時扮演更爲積極的角色，說不定能說服國民政府接受毛所提議的「過渡性安排」，從而避免立即展開內戰。這個珍貴的機會被忽視掉了。第二、如果馬歇爾再多施些壓力，使國民政府尊重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則彼此間的敵意也可能減緩。第三、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春國民政府正在嚴重撤退之中，設若美國掌握最後機會作軍事干預，則狀況亦不致如此。但她並沒有這麼做。事後同想起來，美國似乎是應爲而不爲，喪失了這些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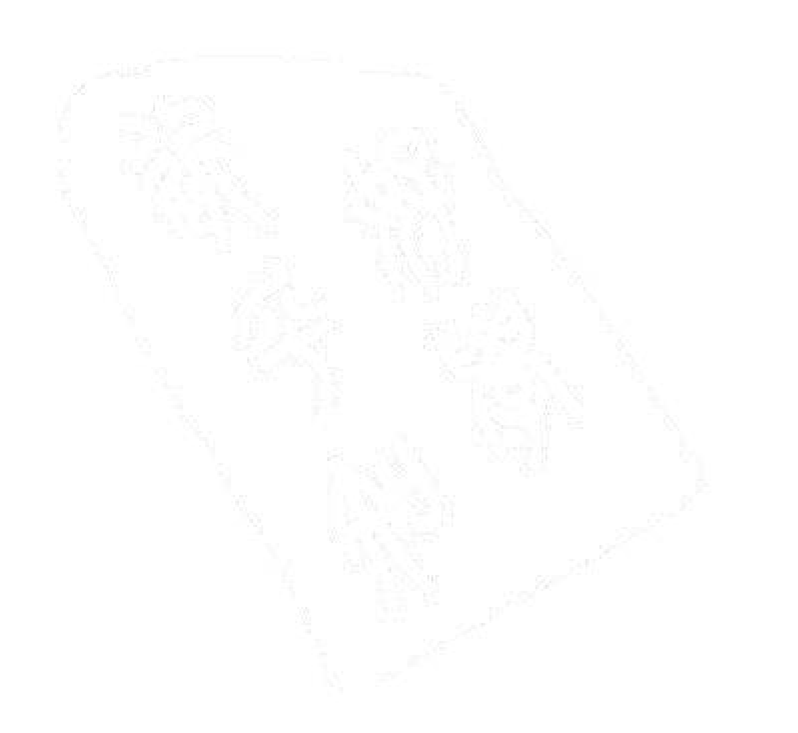
美國人仲裁之所以失敗，部分種因於對共產黨的天眞想法，視其不過是農業改革者，不同於蘇俄共產黨。其實近年來的各種事件證明，前者比後者更加激烈急進。美國人又流傳着一種講法，認國民黨爲法西斯、獨裁，而且封建。其實他們難得一天來安享和平，來推動自從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掌權以後，所汲汲然立意實施的民主重建計劃。美國人所洋洋得意在中國組織聯合政府的觀念，事實上是不能行的。因爲國民黨及中共同樣都是革命政黨，除非時間非常短暫，如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以及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的聯合，否則絕難彼此妥協，而且，聯合政府也只能轉移內戰於一時，而不可能將之作無止境的延後。

由於調停的失敗以及接下來對實況的完全不了解，美國所給予國民政府的只是有限的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援助，數量上太少而且時間上太遲。對於後面這一點，國民政府是打錯了算盤，他們原以

爲美國應該不會眼睁睁地看著他們往下沈的。

社會與經濟改革的遲滯　以上所述乃國民黨失勢的近因。至於迫切需要的社會與經濟改革未能及時展開，則爲失敗更爲基本的原因。而其所以忽視改革，部分導源於此種壓倒性的態勢究非國民黨所能控制。南京政府二十餘年的統治之中，艱難險厄接二連三而來，壓著南京政府未得一年的和平，壓得它精疲力竭。開頭是新軍閥與舊官僚的挑戰，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日本的侵略及中共的造反又接踵而至。國民黨一方面要忍氣吞聲避開日軍的挑釁，另一方面又要對中共展開五次圍剿。它根本不可能存有時間及意向，來應付那些更根本、但却似乎不太緊迫的經濟公正及社會改革。不祇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理想無法實現，甚至更爲溫和的三七五減租都不能付諸實施。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依然僅止於理想。後來中日戰事掀起，軍事問題優於一切，這個原已遲到的社會改革更被置諸腦後無暇問津了。

然而，撇開環境的劣勢不談，國民政府缺乏經濟社會改革之原動力，則也是事實。建立在海岸省份，與內陸十分隔離的南京政府，依賴關稅及都市內商業交易稅收來維持開支，不能對農業問題深入注意。對農人不了解，看不到他們所急切需要的東西，對其惡劣的境遇無法解決。甚至，仍舊在治與被治嚴然區分的老式觀念中打轉，視農家爲無足輕重的對象。却不知農業羣衆最具革命潛力，而不曾動過將之加以組織的念頭。就是因爲在這個地方忽略了，造成毛無比良機，使他們發揮最高的力量。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